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hinese

2008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1933年-1949年)

Wan Ching CH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鍾蘊晴 (2008)。《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1933年-1949年) (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hi_etd.13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
(1933 年—1949 年)

鍾蘊晴

哲學博士

嶺南大學

二零零八年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
(1933 年—1949 年)

鍾蘊晴

此論文為中文哲學博士學位課程之部份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零八年

論文撮要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1933—1949 年)

鍾蘊晴

哲學博士

《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創刊於 1902 年 6 月 17 日，至今已出版將近 106 年，完整地記錄了中國百年滄桑。《大公報》香港版創刊於 1938 年 8 月 13 日，復刊於 1948 年 3 月 15 日，半個多世紀以來，見證了香港的風雲變幻。

論文主要研究三、四十年代《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歷經沈從文(主要編輯時間：1933 年 9 月—1936 年 4 月)、蕭乾(主要編輯時間：1936 年 4 月—1939 年 8 月)、楊剛(主要編輯時間：1939 年 9 月—1941 年 12 月)三位主編的薪火相傳，不僅擁有全國文藝副刊中最廣泛的作者群，而且被譽為中國近現代著名作家的「文學搖籃」。當時大部分新進作家的初期之作，相當一部分是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率先發表。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成為中國文學運動的中堅。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副刊，與《大公報》的社評、星期論文和新聞通訊一道，被中國新聞史學家評為「當時新聞界四絕」。

論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引言」，第二章是「文藝副刊是中國報紙特色」，第三章是「《大公報》『四不』及對文藝副刊的影響」，第四章是「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五章是「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津、滬版)」，第六章是「蕭乾、楊剛編《文藝》(港版)」，第七章是「《大公報·文藝》走進歷史」，第八章是結論「《文藝副刊》和《文藝》的主要貢獻」。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文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鍾蘊晴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八日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一、	《大公報》副刊名列「四絕」.....	8
二、	沈從文、蕭乾、楊剛一脈相承.....	9
三、	對《大公報》文藝副刊既有的研究.....	11

第二章 文藝副刊是中國報紙特色

一、	文藝副刊的特點是刊登創作.....	22
二、	文藝副刊「五四」時期繁榮.....	23
三、	報紙文藝副刊的主要功能.....	25

第三章 《大公報》「四不」及對文藝副刊的影響

一、	《大公報》四個歷史階段.....	33
二、	《大公報》的歷史地位和貢獻.....	37
三、	「四不」主張與第三條路.....	43
四、	《大公報》「四不」主張對副刊的影響.....	55

第四章 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

一、	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四個時期.....	67
二、	《文藝副刊》的前身是《文學副刊》.....	69
三、	中國「第一個職業作家」——沈從文.....	75
四、	《文藝副刊》為沈從文事業插上另一隻翅膀.....	81
五、	讓《文藝副刊》變成新文學陣地.....	87
六、	嘔心瀝血扶掖文學青年.....	89

第五章 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津、滬版）

一、	蕭乾與《大公報》的淵源.....	100
二、	《小公園》的歷史沿革.....	109
三、	蕭乾改造《小公園》.....	112
四、	蕭乾編《文藝》（津、滬版）.....	120
五、	掌握副刊特性揚長避短.....	133
六、	《文藝》全力推動書評.....	136
七、	集體討論活躍《文藝》.....	150
八、	書評——未完成的夢.....	156

第六章 蕭乾、楊剛編《文藝》(港版)	
一、 蕭乾遙編《文藝》(漢版)	160
二、 《文藝》(港版)重整旗鼓	162
三、 「綜合版」清算日本	173
四、 《大公報·文藝》穿上戎裝	179
五、 楊剛接編《文藝》(港版)	184
六、 《文藝》(港版)跨上戰馬	191
七、 兩次討論激起千層浪	197
八、 楊剛接手《文藝》(桂版、渝版)	201
 第七章 《大公報·文藝》走進歷史	
一、 《文藝》見證傳媒生態變化	206
二、 抗戰勝利後的《大公報·文藝》	215
三、 《大公報》與沈從文、蕭乾和楊剛的命運	225
 第八章 結論 《文藝副刊》和《文藝》的主要貢獻	
一、 催生「京派」文學流派	238
二、 為報紙文藝副刊樹立核心價值	243
三、 引發全國性四次文藝論爭	248
四、 中國第一個文藝獎金——《大公報》文藝獎金	253
五、 林徽因編《文藝叢刊：小說選》	255
六、 提倡獨立書評開風氣之先	257
七、 《文藝副刊》和《文藝》與時俱進	262
 附錄一：論文英文簡介	265
A Study on Takungpao's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the 1930s and 40s	
 附錄二：《文藝叢刊：小說選》	266
 附錄三：論文參考書目、資料	268

致謝

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承蒙嶺南大學中文系梁秉鈞教授一直以來的悉心指導和不斷鼓勵，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得到許子東老師、許子濱老師、劉燕萍老師、黎梅笑貞女士、馬文通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不盡感激！

鍾蘊晴

2008 年 5 月 18 日

第一章

引言

《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由英斂之創刊於天津，至今已連續出版了接近一百零六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報紙，也是中國新聞史和全球華文傳媒史上惟一一張連續出版時間超過一個世紀的中文報紙。

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方漢奇，在評價《大公報》的歷史地位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大公報》的貢獻，還表現在它為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大公報》的社評、星期評論、副刊和新聞通訊極具特色，成為當時新聞界的四絕」。¹

獲方漢奇高度評價的，主要是指1926年9月1日至1949年，由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合組新記公司，續刊《大公報》時期，後人稱為「新記《大公報》」。而被評為「四絕」之一的《大公報》副刊，尤以文藝副刊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是1933—1949年期間《大公報》影響最大的兩個純文學副刊，由於辦得出色，「同樣為《大公報》吸引了一大批讀者，成為報紙眾多版面中的一顆耀眼明珠，是中國新聞史上繼著名的『五四』時期『四大副刊』之後的又一著名的報紙副刊。」²

一、《大公報》副刊名列「四絕」

本文重點研究《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1933—1949年），主要是指以下三個主要時期：

¹ 《與時代並進》，香港《大公報》編印，頁7。

² 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14。

1933 年 9 月 23 日—1935 年 8 月，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

1935 年 9 月 1 日—1939 年 8 月 31 日，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津版、滬版、漢版、港版)；

1939 年 9 月 1 日—1941 年，楊剛接編《大公報·文藝》(港版)。

期間偶有間斷，如受戰火影響，《大公報·文藝》(滬版)被迫停刊，1937 年 8 月—1938 年春，蕭乾曾被《大公報》裁員。期間也有重疊，如 1935 年 9 月—1936 年 4 月，蕭乾曾與沈從文合編《大公報·文藝》(津版)一段時期，蕭乾負責周一、三、五共三期，星期特刊則由沈從文負責。但大部分時間，《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出版都屬正常。

1933—1949 年，既是新記《大公報》各項事業進入鼎盛時期，也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發展的輝煌時期；既是《大公報》文藝副刊與中國現代文學關係最密切的時期，也是編者沈從文、蕭乾、楊剛個人文學創作、新聞事業交相輝映的黃金時期。

二、沈從文、蕭乾、楊剛一脈相承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蕭乾、楊剛，因其個人世界觀、文學觀、號召力和辦報理想，為《大公報》文藝副刊帶來了新氣象、新風格。《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原則和傳統，倡導的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注重技巧的文藝氣息、「只認作品不認人」的平等機會，以及無門戶之見的包容襟懷等，代代相傳，成為《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核心價值，備受當時新聞界、文學界的推崇。

沈從文是蕭乾文學上的第一位老師，1935 年蕭乾進入《大公報》任文藝副

刊編輯，沈從文是介紹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沈從文與蕭乾亦師亦友，關係密切。而 1939 年楊剛進入《大公報》任文藝副刊編輯，又是蕭乾作介紹人，蕭乾與楊剛從學生時代就相識，以姐弟相稱，無話不談。

沈從文、蕭乾、楊剛，都與《大公報》文藝副刊有著深厚的淵源。他們三人既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者，也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要作者和長期讀者。沈從文早年的重要創作和文學評論，以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刊發最多。而《大公報》文藝副刊更是蕭乾的文學搖籃，蕭乾最早的六篇小說全部投到《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楊剛是《大公報》文藝副刊最早的書評作者之一，每次《大公報》文藝副刊組織的書評活動，楊剛都積極參加，她的不少文學作品，也是在這個副刊上與讀者見面。

沈從文、蕭乾、楊剛三人在《大公報》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共同從事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出任副刊編輯之外，沈從文還是《大公報》星期論文的重要寫手。蕭乾曾任《大公報》駐英特派員兼戰地記者，撰寫了大量的通訊特寫，其後又任《大公報》社評委員會委員，撰寫了近二百篇《大公報》社評。楊剛曾任《大公報》駐美記者，並參與了 1949 年將天津《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的工作。

本文將沈從文、蕭乾、楊剛三人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放在一起研究，探討 1933—1949 年《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歷史脈絡和繼承發展，從一個側面展現《大公報》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歷史過程，從一個平台透視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路向和潮流興替，從中也可看到中國文學史、新聞史的名家：沈從文、蕭乾、楊剛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榮辱與共、命運相連。

本文將沈從文、蕭乾、楊剛三人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放在一起研究，

一方面可以看到，從《文藝副刊》和《文藝》，無論是編輯人選、編輯方針、作者隊伍、作品內容，都有不可分割的延續、傳承與發展。另一方面，研究沈從文、蕭乾、楊剛所編輯的不同時期《大公報》文藝副刊，也可看到同一報紙副刊同一編輯，因時代不同而面貌有異，同一報紙副刊在不同的編輯手中，又有了鮮明的個人色彩和編輯風貌。

比如，文藝副刊具有文藝性、知識性、戰鬥性、趣味性等多種功能，沈從文主編的《文藝副刊》文藝性最強，他對純文學作品的偏愛勝於蕭乾。而蕭乾在注重文藝性的同時，也強調知識性，他推廣書評的力度超過沈從文。楊剛接手《文藝》，則更偏重於戰鬥性，注重發揮文藝副刊的宣傳功能。這些文藝副刊辦刊宗旨的微調或差異，直接體現在編者的選稿標準、約稿要求、欄目設置、篇幅大小等的不同處理上，除了編輯個人的主觀因素，也與時代要求、作者群和讀者群的變化等外在因素息息相關。

三、對《大公報》文藝副刊既有的研究

中國是報紙文藝副刊的大國，文藝副刊肩負領導時代文化運動的使命，對中國文藝運動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多少後來成為大作家的，都是先經過向報紙副刊投稿起步，接著在雜誌上出現，最後由出版社出書。

中國報紙文藝副刊不但在中國新文藝運動中起過巨大作用，它還影響到東南亞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華文報紙。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這樣中文文學雜誌寥寥無幾的地方，報紙文藝副刊還成為當地作家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

曾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先後七年的蕭乾，每逢談起中國報紙的特色，總是首先提到文藝副刊。他倡議中國現代中國文學史，應該為「五四」以來的文藝副刊單闢一章。

1988年9月13日，蕭乾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應該研究報紙副刊》，文稱：「遍翻幾部現代中國文學史，看不到哪位文學史家正視過文學副刊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起過的作用，做出的貢獻。然而多少作家是在二、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晨報》、《京報》，天津的《大公報》、《益世報》，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開始寫作的呀！」¹由《大公報》人王文彬編撰的《中國報刊的副刊》一書，也是由蕭乾力薦給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蕭乾並為之題寫《序言》。²

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方漢奇，曾在全國新聞工作研究座談會上作「關於新聞史研究的幾點體會和建議」的發言，直指對中國報紙文藝副刊的研究工作很不夠，「它不僅是文學史應該研究的內容，也是新聞史應該研究的內容。」³

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就與報紙文藝副刊結下不解之緣，文學作品借助報紙文藝副刊得以迅速傳播，而文藝副刊也因有了文學的加盟、充實，一躍成為報紙中吸引長期讀者的法寶，成為向「普羅大眾」提供文學作品、傳播新思想的主要媒介。

由於報紙文藝副刊在文學史和新聞史中特殊的「兩棲」身份和功能，在中國文學史和新聞學史的研究中，報紙文藝副刊一直叨陪末座，成了名符其實的「報屁股」。由於報紙文藝副刊受版面、篇幅所限，刊載作品以短篇小說、散文、

¹ 蕭乾《應該研究報紙副刊》，《蕭乾文集》第9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75。

² 《大公報·大公園》，2000年4月30日。

³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詩為主，現代文學史上一些經典名篇，如曹禺的《雷雨》、《日出》，難以在副刊一次過刊出，若連載的話又有損劇力，為使作品有一個更適合的發表平台、更完美的發表效果，當年《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蕭乾，雖與曹禺相熟，但也不敢力爭，不少好作品就這樣與文藝副刊失之交臂。

報紙文藝副刊從最初的報刊的「附刊」、「附張」、「餘興」等「衍生物」轉為報紙的「延伸物」，成為報紙重要的組成部分，報紙副刊的地位提高了，但與新聞、言論等報紙的核心內容相比，文藝副刊顯然處於「次核心」或「非核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大公報》滬版縮減版面和人手，首當其衝的是文藝副刊，連編輯蕭乾也被裁員。從中國新聞史的角度，研究報紙的文藝副刊，只能排在新聞、言論之後，有的甚至聊備一章。

嚴格地說，中國報紙文藝副刊，屬於新聞與文學相結合的產物，屬於中國新聞文學史的範疇。《中國新聞文學史》一書，將「具有新聞性的、在創作發表上時效性比較強的、具有確鑿的真實性的、帶有輿論導向性質、大多以新聞報刊為載體的文學作品」，稱之為「新聞文學」¹。這種定義顯然並未涵蓋所有報紙文藝副刊，比如在文藝副刊刊登的虛構小說沒有確鑿的真實性，算不算「新聞文學」？如果不算，那麼，大量的文藝副刊又將被剔除在新聞文學史之外。但「中國新聞文學史」這個概念的提出，的確為報紙文藝副刊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維、新方向。

中國已有多部現代文學史，也有不少近現代新聞史專著，但以「中國新聞文學史」為名的研究專著，直至 2004 年才有第一本²。近現代報紙文藝副刊的評究現狀，與它歷史上曾發揮的作用和影響，並不相稱。

¹ 李白堅主編《中國新聞文學史》，上海大學出版社，頁 2。

² 李白堅主編《中國新聞文學史》序言，上海大學出版社，頁 2。

最近幾年，研究中文報紙文藝副刊、研究《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人開始增多，不少專門的論文和著作陸續面世，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大部分著作和論文，從文學史的角度，著重研究《大公報》文藝副刊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貢獻和影響，本論文想繼續前人的討論，但強調報紙文藝副刊作為載體的特殊身份。它是附在一張日報上的，是日報有機的組成部分，因而該報紙的辦報宗旨、歷史定位、讀者對象，以及領導層對副刊的態度，都會直接影響到文藝副刊的發展方向。

同時，若單純從現代文學史的角度來研究文藝副刊的作家、作品，甚至與同時代、同一作家其他作品相比較，也存在一些偏差，從傳播學角度來看，忽略了傳播途徑的分別，一部文學作品作為書的面目呈獻、作為雜誌的面目呈獻，與在報紙中呈獻，傳播速度不同，讀者群不一樣，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有分別。

從傳播學的角度，從新聞史的角度，研究《大公報》文藝副刊地位和功能，這幾年有關論文、著作陸續問世，如關於沈從文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專著出版等。本論文特別關心沈從文、蕭乾、楊剛三人，作為副刊編輯，如何薪火相傳，共同創造了《大公報》文藝副刊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副刊輝煌，作一研究。

（一） 沈從文未列新聞界名編輯

以沈從文為例，他是中國報紙文藝副刊史上聲譽卓著的編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主持報紙文藝副刊，特別是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為沈從文從事文學事業插上另一隻翅膀。從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回憶沈從文的文章，憶述沈從文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時期往事的，佔相當的篇幅。

《沈從文傳》的作者凌宇，研究了大量的沈從文作品與生平資料之後，稱：「沈從文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上升，不僅主要取決於他在文學創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於他所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這個評價，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海內外研究沈從文的專家學者，大多將沈從文的一生一分為二，一是 1949 年之前，沈從文的作家生涯(20 世紀 20—40 年代)，二是 1949 年至 1988 年沈從文逝世，沈從文的學者生涯(20 世紀 50—80 年代)，這中間往往忽略了沈從文早年作為報紙文藝副刊編輯的生涯和成就。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為近代以來一百零八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設立了專門的辭條，其中《大公報》人佔了十二條，其中不見沈從文的名字。列名《中國新聞年鑒》「中國新聞界名人簡介」欄的《大公報》編輯記者有三十六人之多，是所有報紙中最多的，沈從文也不在其列。

1994 年出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吳廷俊所著《新記〈大公報〉史稿》一書，全書三十八萬字，其中對沈從文應《大公報》之邀兼編專門性副刊《文藝副刊》，只用寥寥數百字，輕輕帶過。¹

2004 年出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方漢奇等著的《〈大公報〉百年史》，全書近四十九萬字，但對沈從文所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提及更少，只有兩行字，稱：「從 9 月 1 日起，《文藝副刊》和改版後的《小公園》合併創辦《文藝》副刊，由蕭乾主編」²。

¹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頁 184。

² 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251。

直至 2006 年 5 月，山東書報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與〈大公報〉》一書，將沈從文編《文藝副刊》的編輯生涯和歷史貢獻，較為全面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但只限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也只限於《大公報·文藝副刊》。

事實上，抗戰勝利後的 1946 年至 1948 年，沈從文攜家眷自昆明經上海，在蘇州小住後回到北京，繼續擔任北大教授，同時，他又受聘擔任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的主編，同時還參與了《大公報·星期文藝》、《經世報》和《平明日報》文學副刊的編輯工作。

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這一段歷史受到忽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兼職身份

沈從文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四個時期，一直都是兼職身份，並非《大公報》正式員工。他工作的地點也是另立門戶，未在《大公報》編輯部辦公，如沈從文最早接手《文藝副刊》，就在北京單獨設立編輯部，而當時《大公報》的報館位於天津。與沈從文交往最多的是副刊的作者，而非《大公報》同人。

與沈從文主編《文藝副刊》一樣，同屬兼職身份的吳宓，曾主編《文學副刊》，在有關《大公報》的書籍中也少人提及。這就不難解釋，歷年來由《大公報》人撰寫的各種紀念文章，出版的各種紀念文集，幾乎都沒有涉及沈從文，因為大家一直未將沈從文視為《大公報》人看待。

（2）1949 年後最早離開文藝隊伍

沈從文是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最早被剔除作家身份、趕出文藝隊伍的知名作家。

1949 年 7 月，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沈從文榜上無名。1953 年，全國第二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沈從文雖然榜上有名，卻是以美術組的成員身份與會。1949 年之後，沈從文從此與心愛的文學創作正式告別，後半生皓首窮經，埋首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和《中國新聞年鑒》都是 1949 年以後撰稿和出版，當時沈從文專業作家的身份尚且不保，他身為編輯的成就和貢獻，自然也不會受到重視。

（二） 對蕭乾、楊剛的編輯生涯研究不足

蕭乾一生，與《大公報》的賓主關係長達十五年，進去時還是小青年，走出時已是中年了。1998 年 10 月出版的《蕭乾文集》共十卷，三百二十萬多字，收集了他主要的著作，包括回憶錄、散文、特寫、隨筆及譯作。在蕭乾的生活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中，作者回顧了童年至 1988 年的人生歷程，全書分七章，「我與《大公報》」（1935 年—1939 年），佔了整整第三章，而在第四章「旅英七載」、第五章「大十字路口」，都有相當的篇幅談及《大公報》。¹

在《大公報》時期，蕭乾在新聞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早在《大公報》嶄露頭角、廣為人知，還是作為一個副刊編輯，參與創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輝煌，成為《大公報》文藝副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

¹ 《蕭乾文集》第 6 卷，浙江出版社。

一。

蕭乾對於自己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前後七年十分珍惜，他在《我與副刊》一文中強調：「我認為現代中國文學史，應當有一章專門談談『五四』以來的報紙文藝副刊。不但副刊作為文藝搖籃的功績應得到承認，同時也必然涉及到不少作家的成長過程。」¹

蕭乾在編輯《大公報》副刊時期，也是他一生創作最旺盛、作品最多的時期，當年他來往密切的文壇人物，包括沈從文、楊振聲和巴金等，亦師亦友，直接影響了他的文學道路和人生路向。

蕭乾曾先後在《大公報》津版、滬版、漢版、港版工作，跨越《大公報》發展的多個重要時期和出版地點，他改版《小公園》、創刊《文藝》，在漢版和港版分別復刊《文藝》，對《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振興和繁榮，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長久以來，研究新記時期《大公報》的人多，研究新記《大公報》副刊的人少；研究作為作家、翻譯家的蕭乾人多，研究作為《大公報》副刊編輯的蕭乾人少。作為編輯的蕭乾，與作為文學家、新聞記者、翻譯家的蕭乾同樣出色，且不可分割。對於別人稱呼他為「作家」、「散文家」、「翻譯家」，蕭乾自己更喜歡「記者」、「報人」這樣的稱謂。從目前有關的蕭乾研究來看，對蕭乾編輯生涯的研究著作，遠遠低於對他文學成就、翻譯特色的分析和探討。不少新聞史研究，談到蕭乾，也更多地介紹他的旅行通訊、戰地通訊，而對蕭乾編輯文藝副刊時期反而著墨較少。

¹ 《科技日報》，1988年9月2日。

有關楊剛的研究，這些年來一直是薄弱的一環，特別是因為她於 1949 年參與將天津《大公報》改造成《進步日報》，她的歷史功過，在《大公報》史的研究學者中至今仍存爭議。楊剛後來調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1957 年離奇自殺身亡，至今謎團未解。目前能看到楊剛最新的資料，一是 1983 年出版的《楊剛文集》，一是 2007 年出版的《〈大公報〉名記者叢書·楊剛卷》，收錄了作為作家的楊剛的文學作品和文論，以及作為記者的楊剛於 1944 年寫下的一批《美國通訊》，但對楊剛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研究仍極少見到。

實際上，楊剛編輯《文藝》（港版），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紮根港九、本地化的一個開始，楊剛分別於 1939 年和 1940 年在《文藝》（港版）開展的有關「民族文藝」和「新式風花雪月」的大論爭，在香港文壇掀起波瀾，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值得香港文學史學者和香港新聞史學者認真研究。

本人在香港《大公報》工作超過十七年，先後做過記者、編輯和社評委員會委員，因而更能理解沈從文、蕭乾、楊剛對《大公報》的感情，更能感受《大公報》報社的工作流程、用人方式、管理體制，寫作此論文時也更有責任感和使命感。

本論文嘗試更多地從《大公報》歷史的角度，來研究 1933—1949 年的《文藝副刊》和《文藝》。該看到，這兩個文藝副刊是當時作家作品的重要平台、載體，而《大公報》又是這兩個文藝副刊的重要平台和載體。雖然文藝副刊的編輯方針有其獨立性，約稿、設欄、排版、組織討論有其自主性，甚至副刊部也曾經異地另設，但《大公報》的辦報宗旨、新聞報道水準、言論立場、組織架構、管理特色、讀者定位等，都不可能不對文藝副刊帶來影響。比如，蕭乾在改造《大公報》副刊《小公園》時，首先要研究《小公園》的傳統和存稿，楊剛接手《大公報》港版《文藝》，首先做的功課，就是研究《大公報》的「四不」

辦報宗旨等。《大公報》文藝副刊幾度易人，選人過程，代表了《大公報》對副刊路向的設計、對副刊狀況的革新。

近年，不少研究專著、論文都高度評價《大公報》港版《文藝》為發表抗戰文學的重要陣地，但這並不是孤立的現象。翻開同時期的《大公報》，看看它的抗戰新聞，它的抗戰社評，它的其他副刊和專刊，就會發現，形式盡管多種，但主題只有一個：發動民眾，打擊敵人，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也有不少研究專著，由於單獨研究編者個人與文藝副刊的關係，評點《大公報》文藝副刊背後的文壇與人生，對編者個人的文學修養、文壇地位、個人能力與魅力著墨較多，如《沈從文與〈大公報〉》一書¹。而對沈從文與《大公報》關係、沈從文的世界觀、文學觀與《大公報》辦報宗旨相契合等，則未充分展開。

我們不否認《大公報》文藝副刊聲名鵲起，與沈從文、蕭乾、楊剛的個人名望、修養、創意緊密相連，與他們的號召力、凝聚力、組織策劃能力相輔相承，這些個人的因素，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地位、作用，也為《大公報》帶來了一批高素質的作者和年輕的讀者。但也不能忽略《大公報》所發揮的品牌效應，給沈從文、蕭乾、楊剛所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發表言論的陣地，以及發展事業的平台。

以沈從文為例，一方面沈從文給《大公報》文藝副刊帶來了明星效應，另一方面《大公報》的品牌也給沈從文及其聯絡的作家、發表的作品，帶來了明星效應。從《大公報》史的角度來加以研究，我們就不難明白，沈從文在為《大公報》編文藝副刊之前、之後，都曾經編過其他報紙、雜誌的文藝副刊，同是

¹ 杜素娟著《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

沈從文主編，同是文藝副刊，聯絡的作者也相近，為何其他報紙文藝副刊，未如《大公報·文藝副刊》一樣獲得較大的成功與影響？而蕭乾進入《大公報》之前還是新人，是《大公報》這個平台給他提供充分發揮的自由與空間。

本論文偏重從《大公報》辦報宗旨和發展歷史，結合現代文學史的發展和文藝副刊的演變，來探討《文藝副刊》和《文藝》的歷史地位。畢竟文藝副刊的最大特性，在於它屬於特定報紙，通過大眾傳媒，將作者、編者和讀者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沈從文、蕭乾、楊剛編輯的《文藝副刊》和《文藝》，既是現代文學史、新聞史的重要課題，也是《大公報》歷史的重要一頁。

第二章

文藝副刊是中國報紙特色

中國近代報刊，是內容和形式都比中國古代報紙先進的新型報刊，在鴉片戰爭前西方列強圖謀打開中國大門的過程中傳入中國。近代報刊作為舶來品，在中國的創刊、發展，尤其是中文報紙的發展、繁榮，從一開始就打上了深刻的中國烙印，因應中國的國情、文化、民意，報紙在中國本土化的發展過程中，創造和發展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和百姓喜聞樂見的報紙形式。其中，又以文藝副刊，最具中國報紙的特色。

一、文藝副刊的特點是刊登創作

踏入二十世紀，中國報紙與文藝的關係，要比外國報紙來得密切。當時，西方報紙也有文藝副刊，如英國《泰晤士報》或美國的《紐約時報》，但它們主要刊登書評。英國《泰晤士報》，它有文藝副冊，一周有很厚一本，可以單訂，裡邊都是書評，並沒有文藝創作。雖然偶爾也登一首詩，但純粹是為了點綴版面，且大多出於名家之手，並不經常。

又如，今日美國《紐約時報》也有副刊，但內容駁雜，包括：生活方式類副刊，如時尚、飲食、家居、保健等，文化娛樂類副刊，如書評、電影電視節目預告等，消費類，如房地產、汽車、家電、旅遊等。相比之下，中國副刊，尤其是早期副刊，受中國文化影響，因應讀者口味，偏重文藝，與文學、文化、藝術相關聯。

中國報紙文藝副刊的特點則主要是刊登創作，不乏新人新作。從民初，特

別是「五四」以來，中國報紙的文藝副刊一直是文藝青年的一個園地，他們往往在這裡邁出可喜的第一步。文藝副刊對許多作家來說，都起過搖籃作用。同時，不少早期作家也編過報紙副刊，並使之成為同行發表作品的重要園地。

中國是報紙文藝副刊的大國，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多少後來成為大作家的，都是先經過向報紙副刊投稿起步的，接著在雜誌上出現，最後由出版社出書。

中國報紙文藝副刊，不但在中國新文藝運動中起過巨大作用，它還影響到東南亞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華文報紙。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這樣中文文學雜誌寥寥無幾的地方，報紙文藝副刊還成為當地作家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

二、文藝副刊「五四」時期繁榮

文藝副刊並不是隨著報紙的誕生而出現的，中國近代報紙問世後八十年左右（約 1815-1896）的時間裡，只有間或一些文藝性的文字散落在各種報紙的角落，一直未成為報紙的固定內容。有些報紙在版面上專闢一角，刊登詩詞歌賦、小說筆記等輕鬆一些的內容，慢慢地又加入了一些隨筆、雜感等小文章。對於這些與新聞關係不大的軟性文章，有的報紙稱之為「雜粗」、「餘興」。突出其特點，一是雜、一是餘，都不是報紙的主要內容，所以，又有人稱之為「報尾巴」、「報屁股」。它的地位，甚至在廣告之下。

中國報紙文藝副刊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後半葉，當時的華文報刊，開始刊登文藝作品。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創刊的《申報》，自 1872 年 4 月 30 日創刊始，就將文藝作品作為必備內容，刊於新聞之後，使它大體有了較固定的位置，成為副刊的雛型。其他報紙紛紛仿效，除竹枝詞、戲評、八

股範文外，有的開始連載小說。

據《中國新聞文學史》一書的考證，1897年11月24日的《字林滬報》的副刊《消閒報》問世，它有固定的出版日期、內容和刊名，標誌著中國第一份副刊的誕生。¹後來，「附」逐漸被「副」字所替代，「副刊」方式也為越來越多的報紙所採用，為越來越多的讀者所接受。報紙副刊開始盛行，尤以文藝性的副刊居多。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中國絕大部分報紙都在自己的版面上設置了文藝副刊。新文化運動前，報紙副刊一般多是消閒性的讀物，內容多刊載詩詞、掌故、筆記、傳記、小品之類的文藝作品，夾雜一些新聞材料。不少副刊還充斥低級趣味、黃色的內容。

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報紙文藝副刊的情況發生了突破性的變革。在新文化運動的摧枯拉朽之下，定期、定版刊出、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報紙文藝副刊，被視為宣揚民主與科學精神，培植新文化，傳播新思潮的重要園地，出現了影響較大的「四大」著名副刊。包括：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京報》的《京報副刊》和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在眾多的報紙文藝副刊中，以《申報》的《自由談》，歷史較長，創始於1911年8月24日，一直堅持出版到1949年5月《申報》停刊，前後出版了三十八年。

進入三十年代，《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成為北方乃至全國頗具影響的文學陣地。尤其是《大公報》移師上海出版之後，《文藝副刊》更成為全國作家和文學青年風雲際會的平台。藉1936年紀念新記《大公報》十周

¹ 李堅白編《中國新聞文學史》，上海大學出版社，頁126。

年，《大公報》設立文藝獎金，開全國風氣之先。同時，收集兩年來《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作品，請林徽因編了一本《文藝叢刊：小說選》，成為同業又一創舉。

當時與《大公報》同樣在中國影響較大的幾份中文報紙，如北方的《京報》、《晨報》，上海的《申報》等，它們的文藝副刊，在新文學運動中，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邵飄萍創辦的《京報》，最多時擁有二十三種副刊，他並在報上發表聲明：「各種副刊上之言論，皆各保有完全自由，與本報無須一致。」¹

縱觀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報紙文藝副刊，辦得有聲有色。它們富有思想戰鬥性，提倡民主與科學思想，傳播新思潮，經常刊登短小政論和犀利雜文，論時事，砭錮弊，愛憎分明。它們強調文化娛樂性，介紹新文學，發表大量新詩、散文、短篇小說、知識小品等文藝作品，供給讀者精神食糧。它們注重知識性、宗教、哲學、科學、文學、美術各類稿件兼收並蓄，內容豐富，題材多樣，短小生動。

雖然也有不少副刊，在今日看來存在低級趣味，甚至有黃色內容，但它畢竟是娛樂了當時的讀者、滿足了市民茶餘飯後的消閒。從整體上看，中國報紙文藝副刊還是有益無害的居多，且報業市場本身，也一直在對文藝副刊進行著優勝劣汰。

三、報紙文藝副刊的主要功能

在「五四」以後，與文化啓蒙思潮相伴而生的是新文學勃興。異軍突起的中國文藝副刊，順應了開啓民智、改變惡俗的歷史潮流，集知識性、趣味性、

¹ 《京報》，1925年2月7日。

文學性於一身，新思潮、新文化、新知識和新文學，更多地借助報紙文藝副刊這一大眾媒體，喚起民心。

《中國文藝副刊史》一書認為：由白話文運動引起文白之爭，席卷報壇，並不可避免導致文學革命，這場文學革命的大旗由《新青年》雜誌舉起，文學革命的實績卻主要地表現在新興的綜合副刊和文學專刊中。¹報紙文藝副刊在中國現代文學建設中曾發揮巨大影響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作家發表作品的重要園地

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首先通過報紙文藝副刊這個陣地和讀者見面的。

魯迅一生給一百多種報刊寫過稿，他的大多數作品，包括《阿 Q 正傳》，都是首先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出來的。翻開《魯迅全集》，其中絕大部分雜文，率先刊於報紙的文藝副刊之上，如《花邊文學》及《准風月談》兩集，幾乎全部發表於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

而且，報紙文藝副刊，是雜文很好的載體，魯迅的雜文大都有感而發、抨擊時弊，時效性的要求特別強，只有報紙這種每天出版的刊物，最配合這種需求，也惟有報紙這種最普遍的讀物，令雜文「爆炸力」快速引爆。

沈從文的代表作《湘行散記》、《湘西》，也是率先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其後再發行單行本的。三十年代，由巴金主編的五十冊《文藝生活叢刊》中，不少作者都是從當時幾個報紙副刊或文藝雜誌上發現的。

¹ 馮並《中國文藝副刊史》，華文出版社。

（2）文學青年從事創作的起點

蕭乾進入文藝界，是從給文藝副刊投稿開始的。1933年，當蕭乾有幾篇小說被《大公報》文藝副刊選用後，信心加強，才慢慢往雜誌上投，後來出版社將其小說編成集子出書。從無名到有名，這是每個作家的成長過程。報紙文藝副刊之可貴，正在於它是這一過程的起點。

文藝副刊不光刊登青年的習作，還有老作家的文章。像蕭乾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投稿時，巴金、葉聖陶等許多名作家也在那裡寫文章。因此，文藝副刊也是老作家帶新作家的園地。巴金編十集一百六十冊《文學叢刊》時，每集不但包括各類文體品種，還從一開始就注意到新老結合，總讓當時剛冒出頭的新作者與像魯迅、茅盾那樣的老作家在一個集子同時出現。

（3）催生中國職業作家

自稱中國「第一個職業作家」的沈從文，一生與報紙文藝副刊有很深的淵源，他最初的文學作品，就是通過報紙副刊與讀者見面的。1923年，沈從文到北京求學未成，開始嘗試自學寫作，並向報紙文藝副刊投稿，據《沈從文傳》一書作者凌宇考證，1924年12月22日在《晨報副鐫》發表《一封未曾付郵的信》，署名休芸芸，是沈從文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另據沈從文晚年與美國學者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的對話，沈從文自稱：「我算是第一個職業作家，一個月大約二十塊錢三十塊錢……，(第一個作品)我只記得一塊七毛錢稿費，合三毛錢一千字，比給人家抄書還少一點，在《小

公園》發表。」¹

當時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等一批知名作家，雖創作頗豐，但各有一份固定職業及薪水。而沈從文為生活所迫，到處投稿，廣種薄收，賣文維生。後來，沈從文自稱「第一個職業作家」，主要指這一時期。

當時的職業作家，不少僅靠稿費生活，別無收入。例如張天翼的長篇小說《在城市中》，在《國聞周報》連載，當時《大公報》報館會計科計算字數創了空白，因而與作者本人所計算的相差數萬字。當時的副刊編輯蕭乾站在作者一邊，據理力爭。從此以後，計算稿酬，《大公報》會計科再也不創空白了。

對於一些靠寫稿為生的文化人，《大公報》比其他報紙，更樂於施以援手，一方面積極組稿，並盡快發表，一方面及時或提前支付給較優厚的稿費。黃永玉剛到上海時，知者不多，一度沒有職業，《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率先發表了他很多作品，既向讀者推薦這位美術界的新秀，又在經濟上給他援助。

（4）推動文學流派的形成

很多近現代文學著名的流派，也是通過報紙副刊這個陣地滋生、發展起來的。如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在上海，作品則以小說為主，以描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式才子佳人們相悅相戀的言情小說為大宗。報紙副刊是這一文學流派的策源地，也是它賴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基地。

類似鴛鴦蝴蝶派的文學作品，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前清。但是，典型鴛鴦蝴蝶派作品，則是從上海《民權報》副刊上所刊載的那些言情小說開始的。《民權

¹ 《沈從文晚年口述》，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27。

報》日出三大張，副刊佔一整版，除一些小欄目外，還有大量的長篇連載小說，有徐枕亞《玉梨魂》、吳雙熱《孽冤鏡》、《蘭娘哀史》，李定夷的《霄玉怨》、《紅粉劫》等。

繼《民權報》之後，成為鴛鴦蝴蝶派重要基地，還有《申報·自由談》、《新聞報·快活林》、《時報·餘興》、《時報·小時報》。此外，還有北京的《群強報》、天津的《天津晨報》、《午報》等四十餘種報刊。

(5) 推動文學新體裁流行

受篇幅所限，報紙文藝副刊每天收到的大量來稿，通常有超過一半的稿件，是散文、短篇小說、特寫。而文學青年也喜歡把這種鬆散的寫作形式當成「創作入門」，每日稿量需求龐大的報紙副刊，成為求新求變的文學青年多方面寫作試驗、可供發揮的場地，各種新體裁借助報刊散播開去。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公報》由何心冷主編的《小公園》，新舊交替，雖有一些舊的東西，但更多的是一些當時很進步的作品。大約在 1927 年—1928 年，《小公園》經常發表署名「蜂子」的詩，蜂子的詩具有濃厚的泥土氣息，他用通俗流暢的語言，抑揚頓挫，寫出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有強烈的感染力。蜂子的詩首先在天津引起轟動，一般文學青年，競相摹仿，稱為「蜂子體」。

三十年代名重一時的「言林體」，主要指《立報》的《言林》副刊刊載的文章，多為隨筆、雜文及小品文之類，文章短小精悍，既詼諧風趣，又發人深思，密切配合時事，針砭時弊，其特色是：文章雖短而意味深長，既有蜜也有刺。

（6） 爲文學評論、論爭提供重要平台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壇曾展開多場影響深遠的文學論爭，包括「左聯」爲兩個口號大開筆戰，一邊是以周揚爲首的「國防文學」，另一邊是以魯迅爲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另外，「左聯」又向同屬於抗日陣營的第三種人進行攻擊。這種筆戰，大部分是通過時效性強的報紙文藝副刊來進行的。

善於利用報紙副刊進行抗爭的作家，首推魯迅。1927年10月，魯迅由廣州至上海，直至逝世，在先後九年時間裡，他以報紙副刊等爲陣地，發表了大量「匕首」、「投槍」式的雜文，後來結集出版，僅在《申報·自由談》，魯迅的筆名就多達四十多個。魯迅曾說過：「報紙沒有一家沒有背景，我們可以不問，因爲我們自己辦不了報紙，只能利用它的版面，發表我們的意見和思想。不受到限制、干涉，就可以辦下去；沒有自由則放棄這塊園地。總之，應當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我們的黑暗和沉默」。¹

除了路線之爭、政治分野外，文藝副刊還是對作家、作品展開文學討論的重要平台，如曹禺《日出》問世後，《大公報·文藝》就邀請十幾位作家筆談，另外，就書評問題，《文藝》曾分頭請作家、讀者、書評家及出版家參加討論，每次都用整版篇幅刊出。

（7） 擴大文學作品的讀者群

報紙副刊儘管版面、篇幅受到限制，但相比文學類的周刊、月刊、文學書籍，有兩大明顯優勢。

¹ 轉引自《中國新聞通史》（下），武漢大學出版社，頁202。

第一是時效性強。報紙文藝副刊附在一份日報之上，與報紙的社論、新聞等捆綁在一起發行。而且報紙日日出版、版面不斷更新，對文學稿件需求量非常大，客觀上擴大了文學作品的展示平台，鼓勵更多的文學作品產生，使更多的文學作品不用「藏之名山」以留傳後世，縮短了文學作品與讀者見面的時間。報紙文藝副刊的文章發排後，很快就能同讀者見面，這種時效性強的優勢，是雜誌（季刊、月刊，甚至周刊）和叢書難以比擬的。

第二是讀者群大。隨著報紙的普及，銷量的上昇，報紙文藝副刊擁有比雜誌、叢書更廣闊的讀者群。成舍吾創辦的《立報》，發刊不到半年，日銷數即超過十萬份，到 1935 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最緊張時，日銷量接近二十萬份大關。¹在舊中國，《大公報》曾經出過津、滬、漢口、渝、桂、港六個版，日總發行量達二十萬份，這在當時，也是一個空前的數字。由此可見報紙發行之多、流行之廣，已成為社會上一股不可忽略的傳播力量。

報紙文藝副刊的以上兩大優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重要園地，培養了大批的作者和讀者，直接推動文學的普及提高和知識的傳播，迅速提高作家的知名度和擴大了文學作品的傳播範圍。

¹ 《中國新通史》（下），武漢大學出版社，頁 240。

第三章

《大公報》「四不」及對文藝副刊的影響

《大公報》以「忘己之爲大」的「大」字，「無私之謂公」的「公」字作爲報名，以《大公報》命名的報紙，在中國新聞史上先後有七家。1902年創刊於天津、至今仍在香港繼續出版的這一家《大公報》，是碩果僅存的一家，也是其中最知名的一家。

1926年，吳鼎昌(社長)、胡政之(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總編輯兼副經理)三人以新記公司名義，續辦《大公報》。1926年9月1日續刊第一天，張季鸞便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明确提出「四不」辦報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使文人論政在這一時期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辦報固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¹

1958年，周恩來與時任《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談起《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肯定了三點：第一，它是愛國的；第二，它是堅持抗日的；第三，它爲中國的新聞界培養了眾多傑出的人才。²

研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公報》文藝副刊，首先要研究《大公報》辦報方針和歷史演變，因爲文藝副刊是附在報紙上，文藝副刊是報紙不可分割、有機的組成部分，副刊與社評、星期評論和新聞通訊，凝聚了《大公報》人的共同努力，從各個不同方面奠定了《大公報》的事業輝煌、吸引了《大公報》的讀者、成就了《大公報》的百年基業。

¹ 《大公報》，1926年9月1日。

² 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4。

在《大公報》各種各樣的副刊中，影響最大的要數《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其中又以沈從文、蕭乾、楊剛先後任主編的《文藝副刊》和《文藝》備受推崇。

一、《大公報》四個歷史階段

歷經百年滄桑的《大公報》主要經歷了四個歷史階段：

時期	發展階段
1902 年 6 月—1916 年 8 月	英斂之時期
1916 年 9 月—1924 年 11 月	王郅隆時期
1926 年 9 月—1949 年 6 月	新記公司(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時期)
1949 年 6 月—現在	《大公報》新生時期

(一) 1902 年—1916 年 英斂之時期

《大公報》1902 年 6 月 17 日由英斂之創刊於天津，館址設於天津法租界，出一大張，成書本式。創刊號上刊登署名「英華」的《〈大公報〉序》，稱「辦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啓我同胞智慧。」¹

創刊第二天，《大公報》就發表《〈大公報〉出版弁言》，明確表示：「本報但循泰西報館公例，知無不言，以大公之心，發折中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非以挾私挾嫌爲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²

當時，天津被八國聯軍佔領，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被殺，維新派亡命海外，朝政腐敗，國破民奴。剛剛誕生的《大公報》伸張民義，大膽議政，被袁

¹ 《大公報》，1902 年 6 月 17 日

² 《大公報》，1902 年 6 月 18 日。

世凱禁止在租界銷售。

但是，英斂之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方式上卻只想走改良道路。早期《大公報》常通過「論說」來表明政治立場和觀點。據統計，1902年，《大公報》平均每月發表「論說」二十五篇，1905年平均每月二十二篇，1910年平均每月發表「論說」二十八篇，1911年前九個月平均每月二十六篇。¹

武昌起義成功，英斂之「君主立憲」的主張徹底破產。辛亥革命後，英斂之心灰意冷，無心再親自主持《大公報》事務，退居北京香山，潛心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

（二）1916年—1924年 王郅隆時期

1916年9月，舊股東之一王郅隆在安福系軍閥的支持下，收購了《大公報》的全部股權。從此，《大公報》成了安福系的機關報。

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安福系主力被打垮，段祺瑞逃往天津日租界，徐樹錚逃往上海，王郅隆本人也逃往日本。8月12日，王郅隆以「王槐慶堂」的名義聲明與《大公報》脫離關係，提退股本。

1920年8月13日起，《大公報》停刊，一周後復刊，宣布與安福系脫離政治關係，然所有權仍由王郅隆父子控制，報紙的名聲從此一蹶不振。1923年9月27日，王郅隆在日本大地震中死去，次年11月27日，《大公報》宣告停刊，停刊號為8315號。

¹ 《新聞出版報》，1988年6月22日。

（三）1926 年—1949 年 新記公司時期

1926 年 9 月 1 日，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以新記公司的名義續刊出版《大公報》，史稱新記《大公報》。新記《大公報》館址設天津日租界，續刊號為 8316 號，表明它是一張有歷史的報紙。「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為其附屬事業。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天津人曾自豪地稱：「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大公報》能在三十年代成天津一寶，證明新記《大公報》不僅使一張停刊的報紙起死回生，而且在短短時間奠基津門，成為北方的輿論重鎮。

《大公報》滬版於 1936 年 4 月創刊，津、滬兩版同時刊行，《大公報》由一張北方報紙發展成一張名符其實的全國性大報。在抗日戰爭中，《大公報》六易其館，歷經滄桑，曾輾轉於津、滬、漢、桂、渝、港等地辦報。報館同仁顛沛流離，歷盡艱危。

1937 年 11 月，日軍佔領上海，日軍要求在租界出版的《大公報》仍要送檢。《大公報》拒絕送檢，並於限期前一天，斷然停刊。抗戰八年，《大公報》作為一個企業，在戰火中輾轉播遷，雖造成財產上重大損失，但由於它在政治上力主抗戰，贏得人心，辦報專業，經營得法，《大公報》的發展和影響，超過同時代的其他中國報紙。

新記《大公報》從 1926 年 9 月續刊到 1949 年 6 月《大公報》宣布新生，整整出版了二十三年，是百年《大公報》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奠定了《大公報》在中國新聞史上的歷史地位。今天學術界對《大公報》的研究和評價，主要聚焦此一時期。

（四）1949—現在 新生時期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公報》仍留在內地的報館，經過不同形式的改造，相繼停刊，僅存的《大公報》香港版，也改變了政治中立的立場，變身為愛國愛港的左派報紙。

1949 年 2 月 27 日，《大公報》天津版改組為天津《進步日報》。

《大公報》上海版 1949 年 6 月 17 日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仍以民間報紙的地位出版發行。1952 年上海《大公報》北遷至天津與《進步日報》合併，仍名《大公報》，作為全國性的報紙，分工報道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

合併後的《大公報》1953 年 1 月 1 日在天津出版，至 1956 年 10 月 1 日再遷往北京出版。1966 年「文革」爆發，1966 年 9 月 10 日，北京出版的《大公報》停刊。

《大公報》重慶館公私合營後，交給了中共重慶市委。1952 年 8 月 5 日，重慶市委在《大公報》人員、設備的基礎上創刊出版了機關報《重慶日報》。

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創刊於 1938 年 8 月 13 日，中間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大公報》香港版曾於 1941 年 12 月 13 日停刊，職工陸續撤退到桂林館工作。1948 年 3 月 15 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後，除了被港英當局迫停過一個很短時間外，連續出版至今，見證了半個多世紀香港的滄桑巨變和香港回歸祖國的漫長歷程。《大公報》在香港累計出版至今 60 年，是各版《大公報》中出版時間最長的一家。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報》香港版創刊和復刊，都是在新記公司主辦時期完成的，是當時新記公司負責人胡政之一生最後一次事業衝刺，王芝琛在《百年滄桑》一書中，稱香港版「它現在是《大公報》碩果僅存的獨枝。」¹

二、《大公報》的歷史地位和貢獻

《大公報》創刊於 1902 年 6 月 17 日，至今已出版近一百零六年，超過了《申報》和《字林西報》，成為中國歷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一家報紙，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老壽星」。

（一）出版時間最長

中國之有報紙，遠較西方歷史為短。而中國報紙多數短命，民國幾十年間，開張與關門的報紙，起起落落，不可勝數。中國報紙難以平安、長壽的原因，前《大公報》人唐振常認為，「其中因緣，誠然多端，尋其根蒂，則是百年歷史變化急劇，社會動蕩激烈，時代思潮起伏劇變，有以致之。」²

在中國風雲激蕩的一百多年，一張民間報紙，能夠維持十、二十年的生命，已屬少見，求其能登百年，真是絕無僅有，惟有 1902 年創刊於天津的《大公報》。《大公報》經歷了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幾番沉浮，數易其主，由僻處華北一隅的地方報紙，逐漸發展成全國性的大報。

《大公報》所走過的一百多年，是世界局勢、利益版圖變化多端的百年，是中華民族歷盡艱辛、擺脫屈辱和貧困、尋求發展和振興的百年。《大公報》傳播信息，主導輿論，像百科全書一樣記錄了世紀風雲，記錄了民族的歷程，記錄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¹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 48。

²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 1。

重慶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了《〈大公報〉與現代中國》一書，就是以《大公報》為依據，整理出 1926—1949 年中國大事記實錄。主編方蒙在該書的前言寫道：「《大公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張歷史悠久、在海內外有廣泛影響的報紙，它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社會諸方面的情况，對世界風雲的變化、國際鬥爭的激蕩也有較為充分的反映。它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側影，也是中國近、現代史和新聞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¹

（二）開闢辦報新路

在世界報刊發展史上，主要有兩種性質的報紙：一種是商人辦報，辦的多是商業性報紙，旨在營利，在經濟浪潮中發展。一種是黨人辦報，辦的多是政治性報紙，旨在營政，難免在政治漩渦中沉浮。

新記《大公報》既不是黨人辦的報紙，又不是商人辦的報紙，它是一張文人辦的報紙。張季鸞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向公眾宣布：《大公報》是以文章報國，以「文人論政」為特徵，以「四不」為社訓。大公二字更具體化為「四不」，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²

《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曾經說過：「中國素來做報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商業性的，與政治沒有關係，且以不問政治為標榜，專從生意經上打算；另一種是政治性的自然與政治有了聯繫，為某黨某派作宣傳，但辦報的人並不將報紙本身當作一種事業，等到宣傳目的達到了以後，報紙也就跟著衰歇了。但自從我們接辦了《大公報》之後，為中國報界開闢了一條新路徑。我們的報紙與政治有聯繫，尤其是抗戰一起，我們的報紙和國家的命運幾乎連在一起，報紙

¹ 《〈大公報〉與現代中國》，重慶出版社，頁 1。

² 《大公報》，1926 年 9 月 1 日。

和政治的密切關係可謂達到頂點。但同時我們把報紙當作營業做，並沒有和實際政治發生分別的聯繫。我們的最高目的是要使報紙有政治意識而不參加實際政治，要當營業做而不單是大家混飯吃就算了事。這樣努力一、二十年之後，使報紙真正代表國民說話。」¹

簡言之，文人辦報就是論政而不參政，經營而不為營利，以言論報國，代民眾說話。文人論政不是標語口號，是本人民的立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間，容或有偏差或欠準確，亦可為事實所糾正。新記《大公報》時期，不僅是這樣說，而且是腳踏實地這樣去做的。

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向中國《大公報》頒發了榮譽獎章，同一天，《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張季鸞向美國公眾發表了題為《自由與正義勝利萬歲！》的廣播致辭，稱：「我們同人相約不作政治活動，不求權勢財富，亦不求虛名。……我們對全國任何個人和黨派並無說好和說壞的義務。除去良心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約束，我們在私的意義上，並不是任何人的機關報，在公的意義上，則我們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是正義範圍內，都可以把《大公報》看做自己的機關報使用。」²對「四不」的辦報宗旨，作了形象的闡述。

民國之後，中國不少政黨報紙淪為黨派爭權奪利的工具，商業報紙提出「經濟獨立」方針，靠念生意經生存與發展。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吳廷俊認為，「在這種背景下，新記《大公報》提出『四不』辦報方針，在當時的中國報界，『闢了一條新路徑』」。³

¹ 上海《大公報》，1949年4月15日。

² 轉引自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193。

³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頁15。

（三）專業地位崇高

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方漢奇這樣評價《大公報》：「在中國的報壇上，《大公報》具有崇高的聲望，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是中國新聞界的重鎮。」¹

1919 年巴黎和會時期派往法國採訪和會消息的唯一一名中國記者，中蘇建交後第一個奉派到蘇聯採訪蘇聯建設情況的中國記者，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第一個深入邊區發表系列通訊報道的中國記者，都來自《大公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始至終派有記者長駐歐洲現場報道的中國報紙，只有《大公報》一家。在波茨坦會議的現場，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日本簽字投降儀式的現場，在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的現場，都有《大公報》的記者現場報道。

1931 年 5 月 22 日，《大公報》出版一萬號，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專門撰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收穫與耕耘》，稱：「改組以來，賴今社中諸君之不斷努力，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到五年，一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²

1991 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為近代以來的一百零八位傑出新聞工作者設立專門辭條，該書不僅為《大公報》設了專門的辭條，還為英斂之、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范長江、楊剛、彭子岡、徐盈、蕭乾等十二位《大公報》人設了專門人物辭條，佔九分之一。而列名《中國新聞年鑒》「中國新聞界名人簡介」欄的《大公報》編輯記者達三十六人之多，也是所有中國報紙中最多的。

¹ 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2。

² 轉引自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頁 107。

內地出版與《大公報》歷史有關的書籍，也遠遠超過同一時代的其他報紙。近年影響比較大的有：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吳廷俊著《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該書獲 1997 年中國新聞學研究成果最高獎：吳玉章新聞獎。納入 2002 年中國人民大學科研計劃的《〈大公報〉百年史》一書，由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方漢奇等著，已於 2003 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四）廣獲讀者認同

英斂之創辦《大公報》之初，報紙日銷三千八百份。由於他的努力，不到五年，使《大公報》成為天津地區舉足輕重的大報，他自己也被推為當地報業公會主席。

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最初的日均發行量不到二千份，一年後增至六千份，取得收支平衡。至 1936 年 9 月，紙銷量已突破十萬份，附屬刊物《國聞周報》亦發行兩萬多冊，全國分銷機關達一千三百餘處。

1936 年 9 月 1 日津、滬兩處《大公報》同時發表了張季鸞寫的《本報復刊十年紀念之辭》，稱「回憶十年經過，除第一年入不敷支，耗用股本之外，未幾即漸達收支適合。邇來工場設備之發展，皆以營業收入充之。即時工場財產價值四十萬，皆自然發展而來者也。」¹，真實地反映了新記公司經營第一階段經濟方面的收獲。

此後，經過十餘年努力，《大公報》由天津，走到上海、漢口、重慶、香港、桂林辦報，成為覆蓋全國的大報。抗日戰爭時期，《大公報》漢口版銷數達五萬

¹ 上海《大公報》，1936 年 9 月 1 日。

三千餘份，創當時武漢報業史上發行量最高紀錄。《大公報》重慶版，日報銷行達九萬一千五百份，晚報銷三萬二千份，則又創當年重慶報業史上空前之紀錄。

《大公報》在香港創刊不到兩個月，銷路激增到日均五萬份，發行區域相當普遍。《大公報》桂林版發刊後，不數月躍居桂林各報及桂粵湘贛黔等省之第一位，達三萬五千份高峰。¹

抗戰結束後，《大公報》的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四個版總發行量達二十萬份，這在當時，是一個空前的數字，總資產達六十多萬美元。資產與銷量的逐漸增加，證明《大公報》編經並重，經營有方，聲譽日隆。

（五）獲得國際聲譽

1941年4月，《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收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教務長馬丁的信函。稱《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繼續作特殊之貢獻，對於中國讀者之服務，符新聞學之信條。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有鑒及此，在教授會議中全體一致議決，將該學院今年頒贈外國報紙之榮譽獎章一枚予《大公報》。

1941年5月15日，即密蘇里獎章頒贈的日子，《大公報》重慶、香港和桂林三館喜氣洋洋。中國新聞學會、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舉行茶會，慶祝《大公報》榮獲密蘇里大學榮譽獎章。這天的《大公報》渝、港、桂三版都刊登了密蘇里大學贈予《大公報》的《獎狀全文》：

「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該報自1902年創辦以來，始終能堅守自由進步之政策；在長期作報期間，始終

¹ 以上數據來自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1—20。

能堅執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雖曾遇經濟上之困難，機會上之不便以及外來之威脅，仍能增其威望。該報之機器及內部人員，曾不顧重大之困難，自津遷滬抵漢以及渝、港兩地，實具有異常之勇氣機智與魅力。該報能在防空洞中繼續出版，在長時期中間曾停刊數日，實見有非常之精神與決心，其能不顧敵機不斷之轟炸，保持其中國報紙最令人敬重最富啓迪意義及編輯最爲精粹之突出地位。《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¹

據查，世界報紙獲得密蘇里榮譽獎的，在英國有《曼徹斯特衛報》、倫敦《泰晤士報》；在美國，有《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而在東方，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泰晤士報》。中國報紙獲此國際榮譽，《大公報》是一個開始。

新記《大公報》以其「四不」方針開闢了中國報紙發展的新路徑，以其「言論報國」的宗旨定下了中國報人工作的新準繩，以其「經編並重」的管理確立了中國報業運作的新原則，更以其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和堅定不移的愛國立場，爲中國報紙在世界上爭得了地位，贏得了榮譽。《〈大公報〉百年史》一書，稱《大公報》「是中國新聞界的老壽星，同時也是中國新聞界中含金量最高的惟一世界級品牌。」²

三、「四不」主張與第三條路

在中國新聞史上，新記《大公報》創了這樣的紀錄：它是惟一一張同政治保持密切聯繫而不參與實際政治鬥爭的報紙；它是惟一一張在國際上爲中國報界爭得國際榮譽的報紙；在兩極政治勢力激烈鬥爭過程中，它是惟一一張同時受到國、共兩黨高層重視的報紙；它又是內地「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停刊而

¹ 重慶《大公報》，1941年5月15日。

² 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23。

惟一沒有准許復刊的大報。

這四項紀錄，歸根結底，都源於新記《大公報》的「四不」辦報方針，《大公報》希望在黨人辦報與商人辦報的報紙兩極之中，走第三條路——文人辦報，辦無黨派報；希望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兩極中，走第三條路——國家中心，為民眾喉舌。從《大公報》的發展歷史來看，成也「四不」，敗也「四不」。

（一）文人論政傳統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勢力的薄弱，中國近代報刊不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而是救亡圖存的政治鬥爭的產物。中國人自辦近代報刊所出現的兩次高潮，都是在政治鬥爭的推動下形成的。

從王韜的《循環日報》到維新改良派的《中外紀聞》、《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再到革命派的《中國日報》、《民報》、《大江報》，都是以政論為主、以政論著稱的報紙，因而中國近代報刊時代被稱為「政論時代」。

一般來說，論政與參政關係密切，或先論政後參政，或同時論政與參政，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唐才常、譚嗣同、康廣仁、孫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于右任等，他們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他們辦報既是論政，也是參政，他們利用手中的報紙，宣傳政治主張、組織政治隊伍、指揮政治運動，一旦政治目的達到，他們便從報界跨入政界，他們手中的報紙，或消亡，或成為統治者的喉舌。這是中國絕大多數現代政論報刊的命運。

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吳廷俊認為：「自始至終保持民間地位，自始至終

只是一個文化機關，自始至終只論政而不參政的報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除了《大公報》，恐怕別無二家。」¹

（二）確保財政獨立

「四不」辦報方針的形成，還得從新記公司續辦《大公報》談起。

據胡政之在《回首一十七年》的文章中回憶，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同心，約定五事，決定續辦《大公報》。五事包括：其一，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其二，三人專心辦報，在三年之內大家都不得擔任任何有俸給的公職。其三，胡政之與張季鸞以勞力入股。其四，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其五，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問題，商榷意見，決定主張。這五事，就是新記公司續辦《大公報》時大家遵守的「憲法」。²

其中第一點，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確保了《大公報》財政獨立，不需要接受任何政治津貼。如果經濟不獨立，需要向政治集團伸手要錢，報紙必然受別人支配，言論也就失去自由。

吳鼎昌一直有個心願，拿五萬元開個報館，準備賠光，不拉政治關係，不收外股，請一位經理和總編輯，每人月薪三百元，預備好兩個人三年的薪水，讓他們不兼其他職務，不拿其他錢。新記《大公報》的續刊，完全是按照吳鼎昌的這個思路來進行的。

吳鼎昌總結民國以來報界不振、報紙辦不好的情況後說過一段很深刻的話：「一般的報館辦不好，主要因為資本不足，濫拉政治關係，拿津貼，政局一

¹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頁15。

² 上海《大公報》，1949年4月15日。

有波動，報就垮了。」¹王郅隆時期的《大公報》，就是一個例證。

言論獨立，首先要經濟自存。1926年9月，正是辦報資金來源單純、有了資本獨立的前提和保證，才有《大公報》的不拉政治關係、不收外股、不兼外職的自律，才有「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自守。「四不」的根基，建基於財政的獨立，有了獨立，才能自主，才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

（三）「四不」辦報方針

「四不」辦報方針，最早見於《國聞周報》刊登《大公報》續刊啓示，新記《大公報》續刊的第一天，總編輯張季鸞發表《本社同人之志趣》，又專門提出，並逐條解釋。

第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第二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以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²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2。

² 《大公報》，1926年9月1日。

以上「四不」，為在當時環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為同人自守自勵之最小限。「不黨」的核心，是不拉政治關係，「不賣」的核心是資本獨立，「不私」的核心是做公眾喉舌，「不盲」的核心是獨立思考，代表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是辦報論政的最高境界。歸根結底，「四不」方針，就是要確保辦報的獨立和公正，確保報紙為社會之公器。

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續辦《大公報》時，都已年屆不惑，特別是胡政之、張季鸞，更是在中國報界奮鬥多年，事業沉浮，儘管一身「武藝」，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早期辦報均以失敗告終。痛定思痛，他們三人明白到「獨立資本、集中人才、全力為之、方可成功」的道理。

續刊《大公報》十五年，榮獲密蘇里新聞獎時，張季鸞曾自豪地說：「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然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言論獨立，良心泰然。」¹

（四）誓不投降

《大公報》堅持文人辦報，高舉「四不」主張，既不屈服於權貴，更不屈服於外侮。在抗日戰爭中，以一民間報紙、一群無黨派報人，共赴國難，體現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中國文人風骨；愛國抗日，展現了「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的無私無畏的報格。

（1）《大公報》滬版停刊

¹ 重慶《大公報》，1941年5月15日。

日本侵華戰爭一打響，工商界暫時不需要登廣告，娛樂場所也大都停業，各地方新聞來源也斷了，於是，上海各大報紛紛壓縮篇幅。《新聞報》原來每天連本市附刊出七大張，從 1937 年 8 月 14 日起，改縮為一張半。《大公報》滬版原來日出三大張半，抗戰開始後改出一大張，由十四版減至四版，另外，出臨時晚報刊半張，合計六版。

上海戰事打了整整三個月，到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中國軍隊付出重大犧牲後奉命撤離上海，中國這個最大的城市開始了「孤島」時期。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淪陷當日，日本佔領軍通知租界各中文報紙，自十五日起須送小樣檢查。當晚，胡政之召集《大公報》高層開會，大家一致表示，寧肯停版，決不接受檢查。

1937 年 12 月 14 日，《大公報》滬版刊發了王芸生寫的兩篇社評，一是《暫別上海讀者》，另一篇是《不投降論》。在《暫別上海讀者》一文中，指出「國軍是在上月 12 日完全退出了上海，擺在我們報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隨國軍的退卻而停版，另一是在艱難的環境下繼續撐下去，盡可能的為上海的三百萬同胞服務一天算一天，一直盡了我們的最後的力量為止。但是有一個牢固的信條，便是：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¹文章寫得慷慨激昂，表現了愛國報人的精神和氣節。

另一篇《不投降論》更展示了《大公報》人的錚錚鐵骨：「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無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2

¹ 上海《大公報》，1937 年 12 月 14 日。

² 上海《大公報》，1937 年 12 月 14 日。

但當時上海還有幾間大報不但沒有像《大公報》(滬版)以一「死」保全名節，而且在一夜之間變色，昨日還疾呼抗日，今天卻在報導「皇軍進城」了。錢鋼在其新書《舊聞記者》中專門寫了一篇「佞傳媒」，指的就是上海的老牌報紙《申報》、《新聞報》在抗戰中變色，「爲虎作倀」，其中被點名痛批的一位名叫陳彬龢的，就是日本佔領軍委派到上海《申報》的總編輯。¹

(2)《大公報》六易其館

在整個抗戰期間，《大公報》六易其館，輾轉天津、上海、漢口、香港、重慶、桂林，共赴國難。儘管曾經七次直接遭受日本飛機轟炸，但在防空洞仍堅持出報。《大公報》全體同人，傾一腔愛國熱血，寫千篇抗戰文章，以盡言論界一兵一卒之任務。

以下爲《大公報》各版在抗戰前後的創刊和停刊時間：

版別	創刊日期	停刊日期
《大公報》津版	1926 年 9 月 1 日	1937 年 8 月 5 日
《大公報》滬版	1936 年 4 月 1 日	1937 年 12 月 14 日
《大公報》漢版	1937 年 9 月 18 日	1938 年 10 月 17 日
《大公報》港版	1938 年 8 月 13 日	1941 年 12 月 8 日
《大公報》渝版	1938 年 12 月 1 日	1952 年 8 月 4 日
《大公報》桂版	1941 年 3 月 15 日	1944 年 9 月 12 日

旅美記者趙浩生曾撰文談《大公報》的精神力量，他寫道：「我是中學時代就開始讀《大公報》，那是抗日禦侮、八年離亂的大時代：蘆溝橋事變、平津失

¹ 錢鋼《舊聞記者》，中華書局，頁 26。

陷、長沙大火、武漢撤退、重慶大轟炸……在這艱苦的歲月裡，《大公報》是鼓勵著全民抗戰到底的精神力量，沒有這個精神力量，就不會度過重重難關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戰時在重慶出版的《大公報》只是一張淺黃色吹彈即破薄薄的土報紙，但上面是字字珠璣，其精神力量敵得過百萬雄獅。」¹就是在這種精神力量的感召下，趙浩生後來投身新聞事業。

（五）兩黨器重

1941年9月6日，一生以「言論報國」的傑出報人、《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逝世，終年五十四歲。

蔣介石的《唁電》稱：「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

毛澤東等的《唁電》稱：「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

周恩來的《唁電》稱：「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

設於重慶的張季鸞靈堂，蔣介石、周恩來等國共兩黨代表和社會各界前來弔唁者逾千人，自晨達暮。在西安的公祭、公葬，蔣介石都親自參加，當時的國民政府還專門為張季鸞頒發了《褒揚令》。

一個一生崇尚「四不」的無黨派報人，卻獲得了當時全國兩個最大的、對立的黨派領袖同聲褒揚，在中國報業史上，張季鸞是一個異數。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文人辦報的《大公報》獨立言論、專業水準和廣泛影響，受到各界的尊崇。

¹ 趙浩生《〈大公報〉的精神力量》，《我與〈大公報〉》，香港大公報出版社，頁9。

毛澤東曾評價《大公報》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事實上，《大公報》既罵國民黨又罵共產黨，既幫國民黨的忙也幫共產黨的忙。在兩黨並存的時候，走中間路線的《大公報》的民間形象和獨立思考、權威報道，曾受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高度重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全國震動，局面錯綜複雜。12月18日，《大公報》發表了《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論斷張學良及東北軍發動事變是完全錯了，錯誤要亡國家，亡自己。提出解決僵局的四點主張。這篇出自張季鸞之手的社評，深得宋美齡重視，她指示將當日《大公報》刊登社評的第二版加印數萬份，派飛機散發到西安。

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在公務十分繁忙之際，三次會見《大公報》主要負責人，都作長談，還接受了《大公報》負責人館內宴請，並為《大公報》留下「為人民服務」的題詞。重慶當時有十幾家報紙，享有上述待遇的，只《大公報》一家。

《大公報》貫徹「四不」辦報宗旨，贏得眾多「中間勢力」的讀者和作者的喜愛和支持，正是因為它代表了他們的意志和聲音。國民黨與共產黨領導人當年對《大公報》的重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爭取更多的中間勢力的支持。

（六）兩極難容

如果說堅持「四不」、無黨無派的《大公報》，在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時期，能夠「左右開弓」和「左右逢源」，受到國共兩黨的重視的話。那麼，隨著軍事力量的消長，中國從兩黨政治轉向一黨執政的歷史時刻，像《大

公報》這樣的非左非右的中間報紙，開始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陷入左右夾擊和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新記〈大公報〉史稿》一書的作者吳廷俊，寫到 1945 年—1949 年這一章時，特意標明「轉折篇」，並用了「兩極難容 《大公報》根存港九」作題。

（1）中國「報業盟主」夢成空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赴美訂購機器，緊鑼密鼓地恢復《大公報》天津版、上海版，他認為國共兩黨的鬥爭並非短期可以解決，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宗旨的《大公報》的業務經營還有很大發展空間。胡政之原本打算成立《大公報》社總管理處，領導上海、天津、重慶三館的業務，並計劃創辦廣州館，佔據華東、華北、華西、華南四大據點，使《大公報》真正成為中國報業盟主。

作為一個審時度勢的老報人，胡政之很快就發現自己誤判了形勢，抗戰勝利短短兩年，國民黨的腐敗已到不可收拾地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於 1947 年秋天開始轉入戰略反攻，蔣介石及其政權已呈瓦解之勢。胡政之趕緊採取緊縮政策，取消了《大公報》創辦廣州館的計劃，但仍維持津、滬、渝三館的正常運作。

當時，由於發表了《質中共》、《可耻的長春之戰》等社評，《大公報》遭到中共《新華日報》的痛斥，同時因批評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反美扶日、查封《新民報》等，《大公報》又遭到南京《中央日報》的公開叫罵。《大公報》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關頭自感「實在落於一條極狹的夾縫當中。」¹

¹ 《大公報》社評《論宣傳休戰》，1946 年 5 月 29 日。

（2）根存香港

1947 年胡政之寄託希望的兩黨和平共存、反對內戰的「第三條道路」宣告徹底破產，處於決戰前夕的國共兩黨，雙方都不允許走第三條道路。在困境之中，胡政之把他的視野再次投向香港，尋找《大公報》未來的出路。1948 年 1 月 25 日，胡政之以千金一擲的決心和氣魄奔赴香港，著手《大公報》港版的復刊工作。

在 1948 年 3 月 15 日的復刊號上，發表了胡政之親筆寫的《大公報港版復刊詞》，重申《大公報》是民間組織，「現在政治不安，經濟動蕩，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的鬥爭著，相互激蕩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的、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¹

這段話反映了胡政之在二戰之後，面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大決戰，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而陷於深深苦惱和煩悶的心態。文章最後說：「民國二十七年的《大公報》香港版，只是爲了應付抗戰的臨時組織，這次復刊卻是希望在香港長期努力。」²

胡政之在香港復刊《大公報》，對於《大公報》和中國報業至少有三項重大意義：

其一，組建了一支編採精英隊伍，向香港輸送了一批辦報人才。後來成爲香港一代報人的查良鏞，就是 1948 年從《大公報》上海館抽調赴港的。

¹ 香港《大公報》，1948 年 3 月 15 日。

² 香港《大公報》，1948 年 3 月 15 日。

其二，擴大了《大公報》在海外的版圖和影響，如《大公報》人金誠夫所言「尤可回憶者，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使領館、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本報港版的直接訂戶。這種情況，為國內任何地點辦報所未有。」¹

其三，奠定了《大公報》發展的長久性基業，使這張中國文人辦的知名報紙，至今尚能根存一脈。

（3）文人論政式微

1948年4月14日胡政之逝世於上海，終年六十歲。此時離上海解放只有一個月。就在胡政之逝世兩個月後，1949年6月17日，《大公報》上海版發表王芸生《〈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布《大公報》「屬於人民」。天津《大公報》改為《進步日報》，重慶《大公報》被改組為《重慶日報》，《大公報》北京版幾經合併，也於1966年文革中「新帳老帳」一起算，被紅衛兵宣判死刑。胡政之慘淡經營的《大公報》津、滬、渝、港四館，從此只剩下《大公報》香港版。留在內地的《大公報》人，大多歷經磨難，難逃浩劫。

「文革」之後，所有在「文革」中被查封的內地報刊，幾乎都毫無遺漏地復刊了，惟獨《大公報》沒有復刊。《大公報》前總編輯王芸生看在眼裡，悲在心中。當《大公報》同人找到他時，他茫然地說：《大公報》是一個歷史產物，它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大公報》已沒有復刊的必要了。²

前《大公報》報人唐振常在《文人論政說是非》一文中說，「公元1949年，結束了一個舊的時代，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文人論政亦隨舊時代而消逝，《大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5。

²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94。

公報》不再有昔日的輝煌。」¹

四、《大公報》「四不」主張對副刊的影響

文藝副刊與其他文藝性雜誌、書籍不同之處，就在於其依附於一家報紙，是報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報紙框架內編排，隨報紙發行，與報紙的讀者重疊，報紙本身的宗旨、性質、歷史、格調、作風不可避免地影響文藝副刊，而文藝副刊的宗旨、風格和作風也反過來，對報紙有所影響和補充。

在中國報業歷史中，《大公報》在黨人辦報、商人辦報的中間，闢「文人辦報」的新路徑，而《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遠離當時文學政治化、刊物商業化的兩大熱潮，潛心寫作、專心辦刊，闢培育文學新人的文藝副刊新路徑。

（一）副刊「不黨」——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

「不黨」是《大公報》的宗旨，也是文藝副刊編者沈從文和蕭乾的政治取向。

沈從文走入文壇不久，就遇到革命文學的問題，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革命加戀愛」的革命文學模式曾盛極一時。1928年，後期創造社、太陽社提倡「無產階級文學」，並把矛頭指向魯迅，甚至採取了一種十分粗暴的批評作風，魯迅反擊他們是「唯我獨革」。指責他們「擺著一種極左的凶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²這種互相攻擊，加深了沈從文對革命文學的反感。

¹ 轉引自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5。

² 轉引自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74。

（1）不參加「左聯」

讓沈從文困惑不解的是，在激烈「文攻」之後，後期創造社、太陽社成員突然又與魯迅握手言和。1930年3月，五十多位作家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為首的有魯迅、夏衍、馮雪峰等，創造社、太陽社成員也是主要的發起人。不久，沈從文的好朋友胡也頻、丁玲也參加了「左聯」，胡也頻曾勸沈從文參加，但沈從文只是搖頭。

蕭乾也沒有參加「左聯」，雖然他的至友楊剛是北方左翼聯盟的發起人之一。1937年蕭乾因為戰亂、報紙版面裁減，被《大公報》辭退，首次嚐到失業的滋味。在人生最為失落的時候，有些朋友去了延安，有的則加入了國民黨，愛好自由的蕭乾憶述：「這兩種想法那時都沒有在我的腦海裡出現過」。¹

（2）反對公式化、概念化

1928年沈從文寫了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在《新月》雜誌連載，由於現實批判性強，有人在評論中把他歸為「革命文學家」，沈從文不得不趕緊寫《第二卷·序》，聲稱：雖然「我知道在中國，把革命文學家而再加無產字樣，則更驚心動魄、聳人聽聞」，但自己「不能成為某種主義下的信徒」，「更不會因為幾個自命『革命文學家』的青年把我稱為『該死的』以後就不來為被虐待的人類畜類說話。」²

沈從文對於革命文學的這種態度，或多或少直接影響到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以及他培養的接班人蕭乾。針對革命文學普遍存在的公式化、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81。

² 轉引自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77。

概念化傾向，沈從文大聲疾呼「莫輕視技巧、莫忽視技巧、莫濫用技巧。」¹

蕭乾也曾在《大公報·文藝》上寫過一篇《為技巧申冤》，表達了自己對左翼文學的看法，他說：「對於過去左聯文藝集團組織的周密我們表示景服。但如果他們的熱誠曾在國人心中烙下一道印痕，那不是因為他們某本動人心魄的傑作，卻是他們坐牢流血的史跡。特別是早期左翼作品，公式的故事，口號的對話，使一般關心這新興文藝前途的人各捏一把汗。多少人希望左翼作者擲節一部分論戰的工夫，利用當時極有限的自由，本著他們熱誠為我們寫下幾本歷史上站立得住的作品，然而沒有。」²這不僅是沈從文和蕭乾的個人觀感和意見，也是當時文藝界中人一種普遍的印象和看法。

（3）不問左右只問作品

沈從文提出「只認作品不認人」，說到做到，儘管他本人對「左聯」有成見、不願參加「左聯」，但並沒有妨礙他刊登「左聯」作家的稿件，像茅盾、蕭軍、楊剛等，他們的稿件也經常刊登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

後來，回顧這段歷史時，沈從文反覆強調：「我不輕視左傾，卻也不鄙視右翼，我只信仰真實……文學實有其獨創性和獨立價值，然則文學論者所持論，仍無助於好作品的產生。不問左右，解決這問題還是作品。」³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藝界的是非之地，文藝界的論戰進行得熱火朝天。蕭乾這個涉世未深的小夥子，一方面急於把刊物編得熱鬧活潑，同時又在知友巴金的指引下，堅決避免捲入文藝界內部紛爭。蕭乾堅持「只當個逍遙派」。⁴

¹ 轉引自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87。

² 轉引自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89。

³ 《記胡也頻》，《沈從文文集》第 9 卷，花城出版社。

⁴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 7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227。

(4) 只當個逍遙派

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滬版)時期，正碰上「左聯」為兩個口號而大開筆戰。一邊是以周揚為首的「國防文學」，另一邊是以魯迅為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另外，「左聯」正在向同屬於抗日陣線的「第三種人」進行攻擊。蕭乾在晚年回顧這些文壇的「刀光劍影」時曾說：「我不搞理論，也鬧不清抗日文化界內部這些論爭分歧何在。《大公報·文藝》始終沒介入這類論戰。」¹

蕭乾堅持不登雜文，刊物上不打筆戰。這個「不打筆戰」最初是《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囑咐的，也符合蕭乾當時的思想情況。當時上海灘情況複雜，蕭乾又人生地疏，為了不出亂子，還是以穩重為妥。

當時巴金以及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鼓勵、幫助和支持著靳以和孟十還編《文季》、《作家》，黎烈文的《中流》，黃源的《譯文》。蕭乾於 1990 年回首當年，仍向巴金致謝。蕭乾說：「當時上海正進行著各種論爭，『兩個口號』之外，還有『第三種人』問題。我這個來自北方的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對事態既感到茫然，主觀上也有不少糊塗處。記得那時巴金一再告誡我，當前，文藝界的中心任務就是抗日，暴露社會黑暗面也是為了抗日。編刊物不能只追求熱鬧。對於自己人打自己人，一定不要介入。」²

(5) 刊物的大門拒絕兩種人

《大公報》一向以「開門辦報」著稱，由《大公報》首創的「星期論文」，始於 1934 年 1 月，旨在為中國第一流的學者提供發表自己「評論」的園地。應

¹ 蕭乾《我與副刊》，《科技日報》，1988 年 9 月 2 日。

² 蕭乾《懷念上海》，《新文學史料》，1990 年第 4 期。

邀為這個專欄撰稿的先後有胡適、丁文江、翁文灝、梁漱溟等名家，都是一時之選，提高了《大公報》的文化內涵和知名度，擴大了報紙在知識分子中的影響。

《大公報》文藝副刊堅持「開門辦報」，先後請清華大學教授吳宓編《文學副刊》、請知名作家沈從文編《文藝副刊》。文藝副刊在用稿方面也是廣開門路，不拘一格。

但對於當時的兩種人，《大公報·文藝》關上大門，一個是有「黨部」後台的王平陵一夥。當時同在上海搞編輯工作的巴金、靳以、黎烈文、孟十還、黃源，與《大公報·文藝》編輯蕭乾，大家是「聯號」，對王平陵一夥一直是用蔑視的眼光堅決抵制，據說這也是《大公報·文藝》受到南京「黨部」三次警告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是當時北方文藝界的一名惡棍，名叫張露薇。魯迅曾在雜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人是「拿起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傢夥。他狂妄地說中國除他之外，沒人懂得高爾基。」¹

張露薇因投稿到處碰壁，異想天開，另起爐灶，編了一個刊物，專登投稿未遂者的文章。刊物底還有密密麻麻印了很長一個「撰稿人」名單，據說刊物的銷量主要靠這些人大量買來贈送親友。張露薇辦的這個刊物闢「文壇花絮」欄，它從泄私憤出發，每期專門為他們碰過釘子的主編個人捏造最荒謬最無恥的謠言。當時南北刊物的主編很少沒被他罵過的，蕭乾也未能倖免。

（二）副刊「不賣」——不拿版面作交易

¹..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五)」。

有些編輯最怕上峰轉稿，認為不好處理。蕭乾編《大公報》副刊四年間，只遇到過一次，而且沒怎麼費事就頂了回去。「八·一三」之前，上海報紙搞獻金運動。有一天，有一位名叫蘇雪林的攜帶一包金飾到報館來獻，同時交給報館一束文稿。蕭乾拿到一看，是幾篇以陰曹地府為背景，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魯迅的文章。胡政之在獲知文章內容後，毫無異議地退還給原作者，一位名為綠漪的天主教徒、女作家。

1987年，蕭乾寫了一篇《勿找旁門左道》一文，稱「我先後編過七年文藝副刊，我所發的文稿大多是自己約來或從大量投稿中發現的。我怕人轉稿給我，朋友們（還包括當時的老闆）也都體諒我。轉來的稿子多少帶點特殊味道，在一定程度上會妨礙編者的選稿職能。」從切身體會，蕭乾認為那是對編輯工作不應有的一種干擾。¹

在搞書評工作時，蕭乾注意防止利用刊物自吹自擂的惡劣風氣。一開始就決定，蕭乾本人以及沈從文、巴金、靳以（當時刊物的三位主要支持者）作品，一概不評。而且，蕭乾不想用作者或出版者的贈書來搞書評，覺得只有不涉金錢利益，才能做到公正客觀。所以，所有的書，都是蕭乾自己去四馬路書店一本本地挑，抱回來，再分別寄給評者的。

（三）副刊「不私」——沒有私心

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每月從報館得到的酬勞是一百元，當時，沈從文個人經濟上仍很困窘，曾經把送給未婚妻張兆和的一隻訂婚戒指當掉。但是，從《大公報》領到的編費，沈從文絕大部分都用於請副刊作者座談、吃

¹ 《人民日報》，1987年12月8日。

飯，或者給經濟困難的青年作者預支稿費了。

爲了提高稿件的質量，活躍寫作氛圍，溝通寫作思想，每隔一、兩個月，沈從文就要選一些地方，定期舉辦一些作者座談會和聚餐會，他總是親自寫邀請信、自己做東，北平中山公園的今雨軒、北海公園的仿膳，漪瀾堂和五龍亭，都是這種聚會常去的地方。

當時，有些報紙副刊的編者，一方面大量積壓著旁人的文章，可又近水樓台地刊登他本人的大作，使人反感。編《大公報·文藝》前，蕭乾的文章大多發表在這個刊物上，可是自從成爲它的編者，蕭乾自己的文章反而大都投到旁處去了。也正因爲如此，被壓了稿子的朋友始終對蕭乾沒有怨言。

成爲《大公報》的一員後，蕭乾從不從報館支取稿酬。蕭乾稱「我用『編者』名義寫的《答辭》，均屬份內的工作，從不給自己開稿費，我記得只爲刊物寫過一次付酬的稿子，那就是 1938 年《大公報·文藝》香港版舉辦一次『文章義賣』，所有參加者的稿酬一律交香港文協，用來慰勞前方。」¹

（四）副刊「不盲」——不趕時髦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一種文體在中國文壇空前火爆和繁榮，那就是雜文，雜文創作的聲勢、規模，甚至壓倒了同時期任何一種文學體裁。比起雜文的當紅程度，連一向受歡迎的小說、詩歌都相形見绌。只要看一看出自「雜文之父」之手的《魯迅全集》，雜文所佔的比例之大，當年雜文一枝獨秀的盛況，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 7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246。

可見一斑。

上海的《萌芽》、《前哨》、《北斗》每期都用大量的篇幅來登雜文，歷史悠久的《申報》副刊《自由談》，幾乎被雜文佔滿。而《濤聲》、《新語林》、《太白》等新辦的專門性的雜文專刊應運而生，就連一向號稱與政治保持距離的《現代》，當時也趕潮流，專闢雜文專欄。

（1）關注社會但拒絕雜文

出人意料，一向以開明、包容著稱的《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文藝》，卻不趕潮流，將受人矚目的雜文拒之門外。《文藝副刊》、《文藝》是一個以文學創作爲主的副刊，小說、詩歌、散文、戲劇、論文等，幾乎歡迎各種文學體裁的來稿，但《文藝》惟一聲明就是不登雜文。在一個「雜文的時代」卻不登雜文，《大公報》在這個問題上，成爲當時的文學界、新聞界的「另類」。

有些人把《大公報》文藝副刊不登雜文，說成是對社會和政治的冷感，可是，從《文藝副刊》、《文藝》所發表的眾多作品來看，並不缺乏對社會的關注、對時代脈搏的把握，以及編者與作者的正義感。在《文藝副刊》創刊號上，曾刊登沈從文《記丁玲女士·跋》，尖銳地抨擊當局秘密逮捕進步作家的行徑。

《沈從文與〈大公報〉》一書的作者杜素娟認爲，三十年代中國的雜文創作，雖很繁榮，但存在問題也很多。雜文長於對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進行批評，是文人參與社會、干預社會的最好武器。但不少人將雜文簡單理解爲嬉笑怒罵、諷刺挖苦，甚至變成粗鄙的罵街和惡意的攻擊，雜文本身的這種感情方式，與維護藝術的純潔的《文藝副刊》、《文藝》有所抵觸。¹但這只是問題一方面。

¹ 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80。

（2）重視散文輕視雜文

事實上，無論是沈從文也好，蕭乾也好，他們對雜文這種文體先天就有一種抗拒心理，重散文而輕雜文觀念根深蒂固。首先他們自己早年常寫散文而極少寫雜文，其次他們在版面上刊登大量的散文作品，像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麗尼、陸蠡等人的散文，受到《文藝副刊》、《文藝》的青睞，當時這些作者還沒有什麼名氣，大部分還是大學生。

像何其芳的《畫夢錄》、李廣田的《銀狐集》、麗尼的《白夜》、陸蠡的《海星》，都是散文史上的名作，這些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沈從文也是散文高手，他的《湘行散記》、《湘西》散文集，都曾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連載。

（3）不做「鬥士」 不打筆仗

讓報紙副刊引人注目，使版面活潑的的一條經驗，就是需要展開些論爭。但沈從文和蕭乾，都謹慎地意識到切不可為，欲求熱鬧而輕易開筆仗，開頭容易恐怕收攤難。

沈從文曾先後在《大公報》版面上，與人發生了幾次文藝論爭，最後引來的唇槍舌戰都有違他的初衷，而且每次論爭到最後，幾乎都是沈從文自己「叫停」，不願再爭吵下去。

1942年英國喬治·艾倫與恩溫出版社曾出版了蕭乾的英文著作《苦難時代的蝕刻》，這是中國最早向西方介紹新文藝運動的書之一，其中《散文：雕刀還

是利劍》，談到「魯迅死後出版的全集裡，有四卷小說，散文、雜文則佔了十四卷。有批評家認為魯迅把才華浪費在那些雜文寫作上了，因為就其所涉及的內容來看多是短命的，便懷疑它們能否長久。」¹

蕭乾在這篇文章中，以周作人與魯迅為例，稱中國有兩類散文家，隱士和鬥士。顯然，在精神上，無論是沈從文，還是蕭乾，在思想和處世上都更傾向於隱士。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大公報·文藝副刊》雖然不提倡小品文，但從創刊的第一期開始，經常在篇首位置發表周作人的小品文，如《豬鹿狸》、《一歲貨聲》、《顏氏家訓》等。但魯迅帶刺的雜文，卻一篇也沒有在《文藝副刊》和《文藝》上出現過。

（4）副刊編輯欣賞「四不」

無論是沈從文、蕭乾，還是楊剛，都與《大公報》維持多年的良好關係，而且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地點，曾多次為《大公報》編文藝副刊，為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才華。如果說不認同《大公報》的「四不」辦報宗旨、對《大公報》的辦報理念和風格不肯定不欣賞的話，是很難做到的。

沈從文與蕭乾，都是無黨派之人，愛好和平，追求獨立、自由與民主，他們的世界觀、文學觀更接近《大公報》的「四不」。即便是有共產主義信仰的楊剛，她在接編《大公報·文藝》港版時，首先研究了《大公報》的整體辦報思想，以及副刊的一貫特色，認為《大公報》整體的辦報態度，還是以鮮明的愛國主義和堅持抗戰為主。

以任職《大公報》的時間而論，蕭乾長於沈從文與楊剛，對《大公報》「四

¹ 蕭乾《苦難時代的蝕刻》，《蕭乾全集》第8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95。

不」主張也了解得更透徹，體會得更深刻。

1948年2月7日，蕭乾曾在《大公報》上海版撰寫了一篇題為《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蕭乾再一次對《大公報》的傳統進行了強調，他說：「《大公報》是一個報人論政的機構，《大公報》同人向來是論政而不從政。《大公報》同人信守司馬遷『戴盆何能望天』的作風，既許身言論，就不旁驚，尤其相誠不兼任公務，也不做實際的政治活動。因為《大公報》不屬於任何黨派，它的地位是獨立的，卻不是一般的『中立』。《大公報》有自由主義的傳統作風，《大公報》同人信奉自由主義，我們無大野心，卻有極大熱情，願為國家建設做些填土的工作。」¹蕭乾將《大公報》的「四不」與自由主義相提並論，地位「獨立」，而非一般的「中立」，這是《大公報》的「四不」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被賦予了新的內容。

¹ 上海《大公報》，1948年2月7日。

第四章

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Goran David Malmqvist)評價沈從文：「他的價值是，包括魯迅在內，沒有一個中國作家比得上他。沈從文是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偉大，我越為他一生的寂寞傷心。」¹馬悅然將沈從文的文學地位，放在魯迅之上。

《沈從文與〈大公報〉》一書的作者杜素娟，認為「在文藝觀上，魯迅和沈從文分別代表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兩種文學觀。……他們在文學上分別達到了兩種很高的境界：魯迅的現實力度，沈從文的藝術純度，都有各自很高的造詣。因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的評論者把魯迅排在第一位，其次便是沈從文。」²

不論沈從文與魯迅的文學地位誰先誰後，也不論兩人文學觀如何「兩極分化」，僅1949年以來的情況來看，沈從文與魯迅的文學作品在內地的命運，在相當長的時間是「南轅北轍」。魯迅一直受到中國政界、文學界的力捧，《魯迅全集》一版再版；而沈從文其人其文都被打入「冷宮」，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沈從文的文學作品，才像「出土文物」一樣，重新走入人們的視線，連同沈從文早年編輯文藝副刊的貢獻，逐漸被後人重新認識。

¹ 馬悅然《中國人，你可認得沈從文？》，《中國時報·人間》，1988年5月13日。

² 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185。

一、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四個時期

沈從文是中國報紙文藝副刊史上聲譽卓著的編輯。沈從文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及其他副刊、文學雜誌，一大批青年人在沈從文的栽培下走上了文學之路，成為頗具影響的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

《沈從文的最後四十年》一書高度評價沈從文作為副刊編輯的貢獻：「僅從編輯的角度來講，說沈從文『開一代新風』一點也不為過」。¹

沈從文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主要有四個時期：

(1) 1933 年 9 月至 1935 年 8 月

沈從文與楊振聲一起主編《文藝副刊》，雖是兩人署名，但從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來看，主要編務由沈從文一人負責。

(2) 1935 年 9 月—1936 年 3 月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更改刊名為《文藝》，由沈從文和蕭乾合編，每周出四期，周一、三、五共三期，每期半版，由蕭乾負責。周日一期，為整版《星期文藝》，由沈從文主持。

(3) 1936 年 4 月—1937 年 8 月

《文藝》全部改由蕭乾署名，但沈從文仍參與編輯和組稿，是蕭乾事實上的「顧問」。

(4) 1946 年 10 月—1947 年 5 月

1946 年 10 月 14 日，沈從文與楊振聲、馮至一起主持《星期文藝》副刊，

¹ 李揚《沈從文的最後四十年》，中國文史出版社。

其後交由馮至負責編務，至 1947 年 5 月 25 日改由靳以主編。

自從 1933 年 9 月，沈從文接手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以來，他與這張報紙的《文藝副刊》一直保持一種緊密的關係，他時而是編輯，時而是作者，時而是書評座談會的評論員，時而是《大公報》「文藝獎金」評獎委員會評委之一，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這種緊密關係，一直持續了二十多年。直至 1949 年後，沈從文被投閒散置於歷史博物館，埋首於古代服飾研究，這種關係仍然保持。

1964 年至 1967 年，沈從文的文章仍首選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主要是考古方面的發現，沈從文回憶稱這方面的文章「大概有十篇，《展子虔遊春圖》，我談到這畫的真假問題，還有點內容，到現在還可以供參考，我認為是晚唐的。」¹

編輯生涯的高峰期，沈從文同時主編多家報紙副刊，如 1946 年 10 月 13 日，沈從文和楊振聲、馮至一起主持編輯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同時，沈從文主持的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第八期正式出版，至 1948 年 11 月 8 日的第 118 期止。同年 12 月，由沈從文編輯《平明日報·星期藝文》出版，沈從文還為該刊題寫了刊頭。1947 年 6 月 1 日，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復刊，沈從文應邀負責小說的選稿工作。在組織稿件方面沈從文更是積極，他一貫注意發掘有希望的文學青年，吸引他們寫稿。《文學雜誌》復刊後刊登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沈從文組織而來的。

沈從文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編的這幾種文藝刊物，辦得嚴肅認真，可躋身於當時國統區最好的文學刊物之列，在上面發表詩文的有前輩作家如朱自清、馮至、朱光潛、卞之琳、李廣田、廢名等，也有一批新起之秀，如詩歌界的穆

¹ 《沈從文晚年口述》，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35。

旦、杜運燮、鄭敏、柯原、李瑛，小說界的汪曾祺、劉北汜，文學研究界的吳小如、蕭望卿、呂德中、杜少若，外國文學界的盛澄華、王佐良、金隄等。

由此可見，編輯報紙的文藝副刊或文學類雜誌，是沈從文青年和中年時期的一個主要職業。沈從文通過編刊物和與青年交往，栽培了三、四十年代開拓文學新風的一批作家。

縱觀中國報紙文藝副刊，在發表沈從文作品的數量上、奠定沈從文文壇的地位上、開拓沈從文全國的影響上、栽培青年作家的成就上，沒有一個報刊副刊能夠與《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相媲美。一直到 1947 年，《大公報·文藝》的刊頭「文藝」二字，仍沿用早年沈從文為該副刊創刊時所寫的字，刊頭下刊出的幾行稿約，也是沿用三十年代的舊例。

二、《文藝副刊》的前身是《文學副刊》

《大公報》文藝專門副刊是在 1928 年開闢的。這個副刊的名字最初定為《文學副刊》。胡政之、張季鸞雖是報人，文學並非他們專長，但他們對這個副刊十分重視，專門聘請了當時清華大學教授吳宓主編。

1928 年 1 月 2 日，《大公報·文學副刊》正式創刊。至 1933 年 9 月上旬，總共刊出 313 期。

在《文學副刊》創刊之日，吳宓在刊首發表了長篇大論的發刊詞——《本副刊之宗旨及體例》，解釋了《大公報》為什麼要辦文學副刊。文中說，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最重要兩件事就是政治和文學。文學所包含的哲理、藝術、社會生活、民眾感情，體現著國家和民族的內在精神。政治和文學是分不開的，政

治的變遷每以文學之趨勢為先導、為樞機。因此，雖然「本報注重政治」，但是要「著眼於國民生活之全體。故設各種副刊。而今茲對於文學特為加以改良，努力從事。國中愛讀本報之人士，幸其指教而助成之。」¹

發刊詞也強調了該副刊的宗旨和《大公報》的一貫宗旨是一脈相承的：「文學副刊之言論與批評，力求中正無偏，毫無黨派及個人之成見。其立論，以文學中之全部真理為標準，以絕對之真善美為歸宿。」²對於中西文學、新舊道理、文言白話之體，浪漫寫實各派，以及其他凡百分別，亦一例平視，毫無畛域之見，偏袒之私。惟美是求，惟善是從。」²站在文藝副刊的角度，重申新記《大公報》的「四不」主張，強調了思想的獨立和用稿的公平。

《文學副刊》刊於《大公報》的第五版，每星期出一期，周一出版，每期一版。《文學副刊》請吳宓主編，從組稿、編稿到版面設計全由吳宓一人承擔，編輯部就設在北平清華大學內。《文學副刊》接受社會外來投稿，並付稿酬。每期稿件由吳宓編好後，再寄天津《大公報》報館排字、印刷。

（1）嚴謹的學者作風

吳宓治學嚴謹，心思縝密，做事一絲不苟。吳宓在清華大學講課，以「認真」二字聞名，比如，講課中很多地方都要引經據典，對於要引用的原文，別的教授都是打開原文念一念，但是吳宓卻不管引文有多長，向來都是一字一句地背誦出來。有一些西方哲學家的論文，即便看著讀，都十分費勁，就別提背誦有多費勁了。但吳宓固執地堅持這樣做，認為這是做教授最基本的份內之事。

接手《大公報·文學副刊》後，吳宓這種認真勤奮、一絲不苟的學者風範，

¹ 《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1月2日。

² 《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1月2日。

在編輯工作中充分體現，直接影響《文學副刊》的風格。《文學副刊》雖然只是一個星期只有一版的副刊，吳宓卻做得兢兢業業，以一個兼職編輯的身份，做事認真、負責的程度，甚至超過很多正職的編輯。

《大公報》編輯孔昭愷憶述，吳宓主編《文學副刊》時，自己還是《大公報》的一個年輕的編輯。有一次，上司特意把從北平寄來的《文學副刊》的稿樣拿給他看。這個稿樣極其整潔、清楚。當中所有的稿子都抄寫得工工整整，吳宓自己的稿子自不必說，每個字都一筆一劃仔仔細細地寫出來。別人的稿件，如果字跡不清楚，無論長短，吳宓也全部辛辛苦苦地親自重新抄寫一遍。文章中若有比較生僻的字，吳宓還在旁邊空白處另寫一個大的，以方便排字房工人辨認和排版。

《文學副刊》的版面都已經精心設計好了，哪個地方排哪篇文章，一切井井有條。就連哪篇文章用什麼字號，用什麼格式，每個標題用什麼字號、什麼字體，也標得清清楚楚，美觀大方，看得出吳宓下了不少功夫。吳宓排好的稿樣幾乎不用任何改動，立刻就可以拿到排字房輕輕鬆鬆地付印了。

（2）以學術論文為主

出任《文學副刊》編輯時期，吳宓在中國文化界聲譽正隆，他是美國留學歸來的學者、《學衡》雜誌的創辦者、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籌辦者。吳宓曾把當時全國的一流人才收羅麾下，成為國學研究最有力的倡導者之一。

吳宓主編《文學副刊》之後，確實大大提高了《大公報》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他把學術大家匯集一堂，把當時北大、清華的一群教授、學者帶進《大公報》，諸如：章太炎、陳寅恪、吳芳吉等，這些學者在副刊高談闊論，旁徵博

引，一時間「滿座皆鴻儒，出入無白丁」。

《文學副刊》在內容安排上大致有學術論文、人物評傳、中外新書介紹、文學創作、編讀之間交流、通信等。其中，學術論文佔較大比例。後來，《文學副刊》特地聲明，副刊內容並不局限於純文學，其他諸如思想、歷史、考古、哲學也都包括在內。這樣一來，上面發表的學者們理論高深的學術宏論就更多了。

《文學副刊》先後發表《中國文學研究》、《明刻續古名字雜劇殘本跋》、《民俗學之曙光》、《虛甲骨之新發現》、《關於中國古代鐵制兵器先行於南方考之討論》、《外交史及外交史料》等專家論述，專業性、學術性都很強，充滿濃濃的學究氣。對一般讀者而言，艱澀難懂。

（3）文言文佔絕對比重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文學領域里也展開一場革命。具體的表現就是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白話文代表著當時現代化的一種社會理想，要求改變文學格局，推翻為少數知識分子所掌握的文言文的主導地位，把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白話文變成社會通用的語言文字，目的是把文化權利交給普通百姓和底層民眾。

以白話文寫作的新文學，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新文學倡導的是文學的大眾化，主張文學要貼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感情。

吳宓是學衡派的代表人物，他最反對的就是陳獨秀和胡適所倡導的新文學、白話文。當時，反對新文學的並非吳宓一人，還有北大教授章太炎、翻譯

家林紓等，都是擁護舊文學的代表。吳宓和梅光迪等人，創辦了《學衡》雜誌，專門刊登文言文。吳宓直言不諱，辦《學衡》的目的，就是要跟那幫子說白話的人作對。後來，白話文、新文學日盛一日，但吳宓一直以苦鬥的姿態堅持著。這自然會影響到他主編《文學副刊》的原則和立場。

《文學副刊》內容以學術研究為主，很少登小說、詩歌。即便是學術研究，也是關於歷史、文化、考古等專業性很強的文章。作者都是善於發表學術宏論的教授、學者，舊學氣十足，而這些宏論又用文言文來書寫，之乎者也，高深莫測。因此，《文學副刊》和當時的文學主流相差甚遠，更不符合當時文學發展的需要。結果，它未如《發刊詞》所言，成為「全國文學界的公開機關」。

（4）在白話文問題上有所讓步

雖然在吳宓的思想深處，將文言文奉若神明，但考慮到《大公報》是一份綜合性的日報，屬於大眾媒體。爲了把《文學副刊》辦好，視白話文爲死敵的吳宓，在編副刊時也做出了讓步姿態。

吳宓在《文學副刊》的發刊詞中一再申明，這個副刊「願爲全國文學界之公開機關」、「絕無黨派和個人之成見」，所以，無論文言還是白話，都要「一律平視」。吳宓在編輯《文學副刊》時，確實力求中正無私，刊登了不少白話文章和文學作品。

例如，1929年2月11日，《文學副刊》就用了很大版面，刊登了一篇介紹新文學作家老舍的白話小說《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的文章。後來對新文學的作家丁玲、張天翼等，《文學副刊》也都是一些介紹。

但是，副刊的風格總是和編者的趣味和文化傾向有著緊密的聯繫。圍繞著身為國學大師、學衡派主力的吳宓，自然而然形成一定的作者圈子，願意和《文學副刊》往來的大都是支持舊學、支持文言文的學者。於是，《文學副刊》上的文章大多是用文言文寫成，白話文在《文學副刊》只屬點綴，不成氣候。

（5）宣揚西學

吳宓曾留學美國，長於西學，他對當時文學界只滿足於了解西方文學的皮毛、不求實際的現象十分不滿。所以，在編輯《文學副刊》期間，吳宓努力介紹西方思想和文學發展狀況，提倡從荷馬、維其爾、但丁、密爾頓開始研讀西方文學。

《文學副刊》對西方文學的介紹，佔了很大的篇幅，特別是歐洲文學。重點介紹了法國小說家莫泊桑、哲學家班達，英國的曼舒斐爾、哈代，德國的歌德，還有挪威、瑞典、西班牙的文學家、思想家等等。但是這些介紹也帶著吳宓一貫的古典傾向，對古典主義的東西介紹得更多一些。文章偏重於說理、邏輯，帶有濃厚的學術趣味。

吳宓本人，也身體力行介紹西學。1928年3月20日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Henrik Ibsen）誕辰百年紀念，吳宓撰寫《易卜生誕生百年紀念》，刊《文學副刊》上。他指出：易卜生在當世能享如此大名者，以其所作戲劇，皆（一）討論社會問題，正合其時代多數人之心理。而（二）又以精美完密之藝術作成，適於舞台上之排演。兼此二者，實為難得。

（6）《文學副刊》名不符實

吳宓主編的《文學副刊》從 1928 年刊至 1933 年 9 月上旬，在這段時間里，《大公報》的文學副刊，學院氣過於濃厚，氣氛有些陳腐，越來越遠離文學的現實和主流，不能體現當時文藝界的形勢和狀況。

《文學副刊》以文學為名，但文學作品卻少之又少，名不符實，作為一家大報的文學副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文學副刊》遠離文學主流、讀者面越來越狹窄，到了 20 世紀 30 年代初，局面已經難以維持。致力於將《大公報》由地方報發展為全國大報的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張季鸞，不得不考慮改變這個副刊的現狀。

為了使這個文學副刊真正辦出文學的風格，他們決定另起爐灶。胡政之和張季鸞的目光，投向了和吳宓對壘的另一個陣營。《大公報》向曾經是新文學先鋒的一員老將——楊振聲，以及後來居上的文壇新兵——沈從文發出接編《文學副刊》的邀請。當時楊振聲主要負責為教育部編中小學的教科書，主編《文藝副刊》的工作，就交給沈從文一人承擔。此時，《大公報》是一家已有三十餘年歷史的大報，在全國特別是北方影響很大。副刊主編易人，由沈從文這位熱心於新文學的知名作家擔任，面貌很快就煥然一新。

三、中國「第一個職業作家」——沈從文

沈從文一生與報紙文藝副刊有很深的淵源，他最初的文學作品，就是通過報紙文藝副刊與讀者見面的。

在沈從文最初的投稿生涯中，飽受權貴的冷眼，也感受到人間的溫情。這

一階段人生困境所遇到人，所遭遇的事，讓沈從文一生刻骨銘心。尤其是他後來成為報紙文藝副刊的編輯之後，對那些跟自己早年一樣出身窮苦、無依無靠、投稿維生的文學青年傾注了超乎尋常的熱情，甚至親情，跟他早年文壇起步的經歷分不開。

（1）投稿無門 付郵無錢

1923年，沈從文初到北平，本意是求學，然而讀大學必須通過入學考試，這對只有高小畢業程度的沈從文，無疑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難關。一個「鄉下人」，從偏處一隅的湖南家鄉，突然置身於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最為現實的就是經濟問題。沈從文剛到北平時，身上只餘七塊六毛錢，最初兩年半，就是在這種經濟來源完全斷絕、無望無助的情形中度過的。冬天北平零下十多度的嚴寒，一身單衣、兩條棉被，就是沈從文的全部過冬之物。吃飯更成問題，常常是有一頓無一頓情形中，支持著他一邊自學、一邊寫作。同許多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一樣，沈從文最初的習作，投寄到各報文藝副刊，杳無消息。

在窘迫與貧困中，沈從文以一個文學青年的身分，向社會發出了呼救。他曾經用書信的形式，描述一個窮困潦倒的文學青年到處投稿無門的困境，一些稿件甚至因無錢買郵花而沒有付郵。後來發表在1924年12月22日的《晨報副鏤》上的散文《一封沒有付郵的信》，就是沈從文此一階段生活的寫照。

（2）獨立思考之可貴

在北京一邊寫稿、投稿的沈從文，開始到北京大學去旁聽。1980年沈從文應邀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說，他罕有地說起早年在北大旁聽時的感受。有一次辜鴻銘來校講學，同學們看到他一身舊式打扮，背後拖著一條細小焦黃

的辮子，禁不住哄堂大笑起來，可是辜鴻銘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要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它並不重要，剪掉它也極容易，可是你們精神上的那根辮子，據我看，去掉可很不容易！」

沈從文說：「這句話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 …使我明白近年來常說的『封建意識的嚴重泛濫』，影響到國家應有的進步，都和那條辮子的存在息息相關。這句話對當時在場的人，可能不多久就當成一句『趣話』忘掉了。我卻引起一種警惕，得到一種啓發，並產生一種信心：即獨立思考工作的長遠意義。」

1

（3）郁達夫的「一飯恩」

1924 年 11 月，飢寒交迫的沈從文，在百般無奈中，懷著一絲希望，曾向幾位在京的知名作家寫信，傾訴自己的處境。當時在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的郁達夫，接到來信，便前往沈從文居住的「窄而霉小齋」，看望這個尚不知名的文學青年。當郁達夫推開房門，屋內沒有火爐，沈從文身穿兩件夾衣，用棉被裹著兩腿，坐在桌前，正用凍得紅腫的手提筆寫作。

默默地聽著沈從文傾訴自己來北京的打算和目前處境，郁達夫感到脊樑上一陣陣發冷。他站起身，將脖子上一條淡灰色的羊毛圍巾摘下，揮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從文身上。然後邀沈從文一道，在附近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結帳時，共花去一元七毛錢，郁達夫拿出五塊錢匯了帳，將找回的三塊多錢，全給了沈從文。那天一回到住處，沈從文就情不自禁地哭了。²郁達夫看望沈從文回去的當天，心情不能平靜，寫了題為《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一文。³年

¹ 沈從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海內外》，1980 年第 10、11 期。

² 凌宇編《名家沈從文》，頁 79。

³ 徐榮街《湘西之子沈從文》，中華書局，頁 29。

輕時所受的郁達夫「一飯恩」，沈從文感念終生。一直到晚年，每逢談起這段往事，沈從文的眼裡還有淚花。

（4）徐志摩的慧眼

1925 年初，沈從文處於生活最困難的時節，以休藝藝為筆名，做著每個月二十塊錢稿費的白日夢，堅持不懈地將寫成的文章向各處寄去。其中一篇，出乎意料地登在《京報·民眾文藝》上，此前只有《晨報副鑄》發表過他的兩篇短文。¹

辛勤的勞動終於有了回報，1925 年秋，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從大量來稿中發現了沈從文的才華，沈從文作品中清新的文字、樸實的生活情趣、豐富的藝術想象力吸引著徐志摩。於是，《晨報》副刊開始接連發表沈從文的散文、詩歌和小說。徐志摩的慧眼，堅定了沈從文從事文學創作的信念，而日漸固定的稿費收入，也緩解了沈從文的經濟壓力。²沈從文與徐志摩也因投稿而相識、相惜，結下深厚的友誼。

沈從文的散文《市集》1925 年 3 月 20 日在《晨報》副刊發表，徐志摩專門寫了一篇《志摩的欣賞》，宣布一個文學新人的發現。徐志摩稱：「這是多麼美麗，多麼生動的一幅鄉村畫。作者的筆真像是夢裡的一隻小艇，在波紋瘦鰻鰻的夢河裡蕩著，處處有著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餘的。因為他自己的想像是最不放鬆的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餘的，因為春草的發青、雲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的獎勵的。」³

¹ 凌宇編《名家沈從文》，頁 81。

² 彭曉勇《沈從文與讀書》，婦女與生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頁 93。

³ 《晨報》副刊，1925 年 11 月 11 日。

徐志摩是沈從文文學道路上的伯樂，也是「平生風誼兼師友」的知己。在徐志摩的帶領下，沈從文頻頻參加詩歌朗誦會和各種文藝活動，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詩友、文友。在二十年代，沈從文與胡適、林徽因、葉公超、凌叔華等人建立很不錯的私交，都緣於徐志摩的介紹。當時，一些文學評論甚至將沈從文看作新月派一員。後來，在徐志摩推薦下，沈從文先後被胡適、楊振聲聘為中國公學、青島山東大學的教師，人生開始步入坦途。

沈從文在人生困境中得到徐志摩的提攜和幫助，在藝術上，也受到徐志摩的影響。沈從文曾寫過一篇《向徐志摩學「抒情」》的文章，推崇徐志摩「藝術至上」、「感美戀美」的文學主張，贊同其純美、性靈和自由主義的藝術精神，徐志摩其人其文，對沈從文文學觀的形成和文學作品的成熟，都有深遠的影響。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接到噩耗，沈從文震驚得不能言語，即從山東青島趕往遇難現場。深受打擊的沈從文，沉默三年，才執筆撰文，追思徐志摩的點點滴滴。1934年11月21日，《文藝副刊》登了一期專號，以整版篇幅追悼徐志摩。這一天是徐志摩三周年的忌日。沈從文發表了《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一文，追憶徐志摩。

在徐志摩逝世四周年的紀念日，《大公報·文藝》刊登了一篇由林徽因撰寫的《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文稱：「但是我卻要告訴你，雖然四年了你脫離我們這共同活動的世界，本身停掉參加牽引事體變遷的主力，可是也不能否認，你仍立在我們煙濤渺茫的背景裡，間接你是一種力量，尤其是在文藝創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¹顯示離世四年之後，徐志摩的文學成就和藝術追求，仍為當時年輕的京派作家所景仰。

¹ 《大公報·文藝》，1935年12月8日。

（5）周作人青睞

沈從文的另一位伯樂是周作人，當時周作人主編的《語絲》在北方文壇享負盛名，只要在該刊上發表作品，很快就會引人注意。1928年5月，沈從文一篇題名《福生》的小說，經胡也頻通過一位熟人轉給周作人，當這篇小說在《語絲》上發表後，沈從文從目錄上看到文章的標題，感動得只想抱著胡也頻哭泣。

1934年《人間世》雜誌向全國著名作家徵詢「1934年我愛讀的書籍」，周作人的答案與老舍一樣，首選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後來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周作人也非常支持，沈從文辦的副刊作者聚餐會，周作人也是常到的一位。周作人為人為文追求與世無爭、超然淡泊、節制內斂、平靜從容，對沈從文此後的人生、文學道路，都有一定的影響。

（6）廣種薄收

沈從文早期的作品可說是創作的大雜燴，他把當時流行的各種文學體裁，全部兼容並收。為求能適合報刊發表，這些作品篇幅簡短，抒情詩也不過兩三節，劇本只寫獨幕劇，散文、小說力求精簡。這些早期的作品，不少在藝術上並不成熟。沈從文自稱「我從事這工作是遠不如人所想的那麼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還掌握不住。」¹

由1925年起，沈從文的作品越來越頻繁地見於北京《晨報》副刊、《現代評論》，二、三年間，沈從文僅在《現代評論》上，就發表了數十萬字的作品，並一度擔任該刊發行員。從此沈從文同「現代評論派」以及後來的「新月派」

¹ 轉引自凌宇編《名家沈從文》，頁89。

主要成員胡適、陳西滢等有了較深的關係。

1926 年以後，沈從文的作品又刊登在《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上，三年間先後發表各類作品一百七十餘種。北新書局也於 1926 年出版了沈從文的散文、小說、戲曲、詩歌合集《鴨子》，1927 年他的小說集《蜜柑》也由新月書店出版問世。1928 年，沈從文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先後編輯《紅與黑》、《紅黑》雜誌，在此之前，沈從文曾與胡也頻一起編輯《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副刊。

新文學運動的發起人胡適，把沈從文看作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作家，魯迅對沈從文的文學才華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曾給予充分肯定。1936 年，魯迅在和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說：「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張天翼、郁達夫、沈從文和田軍（蕭軍）大概是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這裡包括了最好的短篇和長篇小說家。」¹

四、《文藝副刊》為沈從文事業插上另一隻翅膀

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沈從文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迅速上升，進入創作成熟時期，成為中國文壇上引人矚目的重要作家。

沈從文在文壇上地位上升，不僅主要取決於他在文學創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於他所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事實上，沈從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聲名卓著，並不在於他寫過一部不同異常的紀念碑式作品，而在於他在文學方面的貢獻非常廣泛多樣。」²

¹ 轉引自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185。

² （美）金介甫《沈從文史稿》，。

（一）文壇聲譽日隆

由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編譯的第一次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新文學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國》，收入了沈從文的《柏子》。在該書的《編者序言》中，斯諾提到巴金和沈從文，稱「這兩位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都有過巨大貢獻。」¹

1933年9月，就在沈從文與張兆和結婚同一個月，沈從文應《大公報》之聘，從學衡派吳宓手里，接編《大公報》的《文學副刊》，將之易名《文藝副刊》。當時，副刊稿件和版樣主要由沈從文在北平編好，再寄天津報社發排。

《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一期於1933年9月23日問世，每周兩期，由沈從文主編。從1935年9月起，由沈從文和蕭乾署名合編，每周出四期周一、三、五共三期，每期半版，由蕭乾負責，改刊名為「文藝」，週日一期整版，由沈從文主持。1936年4月起，全部改由蕭乾署名，但沈從文仍參與編輯和組稿，是蕭乾事實上的「顧問」。

姚雪垠在他的《學習追求五十年》一文中追憶，稱：「在北京年輕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從文同志，他在當時地位之高，今日的讀者知道的很少。他為人誠實，創作上有特色，作品多產，主編刊物，獎掖後進，後來又是《大公報》文藝獎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夠成為當時北平文壇的重鎮。」²

沈從文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是與他一生中幾件人生大事聯在一起的。他在收獲愛情、友情的同時，也迎來了創作和編輯生涯的黃金時期。「我要的，已經得到了。名譽或認可，友誼和愛情，全部到了我身邊。我從社會和別人證

¹ 轉引自《現代中國文學運動》，《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期。

² 《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

實了存在的意義。」¹這一段話，正是沈從文新婚燕爾，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完成力作《邊城》、《湘行散記》，人生步入順境時沈從文大好心境的寫照。

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時間，恰好是沈從文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文壇影響力的鼎盛時期、參與文藝論爭最多的時期、與中國現當代作家交往最廣泛時期，同時也是《大公報》開始獲得全國性聲譽的重要時期。

（二）完成《邊城》、《湘西散記》兩部力作

沈從文回憶 1931 年至 1937 年的創作時說，認為這六年是自己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幾年。從青島來到北平的四年裡，沈從文發表了一個中篇、十幾個短篇，十幾篇散文，近百篇短論隨筆，編選了《從文小說習作選》，出版了傳記、短篇集和評論集十來種。與前三年相比，創作數量略有減少，這是因為他把更多的時間和生命，消耗在編輯副刊，為青年看稿改稿之上。

沈從文的作品也日臻成熟。其中，作品《邊城》，完成於他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之時，並於 1934 年上半年，在《大公報》屬下的《國聞周報》文藝欄上首先發表、連載。²

1934 年 11 月底，沈從文得悉母親病情轉重，要他回去看看，《邊城》才寫了三分之一光景。返程十二天，沈從文又寫了約二十封沒有付郵的長信，再連同去時途中寄回的四十幾封信一起整理組織成比較完整的十二篇散文，自 4 月初起，陸續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及各報刊發表，這就是著名的《湘西散記》。至 4 月 13 日，《國聞周報》刊完《邊城》最後一節。無論從思想性還是藝術性看，《邊城》和《湘行散記》，都是沈從文的代表作，它們差不多同時問世，相

¹ 散文《水雲》，《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² 《名人筆下沈從文：湘西秀士》，頁 147。

互輝映，昭示沈從文經過十年歷煉，終迎來個人的藝術高峰。

（三）視友情如生命

沈從文為人視友情為生命，講義氣重信用，滴水之恩以湧泉相報。沈從文這種好客、坦誠的性格，令他贏得作家的友誼，產生群聚效應，令《大公報》文藝副刊，團結了一大批京津兩地的名作家和文學青年。對於這群經常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作品的作家，現代文學評論者以「京派」文人稱之。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一文中，回顧這一段歲月，稱「他(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我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誌》，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糾集在一起，佔據了這兩個文藝陣地，因此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呼。」¹

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三十年代中國文壇出現一個特有的現象。《大公報》文藝副刊(沈從文、蕭乾主編)、1934年創刊的《文學季刊》(鄭振鐸、靳以主編)、《文學月刊》(巴金、靳以主編)，1937年創刊的《文學雜誌》(朱光潛主編)，成為這個作家群發表作品的共同陣地。而《大公報》文藝副刊是其中起步最早，時間最長而又最具連續性的一面旗幟。

沈從文在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期間，與當時北平其他幾個文學刊物一起，將一大群新文學作家、文學青年緊緊團結在一起，相互扶持，勤奮創作，豐富了報紙文藝副刊的版面，繁榮了中國的文學創作，這是不容抹殺的歷史事實。

¹ 《名人筆下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204。

對此，同被譽為京派文人的朱光潛，對此有公允的評價：「京派文人的功過世已有公評，但有一點卻是當時的事實，在軍閥橫行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在北方一批愛好文藝的青少年把文藝的一條不絕如縷的生命線維持下去，也還不是一件易事。於今一些已到壯年或老年的小說家和詩人之中還有不少人是在當時京派文人中培育起來的。」¹

（四）白話文運動的前鋒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文學領域也展開了一場革新運動。具體表現在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在「五四」運動中被譽為「首舉義旗急先鋒」的胡適，就大力倡導和鼓吹白話文，他瞄準《大公報》這一有影響的報紙，作為倡導白話文的「鼓吹手」和「示範園」。

（1）《大公報》成白話文示範園

1931年5月22日，適逢《大公報》續後發行滿一萬號之際，胡適寫了題為《後生可畏》的祝賀文章，發表於《大公報》一萬號的第四版上。他肯定《大公報》的貢獻，提出希望：「在這個二十世紀裡，還有哪個文明國家用絕大多數人民不懂的昭文記載新聞和發表評論？」²

1934年第一個星期日，《大公報》刊出了第一篇「星期論文」，就是胡適的《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文》。胡適指出：「近幾年來，中國的報紙的趨勢有兩點可注意：第一是點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話部分的逐步增加。這兩件事，都只是要使看報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報紙的文字容易看。」³

¹ 《名人筆下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204。

² 《大公報》，1931年5月22日。

³ 《大公報》，1934年1月7日。

胡適還比較了當時北方兩家最大的日報《大公報》和《益世報》，以《大公報》白話和文白合計的比例高。「在《大公報》六版半的讀物之中，白話佔百分之三十八。然而從日報的歷史上看來，這樣的比例很可以使我們樂觀了。」他並借《大公報》的新年第一次星期論文的机会，很誠懇的提議：中國報紙應該完全用白話。¹胡適這篇《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不僅讓《大公報》「星期論文」首戰告捷、一炮打響，而且推動白話文運動，在大眾傳媒——日報掀起「滔天巨浪」。不僅《大公報》自此基本上改用白話文，而且影響到全國的出版物。

（2）文藝副刊率先「白話化」

如果說，《大公報》在推廣白話文方面，在報界處領先地位，那麼，在《大公報》所有版面中，率先全面推行白話文的，則是文藝副刊。在中國，日報的白話化，同日報標點分段一樣，是從「報屁股」上開始「白」的，後來許多日報白話文進入社評，被人形容為「已經白到頭了。」

縱觀新記《大公報》歷史，沈從文編《文藝副刊》，具有推廣白話文的里程碑意義。從吳宓主編《文學副刊》到沈從文主編《文藝副刊》，不僅是兩個名人間的工作交棒，還標誌著兩種文體、兩種作品、兩種觀念的轉換。接編《文藝副刊》之時，沈從文寫作上已完成由文言文向白話文的轉變，成為一名具代表性的新文學作家，而為《大公報》文藝副刊撰稿的作者，或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或本身是文學青年，一開始就以白話文從事創作。編者、作者和讀者三方的同時改變，促使《文藝副刊》，成為《大公報》最早全盤「白話化」的副刊版面之一。

¹ 《大公報》，1934年1月7日。

1933年9月23日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首次亮相，版面上率先辭舊迎新。爲了符合讀者閱讀習慣，整個版面仍然採用豎排方式，但文章全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標點點在字後，而不像原來的文言文那樣，把標點注在一邊。這樣，排出來的文章看上去疏朗有致，美觀大方，具有了現代氣息，《文學副刊》原來版面黑糊糊一大片的狀況獲得改善。

五、讓《文藝副刊》變成新文學陣地

沈從文主編的《文藝副刊》，創刊於1933年9月23日。原來是每周兩期，周三半版、周六整版。後來《文藝副刊》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爲全國文學界最受矚目的刊物之一。適應這種需要，《文藝副刊》又增加在「黃金檔」的周日刊出整版《星期文藝》，爲了滿足讀者需要，不斷增設版面，以至於後來每周有四期之多。

《文藝副刊》的通信地址標明是北平西單西斜街五十五號甲，但它的編輯部卻另有一個大本營，那就是沈從文的家：北平達子營二十八號。

（一）與政治保持距離

有別於一般的文藝副刊或文學雜誌創刊，《文藝副刊》的第一期既沒有發刊詞，也沒有「編者的話」，共有幾篇文章：豈明(周作人)的小品文《豬鹿狸》、林徽因的小說《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詩歌《倦》、楊振聲的文章《乞雨》，還有沈從文的回憶散文《記丁玲女士·跋》。

楊振聲的《乞雨》一文，表明了《文藝副刊》的文學立場和辦刊原則，起

了發刊詞的作用。在這篇文章中，楊振聲把當時文壇比作乾旱的田野，認為需要三樣東西的滋潤：

第一，思想。文章認為當前文壇的問題是作者缺乏自己的思想，盲目追趕潮流，機械地相互模仿。他還批評了當時上海文壇正在進行的無休止的文藝論爭，認為這些論爭對文學發展好處不大，是打架、講空話、缺乏作品，呼籲作者要對人生社會有真正的體會，對文學要有敬業精神。

第二，血淚的灌溉。作品不要說空話，更不能無聊，應和人生緊密相聯，表現人生的血淚、苦難。楊振聲認為好作品要體察普通的現實生命，例如天災、剝削和戰爭帶給人們的苦難。

第三，實幹精神的園丁。文章認為，文壇最缺少的是踏踏實實低頭寫作的作家。這些作家要以藝術至上，在寫作上下功夫，不追求名利，不嘩眾取寵。強調文學應該是自由的，是有獨立性的，有自己的規律和價值。文學變成政治的工具之後，這一切就會失去。

《乞雨》的發表說明，從一開始《文藝副刊》就對當時熱火朝天的「左聯」路線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分析，決定走一條跟政治保持距離的道路。

（二）文學趨雅避俗

《文藝副刊》的第二期，在醒目的首篇位置，刊登了葉公超的《文學雅俗觀》。這篇文章說，作者在創作時，應該用他的理智的感覺來彈壓他自己，使他不致於發生情緒的泛濫。凡過分的表現情感都可以說是俗，不論你的情感是真是假，以思想作本錢的作家也不例外。

因此，作家在寫作時，不能太任性，要「有典有則，遵守法度」。典，就是藝術的典；則，是藝術的則；法度，也是藝術的法度。意思就是說，不論表現甚麼內容、甚麼情感，都要講究「和諧」、「節制」的藝術美，講究文字的乾淨、精緻和中正大方，作者自己也要冷靜、理智。這篇文章也是有感而發，有的放矢。主要針對於當時充斥文壇的情緒激昂的爭論、粗俗直白的雜文。對於雜文出現這些問題，魯迅曾進行批評，寫過一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強調雜文不要露出上海流氓的習氣，與葉公超的觀點相近。

（三）「明星效應」彰顯

沈從文主編的《文藝副刊》，以純粹的文學創作為主，刊登新老作家的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文論，推崇清新自然、藝術精美的風格。代替以前的國學大師、學術大家，在《文藝副刊》刊登稿件的，清一色都是新文學作家。

一時間，當時文壇的名家新秀紛紛登場，小說、詩歌、散文、劇作、理論佳作紛呈，《文藝副刊》推出很短時間，改變了原來「陽春白雪」的狹小讀者對象，開始產生「明星效應」，被文壇熱切關注，受到文學青年追捧，成為當時新文學重鎮。

六、嘔心瀝血扶掖文學青年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以重視對青年作者的培養而聞名報界，這種良好的傳統，始自沈從文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沈從文嘔心瀝血培養青年作家，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爲青年改稿 耽誤自己創作

在這一時期，沈從文將大部分精力用於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與作者座談，成了他生活中常見的節目。這耗去了沈從文的許多寶貴的時間。他原本計劃繼《邊城》之後，進而完成描寫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說《十城記》——分別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爲背景，終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闕如。

沈從文稱「本擬寫十個，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記》。時華北鬧獨立，時局日益緊張，編《大公報·文藝》，大部分時間都爲年輕作者改稿件費去了，來不及，只好放棄。」¹副刊的豐富成果，融入了沈從文辛勤的勞動，特別是他扶掖文學青年方面所花費的精力和心血。他每天要閱讀大量的稿件，不管甚麼人的，一視同仁，看得非常仔細。

（二）早年受辱成現實教育

沈從文初涉文壇，曾把所有作品上百篇，向《晨報》副刊投稿，結果所有稿件不但未見發表，更被一位編輯黏成一長幅，在一次吃烤鴨宴會時，當著前去的一群名教授的面，對沈從文極盡嘲諷，並將該長幅揉成一團丟入紙簍裡。

後來，一位參加過這次宴會的人士，與沈從文相熟後，告之真相。沈從文認爲這次侮辱，是另外一種現實教育。他在《一個人的自白》說：「爲了否定它，也就把我變成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唐吉訶德』！凡曾經用我的同情和友誼作渡船，把寫作生活和思想發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學生都萬萬不會想到，

¹ 轉引自凌宇《名家沈從文》，頁119-120。

這隻忘我和無私的抽象渡船，原是從一種如何『現實教育』下造成的！」¹

這一次向報紙副刊投稿的經歷，讓沈從文深深體會，編者看似無關痛癢的一些行為，對初學寫作者的傷害有多大。因而，在沈從文的編輯生涯中，絕不怠慢青年作者，總是不遺餘力地培育著年輕作家，為他們編發稿件、推薦書稿。

沈從文從個人經歷中體會到，文學青年初次拿了一點文章給世人見面時的靦腆處，那種最謙卑的感謝。所以，他總是設身處地地為這些撰稿者著想，對他們努力寫作的成果以及默默無聞執著於文學事業的精神倍加愛護。

（三）做文學青年引路人

1933年夏天，文學青年王西彥帶著幾樣簡單的行李乘船奔赴北平。到了北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從箱子里找出一篇在杭州時寫成的小說模樣的稿子，用心修改一番，抄後寄給當時天津最大的報紙《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接著就每天下午懷著惴惴的心跑到新華街師範大學圖書館去看報紙。「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那篇稿子竟赫然在《小公園》副刊上發表出來了，而且很快收到一筆可觀的稿費，使我不僅窺看到了生活的前途，尤其是看到了寫作的車徑。」²

在繼續投稿幾次後，王西彥開始與沈從文有了更多的接觸。王西彥回憶：「每次當我紅著臉把裝在口袋里的稿子取出，交給他時，他總是雙手接了過去，微笑著說：『好嘛，好好寫。』他收下稿子，依據篇幅長短或質量高下，有的轉給《小公園》和《國聞周報》，也有的轉凌叔華給武漢一家報紙的副刊，有的就放進他自己負責主編的《文藝副刊》上，有時稿子被發表出來了，才發覺原來已經由他動筆作了修改，變得比較簡煉得體了……」

¹ 《沈從文全集》第27卷，頁18-19。

² 王西彥《寬厚的人並非孤寂的作家》，《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255。

當時和王西彥一樣向《大公報·文藝副刊》投稿的年輕人，還有很多，如河北的田濤、雲南的李寒谷等。田濤原名申壽，沈從文把申字去掉頭尾，又把壽字加上水旁，改成田濤，這個頗有氣派的筆名，田濤頗為受落，一直沿用。至於李寒谷，他的稿子發表出來時署名變成了「寒穀」，也是出自沈從文的改動，他認為寒谷帶有一些遺老名士氣，改谷為穀，更有新意。

李寒谷一篇題為《虎跳岩》的散文很得到沈從文的好評，沈從文多次在王西彥的面前稱贊它：「你那位同學的《虎跳岩》寫得不錯，告訴他今後多寫這樣的作品！」王西彥與同學們在一起時，經常談論沈從文對青年初學者這種令人感動的熱情，對沈從文抱有無限的感激，把他看做自己在寫作上的引路人。

（四）在經濟上資助文學青年

沈從文是一位熱心腸的人，儘管自己家境並不富裕，但他常常慷慨解囊，幫助那些生活上處於困境的文學青年，度過人生的難關。沈從文經歷過無望無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體會到一個窮困的文學青年，在中國現實環境裡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巴金曾憶述，「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刊後我拿回原稿。這手稿我後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淡，只能說是勉強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並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並為它作序。不是聽說，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¹

¹ 《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174。

沈從文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每月從報社可獲一百元報酬，這些錢大部分被用於請作者吃飯，給青年作者預支稿酬上了。青年詩人卞之琳寫了第一本詩集，無處出版，沈從文乾脆自掏腰包，爲他刊印，作序。巴金後來在給沈從文的信中真情地說：「前兩個月我和家寶(曹禺)常見面，覺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¹

（五）文學創作是一種信仰

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以注重文學自身的特性爲辦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藝術性和創作的嚴肅性，既反對遊戲、消遣的「白相」文學，又反對空有血淚叫喊的純粹宣傳品。在與文學青年日常交往過程中，沈從文態度可親，給人溫暖，但在實際編輯工作中，對文學創作卻是嚴格要求，不講情面。沈從文對作者的首要要求，就是對文學有神聖感、信仰感，還要誠實，耐得住寂寞。

（1）創作不只爲個人找出路

沈從文最重視的是端正青年作者的創作態度。因爲只有創作態度端正了，寫作時就比較能正確處置內容和技巧的關係。沈從文曾苦口婆心勸告青年，不要只爲個人找出路，因爲這種寫作態度「被你們自己，把它弄小弄窄」，「態度一有問題，題材的選擇，不是隨風氣人云亦云，就是排泄個人小小恩怨，不管爲什麼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親切。」²

沈從文發表《致一個讀書人的公開信》鼓勵青年，既然對現實不滿，那就「不妨野心更大一點，希望你的心與力貼近當前這個民族的愛憎與哀樂，作出

¹ 吳立昌編《巴金：懷念從文》，《人性的治療者—沈從文》，頁171。

² 《大公報·文藝副刊》，1935年1月6日。

更有影響的事業！」對於那些仍在讀書的青年，沈從文也要求他們的文章一定要與學校習氣離遠才有希望。不要以為讀十年書，寫五年文章，模仿模仿名家，就可以寫出好文章。

沈從文說：「今古相去那麼遠，世界面積那麼寬，人心與人心的溝通和連接，原是依賴文學的。人性的種種糾紛，與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賴文學來詮釋啓發的。這單純信仰是每一個作家不可缺少的東西。有了它，我們才可以在寫作失敗時不氣餒，成功後不自驕。有了它，我們才能夠『偉大』！好朋友，你們在過去總說對文學有『興趣』，我的意見卻要讓你們有『信仰』」。¹

（2）反對創作迷信「天才」

1935年6月，沈從文以副刊編者名義寫給一個詩歌作者一封信，批評他把創作看得太天真太隨便，以為只有「天才」，被名家發現，即可成為大作家。強調創作與其他工作一樣，「必須從習作中獲得經驗，從熟練中達到完全，一再失敗，不斷修改，廢寢忘食，發癡著迷情形中，產生他那出眾特立的作品。」²

沈從文還反對迷信「天才」，因為寫作者迷信「天才」，必然會懶惰，不肯獨立思考。他並不否認創作需要「天才」，但更強調創作需要「耐性」。³這就要求作者應有誠實的態度，不能只停留在「興趣」上，而要建立「信仰」，即對人性的追求。

¹ 《給志在寫作者》，《大公報·文藝副刊》，1936年3月29日。

² 《廢郵底存》，《大公報·文藝副刊》，1935年6月23日。

³ 《元旦試筆》，《大公報·文藝副刊》，1934年1月3日。

（3）永遠不氣餒

沈從文認為對文學抱著誠實態度，就必然要珍惜時間。巴金在達子營住了二、三個月，就不止一次聽沈從文講過這樣的話「不要浪費時間」，對靳以、蕭乾，也講過類似的話。對文學青年，他不僅言傳，更是身教。

經常有文學青年寫信給編輯部訴苦，沈從文不厭其煩地給他們回信，用自己當初對待退稿的態度，鼓勵他們埋頭苦幹，鍥而不捨。「只管寫，只管改，只管各處寄去，只管儘它失敗。在工作上不兒戲，不馬虎，而且永遠不氣餒擱筆……」¹

（六）重視技巧

沈從文雖然從各方面關心青年，但在寫作上卻從不放鬆對青年的要求。除為青年看稿改稿之外，還通過《文藝副刊》就寫作問題發表了許多通信、短論和隨筆。他與文學青年的對話、通信，後來選入《廢郵底存》，該書展現了沈從文當時的文學主張，以及他對文學青年從生活上、創作上的無微不至的關心。

（1）沈從文的作品重視技巧

沈從文的文學作品，非常重視技巧。沈從文的小說集《月下小景》，風格類似《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沈從文還在書中試驗各種講故事的方法，嘗試把六朝譯經和白話口語相結合，文白夾雜，神秘瑰麗。

沈從文還經常把自己的文章，按照段落，一條條地裁開，搞出許多紙條，

¹ 《大公報·文藝副刊》，1935年1月6日。

把這些紙條按照不同的順序排列，看哪一種組合最合適。然後不斷改變這些段落的先後秩序，來研究不同的藝術效果。沈從文有時有意採用不同的形式，來表達同一個故事，發掘不同的藝術效果。比如他的《阿黑小史》和《採厥》，就是同一題材、同樣人物而文體截然不同的兩篇小說。

（2）藝術與技巧不可分割

中國的傳統文學一向重視語言和技巧。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學作品越來越不注意在語言和技巧上下功夫，藝術水平不高，經不起時間考驗。甚至還有不少作家認為，對文學作品來說，內容是第一位的，技巧是可有可無的，作家講「技巧」反倒成了消極、落後的代名詞。

針對文壇的這種「矯枉過正」，沈從文覺得有必要正本清源。在將《文藝副刊》交由蕭乾主編的前夕，沈從文發表了一篇專論技巧的文章《論技巧》。¹詮釋「技巧」二字，「真正意義應當是『選擇』，是『謹慎處理』，是『求妥貼』，是『求恰當』。」

沈從文表示：「有思想的作家，若預備寫出一點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讀者注意，推動社會產生變革，作家應當作的第一件事，還是得把技巧學會」。因為藝術與技巧不可分割。所以人類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須先融解在文字裡，這理想方可成為「藝術」。文章最後的結論是：「莫輕視技巧，莫忽視技巧，莫濫用技巧。」²

¹ 《大公報·小公園》，1935年8月31日。

² 《大公報·小公園》，1935年8月31日。

（七）勇於改和勤於改

沈從文的創作態度嚴肅，精益求精，每篇作品刊出前都反覆修改，力求盡善盡美，才與讀者見面。沈從文的作品，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氣呵成的，其餘的都經過苦思冥想，字斟句酌，倘不使自己滿意，決不輕易出手。沈從文的作品發表了，整理成單行本時，再改，單行本結集時，還要改。

沈從文堅信：「金剛石雖是極值錢的東西，卻要一個好匠人才磨出它的寶光來，石頭雖是不值錢的東西，也可以由藝術家手上產生無價之寶。」¹沈從文不但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曾經看過沈從文很多文稿的朱光潛，這樣形容：「那是蠅頭小草，改而又改，東刪一處，西補一處，改到天地頭和旁邊密密麻麻一片，也只有當地熟悉他的文稿的排字工才能辨認清楚。我覺得這點勇於改和勤於改的基本功，對青年作家是一種極寶貴的『身教』，我自己在這方面就得到過從文的這種身教的益處。

2

對副刊稿件，沈從文從內容到形式，要求很嚴格，但不簡單地否定，而是邊看邊改，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有時在原稿上寫上密密麻麻的章草小楷。稿子刊用後，原稿一定退還作者。稿子如不採用，他也認真回信，或提出修改意見，或鼓勵作者再接再厲，有時稿子有一定質量，便負責將它們推薦到另外報刊發表。

1935 年秋天，當時還是文學青年的嚴文井，接二連三寄了幾篇習作給沈從文。當時沈從文在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星期天版。後來，嚴文井忽然收

¹ 《廢郵底存·沈從文文集》。

²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 255。

到沈從文的一封短簡，批評他寫得太多太快，勸導他多動手修改自己的文章，學會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信中沒有一個字提到嚴文井那些小文章的下落。從此以後，嚴文井照著沈從文的話做，寫了文章不急於寄出，先挑挑毛病，修改了幾遍之後再說，逐漸從修改中體會到了寫作的艱難和樂趣。沈從文雖沒有在自己主編刊物上採用嚴文井的文章，「可是也沒有槍斃它們。過沒多久，我那些小文章就在蕭乾和凌叔華主持的報刊上陸續發表了」。¹

（八）定期以文會友

沈從文與青年相交，從不擺什麼名作家大主編的導師架勢，因此青年作者也都把他當作兄長般的朋友看待。他們常去沈家作客，沈從文總是熱情招待。沈從文在北平的寓所，成了青年作家往來聚會的重要場所。1933年秋，巴金剛來北平時，就在沈從文家里住了半年。朱光潛、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蕭乾等，更是沈從文家的常客。來得更多的，還是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投稿的文學青年。

在作家王西彥的記憶中，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待人都和和氣氣，不會給人一種壓迫感。那時他的年紀也只有三十多歲，說話聲音雖輕，卻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裡我大概只能聽懂一兩句。」²

除了去沈家，當時還有另一種見面聚談的方式，就是由沈從文發通知邀約一些副刊作者到公園里喝茶。大概是每隔一兩個月就聚會一次，所約的人也不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沈從文親自寫簡短的通知信，且無例外地歸他付錢做東，沈從文通常是來得最早，走得最晚。談話的內容雖大致以文學和寫作為主，旁及其他，如時局和人生問題等等。時間也沒有規定，每次總是二、三小時的樣

¹ 《嚴文井：誰也抹煞不了他的存在》，《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188。

² 轉引自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40。

子，完全是一種漫談式的聚會。

嚴文井回憶道：「1936年春，由蕭乾代表天津《大公報》來北平請青年作者們吃飯，我第一次見到沈從文，也是這一次，我結識了張桂(屈曲夫)、劉祖春、胡昭衡(李欣)、黃照、田濤等年紀和我差不多的人，和年紀比較大的楊剛、李君彥(李威深)等。此後，從文先生每隔一兩個月就要邀約這批年輕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園聚集一次，喝茶並交談。如果說有一個核心人物，那就是沈從文。」¹

¹ 《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188。

第五章

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津、滬版)

蕭乾參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的時間，跨越了抗戰前夕、全面抗戰和抗戰勝利初期三個重要階段。前兩個階段，刊物都是在洋人鼻子底下編的：天津法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以及被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而在這段時期，適逢中國處於一個歷史轉折關頭，無論是個人、報社和國家，乃至全世界，都經歷了驚心動魄的突變，這種風雲突變，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打上深刻的時代烙印。

蕭乾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間表：

時間	編輯版面
1935 年 7 月—1935 年 9 月	編《大公報·小公園》(津版)
1935 年 9 月—1936 年 4 月	與沈從文合編《大公報·文藝副刊》
1936 年 4 月—1937 年 8 月	編《大公報·文藝》(津版、滬版)
1937 年 10 月—1938 年 3 月	在昆明遙編《大公報·文藝》(漢版)
1938 年 8 月—1939 年 9 月	編《大公報·文藝》(港版)
1946 年夏—1948 年 2 月	與劉北汜合編《大公報·文藝》(滬版)
1948 年 3 月—1949 年	與袁水拍合編《大公報·文藝》(港版)

一、蕭乾與《大公報》的淵源

蕭乾曾經說過：「《大公報》是我走出校門後的第一個崗位，也是我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它為我提供了實現種種生活理想的機會，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

記者這一行當，廣泛接觸生活，以從事創作。」¹蕭乾進新聞界，加盟《大公報》，純然是出於自己有意識的選擇。

（一）《文藝副刊》是文學創作的搖籃

1933年夏天，蕭乾從輔仁大學英語系轉學到燕京大學的新聞系。蕭乾談到自己轉系的想法，稱：「我希望目前這點新聞訓練能給我以內地通訊員之類的資格，借旅行及職務以擴展自己的生活視野。如果在經歷中我見到值得報告給大眾的，自己縱不是文人，也會情不自禁地提起筆來。如果我什麼也不曾找到，在這個大時代裡，我至少曾充當了一名消息傳遞者。」²在蕭乾考慮、設計自己的生活道路時，很早就拿定主義，既不願當官，又不想賣文為生，想找個有利於日後創作的固定職業，《大公報》是一份民間報紙，在當時風行一時，蕭乾確定目標，經楊振聲、沈從文兩位介紹，進了報館。

1933年11月1日，蕭乾的第一篇小說《蠶》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十二期）上。那時編者沈從文要蕭乾每月給他一篇。蕭乾最早的六篇小說都發表在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包括《小蔣》、《郵票》、《鄧山東》等，《文藝副刊》是蕭乾文學創作的搖籃。

蕭乾寫旅行通訊也是以《大公報》為起點。第一篇《平綏瑣記》（1934年）發表在《大公報》附屬的《國聞周報》上。進入《大公報》，蕭乾用了最有效的策略：當志在進什麼報社時，最重要最有力的介紹人，是自己。蕭乾最早寫的二十來篇小說（後來收在《籬下》和《栗子》集中），不是登在《大公報》上，就是給了它的附屬刊物《國聞周報》。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64。

²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63。

（二）沈從文是文學啓蒙老師

蕭乾的第一個文學老師是沈從文，他們結識於 1931 年，當時，蕭乾正在輔仁大學同安瀾合編《中國簡報》，經國文老師楊振聲介紹，去採訪沈從文。已是知名小說家的沈從文對這位文學青年十分熱情，頭一次見面便請他到東安市場下館子吃飯。沈從文從夥計手里要過菜單，用毛筆在上面寫起菜名，蕭乾見他寫得一手秀逸的毛筆字，急忙喚住轉身欲去的夥計，說：「這個菜單您給我吧，我再給您抄一遍」。沈從文一擺手說：「要菜單幹嗎？以後我會給你寫信，寫很長的信。」打這以後，沈從文給蕭乾寫過很多信，而且總是以「乾弟」相稱，透出親情與關愛。

《中國簡報》只出了八期。在所有介紹性文字中，蕭乾著力最多的是那篇介紹沈從文的《今日中國一個傑出的人道主義諷刺作家》。沈從文的家，也是《文藝副刊》的編輯部，很快成了蕭乾去的最多地方。沈從文曾對蕭乾說：「我希望你每月只寫三兩個短篇，然後挑選最滿意的再來看我。沒有寫成不要來見我。」

1

《蠶》發表後，細心的蕭乾發現師傅在許多處做了修改。蕭乾後來寫道：「看到印出來的文章時，你就不會理會刪改的痕跡嗎？我是曾麻煩過另一個朋友的。我曾臉紅。我覺得是犯了罪，那樣過分地麻煩一位滿心幫我而又負著很重責任的人。我日夜咬往牙，想拚著寫一篇用不著他動筆改的文章。自然，到如今我還只是在努力著。但從那以後，我把別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對贅字養成難忍的反感。學著他那簡練的榜樣，我少用『虛』字，少說無力的廢話。自然我還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²

¹ 傅光明《人生採訪者蕭乾》，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28。

² 傅光明《人生採訪者蕭乾》，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30。

沈從文還為蕭乾的第一個小說集《蒿下集》寫了《題記》。另外，沈從文將蕭乾的《蒿下集》和散文集《小樹葉》，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編入「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出版。同時師徒聯名出版了文藝書信集《廢郵存底》。書中收有十四篇沈從文的《廢郵存底》和蕭乾二十二則《答辭》，闡釋了他倆的藝術觀點。由於是以書信形式寫成，文字真切平實，論理深入淺出，從中可見兩人一脈相承的藝術標準和價值取向。

(三) 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七年

從燕京大學一畢業，戴上方帽子的十五天後，蕭乾便走進了天津《大公報》報館，那是 1935 年 6 月 30 日。自此，如果把在英國頭五年的兼職算上，蕭乾同《大公報》的關係延續了十五年。然而只有在 1935 年至 1939 年、以及 1944 年至 1946 年兩段時間，蕭乾是《大公報》的專職工作人員，其餘都是兼差。

(1) 編《小公園》和《文藝》副刊(1935 年—1939 年)

蕭乾在天津《大公報》時期，先編《小公園》後編《文藝》副刊，上海《大公報》開辦後，蕭乾除了寫旅行通訊，還兼編津、滬兩地的《大公報》副刊《文藝》。

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上海「八·一三」事件發生，戰事全面展開，上海《大公報》從十六版縮成四版，副刊首當其衝，在版面縮減之列。從前的大忙人蕭乾也成了閒人一名，被報館辭退了。

1938 年，身處昆明的蕭乾，接到《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的一封信，稱許多讀者要求《文藝》復刊，請求蕭乾從昆明遙編。蕭乾遙編的《文藝》在武漢

《大公報》以周刊形式刊出，從 1937 年 10 月 3 日至 1938 年 3 月 6 日，共出版二十三期。

1938 年，在胡政之的邀請下，蕭乾從昆明經安南，於八月初到了香港，參加《大公報》香港版創刊籌備的最後工作。不久，《大公報》港版創刊，《文藝》也隨之在《大公報》港版正式復刊。從 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8 月，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港版，創辦《文藝》綜合版。

1939 年赴英之前，蕭乾曾先後主編《大公報》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出版的《文藝》副刊，發表大量的文學作品，大力提倡獨立的書評，使《大公報》文藝副刊享譽南北，影響深遠。很多通過《大公報》文藝副刊成名的作家，都稱讚蕭乾有「像尋寶者那樣以發現新人為樂的」胸懷。¹

（2）評選文藝獎金轟動一時

在新記《大公報》成立十周年的慶祝活動中，蕭乾成功策劃了中國第一次也是 1949 年惟一一次的文藝獎金的評選，在當時新聞界和文學界轟動一時。

蕭乾後來回憶：「小說最初選的是以東北抗日遊擊戰為題材的《八月的鄉村》，作者蕭軍可能由於《文藝》不夠左，拒絕接受。最後選了蘆焚的《谷》。戲劇獎給了曹禺的《日出》，何其芳因《畫夢錄》獲得散文獎。獎金少得可憐，一千元由三位平分，然而在中國那畢竟是第一遭。」²由於評獎過程規範，具有創新性，權威性也較高，《大公報》「文藝獎金」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一件事。該獎原計劃每年舉辦一次，可惜因抗戰爆發而中斷。

¹ 《〈大公報〉名記者叢書·蕭乾卷》，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頁 163。

² 蕭乾《我與副刊》，《科技日報》，1988 年 9 月 2 日。

《大公報》還邀請林徽因在《文藝副刊》、《文藝》刊出小說的基礎上，編一本《大公報》小說選，這是《文藝叢刊：小說選》¹的由來。林徽因所編的《文藝叢刊：小說選》，《大公報》出版部 1936 年初版，早已絕版。1990 年又由上海書店重印，編入《京派文學作品專輯》。

在不少研究《大公報》的著作和論文中，均稱這本小說集為《大公報小說選》，包括由吳廷俊所著的《新記〈大公報〉史稿》一書。另在新出版的《沈從文與〈大公報〉》一書，稱這本書為《〈大公報文藝選刊〉小說選》。經過翻查原著，最早的書名應該是《文藝叢刊：小說選》。

另外，書名雖為《文藝叢刊：小說選》，本應全部收錄均為小說，但書中所見，有部分作品更似散文而非小說，如入選的沈從文兩篇作品：《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湘行散記之一》及《一個戴水獺皮子的朋友——湘行散記之一》。

（3）開始記者生涯

在《大公報》編輯文藝副刊的同時，蕭乾也開始了自己的職業記者生涯。1935 年秋天，魯西發生了大水災，災情嚴重。《大公報》派蕭乾與趙望雲合作，深入災區，一個畫一個寫，以求全面報道災區情況。蕭乾與趙望雲的合作默契，圖文並茂，文章刊出沒多久，各方大批的捐款就匯到《大公報》。《魯西流民圖》，是蕭乾記者生涯最早時期的代表作。

從魯西採訪歸來，蕭乾又去了蘇北，寫出了《邳縣的防災工作》、《東北災區流民圖》的文章，揭示比天災更嚴重的是人禍。

¹ 《文藝叢刊：小說選》，大公報出版部，1936 年初版。

1939 年，蕭乾預先發排了不少《大公報·文藝》香港版的稿件，開始了長達三個月的滇緬路之行，奔波在一千多公里的滇緬公路，寫下了《血肉築成的滇緬路》，這篇五千字的特寫，於 1939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大公報》香港版連載，成為當時對這條中國抗戰大動脈全面、生動的報道。

（四）長駐歐洲的中國戰地記者(1939—1946)

1939 年 8 月 31 日，蕭乾從九龍碼頭遠赴英國，應聘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1942 年蕭乾入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系當研究生，研究英國心理派小說。1944 年在總經理胡政之的勸說下，放棄即將到手的劍橋學位，出任《大公報》駐英特派員兼戰地隨軍記者，成為當時西歐戰場惟一的中國記者。

在戰火紛飛的歐洲，蕭乾寫下了《血紅的九月》¹、《銀風箏下的倫敦》²、《矛盾交響曲》³等膾炙人口的戰地通訊和特寫，被譽為「倫敦特寫三部曲」，代表了蕭乾戰地通訊的最高水平。

蕭乾曾隨英軍多次橫渡德軍潛艇出沒的英吉利海峽，到過美、法兩個佔領區的戰場；也曾隨美軍第七軍挺進萊茵，進入剛剛解放的柏林。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再到聯合國成立大會，親歷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從大洋彼岸為《大公報》發回大量的現場見聞和報道。

1946 年 3 月，巴金將蕭乾 1945 年三訪德國、已在《大公報》發表的一組特寫，輯成《南德的暮秋》，編入「文學叢刊」出版。1946 年 4 月，蕭乾的報告文

¹ 《大公報》，1940 年 10 月 13 日。

² 《大公報》，1940 年 12 月 2 日。

³ 《大公報》，1940 年 12 月 25 日。

學集《人生採訪》出版，這兩本書收錄了蕭乾對於歐洲戰事的通訊特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楊義在《蕭乾全集》的序言中，認為蕭乾在通訊特寫這一領域的開拓之功，高於小說。

旅美記者趙浩生曾感嘆，世界上大多數新聞記者的作品，生命力不足一天。「蕭乾不同於一般記者，他的作品不僅有新聞的時效，而且有文學的藝術，史學的嚴謹。他把文學技法，把對歷史的嚴肅感情寫進新聞，所以他的作品壽命不是一天，而是永遠。」¹

(五) 任《大公報》社評委員(1946—1948)

1946年，蕭乾回到上海，任《大公報》社評委員兼復旦大學教授，《大公報》派給他的工作之一，仍是編《文藝》。不過，那時他主要負責撰寫國際問題社評，雖然蕭乾撰寫社評不多，但影響頗大，尤其是當時的總編輯王芸生囑他寫的《英國工黨執政一年》²和《自由主義的信念——闢妥協騎牆中間路線》³，這兩篇社評既表達了蕭乾當時的思想，也反映了當年《大公報》的立場，轟動一時。

在蕭乾執筆的《自由主義的信念——闢妥協騎牆中間路線》社評中，第一次將自由主義與所謂的灰色人物、中間路線進行區別，肯定其「不左也不右」。蕭乾將自由主義信念概括為五條：一是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二是相信理念與公平競爭；三是以大多數幸福為前提；四是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反對任何一黨專政；五是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選並駕齊驅。⁴

從1946年至1948年，蕭乾為《大公報》撰寫了近二百篇社評，最根本的

¹ 《〈大公報〉名記者叢書·蕭乾卷》，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頁163。

² 上海《大公報》，1946年8月28日。

³ 上海《大公報》，1946年1月8日。

⁴ 上海《大公報》，1946年1月8日。

基調是反對戰爭，嚮往和平。據統計，在蕭乾所寫的社評之中，宣傳自由主義思想的約佔三分之一，有些單從題目就可見作者傾向，如《泛論民主與自由》、《慨嘆人權會議》、《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懷四大自由》等。蕭乾及其社評所表現的自由主義思想，是當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留洋歸來知識分子的一種抱負，甚至是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

蕭乾的自由主義思想，同樣集中體現在他以「塔塔木林」為筆名，在《大公報》刊出的政論雜文專欄《紅毛雜談》之中。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文藝》副刊最初仍由蕭乾主編，後來交給袁水拍。直至1949年10月1日，蕭乾已出任英文《人民中國》副總編輯，卻仍兼《大公報》的駐京記者，並以這個身份替《大公報》報道了開國典禮這一歷史場面。直至五十年代初中國內地包乾制改為薪金制，蕭乾才正式辭去兼職，與《大公報》正式脫離關係。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創刊文藝版，蕭乾曾當過一陣顧問，直至被扣上右派帽子為止。打那以後，蕭乾不但告別報紙副刊，而且在往後的二十年，與文學工作絕了緣。

（六）編輯生涯甘多於苦

1992年，事隔近半個世紀，蕭乾仍以無限依戀的心情來回憶這段副刊編輯生涯，寫下了《我當過文學保姆》的回憶錄，稱：「我熱愛這份『文學保姆』的工作。」¹回味在《大公報》前後長達七年的文藝副刊編輯生涯，他覺得有苦有甘，但甘遠多於苦。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29。

1939 年秋，蕭乾告別《大公報》文藝副刊，遠赴英倫前夕，發表了一篇《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副題是「謹向本刊作家讀者辭行」。他稱自己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關係是近乎血緣。

蕭乾深情地寫道：「即使僅僅是個奶媽，在辭工的時候，一股依戀的情緒不也是難免的嗎？更何況是一個性子最急躁的小夥子呢。四年來，我如一個老管家那麼照護這刊物：每期一五一十地拼配字數，摳著行校對，到月頭又五毛一塊地計算稿費。有時工作同興趣把我由編輯室裡扯出去，扯得很遠。但黃河沿岸也罷，西南邊陲也罷，我總還是把它夾在腋下；可以疏忽，然而從未遺棄。這一次，我走得太遠了。平常對它，我很容易說出『厭倦』的話。臨到訣別的時刻，我發覺離開它原不是件那麼容易的事。一種近乎血緣的關係已經存在著了——然而我又帶不得它走」¹

二、《小公園》的歷史沿革

《大公報》非常重視文藝副刊，在 1926 年 9 月 1 日，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續刊《大公報》的第一天，《大公報》便在第八版上半版創設了綜合性文藝副刊《藝林》，由何心冷主編。

何心冷多才多藝，追隨胡政之辦過通訊社、編過雜誌。除了《藝林》外，他還主持《大公報》的《兒童》周刊、《電影》周刊和《摩登》周刊的編輯工作。

（一）何心冷開墾《小公園》

¹ 《大公報》，1939 年 9 月 1 日。

在《藝林》第一期上，刊登了何心冷撰寫的文章《我們說些什麼》，談到《藝林》的內容：「除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有趣味的詩詞、筆記、戲劇、電影評論、奇奇怪怪的消息外，還加些流行的時裝，或是社會寫真……國家大事固然要說，就是里巷間的歪事，免不了要說上幾句，這麼著，讀者看了既覺得報紙的確和自身有密切的關係，就是我們說的也覺得有些意思，不至於白費了」。¹

從這篇類似發刊詞的文章中，主編何心冷心目中的《藝林》貼近生活，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輕鬆活潑，甚至容許和接納一些「八卦」的話題和茶餘飯後的閒話，而傳統的文學創作、文藝評析只是其中一部分，並非全部。由於何心冷對副刊的定位，切合大部分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心理，一個月後，應讀者要求，《藝林》的篇幅由半版擴展為一整版。

半年以後，1927年3月7日，《大公報》另一個綜合性副刊《銅鑼》在第八版創刊，亦由何心冷主編。1927年9月1日，新記公司續刊《大公報》一周年之際，《藝林》改稱《副刊一》，《銅鑼》改稱《副刊二》，仍由何心冷主編，兩個副刊作了適當的分工，《副刊一》偏重文藝性，專載含有趣味之小說、詩文，還另闢「談話室」專欄，刊載小品文字。《副刊二》偏重綜合性，開闢各種各樣專欄近十個，專載含有新聞性之稿件，亦強調其趣味性。

1928年元旦，《副刊一》和《副刊二》合二為一，組成一個全新文藝副刊《小公園》，其後成為《大公報》連續出版時間最長、在讀者中影響較大的綜合性文藝副刊。

（二）《小公園》趣味濃郁

¹ 《大公報》，1926年9月1日。

主編何心冷化名「園丁」，在《小公園》創刊號上寫了《我們的公園》一文，文中稱：「我們的公園，沒有杰閣崇樓，只有幾間茅屋。沒有嶙峋怪石，只有幾塊破磚。沒有飛瀑流水，只有一灣活水。沒有珍禽異獸，只有在天空飛翔著的鳥兒。大人先生們有的是大廈高堂，一瞧見這園門以內一片茂草，早就不屑一顧。但是，我們本來也不敢屈駕，生怕滑滑的泥會玷污您的白鞋，亂草裡的刺棘會碰疼了您的嫩皮肉，反而弄成個恭敬不足，得罪有餘。」¹表明該副刊崇尚自然、樸素、清新而有活力，追求大眾化、平民化、生活化。版面公開，不是專為「大人先生們」而設，也不求過分裝飾、雕鑿，盡顯「平民情結」。

在《我們的公園》文末，何心冷說：「我們的公園，本來是為需要精神上得到安慰的人們而設的，『門雖設而常開』，愛什麼時候進來都行，只要能使大家安安靜靜的領略一些自然的趣味，不求其他。」在刊圖下面，他還特別聲明：《小公園》的稿件「第一要緊的是有趣味」。²

曾經編輯過《小公園》的陳紀滢這樣評價：「《小公園》既注重文藝性，更注重綜合性，既有為專門家預備的，更有為一般讀者預備的」，「它是大多數讀者興趣(非低級)的所在，誰也可以看得懂，並且人人需要它。」³概括了《小公園》特點。對於《小公園》刊登各種體裁的通俗文藝作品，張香山評價說：「《小公園》既不像上海鴛鴦蝴蝶派所編的副刊，但也不像北洋軍閥時代北京《晨報》、《京報》副刊那樣，它作為文藝性刊物，新舊兼備。」⁴

何心冷的努力，獲得《大公報》所在地——天津市民的認同，據前天津《商報》編輯吳雲心回憶，「天津市民盡有人不知道《大公報》有張季鸞，但不知何

¹ 《大公報》，1928年1月1日。

² 《大公報》，1928年1月1日。

³ 王文彬編《中國報紙的副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38。

⁴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28。

心冷者甚少。」¹說明《小公園》拉近了精英辦報、文人論政的《大公報》與普羅大眾的距離。

不幸的是，何心冷於 1933 年英年早逝，之後，徐凌霄、曹世瑛、吳硯農、陳紀滢，馮叔鸞先後做過《小公園》的「園丁」。然而到了國難深重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這種以趣味性為主要特徵的綜合性文藝副刊，顯得落伍，與急速變化的時代不大合拍了。

尤其是《小公園》在人稱「馬二」先生的馮叔鸞接編之後，更是每況愈下，演變成一個以傳統曲藝及舊聞掌故為主的副刊，不僅內容陳舊，版面呆板，逐漸失去當年的活力。面對這種情況，當時的經理胡政之深感不安，急需物色一位有才幹的年輕人來接替馮叔鸞主持《小公園》。

三、蕭乾改造《小公園》

當時《大公報》除了以青年知識界為對象的《文藝副刊》，還辦了個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小公園》，另外報紙還有十一種由社會上專家學者主編的學術副刊，如《藝術》、《哲學》、《史地》等。

胡政之當時想物色的是一個既編《小公園》，又兼管那十一種副刊發稿工作的人。其實，這並不完全符合蕭乾的最初的設想。因此，蕭乾問：「要是我能預先把《小公園》編出若干期，您肯不肯臨時找人幫我發旁的副刊，放我做點外出採訪的工作？」²老闆聽了，知道他收下的大概不是個懶漢，一口答應。

（一）不能編給提籠架鳥的老頭兒們看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 128。

²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 165。

接過《小公園》的編務之後，蕭乾立刻發現一個矛盾：拿起移交過來的稿子一看，才知《小公園》原來是個以傳統曲藝及舊聞掌故爲主的副刊，只有半版。下面滿是五花八門的廣告：從航空彩券到性藥和火車時間表。刊物上登的是有關跑馬、回力球和圍棋，這些蕭乾自認都外行。待用的存稿如《七夕考證》、《小白玉霜的藝術觀》和正連載著的《劇壇》以及探討戲曲源流版本的文章，蕭乾既不懂，又不感興趣。當胡政之問起接編後的情況時，蕭乾直言由自己來編這樣的副刊怕不對頭。

很多年之後，蕭乾還記得當時胡政之那席使他大爲開竅的話。胡政之說：「你覺得不對頭，這就對頭了。我就是嫌這個刊物編得太老氣橫秋。《大公報》不能編給提籠架鳥的老頭兒們看。把你請來，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這一頁。你怎麼改都成，我都支持你。」¹

那時，報界給副刊起的別名「報屁股」著實不雅。像當時的《大公報》，在十四版報紙中，《小公園》是被放在體育、經濟，以至專登桃色新聞及兇殺案的本市版，以及名流顯貴和美女明星的玉照爲主要內容的畫刊後面。蕭乾剛進報館時，對於「編報屁股」確實有過自卑感，逐漸地，他感到這真正是中國報紙的一個特色了。

（二）發表《園例——致文藝工作者》

被蕭乾問及抽屜裡的存稿如何處理時，胡政之答：「總得有個新舊交替的階段嘛。約好的稿子當然不便於退。這麼辦吧，你把那些登在刊物上不起眼的位置，登完爲止。你可以在刊物上公布你的新大政方針。這樣，一看換了人，變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68。

了樣，舊的也就不來了。」¹

1935年7月4日，上班後的第四天，蕭乾便在《小公園》發表一篇《園例——致文藝工作者》，足足佔了一整版。從小標題：「文章水準」、「內容與形式」、「小品與大塊」、「一個擔保」、「一個請求」和「一個呼籲」，蕭乾經過幾日的深思熟慮，將自己對《小公園》的期望和要求，和盤托出，與讀者分享。《園例》發表後，引起各方面的反響，有的嫌刊物水準太高，有的要求還是登舊體詩，更多的來信，則是對《園例》表示支持。

7月9日，蕭乾在《小公園》上開闢了一個「讀者與編者」欄，就刊物內容和文學觀點與讀者直接對話。蕭乾又通過「答辭」（如《理髮師·市場·典型》）等文，一再強調要提高來稿的質量。接著，蕭乾就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設計起刊物的內容，另起爐灶。

《小公園》之前的專欄，蕭乾除了保留由北平國劇學會主編的《劇壇》之外，其餘全部捨棄，算是如報社所要求的新舊交替。遺憾的是這個過渡期似乎過長，一直到8月31日蕭乾編的《小公園》最後一期，《劇壇》仍保留一個小小的版位，與大批新人新作放在一起，「舊」的「尾巴」顯得頗不協調。蕭乾新增的專欄，包括：《文藝新聞》、《讀者與編者》、《書評》、《文壇消息》、《答辭》、《名著介紹》等，將刊物辦得既有份量，又多樣化。

（三）新文藝園地

把一個老頭兒看的變成青年人的刊物，不如蕭乾想得那麼容易。1935年7、8兩個月，在友人巴金、靳以和凌叔華的支持下，蕭乾挽起袖子認真地幹了起來。

¹ 蕭乾《我與〈大公報〉》，《〈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68。

每隔一段時間，他都從天津到北京，參加文學青年的聚會，廣泛約稿，令《小公園》改變方向，耳目一新，顯示了一個剛出校門、滿懷理想的年輕人的銳氣、勇氣和幹勁。

（1）改變了《小公園》的定位

蕭乾改版《小公園》是從星期六、日的版面開始，改版的方向是變消閒為文藝，由舊聞掌故改為新文藝的陣地。蕭乾在《讀者與編者》強調，不必管刊物的過去如何，現實的存在永是為糾正過去。一切有成效的糾正都必須在內容上下工夫。他公開向作家、文藝青年約稿。為了避免用不相干的東西來填塞篇幅，《小公園》所有的專欄都可自由伸縮。有適當的稿子就登；沒有寧可空著。

翻看一下 1935 年 7、8 月的《小公園》，雖然讀者感到不和諧，可也奇特有趣。蘆焚的小說，繆崇群的散文，李健吾、張庚的評論旁邊，卻登著齊如山的《論皮黃》和劉澹雲的《論昆曲》，魏深介紹路卜洵的《灰色馬》，旁邊卻刊著《思凡曲調考》和《清宮之月全承應戲》，新舊交替、對照，成為《大公報》文藝副刊一個有趣的現象。

（2）改變了《小公園》的作者群

報紙副刊的年輕化，首先來自作者的年輕化。《小公園》之前作者，在馬二先生約稿的名單中，大多數都是年紀較大的舊式文人，他們的興趣也集中在傳統戲劇和舊體詩詞上面。到了蕭乾時期，除了存稿以外，新來稿件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以前從未給《小公園》撰稿的新作者，既有已成名的作家，更多的是未成名的文藝青年。

蕭乾宣稱：「我們的光榮將不在於曾刊登了某位『老作家』的稿子。」¹堅決反對把作家或作品分作幾流，對於每篇文章，要求它在文字通順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創造性。

蕭乾本人是一名文藝青年，他充分體驗過投稿人的心理，以及他們的心血變成鉛字見不到天日的苦惱，所以，從一開始他就決心讓手裡這《小公園》成為千千萬萬個文藝青年自己的園地。「編者也有一顆綿軟的心，他不甘心把來稿丟進黑暗所在，編者只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媒介。他的良心不容許他埋沒可貴的貢獻。只要印出來對讀者多少有些好處，他永遠不會埋沒來稿。」²

蕭乾在致讀者的信中保證：「編者卻永不會漠視你的文稿，只要印出來對讀者有些許好處（一點美的表現或啓示），他必讓它早早登出。……只要作者不吝惜精力，編者要學習一個好漁夫的榜樣，永不讓佳作漏到網外。」³

（3）重「作品」輕「作家」

蕭乾將刊物定位在千千萬萬文藝青年的陣地，然而每天成批寄到的來稿，卻大都屬於中學作文水平，怎麼辦？除了不厭其煩在《讀者與編者》呼籲文藝青年重視作品質量，提醒他們：「文藝與新聞顯然不同，把各地通訊稿投到《小公園》來可就走錯了門」。⁴

同時，蕭乾採取出專輯的形式，將好的稿件先集中在周六、周日《小公園》刊出，希望用以老帶新的形式，為日常版面起到示範作用。但專輯並非名家名作的集中地，而是重「作品」而輕「作家」。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31。

² 《大公報·小公園》，1935年7月4日。

³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70。

⁴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70。

在「讀者與編者」欄《致客君》中，蕭乾說「在『園例』裡，我們不是根本否認了『流』的排列嗎？被我們約來寫文章的也多是列於作家群流之外忠文文學的朋友們。這刊物雖小，我們將努力克服編輯上傳統的勢利心。我們的光榮將不在刊登了『老作者』們的稿子。我們準備著更多的驕傲來發現新進。因此，只要是『文章』，我們必登，只要是『好文章』，我們必登在特輯上。我們希望做到一切公開，一切平等的地步。」¹

《小公園》的周六、周日專輯，聯繫了一批南北作家，以老帶新，提高整個刊物的質量。最後，由於平日的稿件質量上去了，名家專輯亦隨之取消。周六、周日專輯，通常提前一周刊出預告，到了八月中旬，《小公園》已沒有了這類預告，專輯與平常的《小公園》的界限已經不存在了。在《無預告》一文中，蕭乾高興地說：「下周今日的文章可以不必預先宣傳了，因為他們與平日的內容已不再有懸殊的差別。今後本刊在發展上將趨向穩固與持久，努力謀刊物水準平衡地升高。」²

（4）刊登一批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

蕭乾在接編《小公園》的過程中得到了《文藝副刊》的大力支持，不僅在文藝思想、編輯思想、文學立場上和《文藝副刊》一脈相承，《文藝副刊》的編者沈從文和他聯繫的一大批作者，都給予《小公園》無私的幫助和支持。

1935年夏天的《小公園》，頗為熱鬧，既有嚴文井、張秀亞、田濤、藺風萼（柳杞）等北方新秀，又刊登著南方知名作家葉聖陶、巴金、張天翼的近作。版面上各種專欄之間，夾著沈從文的《廢郵存底》和蕭乾署名編者的《答辭》。

¹ 《大公報·小公園》，1935年7月8日。

² 《大公報·小公園》，1935年8月17日。

在蕭乾接編後的一個多月，《小公園》刊出不少在技巧和體裁上比較成功的作品，如：田濤的《吝惜》(1935年7月9日)，盧湖的《田地》(1935年7月10日—11日)，德初的《劫後》(1935年7月17日)，王尹的《中原》(1935年7月22日)，葉均的《黃沙》(1935年7月23日)，謝縵的《攀》(1935年7月26日)，威深的《鄉村》(1935年7月31日)，朱芳的《夜》(1935年8月1日)，黃虎的《橋》(1935年8月8日)。

其中，農村題材的《田地》藉著自耕農老坤視田地如生命的細緻而真實的描寫，藉著老坤想完成他差二畝就夠一頃看不到邊際的田地的熱望，反映出農民對土地的觀念。描寫戰爭的短篇小說《橋》，讓蕭乾推崇備至，他甚至將之媲美於冰心的《一個軍官的日記》，認為冰心的作品給予我們的僅是絕望消息，而《橋》卻給我們猛進的力。

(5) 同齡人心靈對話

當時《大公報》的副刊編輯，大部分都是邀大學教授、專家出任，在知識界享有盛譽。但蕭乾編《小公園》，卻顯示了另一種優勢——年齡，由於年輕，蕭乾與年青的作者、讀者沒有代溝，能夠平等相處、對等交流；因為年輕，蕭乾很容易理解和體會年青人所面對的創作問題、人生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也曾給他困擾。藉《小公園》，蕭乾步入同輩青年朋友的精神世界，分享他們寫作上、生活中的苦惱與思考。在當年風行一時《寄小讀者》和《給青年十二封信》的影響和啟發下，蕭乾曾努力同讀者建立一種更親切的關係，最早在《小公園》上出現的《答辭》，就屬於這種嘗試。

蕭乾在《小公園》最早開闢也最活躍的是《讀者與編者》這一欄。從一開

始，他就強調不要讓它成為編者的獨白。編者曾說：「這是一個圓桌，不是一個講台。討論的範圍以文藝問題為主，但也可涉及其他……這是個苦悶年頭，誰沒有一肚子委屈！這欄一開，我們相信年輕朋友們將爭先遞給編輯他們的『公開狀』」。¹在《小公園》改版約兩個月的時間裡，《讀者與編者》共刊出二十八期。

蕭乾開了閘門，每天的來信增加了不止一倍。文藝問題之外，還有談升學的，談戀愛問題的。特別多的則是由苦悶引發的青年出路問題。蕭乾在《小公園》的《答辭》，部分後來收入《廢郵存底》一書，文章包括《理想與出路》、《為技巧伸冤》、《風格的金字塔》、《認真：一個妥實的出路》、《臨帖：死路一條》、《客觀化些》等，與青年朋友展開討論，觀點未必深刻，但熱情和真誠，撲面而來。

（四）讓《小公園》年輕化

在 1935 年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蕭乾按自己的理想、大刀闊斧地改造《小公園》：變綜合性、消閒性為文藝性，變作者、讀者老齡化為年輕化，編者、讀者的距離由鬆散變緊密，版面內容、欄目設置由呆板變得活潑……最重要的是將版面定位於面向千千萬萬青年文藝愛好者，為他們提供作品發表的園地，為他們提供交流的「圓桌」，致力幫助他們提高創作質量，為他們介紹最新好書、文壇消息……

吳廷俊在《新記〈大公報〉史稿》一書稱：「《小公園》改版在社會上得到一大批名作家的支持，他們是葉聖陶、冰心、知堂、光潛、巴金、靳以、蘆焚、健吾等，他們經常賜《小公園》以大作，從而使這個小小的副刊身價倍增。」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 171。

事實上，使《小公園》身價倍增的並不只是名家新作，而是對新人新作的重視。蕭乾從一開始做編輯就表明：「評判一個副刊，首先應看它發表過什麼作品——尤其是看它發表過多少青年作者的處女作。」¹

蕭乾改造《小公園》最突出的成就，就是讓《大公報》文藝副刊充滿活力，關注新人新作，以及由年輕的編者、作者和讀者所帶來的版面年輕化、生活化，令《小公園》原來的老讀者——「提籠架鳥的老頭們」，開始感到陌生和難以適應了。

四、蕭乾編《文藝》(津、滬版)

蕭乾個人喜歡的是文藝，往來的是文藝界，《小公園》改版，經過 1935 年 7、8 兩個月的刊行後，不僅變活躍了，而且性質起了明顯變化，先是周六、周日特輯，為純文藝性，後每期《小公園》都變成純文藝性的了，成了一個專門性文藝副刊。

(一)《文藝副刊》與《小公園》合併

從《大公報》副刊的整體來說，經蕭乾改造的《小公園》與沈從文編的《文藝副刊》的分工和區別越來越小，有內容重疊之感。恰巧這時，胡政之和張季鸞有感於《文藝副刊》已成為《大公報》的名牌副刊，影響日增，打算擴大《文藝副刊》的版面和容量。

合併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文藝副刊》版面不斷增加，沈從文開始感到

¹ 蕭乾《我與〈大公報〉》，《蕭乾文集》第 6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69。

吃力。此時，沈從文既要編《文藝副刊》，還要協助楊振聲，為教育部編中小學教材，同時還要寫作，身兼多職。沈從文便向報館建議，索性將刊物改名《文藝》，交蕭乾負責。

1935年8月，《文藝副刊》與《小公園》正式合併。沈從文主編的《文藝副刊》於1935年8月25日出至第166期後，停刊了；蕭乾主編的《小公園》於1935年8月31日後，也停刊了。

為了與原來的《文藝副刊》有所區別，這個新副刊改名為《文藝》。從1935年9月1日，蕭乾主編的全新《文藝》（津版），正式面世，為《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掀開新的一頁。當時對落伍了的《小公園》進行改版是必要的，但將它改變成一個純文藝副刊，則有利有弊，使《大公報》從此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綜合性的文藝副刊。這對一家大報來講，未嘗不是一個缺憾。

（二）《文藝》出版是副刊史上大事

從1935年9月起，《文藝副刊》易名《文藝》，由沈從文和蕭乾署名合編，每周出四期，周一、三、五共三期，每期半版，由蕭乾負責，多刊登一些短小的作品，開設各種專欄，保持原《小公園》的清新、活潑風貌；星期日整版，由沈從文主持，主要刊登名人作品，以特刊為主，包括詩歌特刊、藝術特刊、翻譯特刊、教育特刊等，基本上保持《文藝副刊》的特色。

到了1936年4月，全部改由蕭乾署名，沈從文擔任顧問，由蕭乾全面負責津、滬兩地的《文藝》的編務，包括平時三個半版及「星期文藝」整版。

對於《文藝》副刊的出版，學者吳廷俊評價為：「不僅是《大公報》副刊史

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當時文藝界一件值得記敘的事。《文藝》副刊上不僅發表了一批名家的著作，而且發表了一些文學青年的處女作。一些重要的作品如孫毓棠的歷史敘事詩《寶馬》等，就是由《文藝》首先發表的。」¹

（1）編《文藝》師徒接力

1933年10月，蕭乾的第一篇小說《蠶》就是發表在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那是除了校刊之外，蕭乾生平第一次變成鉛字的小說。

蕭乾稱：「做了四年《文藝》作者或讀者的您，或許想知道我同這刊物究竟是怎樣結起姻緣的吧？首先我得承認，我是它幾十幾百名科班之一，它培養起來一個不長進的孩子。」²

蕭乾曾滿懷深情地回憶自己在《文藝副刊》起步的情形。「那時我在北平西郊一家洋學堂上學。沈(從文)先生送出門來總是半嘲弄地叮囑我說：每月寫不出什麼，可不許騎車進城啊！於是，每個禮拜天，我便把自己幽禁在石叢湖的舫上，望著湖上的水塔及花神廟的倒影發呆。直到我心上感到一陣熾熱時，才趕緊跑回宿舍，放下藍布窗簾，像扶乩般把那股熱氣謄在稿紙上。如果讀完自己還覺得可喜，即使天已黑，也必跨上那輛破車，沿著海甸滿是荒冢的小道，趕到達子營沈(從文)家。」³

沈從文在文學創作上是蕭乾的導師，在副刊編輯上，也是蕭乾的導師。蕭乾從天津去上海編《大公報·文藝》時，沈從文叮囑他：「你要我們做什麼，儘管說。當你因有我們而感到困難時，拋掉我們。不可作隱士。要下海，然而要

¹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頁188。

²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³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浮在海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當的，要挺身去做。一切爲報館，爲文化著想，那才像個做事情的人。」¹

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從前任沈從文手上承繼下來的，除了廣泛的作者群和忠實的讀者群，還有「只認作品不認人」的優良傳統，兼收並蓄的版面風格，以及以扶植青年作家爲己任的責任感。

（2）不捧角不勢利

《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傳統就是堅持「不勢利」、「不捧角」。由報紙的生意經來說，不登雜文，注意作品本身並不是容易的事。當時的《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曾多次囑咐蕭乾說：「我們並不靠這副刊賣錢，你也不必學許多勢利編輯那樣，專在名流上著眼。要多留意新人。只要從長遠上，我們能對推進中國文化起一點點作用，那就夠了。」²

幾年來，蕭乾編的《大公報·文藝》在報館的寬容和支持下，「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橋樑。時常遇到時興的東西它反而躲閃開。它不勢利，然而也從不恃提拔新人的態度。它盡力與作者讀者間保持密切聯絡，但教訓式的文章卻不大登。」³遇有新人的較長而質量高的稿子，蕭乾時常轉給靳以或孟十還，而他們有時也把登不出而又捨不得退的稿子轉給蕭乾。這樣，刊物在某種程度上也起了些階梯作用。

（3）《文藝》更具青春活力

¹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²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³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文藝》比《文藝副刊》更具青春活力。蕭乾當時二十五歲，本身就是一個青春逼人，充滿理想和熱情的年輕人。如果說，沈從文和那些文壇的名人、大家有著密切的關係，那麼蕭乾周圍則更多的是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

蕭乾在天津《大公報》館工作時，何其芳、畢喚午和巴金的二哥都在天津的南開中學教書，曹禹大學畢業後，也回天津工作。蕭乾的業餘時間，幾乎都在南開中學度過。這些年輕人在一起，沒有和沈從文在一起那種師生的拘謹，是純粹相知相伴的同齡朋友。吳伯蕭、劉白羽等 1949 年後的中國文壇名家，當初還是無名小輩，也是在蕭乾的培養扶持下，在《文藝》上初露頭角。

由於沈從文在藝術上嚴格要求，追求精品，《文藝副刊》上名人大家的作品佔較多的份量，顯出雍容大度、沉穩平和的風格。而蕭乾自己也是文學青年，文學創作起步不久，因而對年輕人來稿有更多的寬容，年輕人筆下所描繪的多彩世界，更容易引起蕭乾的共鳴。

無論是刊登的作品內容、形式，還是版面安排、專欄創新，蕭乾主編的《文藝》都較沈從文的《文藝副刊》，更加多元、活潑、敢於創新，刊登的文學青年的來稿，在比例上也較以前高。

（4）各種特輯增強聲勢

相比前任沈從文更多地關注文學作品的內容，更多的精力花在對稿件的精編細改，蕭乾更重視研究副刊這一文學載體，注重表現形式上的豐富與特色，以及刊登出來的效果和讀者反應。蕭乾在實踐中發現，大凡一種體裁的文章集中起來，那一期的刊物就多少會顯得有些特色。因此，一個辦法就是出一些特

輯。因此，蕭乾不斷地推出特輯，不僅形成《文藝》的特色，還增加《文藝》的聲勢。

《文藝》出過「藝術特輯」，登過冼星海從巴黎寄來悼念亡師的文章，常書鴻還為這個特輯寫過《中國新藝術之出路》，並譯過有關塞尚畫風的專論。

在美術方面，蕭乾自嘲是個外行，但《文藝》對美術作品極為重視。還發表過趙望雲所畫的貴州少數民族速寫，李樺、彥涵、古元、新波等人的版畫也經常刊用。漫畫方面，還刊登過日本佐宗美邦畫的《物資缺乏下的所謂節約》，屬於自我嘲諷類型。黃永玉早期的木刻，就是通過《大公報·文藝》，向讀者推介。

在《文藝》眾多的特輯中，一種頗受矚目的特輯，是請多位評論者來談一部作品。曹禺的《日出》和孫毓棠的《寶馬》，都曾是這種集體評論的對象。這樣的討論，頗有些「百家爭鳴」的味道，顯得更為理性和公正。

（5）「刊中有刊」——「詩特刊」

《文藝》出得較多的是詩歌和散文兩種特輯，散文特輯則一直是蕭乾自己編，「七·七」事變第四天，《文藝》還登過何其芳的長文《我和散文——我是怎樣寫起散文的》。

蕭乾自己不寫詩，但對於詩歌卻喜愛尊崇，譽之為「文學金字塔的頂峰」。他接手《文藝》後，平時憑自己一點「直覺」選登一些詩歌，如以整版篇幅發表孫毓棠的長詩《寶馬》。蕭乾覺得這樣不夠，應該請一位詩人來主持一個詩歌園地，於是開始了《文藝》的另一個創舉：刊中有刊。把《大公報》委託給自

己的副刊園地，再切割部分版面請名家來代編。

1935 年 11 月 8 日，「詩特刊」誕生，聘請梁宗岱、孫大雨、羅念生出任主編，沈從文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加以推薦，《新詩的舊帳——並介紹〈詩刊〉》，稱：「目前新詩不妨說還在實驗中，可走的路甚多，從各個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沒有個實驗的場所，來發表創作，共同批評和討論，中國新詩運動不會活潑起來。」¹

「詩特刊」，既是新詩發表的園地，也是詩歌理論探索的平台，此外，還翻譯了不少外國詩歌，創作、理論、翻譯並進。如 1936 年 7 月 17 日出版的「詩特刊」，內容有何其芳的論文《論夢中道路》，再加上畢奐午、林徽因、方敬、卞之琳、曹葆華、王辛笛的詩作，還有李健吾與卞之琳關於「你」的討論，劉榮恩評阿克敦，劉榮恩還與陳世驥合譯英文的《現代中國詩選》。

此後，這個「詩特刊」不但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詩作，還登過不少關於新詩(如音節問題)的討論。郭紹虞的《從永明體到律詩》，也曾在「詩特刊」發表。這種「刊中有刊」的辦法，以其專業水平為亮點，很受讀者歡迎。

(6)「譯文」：專業推介外國文學

《文藝》的另一個「刊中有刊」，是請黃源主編「譯文」特輯，1936 年 5 月 27 日創刊，首篇是魯迅所譯的嘉爾陀尼·吉柴(匈牙利)的《畫家在鄉村裡》，同期刊有金人所譯的良士果(蘇聯)的《金牙齒》，以及麗尼譯的哈爾斯特隆(瑞典)的《鷹》。

¹ 《大公報·文藝》，1935 年 11 月 10 日

另外，魯迅譯的《奇聞八則前記》和《波斯勛章》(契訶夫)，也曾在《文藝》「譯文」特輯中發表。姚雪垠早年曾為《文藝》譯過猶太作家奧爾吉(Olgin)的《春天裡》。「譯文」還登了一些紀念外國作家誕辰或忌辰的專刊，如紀念普希金專輯。平時，還登過梁宗岱寫的《回憶羅曼·羅蘭》¹，朱自清譯的《中國文學同用語》(長瀨誠)。

1936年，中國失去魯迅，蘇聯失去高爾基，《文藝》分別刊出追悼特刊。為紀念高爾基而出的特刊上，有黃源的文章《高爾基是不死的》，還有蕭軍的《死了！我們偉大的母親！》。

致力介紹外國文學，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一個良好傳統，從吳宓的《文學副刊》到沈從文的《文藝副刊》，一直薪火相傳，至蕭乾編《文藝》將之發揚光大，在當時的報紙文藝副刊中，《大公報·文藝》在推介外國文學方面，享有權威地位。

(7) 報道文壇動態

報道文藝新聞，文藝副刊具有先天的優勢，因為它本身就附在新聞紙上，在動態追蹤、時效性方面，較雜誌更具優勢。蕭乾在《文藝》開闢《文藝新聞》一欄，主要報道國內各地的文藝動態。

當時報刊上常常登些「文壇消息」，談的大多是一些私人瑣事，其中不乏捏造的謠言。因此，從一開始，蕭乾就聲明：這一欄要摒除作家的私事，只報道與文藝有關的活動。因而登在《大公報》的《文藝新聞》，短小精幹，以快速、準確、正派著稱。今天，研究三十年代各地文藝界的動態，諸如不斷湧現的新

¹ 《大公報·文藝》，1936年6月17日

人新刊，以及文藝團體的情況，那一個時期《大公報·文藝》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文藝新聞》刊出後，不斷收到有關外國文壇的報道稿，蕭乾又在《文藝》副刊上創立了《海外文壇》，專門報道海外的文壇消息，其中包括介紹新書，如介紹西班牙阿索林的新著。這一欄由清華大學的圖書館任職的畢樹棠及南開大學的劉榮恩二位負責報道，有時也發表另外幾位的，如黃源所寫關於日本出版《高爾基書簡集》的報道。此欄對不少西方作家也作過簡介，如德國的里爾克、法國的莫洛亞、西班牙的阿索林等。張香山還從東京為「文藝新聞·海外欄」寫了一些鳥瞰式報道，如《1936年的日本創作界》及《日本進步文學新動向》，對國內文藝界起過推動作用。

通常，《海外文壇》這一欄，每篇只有幾百字，但吳達元關於《費加羅的婚姻》、羅念生關於梵樂希，以及張香山關於日本文壇的鳥瞰式報道，均長達七、八千字。只要文章言之有物，內容充實，編者蕭乾從不吝嗇版面。

（三）《大公報》文藝獎金

1935年是新記《大公報》創刊十周年，在蕭乾的策劃之下，1936年9月1日，《大公報》刊發設立第一屆文藝獎金的「啓事」。

「本報自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創刊，中間曾於民國十四年底停刊數月，至十五年九月一日復刊，迄本年九月一日，適為復刊滿十周年。茲為紀念起見，特舉辦科學及文藝兩種獎金，定名為『大公報科學獎金』及『大公報文藝獎金』。由本報每年提存國幣三千元，以二千充科學獎金，一千元充文藝獎金。每年得獎人數：科學擬以一人至四人為限，文學以一人至三人為限，即自本學年開始，

至學年終了爲一年，每年評選一次，定期三年。」¹

當時《大公報》剛在上海開館時，還基本上是一家北方報紙，蕭乾只是邀請北平、上海兩地與《大公報·文藝》關係較密切的幾位先輩作家：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聖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和凌叔華任「文藝獎金」的裁判委員。由於成員分散，這個裁判委員會並沒開會，意見由蕭乾負責溝通和協調。經過反覆醞釀協商，投票推薦，到1937年5月公布出的結果是：小說《谷》(作者蘆焚)、戲劇《日出》(作者曹禺)、散文《畫夢錄》(作者何其芳)獲獎勝出。

(1) 得獎作家清一色「京派」

當時曾有作家質疑，這個獎是不是太「京派」了，因為獲獎的都是北京的作家。晚年蕭乾曾澄清，透露本來小說獎是要頒給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但當時「左聯」的文學家不與《大公報》發生任何聯繫，拒絕接受，裁判委員才重新選擇了蘆焚。²

評選委員會對三部入選作品的作者是這樣評價的——

《日出》的作者曹禺：「他由我們這腐爛的社會層裡雕塑出那麼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貶責繼之以撫愛，直像我們這個時代突然來了一位攝影者。在題材的選擇、劇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運用上，都顯示著他浩大的氣魄。這一切都因為他是一位自覺的藝術者，不尚熱鬧，卻精於調遣，能透視舞台的效果。」

《谷》的作者蘆焚：「他和農村有著濃厚的關係。用那管揉合了纖細與簡約的筆，他生動地描出這時代的種種騷動。他的題材大都鮮明親切，不發凡俗，

¹ 《大公報》，1936年9月1日。

² 《〈大公報〉名記者叢書·蕭乾卷》，大公報出版社，頁188。

的確創造了不少真摯確切的人型。」

《畫夢錄》的作者何其芳：「在過去，混雜於幽默小品中間，散文一向給我們的印象多是順手拈來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場上雖曾走過紅運，在文學部門中，卻常為人輕視。《畫夢錄》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製作，有它超達深淵的情趣。」

1

（2）《大公報》社評寄望新興作家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公報》，主要由張季鸞主持筆政，社評以政治、社會問題的論述為多，在 1936 年公布《大公報》首屆「文藝獎金」獲獎者的這一天，《大公報》發表社評《本報文藝獎金發表》，專門談文藝問題，顯示報社對「文藝獎金」的重視程度。

《本報文藝獎金發表》社評，熱切希望全國新興作家們要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己任，「決心完成近代文壇前輩未完成之事業，把握現階段救亡衛國之急需。共以義俠之精神、悲憤之態度，以進民德，以淩民智，以泯社會之不平，以除風俗之病態。庶幾因個人與社會之一般進步，而促民族復興之速成。至於文學家處世立言之道，應勇敢的保持其合法之著作自由，對一切問題為公誠的批評指導，勿頹唐、勿苦悶。以喚不文、不學之人，亦將努力學為諸君作品之理解者、同情者，以共扶翼中國文藝界之振興。」

表明《大公報》寄希望於全國新興作家，在四個方面發揮文藝功能：進民德，淩民智，泯社會之不平，除風俗之病態。並告誡中國作家：勿頹唐、勿苦悶，為中國文藝界的振興而承前啓後，救亡衛國。

¹ 蕭乾《魚餌·論壇·陣地》，《蕭乾文集》第 4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138。

（3）林徽因編《文藝叢刊：小說選》

新記《大公報》創刊十周年紀念大事，除了評選「文藝獎金」，還邀林徽因從《文藝副刊》和《文藝》已刊出的作品中，編一本《大公報》小說選。

林徽因很快就把選目寄到了上海。她一共選了三十篇小說。有的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張天翼、凌叔華，有的如宋翰遲、楊寶、程萬孚、雋聞、威深等，當時剛嶄露頭角。林徽因還為這本《文藝叢刊：小說選》專門寫了一篇序言，指出成績，也評點不足。

林徽因是《大公報·文藝》忠實讀者。蕭乾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蠶》在《文藝副刊》發表幾天後，就收到編者沈從文的一封信，大意是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上了《蠶》，要請蕭乾去她家喝茶。跨進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蕭乾第一次見到林徽因。他形容「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麼一鞭子。」¹

在蕭乾眼中，林徽因是一位學識淵博，思想敏捷，語言鋒利的評論家。她十分關心創作，當時南北方也頗有些文藝刊物，她看得多，而又仔細，並且對文章有犀利獨到的見解。對於好惡，她從不模稜兩可，同時，在批了什麼之後，往往又會指出某一點可取之處。

自 1935 年 7 月以來，蕭乾去天津《大公報》編副刊，每個月都要到北平，在今雨軒舉行二、三十人的茶會，一半為了組稿，一半也為了聽取《大公報·文藝》支持者們的意見，林徽因幾乎是每會必到，而且席間必有一番宏論。對

¹ 《一代才女林徽因》，《讀書》，1984 年第 10 期。

於蕭乾搞的活躍副刊版面的各種新嘗試，林徽因都熱烈支持、積極參加。

（四）打破京、海二派畛域

在沈從文主編《文藝副刊》之時，由於與魯迅等「左翼」作家文學觀不同，雙方存在分歧，又因多次文藝論爭，特別是沈從文提出的京派與海派的文藝論爭，雙方又多了隔閡。在一段時間內，沈從文與魯迅沒有稿件往來，也沒有私人交往，即便同處一個城市，也互不聯繫和見面。

蕭乾在《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稱：「巴金和鄭振鐸的北來打破了那時存在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時，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報刊出現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接手編天津的《大公報·文藝》。」¹事實上，早在蕭乾編《小公園》時，上海的一些作家就不計刊物的大小，一時張天翼、艾蕪、麗尼等幾位作家的作品，經常在《國聞周報》、《小公園》上出現了。這個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幫蕭乾打通的。

1936年初，蕭乾被派往《大公報》上海館工作，蕭乾的大學老師斯諾，曾托蕭乾把一封信交給魯迅，信中提到了蕭乾與斯諾編的《活的中國》一書的關係。一次在新雅餐廳舉行的茶會上，魯迅還親切地向蕭乾問起斯諾這本書的一些情況。

那時，蕭乾編《大公報·文藝》，同楊朔一起住在環龍路，隔幾個門就是黃源，巴金那時住在霞飛路，正在寫他的三部曲。在蕭乾的印象中，1936—1937是最熱鬧的兩年。孟十還編《作家》、靳以先後編《文季》和《文叢》，黎烈文編《中流》，黃源編《譯文》，大家經常在大東茶室聚會，蘆焚、索非、馬宗融

¹ 《文匯月刊》，1982年第1期。

和羅淑也來，大家討論各個刊物的問題，互相交換稿件。也就是這個時候，魯迅開始直接或間接地給這些刊物以支持，《文藝》的「譯文特輯」從第一期開始，就刊登魯迅的譯作和推薦的稿件。魯迅逝世時，《大公報·文藝》發表了「紀念特輯」。

五、掌握副刊特性揚長避短

相比前任沈從文和後任楊剛，蕭乾在《大公報》的副刊編輯生涯時間最長，長達七年，加上是專職、又是第一份工，蕭乾做得特別關注，表現專業。

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蕭乾，年輕好學，他不但編文藝副刊，而且還認真研究中國報紙的文藝副刊，發現其特性和專長，也感受其不足與短處。因而，在約稿、編排過程中，盡可能揚長避短，力求副刊用稿更合適，版面更活躍，疏密有間，讓廣大讀者喜聞樂見。

（一）「苦命的副刊」

篇幅小而完全沒有彈性，是報紙副刊先天的局限性，對此，蕭乾在《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中，專門有一章談「苦命的副刊」。¹

長年為副刊「補遺」的蕭乾，深深體會到來自副刊篇幅的制約，這也成為考副刊編輯排版的功力所在。一本四十萬字的雜誌，稿子多出或缺幾千字不算回事，然而一期副刊如果多出一百個字，就得「抽條」，鉛字隨之便會擠成蟻群。而且版面疏密不勻，難看死了。倘若缺了一百個字，空空蕩蕩，也成問題。

¹ 《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1）篇幅小是致命傷

在日復一日的編輯工作中，蕭乾深刻地意識到：沒有比篇幅對副刊發展更嚴峻、更致命的限制了。《大公報·文藝》副刊，一般是整版一萬字，半版五千字。在天津乍接手刊物時，這個拼湊字數就是一個難題。

蕭乾 1936 年 10 月寫於上海的一篇文章稱：「於是揮著汗，每天我就依著刊物排定文章的地盤，答覆著各方的來信。這裡便是選出的一部分。常常排字工人喘著氣跑來說：蕭先生，不成，還差五十多個字。這個不難，使人發愁的卻是逼我把已經寫成的再去一半。如果讀者發見這些信太粗劣，您記住那熱天，如果嫌長短不齊，您莫忘記我桌邊那位認真的排字工人，但你還有一個毛病可挑，那是淺薄，這我沒處推。我是才由學校走出十五天，而且編的是一個那麼小的副刊。」¹

當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時，靳以正在編著大型的《文學季刊》。每逢蕭乾抓耳撓腮地安排副刊版面時，對靳以的羨慕之情便油然而生。蕭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編雜誌有如在大圓桌上擺宴席，編副刊則好比在小托盤上拼湊快餐。」²編雜誌當然也有長短結合的問題，然而五、六千字也可作為「短」稿。在副刊上，那就有可能佔去半版篇幅。

（2）文章散登難成系統

在與雜誌編輯的對比中，蕭乾還發現，由於文章無法集中，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一個雜誌編者像是在蓋樓房，磚瓦砌好，即刻便成為一座大廈。那成績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補償。但一個副刊編者修的卻

¹ 蕭乾《廢郵底存一答辭》，《蕭乾文集》第 8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165。

²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 7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232。

是馬路，一年到頭沒法停歇，可永遠也看不到一點成績。由於鋪得散，份量單薄，好像總也成不了氣候。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於副刊的篇幅，文章無法集中，因而也無法顯出系統。

例如《大公報·文藝》書評討論，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給讀者一個印象。但散登出來，顯得拖沓，有時甚至令人不耐煩。

受篇幅所限，副刊的一些長稿只能作跨期安排，但蕭乾一向反對發跨期稿件，因為會使作品不連貫，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當時，曹禺的《雷雨》發表在《文學季刊》上，立刻轟動全國。但若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一千或八百字，所有它的劇力必為空間時間的隔離拆光。身為一個副刊編者拉稿時，蕭乾懷著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他覺得為了整個文壇，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顧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彩。蕭乾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轉給編雜誌的朋友。

(二) 堅持不打筆仗

報紙文藝副刊在發表文學作品上，不能與雜誌競爭，蕭乾認為這短處是先天注定的。在中國報紙不能發展到像《泰晤士報》那樣另出《文藝附冊》之前，副刊一日附在報紙上，一日就得接受這份命運。

在副刊版面上，三欄不夠登一篇小說的楔子，為報紙設想，每期題目還要多，且不宜常登續稿，才能熱鬧。這是說，副刊只能向報屁股的方向發展：登雜文，挑筆仗，至多是小品隨筆。而在蕭乾看來，一個編者如還愛好文藝作品，不甘向這方向發展，就只有陷在永恆的矛盾中了。

1936 年春，蕭乾編《大公報·文藝》(上海版)時期，正碰上「左聯」為兩

個口號而大開筆仗。蕭乾堅持不登雜文，刊物上不打筆仗。這個「不打筆仗」最初是《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囑咐的，也符合蕭乾當時的思想情況。當時上海灘情況複雜，蕭乾又人生地疏，爲了不出亂子，還是以穩重爲妥。

四十年後回顧「不打筆仗」的編輯生涯，經過新中國歷次運動洗禮的蕭乾，卻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刊物沒有發揮「陣地」的作用，它缺乏戰鬥性。蕭乾稱：「倘若我回到那熱火朝天的三十年代去重操舊業，我想我是不應讓刊物置身像關於第三種人那樣重大論戰之外。」¹蕭乾 1978 年的這種反省，頗有「打倒昨日之我」的味道。但歷史就是歷史，人生終究是不能重來。

六、《文藝》全力推動書評

蕭乾認爲附在報紙上的副刊必須編得活潑有趣，具有廣泛的吸引力，既要使副刊在文藝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它又必須同時有些份量，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將副刊的有份量與多樣化二者結合起來。

由於報紙屬日刊，出版迅速，在時間上，一個雜誌是競爭不過報紙的。因此，副刊登載書評，比雜誌有明顯的優勢。蕭乾一直認爲，書評最適宜刊登在報紙副刊上，因爲又快又及時。既涉及文學，又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意識到這一點，從 1935 年到 1939 年，無論蕭乾在天津、上海還是香港編《大公報·文藝》，書評這一欄，從沒有間斷過。

自從蕭乾發現副刊在創作上不能與雜誌競爭，而又不甘於走雜文的路時，蕭乾就決定《大公報·文藝》必須奔向一個讀書界可能有更大貢獻的路：書評——一種比廣告要客觀公允，比作品淺顯實用的文字。

1

（一）從理論到實踐推廣書評

蕭乾顯然並不滿足於將《文藝》副刊停留在發表青年作者文藝作品的層次。除了在《大公報·文藝》繼續發表小說、散文、詩歌及翻譯作品外，蕭乾不斷開闢專欄，而首先開闢的專欄，花費力氣最大的專欄，就是「書評」。蕭乾在《大公報·文藝》所推動的書評，從表現形式來看是廣義的，既有新書推介，也有文學作品評論，還有外國名著賞析。

蕭乾致力推動書評，除了意識到報紙副刊的局限性，更大的動力來自他本身對書評的研究、認識，以及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大公報·文藝》的書評專欄，在當時中國報紙副刊中力推書評，獨樹一幟，有其主觀和客觀的原因。

（1）大學畢業論文是《書評研究》

蕭乾在大學頭兩年學英國文學，三年級轉入新聞系，臨到畢業那年，要寫論文。蕭乾就選了個介乎新聞與文學之間的題目《書評研究》，他認為應當提倡書評，因為它是推廣和提高文化的必要手段。寫畢業論文時，蕭乾參閱了幾百篇中外書評，包括呂嘉慈（I.A.Richards）的《實用批評》。論文中「認識：四種意義」那一節，即出自呂嘉慈《意義之意義》一書，有李安宅譯本。

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蕭乾認識到書評對於一個國家的文藝事業——對於整個文化事業的重要性。它是讀者的顧問，出版界的御史，是好書的宣傳員、解說員，是壞書的閘門。它不一定高深，但很實際，是文藝批評或各科「原理」的應用。它既能推動，也能過濾。蕭乾在論文「序論」的結束語是：「我們需要

二個文藝批評的研究者，六個批評家，五十個書評家」¹，把書評提到一個十分迫切而重要的地位。

在論文「書評與讀者」一節中，蕭乾強調書評家的真正對象必須是讀者大眾。作品價值的起點是在被人閱讀。這中間，需要一座橋樑，促使作品與讀者接近。一向充當這橋樑的出版商用以推銷書籍的廣告。這不是一座好橋樑，因為它是搭在讀者與出版商的錢袋之間，滿是誘惑，滿是誇張，專引讀者上當。「書評的存在就是要代替這座出於一方貪私的橋，抵抗商賈的誘惑。他雖介於作品與讀者之間，但他卻面向著讀者，替他選擇，詮釋，替他評價。」²

在蕭乾看來，書評家應是作品與讀者間最真摯可靠的介紹人，他必有一顆平衡心，把讀者看成是智力的平等者。書評家的權威完全維繫於對讀者的服務。他應面向讀者，對著作品說話。如果是科學的著作，就糾正錯誤了的事實。如果是文藝，就陳述個人的詮釋和反應。

(2) 蕭乾的第一本書是《書評研究》

當時蕭乾是靠稿費來交學費並維持生活的。以前，每月寫上一篇小說，《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者沈從文就保證蕭乾起碼每月有二十元的稿費收入。動手寫論文後，為了解決學費問題，蕭乾就邊寫邊發表，從論文中選一些片斷(如《平衡的心》等)先在報刊上發表，這樣也可以聽到先輩作家，如朱光潛的意見。在論文交出之前，它的複本就已經賣給商務印書館了。

畢業論文是在蕭乾大學三年級時就開始動手的，寫完之後，一份交到學校，另一份就由鄭振鐸轉給商務印書館。蕭乾的小說集《蒿下集》是1936年問世的。

¹ 蕭乾《魚餌·論壇·陣地》，《蕭乾文集》第4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34。

² 蕭乾《書評研究》，《蕭乾文集》第8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88。

《書評研究》早於 1935 年 11 月已經出版，可以說《書評研究》才真正是蕭乾的第一本書。

1987 年，內地一家出版社重印《書評研究》一書，並邀請蕭乾寫序。蕭乾爲之撰文《未完成的夢》，直指提倡書評是他一生未完成的夢想。1990 年，台灣的商務印書館又把《書評研究》重印了一次。

（3）在報紙副刊上呼喚書評

1935 年 7 月，蕭乾大學畢業後，經沈從文、楊振聲的推薦，加入《大公報》，先編《小公園》，後編《文藝》，蕭乾在刊物上，利用「編者的話」或解答青年作者問題的機會，大力提倡書評。

還在編《小公園》時，蕭乾就在一篇答覆讀者楚君的信中，談到書評政策。蕭乾稱「你對文藝批評夙有興趣，且願以後在這方面供給我們稿件，這自然是我們竭誠歡迎的。」

在信中，蕭乾囑楚君：「你得多讀書。當你讀到一本極好的書時，你會情不自禁把它介紹給別人。這是一種熱忱。唯有在這樣心情下，書評才寫得好。缺乏了作者激情，很少小說中的人物能寫得生動。缺乏了評者的激情，一篇書評也不易促使別人閱讀。一切藝術工作莫不需要共鳴。」¹

1935 年 11 月 27 日天津《大公報·文藝》登了一篇蕭乾《兩種心靈的活動》，稱：「我們承認，特別在出版物的量數與書評的需要激增的今日，批評已逐漸具有當代的服務性了……批評解釋人生，創作表現人生。在一個完整的文化生活

¹ 《大公報·小公園》，1935 年 7 月 9 日。

裡，它們同是不可缺的。」¹

蕭乾認為在出版事業上，書評家是代表讀者的鑒定者，是文化生產的監督人。他的責任在於制止劣品的發行，獎勵那些裨益讀者的出版物。它像個漏斗，書評家精細地濾去出版物的渣滓，使只有健康的、正確的、美的才為讀者接近。他幫忙選購新書，他是作品與讀者間的一座好橋樑，一個負責的介紹人。²

(二) 書評是當時文化界的空白

書評在中國歷史上極淺短，在中國批評的文庫裡，泛論風格、技巧、作家創作道路的很不少，但把注意集中到某一本書上的還不多見。至於除評者主觀印象外還顧及讀者客觀需要的，幾乎沒有。

在當時，獨立書評是文化界有待填補的空白，蕭乾曾不止一次感嘆：當千萬冊書每天由印刷機搬到書籍市場去的時候，讀者們是多麼需要在購買和閱讀上的指導啊。

(1) 專門的書評雜誌莫不失敗告終

在中國，真正的書評是隨著雜誌的興盛而出現的。當時，《新潮》第三卷出過「名著介紹專號」，《新月》曾把「書報春秋」作為固定一欄。習慣的做法是雜誌後面附一篇書評，其中，由書商編輯作為變相廣告的很多，真正的書評雜誌卻很少。出版家看到大眾對書評的信任，於是自己也辦起書評刊物來了。如《新書月報》(華通書局)、《現代出版界》(現代書局)，都曾風行一時。但有志之士幾番想創辦一專門的書評雜誌，莫不以失敗告終。如教育當局於1933年辦

¹ 天津《大公報》，1935年11月27日。

² 蕭乾《書評研究》，《蕭乾文集》第8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79。

起大規模的《圖書評論》，各科都由專家負責，該刊物出到第二卷便夭亡了。

蕭乾在《我與〈大公報〉》回憶錄中嘆息：「每個刊物都在創刊辭裡發誓為讀者服務。可憐的讀者，他的顧問很少是長壽的！目前，買書者除了聽憑廣告上的吹噓和一點直覺的判斷外，中國讀書人幾乎成為全然無助的了。我們認為這是文化界的一個危機。」¹

（2）書評進軍報紙副刊

除了書評雜誌，越來越多簡短的書評開始在報紙副刊上出現，其中《大公報》率先辦起圖書副刊。

一個美國圖書館員把書評大致分為四類：(1)學者的，(2)欣賞的，(3)謾罵的書評，(4)報紙的書評。在這位圖書館員的眼中，報紙的書評，被稱為「趣味的書評」。只求新奇熱鬧，引人入勝，而不重批評標準。

蕭乾通過研究認為，以上四種書評都已在中國萌芽了。「博學的教授在批評《玉君》時，卻用去八成篇幅講起西洋小說發達史來。翻譯老將提筆批評起另一個翻譯者的成品時，四分三的篇幅成為逐頁校閱的勘誤表。說著恭維話的又多是一些十足的外行，面前的書像是該科唯一的典籍。刻薄的，口口聲聲『教授』、『博士』，用極富酸性的話嘲笑著原書的作者。至於報尾巴見到的書評則除將原書目錄如流水帳地一氣抄完，就再沒可說的了。膚淺有了，卻似還未把握到那點新奇熱鬧。」²

（3）職業的書評家尚不多見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71。

² 蕭乾《書評研究》，《蕭乾文集》第8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6。

當時，職業的書評家在中國尚不多見。偶爾一個常寫書評的人出現，細一調查，這人也許在某地教著書（一個業餘的批評家），或者寫了一些時候，自己變成了作家了。

中國的書評界似活躍著兩種人物：批評學者和批評家。前者的文章常見於雜誌的首端「論文」欄裡，介紹著晚近東西洋的文藝觀念和方法，但卻很少人肯將那些精確的方法應用到本國流行文藝的品評上。後者的文字多登在雜誌的尾部「書評」欄裡，用一種熟習的行話，一種固定的格式，論斷著近刊的書籍，而對於新興的文藝理論又不屑顧及。這兩種人的工作性質雖很接近，而實際上卻常是兩碼事。

（4）現代文化事業的新興勢力

蕭乾的《書評研究》在第一章序論中，引用了都伏思(R.L.Duffus)《圖書在民主國家的位置》一書中有關美國的一個調查，其中就讀者是通過什麼媒介與書接近，有一個統計數字。

通過書評作為購書媒介的最多，佔 3454 人，以廣告為媒介的，位居第二，佔 2460 人，而因為書名吸引人、書皮吸引人而購書的，分別只佔 199 人和 191 人。蕭乾因此得出結論，認為這數字證明現代文化界的一股新的勢力——書評：一種為一般讀者所寫的一般書籍的批評。

蕭乾大膽預言：隨著讀者層的擴大，新聞紙銷路的飛增，這股勢力在著作界、出版界、讀書界中都將享有相當的權威。紐約書評家的一句話也許就形成某本書的命運。這勢力對於文化或許是威脅，或許是促進，無論如何，它已牢

牢地存在著了。¹

在當時的中國，蕭乾不諱言書評勢力實在還不大。人們的閱讀及購買大半仍是以廣告的魔力或自己的趣味癖好為歸依。這是因為我們真正的大眾尚未成為讀者，著作人的名字也仍少得極易記辨。但終有一天，它將像塞克斯機一樣會在這古國國土上飛翔起來，書評終將尾隨著文化高潮穩穩地步入讀書界。

這預言需要論據嗎？蕭乾充滿自信地稱：「國內批評性刊物隨了出版業的興旺而增加是近年來極明顯的現象。作者或出版家對批評家的拉攏與憎恨也印證著這勢力的增大。」²

（三）西方報紙文藝副刊主要登書評

蕭乾經常將中國報紙與外國報紙比較，他認為文藝副刊是中國報紙最大的特色。西方報紙自然也有文藝副刊，如英國《泰晤士報》或美國的《紐約時報》，但他們主要是登書評。而中國報紙副刊的特點則主要是刊登創作，並且首先是新人的創作。

1940年5月，蕭乾在劍橋大學讀書，還專門到《泰晤士報》參觀，並在文藝副刊編輯部盤桓了半個早晨。蕭乾發現，《泰晤士報》文藝副刊編輯部的兩間房子，為五個助手和幾百冊贈書佔滿了。談到書評，《泰晤士報》主編莫雷認為，批評尊嚴最為重要，什麼時候廣告部勢力侵入了編輯部，讀書信用便從此喪盡。他們全年很少購書，因為各出版社每出一書，必即贈送，即使出版家如威克特·格蘭士不贈送，有好書也仍購來作批評用。

¹ 蕭乾《書評研究》，《蕭乾文集》第8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4。

² 蕭乾《書評研究》，《蕭乾文集》第8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4。

後來，蕭乾本人的文章也曾被外國報紙的文藝副刊予以評論，如蕭乾用英文寫作的《苦難時代的蝕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一書出版後，不少英國倫敦出版的報紙都寫了評論。1942年3月21日的《泰晤士報·文藝附刊》在評論中特別重複了蕭乾的書中序言《英國不能通過唐詩來了解當代中國》。文中稱：「從這第一次的介紹中得知，中國新文學充滿了活力。」¹

(1) 開展文藝評論有基礎

文學評論一直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強項，從沈從文編《文藝副刊》開始，就一直鼓勵文藝方面的評論，不少蕭乾重用的「書評高手」，也是從沈從文時期就開始培養的，如常風、劉西渭等，為書評的展開，奠定基礎。蕭乾曾經感嘆，《大公報·文藝》出過「小說選」，然而並沒有出過論文選，倘若出了，「我相信其價值不會低於前者。」²

例如，沈從文的《穆時英論》、朱光潛的《從「距離說」辯護中國藝術》、梁宗岱的《新詩的十字路口》，今天讀來仍能給人以啟發，有些評論，時過境遷，光芒可能減少，但在當時還是切合時宜的，如李影心的《珍本與名著》，就對當年的出版傾向及時提出意見。

(2) 建立書評隊伍

接手《大公報·文藝》後，蕭乾首先開闢的專欄，便是「書報簡評」，在很短的時間內，蕭乾就得到二十位以上朋友的支持，答應經常為刊物寫這方面的東西。

¹ 蕭乾《我的副業是溝通土洋》，《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311。

²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39。

爲了建立一個書評網，蕭乾費了不少力氣，先從文藝界友人及投稿者中尋找肯幹並擅長寫書評的人，最早參加《大公報》書評隊伍的，有黃照、劉西渭、常風、楊剛、宗珏、李影心、陳蘭諸、劉榮恩等。

這些書評作者，在寫法上也各有千秋，有的就書評書，如常風、李影心；有的則借寫書評作「心靈的探險」，如劉西渭；有的則往往在評書時兼聯繫到一些理論問題，如楊剛。根據他們各人所長，大致有個分工，比如外文書大多請楊剛或劉榮恩來評。

一心投入書評的蕭乾，盡力不放過一本好書，也盡力不由出版家那裡接受一本贈書。通過《大公報·文藝》這個平台，蕭乾逐漸地在朋友及投稿人中建立起一支書評隊伍了。

（3）訂立書評三原則

開闢「書報」專欄，蕭乾從一開始就確定了幾條原則：

第一、不介紹沈從文和蕭乾自己的書，到上海後，又包括了巴金和靳以的書。沈從文、巴金、靳以，都是蕭乾當時最親密的老師和朋友，爲免瓜田李下，蕭乾選擇「舉賢」先避親。

第二、爲了保持評論的獨立性，也爲了擺脫替書店做廣告，不接受書商贈書。蕭乾認爲，只有不欠情，才能做到公正客觀。每個星期，蕭乾總要抽出一、兩個下午去逛四馬路，親自去書店選購值得一評的書，歸來脇下總挾了一大疊新書，再分寄給評者。

第三、最重要但也是最難堅持的一條原則是：持論客觀，不捧不罵。

晚年蕭乾重溫這三條書評原則，認為第二條標準不接受贈書，未免矯枉過正。原因是蕭乾 1939 年赴英國後，看到外國的報刊都是把出版社的贈書分別寄給讀者，這樣做，並不就足以左右評者的觀點。蕭乾這才認識到自己早年全靠自己購書的辦法「實在迂而且蠢」。¹

蕭乾也反省第三條原則不捧不罵「很成問題」，他認為當時書評有些東西就是應該罵它一罵，但是編輯為求「風平浪靜」，僅僅評那些有可取之處、可以說些好話的書，對於壞書，實際上是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²蕭乾的這些反省，今日看來，多少有一點「求全責備」的味道。

（4）只舉薦好書

蕭乾曾就「書評政策」公開在《大公報·文藝》上答覆讀者楚君，將書評的範圍限於舉薦好書、將健全的讀物介紹給大眾。

蕭乾指出，「在目前，我們的簡評預備先從『介紹』入手：即是只舉薦好書。除非是流行極廣，毒害大眾極深的，一般庸作我們將以沉默對付。請想，每周才一篇書評，我們哪里有工夫顧及滋長分外多的它們！把健全的讀物多在大眾面前晃晃，不是更能積極地吸引讀者層的注意嗎？」³

蕭乾的《創作與書評》一稿，1935 年刊於《大公報》的附屬刊物《國聞周報》，他承認：一個最可憐的事實是，中國的書評很少能成為獨立的讀物。蕭乾對書評的文字提出要求，「拙笨的文字不能寫書評。如果書評想為讀者所注目，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 7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247。

² 蕭乾《一本褪色的相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 年出版。

³ 天津《大公報》，1935 年 7 月 9 日。

它本身必須是生動的……如創作一樣，書評要的是智慧……它介紹的是智慧，它本身必也是智慧。作者富想像，書評若缺乏了想像，也將不成爲作品與讀者間的橋樑了。」¹

（四）出版書評特輯

編《大公報·文藝》時，最讓蕭乾傷腦筋的課題是：如何使刊物編得既不太死板而又有些份量。前者指的是內容多樣化一些，設法滿足更多的讀者的需求，後者指的是讓刊物不僅僅按期載著一定數量的作品，而且讓它也能產生些影響。

（1）多角度「立體」書評

蕭乾爲了提倡「立體」書評，《文藝》接連出過幾個整版的書評特輯，反響熱烈。原計劃是邀請作家、讀者、出版家及圖書館員，從不同的角度來談他們對書評的看法和要求，可惜突然到來的「八·一三」事變，把這個計劃打亂了。但重要的幾個專輯，包括「作家論書評」、「讀者論書評」、「出版家論書評」、「書評家談書評」，四期整版專刊，代表了四種書評角度，還是趕及《大公報·文藝》滬版停刊前出閘，與讀者見面。

首先是由經常撰寫書評的朋友談「我怎樣寫書評」，接著討論了「書評是心靈的探險嗎」，實際上是討論書評與文藝批評之間的界限與關係。開頭是朱光潛的《佛朗司和布魯地耶的對話》，然後是劉西渭的《自我風格》。張振亞問「探險到哪里去呢」，楊剛則寫了一篇《冒險與裁判》。

¹ 《國聞周報》第12卷第41期，1935年10月21日。

其次是由作家來論書評，參加討論的有葉聖陶、巴金、張天翼、李健吾、施蛰存、艾蕪等。討論中也揭露出一些作者與書評家的矛盾，如巴金的那篇《我只有苦笑》，稱「只因為自己的生活經驗太少，就隨意抹殺這抹殺那的。對於這樣的人，我只有苦笑。」¹半世紀過後，蕭乾寫作《我與書評》一文，還將當年作家論書評的特輯中有些論點，重新摘錄出來，認為並未過時，「還是很有意思的」。²

(2) 作家論書評有褒有貶

在「作家論書評」一輯中，有不少獨到見解。

葉聖陶說：「書評是寫給作者看的，假如沒有摸著作者心情活動的路徑，任你說得天花亂墜，與作者的書毫不相干……我喜歡聽體貼的疏解。假定我有些微的好處，你給我疏解為什麼會有這些好處，我就可以在這方面更加努力。假定我有許多的缺失，你給我疏解為什麼會有這許多缺失，我就可以在種種方面再來修煉。」這是把書評家當作郎中了。³

巴金在文中提到一位書評家，他的「唯一法寶就是藝術。但藝術這東西無論如何是離不了人生的。而且藝術的標準就並非固定的，惟一的。讀者能否了解欣賞一個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藝術價值高低而定。生活環境教養甚至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意識形態，更何況藝術的觀點！」⁴

朱光潛說：「書評家的職務是很卑恭的。他好比遊覽名勝風景的嚮導，引遊人注意到一些有趣的林園石寨堡。」但他認為「書評卻不如旅行嚮導可以成為

¹ 蕭乾《我與書評》，《文學報》，1988年11月。

² 蕭乾《我與書評》，《文學報》，1988年11月。

³ 轉引自蕭乾《我與書評》，《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61。

⁴ 轉引自蕭乾《我與書評》，《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61。

一種職業，書評所需要的公平，自由，新鮮，超脫諸美德都是與職業不相容的。」

1

沈從文認為，「如果一個書評家，對於近二十年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成長有一貫的認識，對於一個作品的價值和內容得失能欣賞且能說明，執筆時不敷衍，不苟且，這樣子寫成的書評，至少對於讀者是有意義的。」²

李健吾說：「假如有一天我是一個批評家，我會告訴自己：第一，我要學著讀書；第二，我要學著領受；第三，我要學著自由。」他還認為，唯其人人具有批評的官能，猶如每一個年輕人都有一陣子寫詩的熱狂，批評之所以成為批評也就越發艱難，而批評家的使命也就越發重大，而其成就也就越發可靠。³

以上這些作家在《大公報·文藝》上關於書評的筆談，到了1988年葛昆元還在《怎樣寫書評》(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一書中予以全文引用，並被人民日報出版社全文收錄《書評面面觀》一書。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大公報·文藝》當年拓展書評的先行與權威。

(3) 讀者論書評來稿踴躍

另外，「讀者論書評」特輯也收到了全國各地讀者的來稿，為了表示來稿地區廣泛，蕭乾特意在作者名字上面用六號字標出來稿地點，如「濟南侯金鏡」、「臨沂戈矛」等。

¹ 轉引自蕭乾《我與書評》，《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61。

² 轉引自蕭乾《我與書評》，《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62。

³ 轉引自蕭乾《我與書評》，《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62。

書評特輯每期都是整版，討論十分熱烈。蕭乾本來還計劃出一期「出版家論書評」，可惜還沒等發排，中國全面抗戰形勢已經展開。就在上海「八·一三」那天還出了一輯書評特輯，成為《文藝》的輓歌。接著，報紙由十六版縮為四版，《大公報·文藝》(滬版)也停刊。原計劃中的圖書館員論書評，沒有來得及組織就夭折了。

七、集體討論活躍《文藝》

1936年調到上海，同時編津滬兩地的《文藝》，是蕭乾一生從事文藝編輯工作最緊張、最興奮、也是最熱鬧的一年。「那時，我三天兩頭用『答辭』欄同副刊的作者和讀者交談。為了使版面活躍，還不斷開闢各種專欄。我幹得最起勁的，是從理論到實踐去推廣書評。什麼好作品一問世，無論是《日出》還是《寶馬》，我都先在刊物上組織筆談，然後再請作者寫那部作品的經驗——通常一登就是一整版。」

(一) 開展「集體評論」

為了避免由一位權威對作品一錘定音，蕭乾嘗試在書評中，引入「集體討論」，即邀請多位評者來談一部作品。曹禺《日出》劇本問世後，《大公報·文藝》率先展開介紹和評論，蕭乾想通過它把評論搞得「立體化」一些。

頭兩次是「集體批評」，也即是請文藝界新老作家對曹禺的《日出》各抒己見，最後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這一場有關《日出》的評論，討論是熱烈的，評者與作者的態度是誠懇的，應該說，起到了文藝界相互切磋的作用。

「集體批評」的來稿幾乎都是以《〈日出〉讀後》或《讀〈日出〉》為題。

爲了醒目，蕭乾就抽出文中關鍵詞句作爲標題，如《渴望早日排演》(茅盾)、《捨不得分手》(孟實)、《其實也是詩》(葉聖陶)、《偉大的收穫》(沈從文)、《雄偉的景象》(巴金)、《更親切些》(靳以)、《大膽的手法》(黎烈文)等。集體評《日出》時，蕭乾甚至還請了教過自己英國戲劇的燕京大學外籍老師謝迪克，寫了一篇《一個異邦人的意見》。

對《日出》的評論，並不是所有的評論都是全面肯定的。李廣田的那篇標題直言《〈日出〉不如〈雷雨〉》，陳荒煤的評論也有同感。曹禺的長文《我怎樣寫〈日出〉》，也是肝膽相照的。他剖析了自己此劇的動機、構思經過和藝術企圖，同時對評者作了虛心中肯、實事求事的答覆。

蕭乾後來在回憶錄中，談到由作家自己來談創作體會的文章爲何會越來越少，他的體會是「這種文字也許不大合乎中國國情，然而不論對讀者還是對研究者，都是大有裨益的。這裏就要看編輯的本事了：首先要弄準有哪些作品值得這麼深入地探討，然後設法勸說作家。一般來說，寫了得意之作的人，是肯於向讀者交心的。」¹

(二) 溝通土洋

《蕭乾文學回憶錄》由華藝出版社 1992 年出版，其中有一篇題爲「我的副業是溝通土洋」，寫自己遊走在文學創作與文學翻譯之間的創作道路。事實上，早在三十年代編《大公報·文藝》時，蕭乾已是在實踐溝通土與洋了。

三十年代文藝界對於國外有關中國的論著，往往採取相應不理的態度，在《大公報·文藝》書評欄裡，蕭乾試圖扭轉這一趨勢。蕭乾一直認爲，凡是外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 7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238。

國出版的涉及中國的專著，以及單篇而有份量的論文，《大公報·文藝》都應作出評論：正確的，應予以肯定，錯誤的宜加以糾正。同時，相信外國漢學界出了有關中國的著作，自然也渴望聽到中國的反響。

賽珠珍對三十年代中國創作界所作的評價、日本小畑薰良譯的《李白詩集》，蕭乾都立即請人寫了評論。

另外，外國人以中國為題材所寫的書，蕭乾也認為《大公報·文藝》書評一欄一定要評論，表示態度。像賽珍珠的《流犯》(*Exile*)出版後，李影心立即作了評論。同樣，斯諾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楊剛也作了詳盡扼要的評論。

《大公報·文藝》還致力讓國內讀者了解外間關於中國有些什麼論著。例如日本學者所撰寫的《中國文學與用語》一文，就請朱自清翻譯了出來，發表於1936年1月12日的《大公報·文藝》。

(三) 創作經驗談

三十年代常有作家現身說法，談個人的創作經驗和體會。這類文章風行一時，為人們喜聞樂見：一是可以加深對作品的理解，同時也有助於文學青年在創作道路上的摸索。

在蕭乾編的《大公報·文藝》(津版)，創作經驗談是亮點之一。小說方面如巴金的《愛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給劉西渭先生》，詩歌方面如陳夢家的《一個寫詩者的自白》，戲劇方面登過曹禺的《我如何寫〈雷雨〉》等。

到了上海,《大公報·文藝》(滬版)在處理長詩《寶馬》時,方法上有些變化。「五四」以來,中國的詩歌大多是抒情的,敘事詩極少,用歷史題材寫成的長篇敘事詩猶不多見。當孫毓棠的《寶馬》從日本寄到後,蕭乾感到不但應給它一整版篇幅,而且需要著重提倡一下這種體裁。於是,蕭乾除了請作者寫一篇創作經驗外,還約請《中國詩史》的作者馮沅君教授寫了一篇專門性的評論。

孫毓棠在《我怎樣寫〈寶馬〉》一文中詳細地談了該詩的整個意圖、構思經過及史料依據,同時闡述了他對歷史詩寫作的一些體會和見解。

另外,蘇雪林在談到自己寫《鳩那羅的眼睛》的經過時,坦率地承認是受到沈從文《月下小景》的啓發。對讀者來說,這無疑是有益的提示。

(四) 不躲避爭論

雖然《大公報·文藝》始終遊離於當時中國文藝的內部論爭(如兩個口號)之外,但也並不躲避爭論。如何區別「論爭」與「爭論」?如何避免捲入「論爭」而又接受「爭論」?《文藝》編輯蕭乾把握著這個「度」,他認為關鍵是遠離政治是非,爭論的問題本身有意義,不妨就事論事,不傷和氣。

《文藝》舉行過幾次就某一作品的集體討論,然後請作者筆談一下創作體會。另外,批評家講完,理應准許作者出來答辯一下。影響較大的,首推卞之琳與劉西渭之間,就詩集《魚目集》的對話,至少進行了三個回合。

劉西渭對《魚目集》的評論在1936年4月12日的《大公報·文藝》上發表後,卞之琳對劉西渭所評「沒有內容」,顯然十分光火,認為這是一句時髦的評語。

卞之琳回應說：「您(評者)翻開一本詩集，不必體會詩中的意義，一目十行地專心注意用字，倘若其中用風花雪月的字眼多，您不妨捨去其他字眼，單把這種字眼錄下來，再挑一本用『痛苦』、『飢餓』、『壓迫』、『奮鬥』這一類字眼多的詩集，把其中用的這些字眼也錄下來，比較一下，統計一下，就可以結論了，說前者『沒有內容』，不如後者。可是這個『內容』上並無任何形容詞，我不知道怎麼講。我們可以說橘子沒有栗子的內容，我們可以說橘子沒有內容，而栗子有內容嗎?.....我認為材料可以不拘，忠君愛國，民間疾苦，農村破產，階級鬥爭，果然可以入詩，風花雪月又何嘗不可以寫呢？」¹

卞之琳最後說：「總之，隨便人家罵我的作品無用，不合時宜，頹廢，我都不為自己申辯，惟有一個罪狀我斷然唾棄，就是——斬釘截鐵的『沒有內容』。」

2

劉西渭在答覆中說：「一個讀者，所有經驗限於對象(一部書、一首詩)的提示，本身和作者已然不同，想像能否幫他打進讀書的經驗，即使打進去，能否契合無間，正如一句傷心的俗話：『天曉得』。」³

在編者蕭乾看來，作者與評者坦誠相見，是文藝界一種健康現象，作為讀者，則獲益良多。倘若雙方都客客氣氣，隱瞞觀點，對各方面均無好處。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卞之琳與劉西渭之間爭論得這麼激烈，但始終未傷到個人之間的和氣。這比相互之間只要一爭論就翻臉也來得健康得多。

（五）做拳擊場上的裁判

¹ 《關於〈魚目集〉——致劉西渭先生》，《大公報》，1936年5月10日。

² 《關於〈魚目集〉——致劉西渭先生》，《大公報》，1936年5月10日。

³ 《答〈魚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大公報》，1936年6月7日。

做了多年的《大公報·文藝》編輯，對於副刊的其他作品，蕭乾輕易不去刪改。但是書評這一欄，遇到文字過於尖刻或跡近挖苦時，蕭乾總在保持評者的觀點及評價的前提下，盡量把帶刺的字眼刪去。

蕭乾於 1978 年 10 月發表《魚餌·論壇·陣地》一文，談到編輯的角色，稱當時是把自己比作拳擊場上的裁判，「當雙方按照規定在認真較量時，我沒有權力去干預。然而當競技出現了偏差時，我有責任不能聽其自流。」¹而「較量認真」與「出現偏差」究竟如何分別？如何判斷討論是否能「冷靜進行」，蕭乾沒有詳說，但在他心目中，關鍵的指標是看雙方是否「心平氣和」，是否有一方被激怒得「翻臉」。

1936 年，北大英藉教授艾克敦與陳世驤在倫敦合出過一本《現代中國詩選》。蕭乾請南開大學一位教授撰寫書評。發排之前，蕭乾已盡量把刺眼的語句刪去了。刊出之後，還是激怒了譯者之一，他寫了文章加以反擊。蕭乾又把文中的扎眼語句刪去。然後兩回合後，蕭乾看到討論已不可能冷靜地進行下去了，就婉言通知雙方告一段落。

（六）名著介紹

書評談的是新出的書，《大公報·文藝》另外還闢了一個《名著介紹》專欄，目的是普及中外經典性文學作品。

蕭乾在一開頭即申明：「把讀古典著作視為目的當然是荒謬可笑的。讀古的，是爲了更好地寫新的。從名著中發現前人曾走過的路，必然有助於開闢新

¹ 蕭乾《魚餌·論壇·陣地》，《蕭乾文集》第 4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135。

的創作途徑。目的是爲了引導文藝青年接近過去有定評的名作。」¹

稿件要求，每篇要在二千字以內，扼要地介紹作者生平，原作背景，故事梗概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蕭乾更呼籲學者及作家們把他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狄更斯、哈代、高爾基之後的心得寫出來，供廣大青年分享。

八、書評——未完成的夢

1939年9月1日，蕭乾離開《大公報·文藝》，遠赴英國，他發表《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一文，向副刊作者讀者辭行，文中第四節，標題就是「書評是怎樣失敗的」。

（一）戰爭打亂書評計劃

在中國書評歷史上，《大公報·文藝》發表了一批高水準的書評，組織了一支穩固、優秀的書評隊伍，舉辦了多次較大規模的書評活動，對推動獨立書評在中國發展、提高書評在副刊中的比重和地位，作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客觀地說，蕭乾推廣書評，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也是他編輯《大公報·文藝》的重要特色。

但現實與蕭乾本人的理想還有一段距離，他說「這方面我承認我並未成功。第一，戰事：交通線的阻斷，出版物的稀少，書評家的流散，拆毀了這個脆弱的網。同時，書評在重人情的中國並不是一件容易推行的工作。書評最大的障礙是人事關係。一個同時想兼登創作與批評的刊物，無異是作繭自縛。批評一位脾氣壞的作家，在稿源上即多了一種封鎖。」但蕭乾堅持不能因噎廢食，「這

¹ 蕭乾《我與〈大公報〉》，《蕭乾文集》第6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71。

隻文化的篩子必須繼續與創作並存，文壇才有進步。本刊在這方面雖未成功，卻也不準備知難而退。」¹

蕭乾認為「書評最大的障礙是人事關係」，這在和平時期，也許是這樣，但當時，日本侵華戰爭已經打響，交通線的阻斷，出版物的稀少，書評家的流散，嚴重制約書評的持續展開，更致命的是，受戰事影響《大公報》與其他報紙一樣縮減版面，《文藝》停刊，蕭乾本人也失去編輯工作，他的一系列書評計劃只好被迫擱淺，這是形勢迫人，而非人事關係所能影響的。

（二）呼喚藝術上的民主空氣

對於自己三十年代在《大公報·文藝》大力提倡書評，蕭乾晚年回眸，自覺「也許不大合國情」。在外國，一本書出來後，好像總得有人評那麼一下，才算有交代。因此，他們那裡有職業書評家。而在中國，並不是這樣。就當時文化出版界而言，書出來後，倘若政治上確有毛病，總會有人出來批判。一本來歷不凡或特別出色的書出來，也不愁沒人寫推薦。一般著作，除非自己去張羅，否則彷彿就沒有一評的必要了。由此蕭乾體會到：「我知道書評這個問題涉及的方面很多，不在政治和藝術之間劃個界限，書評沒法推廣。」²

據蕭乾分析，「旨在為讀者當讀書諮詢者的書評之所以樹立不起來，就因為中國寫書的人大都只允許褒，容不得你貶，即使貶得有道理。一本書出來，如果誰也不吭一聲，寫書的人倒不在乎。說點子好話，自然就不勝感激。倘若你歷數一本書的七成好，同時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煩就來了。正面申辯，甚至抗議，本無不可。然而不，他會在另外場合挑眼找岔兒，為幾個字竟然能結下多

¹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² 蕭乾《一個樂觀主義的獨白》，1982年《當代》第6期。

年深仇，在你料不到的時候，大做起文章。」¹

蕭乾欣賞台灣作家歐陽子在《王謝堂前的燕子》中批評了白先勇的《台北人》，而他們友好如常，說明仍然有寬宏大量的作家，書評的昌盛，需要藝術上的民主空氣。

（三）書評作者淪為推銷員

九十年代北京曾舉行過一次書評會議，蕭乾應邀出席和講話。坐在台上，望著會場黑壓壓五、六百人，蕭乾初時為有這麼多人獻身文化界這一諮詢行業而感到欣慰，後來得知來者全是全國各地出版社裡搞發行的人，又為之悲哀，驚奇地發現原來現今的書評作者，竟變成推銷員的化身。

1996年3月22日，蕭乾有感而發，寫了一篇《我的出版生涯》，他說「我把心坎上頂關心的問題放在最後，這就是應該有獨立於發行之外的書評。」²蕭乾感嘆：三十年代，自己就站在買書者立場為書評大聲疾呼。想不到六十年後的今天，書評依然沒有形成一股力量。這裡，除了出版者既然把書印成，就不能積壓，得盡快推銷外，還涉及我們的傳統及社會風氣。特別是1949年後，一個人只要政治上未倒，就只許誇，不許貶，正如誰要是政治上有污點，就只許貶而不許誇。

（四）理想主義的破滅

根據自己數十年積累的經驗，蕭乾認為「沒有點容忍和雅量，書評是很難紮根的。沒有明真偽、辨是非的書評，好書得不到褒獎，壞書乏人指摘，那

¹ 蕭乾《我與書評》，《文學報》，1988年8月11日。

² 蕭乾《我的出版生涯》，《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430。

就像是足球場上沒有了裁判。球還是踢著，甚至十分勇猛熱烈，可就難免亂成一團。食品需要經過鑒定，精神食糧也應允許品評。書評可以使好書更暢銷，壞書受到淘汰。它應是讀者的顧問，出版者的御史，是好書的宣傳員，壞書的閘門。對於出版工作，它應起到篩子、鏡子和輪子的作用。」¹

蕭乾在中國推廣遠離政治紛爭與商業利益的獨立的書評，提倡「超捧場、超攻訐」，「不阿諛，不中傷」的公正無私的書評風格，理想主義色彩過於濃厚，特別是在戰火紛飛、政權更替、社會急劇變遷之時，單靠一張報紙、幾個文人，在中國推動獨立書評，各方面的阻力可想而知。但蕭乾在中國為推廣獨立書評所作的種種努力，與《大公報》堅守「四不」辦報宗旨一樣，記載在《大公報》的歷史之中，也記載在中國的新聞史冊之中。

另據蕭乾夫人文潔若的回憶文章，1997年在住醫院之前，蕭乾曾細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陸鍵東著)一書，在空白處做了許多記號，原想寫篇書評，終因住院而只得罷休，直至蕭乾逝世。²未完成的書評，真正成為蕭乾一生未完成的夢。

¹ 蕭乾《我的出版生涯》，《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431。

² 《〈大公報〉名記者叢書·蕭乾卷》，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頁390。

第六章

蕭乾、楊剛編《文藝》(港版)

1996年，蕭乾為香港《大公報》寫了一篇題為《香港回歸》的文章，充滿感情。香港，在蕭乾的生命史上一直是個重要港口。蕭乾文中提到的1949年之前三次與香港的人生交叉點，都與《大公報》有關。1937年，蕭乾由上海轉往內地，是因為《大公報·文藝》(滬版)停刊，蕭乾被《大公報》解僱。而1938年至1939年，以及1948年至1949年，蕭乾曾兩度在香港工作，一為《大公報·文藝》(港版)創刊，一為《大公報·文藝》(港版)復刊。

一、蕭乾遙編《文藝》(漢版)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件發生，戰事全面展開，《大公報》上海館所在的租界也落了兩顆炸彈。戰爭無可避免地要打亂生活，一開戰，《大公報》除了國內國際政治和本市新聞版，統統停了。紙張告急，廣告也沒了著落。既然不再有《文藝》副刊了，它的編者自然也成為多餘的了。

(一) 平生第一回失業

1937年《大公報·文藝》(滬版)停刊之後，胡政之把蕭乾叫到辦公室，談起看情勢戰事就要展開，而且國軍肯定抵擋不住，報館能維持幾天還很難說。胡政之還說了許多表揚蕭乾工作表現的好話，不願蕭乾困在上海，同歸於盡。蕭乾聽到這裡，終於明白了，自己被報社辭退了。

1936年，蕭乾在《大公報》的年終獎金是三個月的薪水，這一回，蕭乾只

從朝不保夕的報社，拿到半個月薪水作為路費，離開上海，經香港、廣州，來到武漢，自謀生路。

蕭乾到了武漢，發現《大公報》漢版已經出版，但是班子已經搭好，新創辦的《戰線》副刊由陳紀滢負責。恰好楊振聲和沈從文二位由北平逃到武漢，那時他們正在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就慨然收留了失業的蕭乾，讓他搬進他們在珞珈山腳下租住的五福堂。後來，蕭乾又跟隨他們一道從武漢到長沙，再轉到湘西沈從文大哥沈雲六的家，1938年初，蕭乾隨楊振聲、沈從文二位流亡到昆明。

(二) 昆明遙編《文藝》(漢版)

到了昆明，蕭乾收到胡政之的一封信，說副刊《文藝》在作者和讀者中產生過較大影響，現在許多讀者要求《大公報》的《文藝》復刊，他希望蕭乾在昆明遙編，在《大公報》(漢版)上刊行。

記起在上海遭胡政之辭退時的突兀，蕭乾原本想一口回絕。但那封信也多少使蕭乾感到溫暖。想不到在烽火年代，竟還有讀者想念自己編的刊物。刊物畢竟不應同報館以及老闆劃等號。蕭乾便回信應承下來，重操故業。

1937年10月3日，《文藝》在《大公報》(漢版)恢復，復刊的第1期，編輯蕭乾只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巴金的《給山川均先生》。《文藝》(漢版)為周刊，至1938年3月6日止，總共出版了二十三期(372—392期)。

一時間，許多朋友又從敵後，從游擊區，從陝北，給蕭乾寄來了文稿。蕭乾在昆明的那張小桌子又熱鬧起來了，不知是廣告太擠，還是報館上層意見並

不一致，在昆明遙編的《文藝》(漢版)成爲一塊不定形的報屁股：有時半版，有時僅僅兩三欄，版面太小，蕭乾自然也遙編得不太起勁。

1938 年夏天，距在上海被遣散後快一年的時間，蕭乾突然接到胡政之一封電報，隨後附一封航空信，來函一方面對頭一年在上海遣散同仁(包括蕭乾在內)的事，深表歉疚，說那是動亂中的失計。表示今後報館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再也不使同仁星散了。不管這是一種姿態還是一番誠意，當時讓蕭乾很受感動。接著，胡政之又談到在香港辦《大公報》的用意和決心，強調那是抗戰宣傳的前哨，要蕭乾務必火速赴港，共圖大計。緊接著，電匯來旅費。胡政之的來信，讓原本百無聊賴的蕭乾，變得一下子亢奮起來。

幾天後，蕭乾找了一位同伴施蛰存，一起取道安南，幾經曲折，於 1938 年 8 月初到達香港，參加了《大公報》香港版籌備的最後階段工作。一走進香港皇后大道中的《大公報》編輯部，看到闊別近一年的老同事，蕭乾感覺恍如隔世。

二、《文藝》(港版)重整旗鼓

1938 年 8 月 13 日，《大公報》(港版)創刊，《文藝》也隨之在港版上正式刊出，蕭乾幹的還是老行當，編《文藝》並負責一個名叫《小公園》的娛樂性副刊。如有餘力，再往內地跑。

有了職業，蕭乾恢復了自信，精神面貌也大爲改觀，覺得自己儘管沒去敵後或延安，畢竟又站在抗日運動的一個重要宣傳崗位上了。「我決心把《大公報·文藝》辦好，讓它依舊在文化陣線上成爲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¹

¹ 蕭乾《我與〈大公報〉》，《蕭乾文集》第 6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82。

(一) 首要任務是充當郵箱

1938年8月13日《文藝》(港版)創刊之時，全面抗戰已經展開，國難當頭，文化人各奔前程。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蕭乾一生中寫「尋人」信件最多的，也是《文藝》刊登最多作家信件的時期。

一方面，因戰火四起，過去為《大公報·文藝》撰稿的作者，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敵後，有的仍滯留在上海，也有的像蕭乾一樣，轉到大後方。《文藝》經沈從文、蕭乾辛苦多年編織的作者網，突然四散，不少作家更失去了聯繫。

另一方面，《大公報》作為內地的報紙，首次到香港辦報，而蕭乾更是剛從雲南昆明來到香港，與香港本地作家沒有聯繫，要撐起《文藝》(港版)，必須重新編織作者網，顯然香港本土作家網一時難以建立，而且，論人數、作品質量和對《大公報·文藝》的熟悉度，香港的作家與內地作家是無法相比的，在編者蕭乾看來，最便捷的方法還是尋找老朋友、舊相知。

此外，抗戰期間，作家的命運，已跟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在訊息不通、聯絡受阻的情況下，作家執筆不僅為了創作，也肩負著一部分「新聞記者」的功能，因為毋須虛構，他們本身的經歷充滿了故事性、新聞性。那時，文藝界迫切需要是通消息，讀者也很急於知道作家們的行蹤。從這一角度來看，《文藝》(港版)創刊時期，將文藝副刊的「新聞性」充分發揮。

在《大公報》香港版創刊之後，蕭乾立即刊出《尋找朋友，並為〈文藝〉索文》，即給李蕤、田濤、炎午、祖春、嚴文井、張振亞、以圭、吳伯簫、力夫、黃照等人的公開信。蕭乾在信中寫道：「兩周前，我由西南一座山城來到了香港，

今後，我將有一個較為固定的住址了。同時，三年來你們所愛護支持的那個刊物：《文藝》，已於「八·一三」周年日在港版《大公報》上復刊了……這刊物在太平年月，它載的是堅實健康作品，在戰時，它自然也得積極參與全國文化的總動員，展示新姿態。」

(1) 由發行網重建作者網

蕭乾在尋找朋友的同時，對《文藝》今後的發展，明確指出兩點：

一是鑒於抗戰的新形勢，準備引導《文藝》積極參加全國文化的總動員，並在抗戰宣傳中展示其新的新姿態。二是希望《文藝》的老作者們予以理解，予以支持。《文藝》過去拒絕萎靡文章，但現在這個標準顯得並不足夠。

蕭乾在香港重整旗鼓，當務之急是尋找散於敵後遊擊區、延安、上海孤島的朋友們，重新取得聯繫。蕭乾估計，這需要寫上不是幾十封、而是數百封信。幸好，編副刊多年，最能訓練一種習慣：勤於寫信。這個習慣，蕭乾一直保持下來。

好在《大公報》的發行網在戰時仍相當廣，看的人多，蕭乾很快就與從前的作家朋友逐漸取得聯繫，大家互報平安。最先聯絡到的，大多是從平津奔赴延安或敵後，以及疏散到大西南或西北幾所大學的作家們，其中不少都是《文藝》(津、滬版)的作者。此外，當時戴望舒在香港編《星島日報》的副刊，蕭乾很快借助他的渠道，也同上海的作家們取得了聯繫。

(2) 闢「作家行蹤」

在《文藝》(滬版)，曾闢《文藝新聞》專欄，一開頭就聲明不登作家的私事，

然而抗戰局面展開後，作家們的行蹤就不再是個人的私事了。

蕭乾編《文藝》(港版)同延安作家群最早取得聯繫，是通過嚴文井接上頭的。1938年10月12日，《文藝》發表了嚴文井的陝北來信，從這封信中，讀者們第一次聽到「魯藝」(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這個名字，了解到哪些人去了陝北。信中還詳細描繪了「魯藝」的課目，以及作家們在陝北睡窯洞土炕、吃小米的香甜滋味。信末說，在延安生活無慮，精神愉快。

嚴文井這封信發表後，各地作家紛紛來信，有南陽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濤，山東的吳伯簫，以及卞之琳、藺風萼(柳杞)、丁玲、劉白羽等。為此，蕭乾在《文藝》上添了一個新欄目：《作家行蹤》，專門報道作家的最新動向，摘登作家來信。其中報道了大量活躍在各戰區的作家近況，尤以延安作家最多。

1939年3月24日，《文藝》發表了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文學系主任的陳荒煤的來信，他介紹了許多延安作家的近況。信中說：「到此地後，新認識了許多朋友，都是從前在北平沒見過的(有何其芳、卞之琳、嚴文井、李威渠、張振亞)，心里很高興。」¹信中還談到了延安近來編輯出版了一本雜誌《文藝戰線》，編委有丁玲、陳學昭、周揚、成仿吾、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劉白羽和陳荒煤。

(3) 登「戰地書簡」

1938年10月間，作家天馬從太行山給蕭乾寫來一封十分感人的信，天馬想用前方的戰利品來換取毛衣和糖果。他說：「這樣化緣不離奇吧。我實在因為生活太苦太單調了。山西一下雨，確實太冷了。棉軍服大概要一個月以後才發下。

¹ 《大公報·文藝》，1939年3月24日。

我非常企慕一件羊毛衫，因為它難於藏虱子，還又輕又暖，多可愛啊！東西寄『山西郵局探役戰區前敵總司令趙秘書轉交。』此信最後一句是：「你猜我的鬍鬚有多長了？」¹

蕭乾用天馬的這一封來信，開始在《文藝》設了一個新穎而響亮的欄目：《戰地書簡》。後來，奔赴戰地的作家們紛紛來信，一時間，《山西書簡》、《冀中書簡》成為《文藝》(港版)最引人注目的內容。與此同時，一些流亡到大後方的作家朋友也陸續來信取得聯繫，《文藝》在香港復刊第一個任務——充當郵箱，順利完成。

(4)「文藝新聞」受矚目

在《文藝》(滬版)常見的《文藝新聞》一欄，以往篇幅僅寥寥數百字，一直是《文藝》副刊的配角、閒角，到了《文藝》(港版)，卻一度躍昇成為《文藝》副刊主角，這是蕭乾當初開闢此欄始料不及的。在新形勢下，《文藝新聞》頻頻見報，在作家間起到溝通聲息的作用了。

《文藝新聞》的海外部分，也有一些直接反映抗戰的，如根室那篇帶點預言性的《新加坡——未來太平洋的戰場》，以及從巴黎寄來的一篇航訊，痛斥紀德「糊塗」竟然聽信日本人小德松的謠言，說中日之戰正如法德的衝突，是宿命所決定的。

(二) 把文章變成信念和力量

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港版)時，雖具副刊編輯多年的經驗，卻未敢輕言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42。

駕輕就熟，因為新地方、新形勢，都不允許編輯墨守陳規，需要根據 1938 年的客觀環境，重新設計副刊。

在 1938 年 8 月 13 日刊出的《文藝》(港版)第一期，蕭乾向作者、讀者交代大政方針。申明：「《文藝》過去從不登萎靡文章。現在僅僅那樣就不夠了，我們要把文章變成信念和力量。」¹蕭乾希望戰時的《文藝》，與太平時期《文藝》面貌有所不同。但這種改變是逐漸的，是分階段的，需要作家和稿件的配合。

(1) 連載沈從文的《湘西》

《文藝》(港版)最初的稿源主要依靠流亡到大後方或留在上海孤島的朋友。作品內容雖然盡量突出抗戰，但是基本上只能保持老樣子。《文藝》(港版)創刊號除了蕭乾的發刊詞，就是《文藝》幾位老作者的新作——巴金《在轟炸中過的日子》、靳以《八·一三》，並開始連載沈從文的《湘西》。

蕭乾在「編者按」中介紹沈從文的長文《湘西》，稱它寫的不僅是詩意的湘西，富裕的湘西，而且也是生氣勃勃的湘西——抗戰中的湘西。文章也確實是從戰爭開筆的。

第二期有巴金的《一點感想》和豐子愷的《勞者自歌》。隨後幾期有楊剛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親》和長詩《我站在地球中央》，楊朔的《跳動在歷史過程中》，蕭紅的《汾河的圓月》，李廣田的《陰森森的》，李健吾的《拿破侖第二》，蘇金傘的《星們的悲哀》，艾蕪的《退到後方去的人們》，李輝英的《山崗上》和靳以的《鄉長》。此外，還有徐遲寫廣州囚犯的《火裡的大赦》，以及陸蠡的優美散文《光陰》。

¹ 《大公報·文藝》，1938 年 8 月 13 日。

(2) 書評、特輯逐漸恢復

《文藝》在上海時，曾大力提倡書評，到了香港，這一方針也並未放棄。只可惜，因戰爭影響，各種文藝雜誌和新書，有如百花凋零，所餘不多了。

爲了解決戰爭期間文化界的隔膜問題，《文藝》(港版)書評一欄就盡量報道並評介當時爲數不多的幾個刊物，如茅盾編的《文藝陣地》，靳以編的《文叢》，還有木刻家陳煙橋主編的《自由》。此外，還評介了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作品《打回老家去》。

1939年7月9日，《文藝》綜合版的「書報簡評」一欄中，發表了樓菲的文章，詳細地評論了延安文藝戰線社出版的《文藝戰線》第三號，主要評述了劉白羽、梁彥、白曉光、駱方、賈嘉、卞之琳、柳青等人的小說、詩歌、散文。文章開頭寫道：「在烽火中成長，在戰鬥的生活裡發展，能夠以血肉的生活呈現了現實之全貌的，只有值得特別推崇的《文藝戰線》這一刊物。……步調是一致的，是真正的《文藝戰線》的姿態；叫喊是一致的，是廣大的民族的呼聲。」

1

爲了活躍氣氛，迅速打開局面，蕭乾還在《文藝》(港版)上組織了關於《文章下鄉》的討論，並刊載了中央大學師生對魯迅《阿Q正傳》的討論。同時，蕭乾還花力氣組織一些特刊，先後出過「漫談翻譯專號」、「世界語特輯」、「詩特刊」和「魯迅逝世二周年」等，在「魯迅逝世二周年」專輯中，刊有茅盾的《關於魯迅研究的一點意見》、李健吾的《魯迅和翻譯》，以及林煥平的《頌魯迅》。

¹ 香港《大公報》，1939年7月9日。

(三)、關注抗戰的前後方

作為抗戰時期的報紙文藝副刊的編輯，蕭乾強烈意識到，刊物不能像和平時期那樣率由舊章，它需要更直接地反映戰爭，更充分地宣傳抗戰，並起到鼓舞前後方士氣的號角作用。

特別是蕭乾在同各戰區，尤其是延安的作家取得聯繫之後，為《文藝》「展示新的姿態」創造了有利條件。刊登這些「投筆從戎」的作家文章，是蕭乾主編香港《文藝》副刊的一大特色。

(1) 編副刊也要有「導向」

編副刊也有所謂「導向」。但那絕不意味著告訴作者們該怎樣去寫。那永遠是無從「導」起的。然而編者只要順著潮流，而不是逆著它，總可以通過版面（例如徵稿或預告）鼓勵某方面的文稿向你湧來。

在敵機狂轟濫炸廣州時，蕭乾就開始刊登徵文啓事，宣布要出《空軍戰績》及《保衛大廣東》兩個特輯。1938年8月25日的《文藝》預告了首期《戰地特刊》的主要內容：陳毅的《最近的山西》、楊華的《川口鎮之役》，以及連載了三期的劉白羽的《西北線上》。刊物問世後，很自然地引起香港及大後方文化界的注意。

《文藝》接著刊出美國友人史沫萊特(Agnes Smedley)的《冬夜行軍》和《八路軍隨軍記》(譯者艾風)，黑丁的《我懷念呂梁山》，吳伯簫的《隨軍草：懷壽州》等一系列直接來自戰場的文章，其中還有幾篇將軍訪問記，如謝冰瑩的《會

見趙侗將軍》。

(2)「延安文學」的重要陣地

1938年，香港與延安郵路暢通，香港往延安寫信幾天就能到達，匯款也同樣捷便。有了郵路的保證，蕭乾就通過嚴文井在延安代為組稿，嚴文井自己也寫過好幾篇，如《來去》、《春天——一個小鬼的故事》等。反映延安和各根據地人民鬥爭生活的文藝作品，陸續登上《文藝》，形式有散文、小說、特寫和詩歌等，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通過嚴文井牽線，蕭乾後來同「抗大」也接上頭。野火不但為《文藝》寫來了《陝北行》，並且還寄來了由陸荊、陳璞、陳遠高、野火集體創作，野火執筆的《抗大生活》，1938年2月23、24日在《文藝》發表。

《抗大生活》是一篇直接反映延安生活的優秀散文。該文詳細地描寫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習和生活，全文分七個部分，分別介紹「抗大」學生的早操、吃飯、上課、討論會、娛樂晚會、課外活動、衛生所等活動內容，題材新穎，表達生動。

劉白羽《藍河上》從1939年4月7日至5月3日，共連載了十六期，是一篇反映根據地人民火熱鬥爭生活的長篇小說。吳伯簫的《潞安風物》，從1939年6月至7月共連載十六期，記錄他從陝北到太行山前線路經潞安的見聞，歌頌根據地軍民的勤勞、質樸和敢於鬥爭，是一篇有份量散文。

黃鋼散文《兩個除夕》刊於1939年8月4日，是一篇思想性十分鮮明的散文，文章敘述了在漢口過除夕的兩種不同情形、不同心境，其中最為特別的是，

描寫了毛澤東與群眾共度除夕的動人場面。歐利文的抒情散文《延安月色》，作者為「抗大」學生，該文寫他下課後，漫步在月色之中，看著地下延河水、水中延安月、月下延安人，作者觸景生情，深情地說：「延安，這古老的名城，現時正為許多青年人憧憬著。」¹此外，還有黑丁《我懷念呂梁山》，刊於《大公報·文藝》1939年8月18日。

(3) 不必局限戰爭題材

後來，蕭乾逐漸意識到，要保持《文藝》副刊固有的全面推動文藝的做法，來稿不必局限於戰爭題材。因為對整個抗戰而言，後方也是同樣重要的。為此，《文藝》曾出過《我們的大後方》和《不打仗的作家們幹甚麼》等特輯，引導作家多寫大後方的稿件。

流亡到大後方的作家們，紛紛來稿，不少作品都與戰爭題材有關，如華嘉的《高射炮手說》、艾蕪的《退到後方去的人》和《湘桂路上》、田濤的《大別山荒僻的一角》以及藺風萼（柳杞）的《陪都的人們》，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作為抗戰後盾的大後方百姓生活情況。

關於上海孤島，則常有楊剛的報道，她還為《文藝》寫了篇《翹首》。此外，在白平階那篇《跨過橫斷山脈》的啟發下，蕭乾曾由香港往滇西，寫了一組關於修築滇緬公路的特寫。另外，大後方的文藝動態也受到《文藝》的關注，刊出《桂林劇壇》。

¹ 《大公報·文藝》，1939年8月16日。

(4) 老作者 新素材

雖然根據抗戰新形勢，蕭乾重新設計副刊，他比以往更關注文學作品的内容，但也沒有忽略對作品藝術水平的嚴格把關。所以，在蕭乾主編的《文藝》(港版)的時期，雖飽經戰亂，但還是留下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尤以紀實性的散文最多。

這一時期的作品，散文和小說佳作有：陸蠡的《囚綠記》、李輝英的《小山崗上》、蘆焚《夜哨》、艾蕪的《退到後方的人》、巴金的《在轟炸中過日子》、沈從文中篇連載《湘西》、楊朔從西南寄來的《跳動在歷史過程中》，以及茅盾的《追記一頁》

詩歌方面，有楊剛的長詩《我站在地球中央》和老舍長詩《成渝路上》。戲劇方面，有落華生的獨幕劇《女國士》。雖然以上這些作家，不少都是《文藝》天津、上海時期的常客，是蕭乾的朋友，但因為戰爭，因為流離，擴大了作家們的生活半徑和視野，也影響到他們的心境和創作。所以，即便是一群《文藝》「老作者」，作品卻有了新面貌。要在以前，很難想像，埋首「三部曲」等宏篇巨製的巴金，會寫出《在轟炸中過日子》這樣題材的散文。老舍寫作《成渝路上》長詩，也是一種新的面貌。

(5) 長篇連載明顯增多

在天津和上海編《大公報》副刊，蕭乾極少發跨期的稿子，但編《大公報·文藝》(港版)，雖然稿源充足，但刊出的跨期稿件，較以往有明顯增長。其中，陳毅的《最近的山西》連載了三期，劉白羽的《藍河上》連載了十六期，吳伯簫的《潞安風物》連載十六期。

究其原因，一是來稿本身就比較長，其中部分作品創作伊始，並非為報紙副刊而寫。二是蕭乾用稿的標準也與以往有了不同，能夠容忍和接受一些跨期較長的稿件。三是讀者似乎也接受了這種連載的長篇作品，最起碼，沒有接到讀者這方面的投訴。還有就是編者蕭乾為了爭取時間，去嶺東和滇緬旅行採訪，在他外出的這一段時間，《文藝》上連載過沈從文的《湘西》、楊剛的《偉大》和丘東平的《沉鬱的梅冷城》。

三、「綜合版」清算日本

《文藝》(港版)，除了刊登延安和各戰區的來稿外，蕭乾一直思索立足香港的《文藝》，還有甚麼優勢，還能做些甚麼，溝通前方與後方，為全國軍民抗戰到底打打氣？

蕭乾逐漸意識到，為了壯大聲勢，鼓舞前後方的士氣，還有一項很重要的任務要做：揭露日本侵略者。開頭《文藝》只是刊出《瘋狂贖武》及《侵略者的老家文藝》等特輯，想不到這方面來稿，比戰地及後方的來稿，更為踴躍。

(一) 揭露日本的黑暗和虛弱

1939年春，《文藝》(港版)逐漸放棄了純文藝傳統，開始刊出「綜合版」，時間為每周一版，周日刊出。凡是能鼓舞抗戰軍民士氣的，不論是軍事、政治還是經濟問題，都可以談，都可以登。首要任務是揭露日本本國的黑暗和虛弱。

《文藝》過去一直注重宣揚西學，介紹外國文學不遺餘力，但對日本的介紹，僅限於文學領域，數量也不多。至蕭乾編《文藝》(港版)，介紹日本、揭露

日本的各類文章，刊發的密度驟增，內容和形式呈多元化，從敵情到兵器以至防空常識，只要有利於抗戰的，都盡可能發表。這種大範圍、高密度地聚焦日本問題，普及軍事知識，不僅在以往的《文藝》上罕見，在當時的報紙文藝副刊上，也是相當突出的。

（二）打破純文藝的框框

蕭乾在《文藝》（港版）力推「綜合版」，實際上就是爲了盡最大努力，加強自身對抗戰的信念並揭露敵人，打破純文藝框框。當年，蕭乾這樣做需要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也常有不被人理解的時候。蕭乾本人就曾遭受個別老先生的指責，稱《文藝》辦得越來越離譜，太缺乏文藝氣息了。

但蕭乾還是得到報館內外更多朋友的支持。他們認爲既是非常時期，就應打破以往純文藝的框框，以非常方式來編。於是，蕭乾索性敞開大門，凡是足以揭露敵人、鼓勵自己的，不論文章性質，一律歡迎。在《文藝》的編輯方針轉變這一點上，蕭乾的做法，得到《大公報》胡政之的默許。

打響第一炮的是 1938 年歲暮的系列回顧文章。最早登出的是夏衍的《我們這一年》。隨後又出了特刊《世界這一年》。

當時，與蕭乾同住一間宿舍的《大公報》同事李純青，不但贊成蕭乾的意向，還給予具體的支持。李純青不僅爲刊物又寫又譯，還介紹了不少日本問題研究者給蕭乾，蕭乾爲此很是感激，稱：「使我這個日本一無所知的人，也能接連編出一系列揭露日本內幕的專輯」。¹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 7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244，

最早刊出的清算日本文章，是李純青所譯的《統制下的日本家族》和《日兵的家難》。李純青還約了宋斐如寫《日本戰時政治機構轉變過程》、東閔寫《一年來華北華中日本經濟侵略》，以及吳斐丹的《一年來日本財政》，陸續在《文藝》上與讀者見面了。接著，還登出張風的戰時日本社會研究《戰爭與犯罪》及《迷信的民族》，華雲遊的《台灣青年反日運動史》等。

(三) 爲日本侵略者算總帳

1938 年年終，《文藝》接連發表了一大批爲日本侵略者算總帳的文章。從軍事、政治、金融、財政到社會動態，從各方面來揭露敵人的外強中乾，並著重報道了日本國內反戰運動，以及戰時日本人民、尤其是娼妓及童工的苦況。

《文藝》每期照例要配一、二幅圖片，有一幅是日本陸相坂垣與海相米內在用餐，標題是：《我舐了舐，喏，人的血果然味道不同些》，該像片是從日本報刊上剪下轉載的。

更爲有力的揭發來自日本內部。例如，楊慶光從日本《主婦之友》雜誌譯的《橫須賀海軍病院慰問記》一文，真實生動地描繪了陣亡日兵丟下孤兒寡婦的慘狀。當時，日本有不少作家曾被迫作爲隨軍記者參加侵略軍。《文藝》譯了不少篇他們寫的反戰文章。如濱本浩厚的《從九江到武穴》，生動描述了軍糧的匱乏，中國游擊隊的活躍，以及長江中下游佈下的水雷，對日軍所構成威脅。在《我們最怕機械地雷》這一標題下，《文藝》還譯載了日本隨軍作家菊池等人的自述。這些，對於鼓舞中國軍民志氣，起到積極作用。

(四) 區分侵略者與日本人民

即便是與侵略軍交戰最激烈時，《文藝》也不曾忘記把作為侵略者的日本軍政當局，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流金就從山西廣陽寄來一篇《從敵營奪得的「同志」》。這個「敵」字是，原來可能是「日」字，那時香港殖民當局不許中國報紙使用「敵」或「日」二字，所以，見到的時候，「敵」字變成一個「X」符號。

《文藝》還登過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小說《黯夜事件》，白井四郎的俳句《戰場》，片柳竹市的《華北》，以及青木弘的《出征一年》。後面三位日本作者，都是厭戰的現役軍人。

1939年3月20日，《文藝》刊發裴琴所寫的《兩個日本朋友》，是一篇別開生面的特寫，文章表現兩個日本戰俘在八路軍俘虜政策的感召下，迅速覺悟，在八路軍中，不僅生活愉快，而且積極參加了反戰工作，寫了許多日語反戰歌曲。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國統區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不少人認為延安政權能把敵人變朋友，實在太高明，太可愛了。

(五) 直擊侵略者的老家

在蕭乾的策劃之下，《文藝》出過一期《侵略者的老家》特輯，其中有一篇題為《日本有二千萬革命黨》。這些文章在爭取友人、瓦解敵人，堅定人民大眾對抗戰的信念上，起了一定作用。

1939年3月11日，《文藝》刊登了《狐狸精附了體——戰時日本童工的剪影》(下村千秋文，高行譯)，4月1日刊《死亡線上戰慄著的日本大學生》、4

月 15 日刊《日本肥料缺乏》等文，報道了日本民眾的反戰運動。同時，還轉載日本漫畫家佐宗美邦的反戰漫畫。

1939 年初，《文藝》綜合版系統地發表過幾篇分析《日本這一年》的文章，綜述「一年來的漢奸活動」，以及「日本在華北華中的經濟侵略」，特別著重揭露「日制大亞細亞主義」的罪惡。1939 年 3 月，《大公報》出版部出版了《清算日本》一書，屬「綜合文藝叢刊」第一種，收錄了原來登在港版《文藝》上的四十三篇文章，從各方面揭露日本本國的黑暗和虛弱。

1986 年《香港文學》發表了楊玉峰《蕭乾·〈大公報·文藝〉與〈清算日本〉》一文，概述 1938 年蕭乾抵港後在副刊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談到《清算日本》一書。楊玉峰寫道：「《大公報》的宗旨是希望替民族解放事業作一點貢獻；說得直接些，就是作為宣傳抗戰的媒介。由蕭乾主編的《小公園》和《文藝》兩個副刊，目的自然與報章宗旨步調一致的。」¹

楊玉峰慨嘆《清算日本》一書，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視，並說：「就連編者本人恐怕也毫無印象了。」1979 年，蕭乾有機會重新拿起筆，撰寫《生活回憶錄》一書時，坦率地承認「他(楊玉峰)的推斷準確得很，我早已把這本書忘得乾乾淨淨。從文中所附那本書封面的照片看，那是『綜合文藝叢刊』第一種。也不知道楊剛後來有沒有再編下去。」²

(六)《文藝》邁向國際化

蕭乾主編港版《文藝》，為了宣傳抗戰，也有意識地加強了刊物的國際性，刊發了不少國際題材的作品。他認為，既然是同一場反法西斯戰爭，《文藝》歡

¹ 轉引自蕭乾《我與〈大公報〉》，《蕭乾文集》第 6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83。

² 轉引自蕭乾《我與〈大公報〉》，《蕭乾文集》第 6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83。

迎國際友人的聲援，同時，也支持他們的鬥爭。所有這些文章無非都是讓讀者時刻意識到：我們不孤。

蕭乾後來回憶這一段工作，並沒有刻意拔高自己，「當時，還不懂得甚麼國際主義，只知道對於支持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外國朋友，一概表示由衷的感激。」

1

(1) 與抗戰有關的外國作品

在《文藝》的日常版上，開始發表一些支援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作品，如日本反戰作家鹿地直的《暗夜的事件》、美國朋友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長篇連載《八路軍隨征記》、《冬夜行軍》和《八路軍隨軍記》(譯者艾風)，以及日本反戰作家村野四郎的《一九三八年的田園詩》，廣受讀者矚目。陳崎的《給非國民鹿地亘》，則是來自國統區的作品。

《文藝》還登過吉士所寫的《記史沫特萊》，文中記載了史沫特萊參加晉北突破的經過。也譯載過蘇聯《消息報》上的《朱德將軍——中國的伏羅希洛夫》。在《文藝》的綜合版上，有祝賀美國作家辛克萊的六十壽辰的文章，介紹黑人作家休斯的文學活動，刊登過邱吉爾的《論蕭伯納》，回顧西班牙戰爭。此外，還刊登過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訪問記。

美國朋友吉朋(F.GIBBON)的《在中國空軍隊伍中》一文，曾頗引起注意。在一篇巴黎通訊裡，作者正面質問：「紀德能這樣糊涂嗎？」文中引用紀德一段話說：「中國與日本正如法國與德國，是種下了宿命的根。」他認為兩國之間有著一道「超越理智的大鴻溝」。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45。

(2) 斯諾建議「工合專號」

《文藝》於1939年5月26日刊出一期「工合專號」，當時，斯諾正在宋慶齡女士的支持下，同路易·艾黎、梁士純、馬海德等國際友人一起，發起一項至今還為人們所稱道的工業合作化運動(簡稱工合)，以解決中國大後方工業品奇缺的困難，同時也起到了緩和戰爭造成失業問題的作用。這一運動立即得到美英等國進步人士的襄助。後來，蕭乾在《文學回憶錄》中透露，《文藝》推出「工合專號」，最早來自斯諾的建議。¹

四、《大公報·文藝》穿上戎裝

九十年代，蕭乾在《我當過文學保姆——七年報紙文藝副刊編輯的甘與苦》一文中，寫到《文藝》(港版)部分，用了「脫了馬褂，換上戎裝」作為標題。形象地道出自接手《大公報》的《小公園》，到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編《文藝》，刊物經歷的種種變化。事實上，從1935年到1939年，「脫了馬褂，換上戎裝」的，又豈止《文藝》？又豈止《大公報》？整個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國破山河在」，侵華日軍的鐵蹄，踏碎了中國作家平靜、安穩的生活，也踏碎了很多文學青年「藝術至上」的夢想。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這樣的時代大潮面前，《大公報·文藝》的編者、作者雖然依舊，但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離失所，他們個人生活和創作，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抵達香港後，蕭乾寫了一篇《安南的啓示》，記載他從安南轉香港的見聞，寫道：「在安南，你可以看到一個國家應有的東西：美麗的山河，現代的文明；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45。

所缺乏的只有一樣：自由——獨立國人民應有的自由。... ..丟掉了自己的文化，又丟掉了自由，那是注定了的悲劇，是什麼現代文明也不能補償的損失。因為機器本就是吮血的傢夥。如果不是把『民族』放在前面，作通盤的打算，文明也許正是個噩夢。」¹

抗戰時期，眾多的文化人，尤其是文學青年，懷著滿腔熱情奔赴各戰區從事文化宣傳工作，或辦報刊，或以戲劇形式進行抗戰宣傳。如王西彥、黎烈文、田濤、碧野、姚雪垠、黑丁、劉白羽、嚴文井、吳伯簫、何其芳、卞之琳等，其中不乏以往與《文藝》聯繫較多的作者，他們充滿激情地投筆從戎，投奔新生活，擁抱新理想，從學校、書齋走向大時代，他們此時的作品，都打上了新時代、新生活的烙印。

1938年7月7日，《大公報·戰線》文藝副刊編輯陳紀滢就文藝工作者在過去一年中所表現的工作，作了三點概括：

第一，自「七·七」抗戰後，全國文藝工作者停止了幾年來有關文藝的自我鬥爭，形成了大團結。

第二，在文字上，在體裁上，是完全把握著現實，充分發揮了它的暴露性。

第三，把文藝孕育在實際的戰爭生活中，從實際的戰爭生活中換取了文藝的成果。以上三點，概括了中國作家當時普遍的思想狀況和創作情形。

全面抗戰，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必然選擇；鼓勵抗戰，是為民喉舌《大公報》的必然選擇；宣傳抗戰，是與時俱進《文藝》的必然選擇。無論是蕭乾主編，還是其後楊剛接任，抗戰題材成為《文藝》(港版)的主旋律，《文藝》(港版)成為宣傳抗戰的重要陣地，這不僅僅是編者個人的選擇，更是時代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大公報》的選擇。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60

看一看《大公報》前後幾任副刊編輯的遭遇就可知一二。吳宓的《學衡》雜誌已走進歷史，沈從文的筆下美麗的《湘西》，也受到炮火無情的侵襲。蕭乾本人，不再是那個剛出校園的憂鬱大學生，也不再是《文藝》茶會上熱情風趣的主人家了，他經歷了失業、流亡生活，從上海到武漢，由昆明到香港，顛沛流離，歷盡難辛。1938 年的中國報紙、中國作家，對社會、人生和文藝的看法，都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樣了。

《大公報》在抗戰中的表現，是中國報紙的一面旗幟。從《大公報》當年社評、新聞、戰地通訊和其他文藝副刊的整體表現來看，可以看到，蕭乾主編《文藝》(港版)的，在編輯思想和表現形式的轉變，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

(一) 社評：一心抗戰，不知其他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拉開了中國全民族抗戰的帷幕，一方面，日本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佔領中國大片領土，一方面，中國人民抗戰激情空前高漲。此時的《大公報》，爲了更加堅定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念，接連發表社評，申述「一心抗戰，不知其他」的觀點。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軍攻佔南京，《大公報》發表題爲《訴諸全國軍民各界》的社評，「首都失陷，外患的嚴重緊急，不庸諱言。」「凡一切有愛國意識的人們，必須知道：現時以集中全國力量，擁護政府抗戰，爲唯一的救國方法」。

1

¹ 《大公報》，1937 年 12 月 16 日。

1937年12月下旬，杭州、濟南相繼淪陷。《大公報》發表題為《杭州、濟南之失陷》的社評說：「現在事實上，是敵人赤裸裸的進行征服全中國，因此中國的決心，只有兩點，受征服或抗戰，這其間，絕無中間性的存在。現在問每一個中國人，一定反對受征服，那麼結論只有抗戰，一切悲苦，一切犧牲，須絕對預期，不容瞻顧。」¹

(二) 新聞：爲前方勝利鼓與呼

新聞需要真實、客觀，但在1938年，《大公報》一改過去「聞敗勿餒」的做法，更注重利用前方的勝利，駁斥「戰必亡」的謬論，鼓舞中國軍民「戰必勝」的信心。1938年2月下旬到3月中旬，龐炳勛、張自忠兩部在山東臨沂與日軍血戰，給日軍以重創。

3月19、20日，《大公報》連續兩天在要聞版頭條位置報道了魯南大捷的消息。20日更發表短評《魯南的大捷》，稱：魯南的勝利，開始矯正人們的「失敗心理」。21日又發表題為《臨沂之戰》的社評，指出「臨沂之勝，是抗戰開始以來可特書大書的一件事。」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國軍隊孫連仲部和湯恩伯部在第5戰區李宗仁指揮下，在台兒莊夾擊日軍，殲敵一萬一千餘人，沉重打擊侵華日軍的囂張氣焰。

從台兒莊戰爭打響到戰爭結束，《大公報》要聞版幾乎天天都是台兒莊消息，並發表有關言論多篇。1938年4月7日，戰爭剛一結束，《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便隨中國軍隊進入硝煙瀰漫的台兒莊，當日下午四時給報社發回專電，詳

¹ 《大公報》，1937年12月29日。

細報道中國軍隊勝利的戰果。

4月8日,《大公報》發表社評《台兒莊勝利以後》,稱「經此一戰,證明我們軍隊,如運用好,決心堅,便充分可以戰勝暴寇」。9日又發表記者惜夢寫的通訊《台兒莊殲滅暴敵血戰的一幕》,12日和13日先後發表范長江的兩篇通訊《台兒莊血戰經過》、《慰問台兒莊》。

(三) 其他副刊：在《戰線》上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的時候,宣布《發起旨趣》:文藝是激勵人民、發動大眾最有力的武器。抗日戰爭的形勢要求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像前線將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粉碎寇敵,爭取勝利。

在整個抗戰時期,《大公報》漢、渝、港、桂各版,雖創辦了幾個文藝副刊,但主題只有一個:用文藝為武器發動民眾,打擊敵人,爭取抗戰勝利。戰鬥性是這一時期《大公報》副刊的一個共同特點。

當《大公報》在漢口發行時,武漢的報紙已受戰事影響,削減篇幅,素被人輕視的「報屁股」副刊,自然在最先淘汰之列。但《大公報》「票友記者」陳紀滢卻向館方建議,應該有一種文藝副刊,而且希望多刊載一些具有戰鬥性的文章,為吸引大部分青年作家起見,特把漢口版的文藝副刊取名為《戰線》。《大公報·戰線》文藝副刊,1937年9月18日在漢版創刊,後隨漢版撤至重慶,在渝版繼續刊行,至1943年10月31日停刊。

在《戰線》的創刊號上,陳紀滢發表《我們的信念和態度》,稱「自19世

紀產生了一個『爲文藝而文藝』的口號，一些從事文藝的作家們，便拿它當作金科玉律現在我們眼巴巴地瞅著敵人的炮火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滅絕我們的文化命脈，我們是不是還躲在亭子間寫些丟開時代，憑著天才幻想出來的不關痛痒的文藝作品呢？我們是不是還以特殊階級自居而賣弄風雅呢？決不！」¹

《戰線》共出版 996 期，所發表作品絕大多數是以抗戰爲題材，鼓舞鬥志，讚美英雄是一個中心內容。1939 年 1 月，陳紀滢還邀請《戰線》和《文藝》(港版)部分作者和文藝界的朋友聚會，對「目前文藝工作者努力的方向」這個議題，交流意見，暢所欲言。

五、楊剛接編《文藝》(港版)

1939 年 8 月，蕭乾接受聘書，決定赴英國倫敦東方大學任教。自從蕭乾將赴英國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人向《大公報》老闆胡政之舉薦《文藝》編輯的繼任者。近的有香港本地的，但胡政之不予考慮，因爲《大公報》一直是一份全國性的報紙。胡政之曾就此事徵詢蕭乾的意見，希望找一位像蕭乾那樣編下去的人。而蕭乾，始終只向他提及一個人——楊剛。

(一) 胡政之曾擔心「赤色」楊剛

《大公報》的「四不」宗旨，第一就是「不黨」。是否聘請楊剛接替蕭乾，胡政之一直舉棋不定，他爲此承受著各方壓力。最大的問題是楊剛共產黨員的身份，並不符合《大公報》政治中立的立場。不少人擔心這位「赤色分子」，日後會給報紙帶來麻煩。胡政之一度考慮另請北方的一位作家，認爲那位作家比較穩重。

¹ 漢口《大公報》，1937 年 9 月 18 日

然而，蕭乾堅持楊剛是最佳人選，他對胡政之曉以利害：「1936年你不是說過兼容並蓄嗎？如果把你那位請來，刊物會馬上回到1933年以前學院派老樣子，而今天已經抗戰了！我保證所有多年來同刊物保持聯繫的作家們，都會同報紙分道揚鑣。」¹

談到楊剛的政治取向，蕭乾說：「她屬於什麼黨派，我不清楚。即便是共產黨，現在不也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嗎？楊剛是我接下這個攤子以來，最經常的撰稿人。她不但了解副刊的傳統，也熟悉給我們供稿的所有作家。不是她接手，攤子可就散了。報館就會失掉一大批作家的支持。」²胡政之聽了蕭乾的分析，覺得有道理。爲了不失去這群作家，延續蕭乾建立的《文藝》(港版)風格，胡政之終於發了話：打電報把楊剛請來吧。

(二) 蕭乾與楊剛的淵源

1939年9月1日，在楊剛陪同下，蕭乾渡海去九龍，登上阿米拉斯號，臨行，楊剛特意揣給蕭乾一份剛從機房取來的《大公報》，蕭乾寫的《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謹向本刊作者讀者辭行》，佔當日《文藝》副刊的一版篇幅。宣告：這刊物從即日起便由《文藝》的另一個科班——楊剛先生接手主編了。

蕭乾在文章最後，給作者和讀者留言：「相信你們必將續幫助這個小刊物，視如己出地愛護它。我感激地握你們的手。」³《大公報·文藝》(港版)的接任人選，直接關係到副刊宗旨的落實和副刊風格的延續，蕭乾力主楊剛接編，有他的原因。

¹ 《蕭乾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頁65。

² 蕭乾《我與〈大公報〉》，《蕭乾文集》第6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89。

³ 《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1日。

(1) 認識十年姐弟相稱

在楊剛接編《文藝》(港版)之前，與蕭乾相交多年，他倆是燕京大學同學，楊剛念英語，蕭乾學新聞。1929年，他們相識於一個詩歌朗誦會上，到1939年正好十年。蕭乾與楊剛相識之後，過從密切，姐弟相稱。從寫作到人生，幾乎無話不談。

蕭乾1979年寫過一篇《未帶地圖的旅人》，文章開篇寫到兩個青年踏著蕪蔓的草叢，在激烈地爭辯。¹故事中的男女，就是年輕時的蕭乾與楊剛。那時，燕京大學學生會的交通部辦著一種校內郵政，蕭乾與楊剛相識以後，就通起信來，內容從對人生觀的探討到各自讀書筆記的摘錄。

楊剛是一名共產黨員，蕭乾是一個典型的未帶地圖的旅人，然而，這沒有成為他們友誼的障礙。蕭乾認為，與其讓一位陌生人來接編港版文藝，不如讓一位自己熟悉和信任的人來接編，以延續港版《文藝》的路向、風格。

(2) 楊剛是《文藝》長期作者

「我和楊剛認識十年，我只曉得她進步，愛國，她筆頭快，判斷力比我強。」

²蕭乾赴英之前對胡政之說的這一番話，代表了蕭乾對楊剛的整體評價。

蕭乾敢於舉賢不避親，還在於欣賞楊剛的文字水平和編輯經驗。早在蕭乾編《文藝》(津、滬)時，楊剛已是主要撰稿者之一，是書評活動的重要支持者，為《文藝》(滬版)評論了不少外國作家作品。楊剛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長篇小

¹ 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61。

²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9。

說《偉大》由蕭乾編輯，在《文藝》(港版)連載。楊剛長達八百行的政治諷刺詩《我站在地球中央》，也刊登在《文藝》(港版)上。除了勤於寫作，楊剛也具備編輯經驗。1936年曾擔任北平通俗讀物編輯社創辦的《大眾知識》半月刊編輯。

楊剛接到蕭乾的電報之後，對擔任《大公報》副刊編輯，在公在私，她都是願意的。在私而言，她與蕭乾相交甚深，願助蕭乾一臂之力，將蕭乾用心血澆灌的《文藝》發揚光大。在公，她也將進入全國大報《大公報》視為一項重要的任務，借助《文藝》副刊的平台，全面配合抗戰，充分發揮作用。

(三)「浩烈之徒」——楊剛

楊剛(1905年1月10日——1957年10月7日)1928年秋，因在南昌葆靈女子學校成績優異，免試被送入北平的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不久，她認識了正在北京大學經濟系求學的鄭侃和在政法大學求學的鄭佩兩兄弟，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編入清華燕京支部。

(1) 共產主義忠實信徒

夏衍曾給楊剛下過一個評語，稱她為「浩烈之徒」，即「浩革命之烈焰，共產主義忠實信徒」。¹1930年5月1日，楊剛參加「五·一」反內戰示威遊行，剛出北師大校門就被上百名警察團團圍住，與參與活動的五十多名學生一起被捕，關在大牢。楊剛後來曾在《自傳》中詳細描述過這段牢獄生涯，她是這次遊行被捕者中唯一的女性黨員，但卻表現出和男性一樣的堅強意志。

楊剛被釋放後，重返燕京大學，1930年冬天，北方「左聯」成立，楊剛作

¹ 轉引自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69。

為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被推選為常務執委。1938年，楊剛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她利用自己在塔斯社工作的便利，把毛澤東的名著《論持久戰》譯成英文版。與此同時，楊剛出版了散文集《沸騰的夢》，其中一些篇章還被權威人士建議編入中學語文課本。¹

(2) 助斯諾編譯《活的中國》

1933年，楊剛離開北平前往上海，一年後再回北平，應邀做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斯諾的助手，編譯一本當代中國新文藝作品選集《活的中國》，負責推薦和翻譯工作。同時應斯諾要求，用英文寫一篇題為《日記拾遺》的小說，收進該選集，署名「失名」。後翻譯成中文易題為《肉刑》，1935年4月15日發表在《國聞周報》上。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以身邊的親人和朋友作模特兒，描寫一對從事地下活動的年輕中共黨員夫妻的悲慘生活。

斯諾對這篇小說作了很高的評論：「楊剛大膽地運用迄今被中國文藝界視為禁區的社會題材，她的勇氣顯示出一種解放精神，勢必使那些認為中國藝術不能以革命氣概斷然與過去決裂的人大為震驚。失名把自己列為『革命現實主義』作家，而《日記拾遺》是這一流派的一個範例。」²後來，蕭乾在《大公報·文藝》推動書評，斯諾《活的中國》一書，就是請楊剛撰寫書評的。

(3) 鼓勵青年用筆戰鬥

在離開北平南下之前，楊剛在《大公報》主辦的《國聞周報》、《榴花文藝》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肉刑》、《殉》、《愛香》、《母難》等，作品主人公都是些苦難的勞動者和革命者，著重反映當時百姓的生活狀態。楊剛的創作，希望以筆

¹ 胡喬木《楊剛文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

² 《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頁140。

爲劍，揭露社會黑暗，喚起人民的覺醒。

楊剛還翻譯並出版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商務印書館)。後來，楊剛還出版了歷史小說《公孫鞅》。

1936年，楊剛進入由北平通俗讀物編輯社辦的《大眾知識》半月刊出任編輯，負責文藝編輯。在創刊號上，楊剛發表了《境與真》一文，討論文學作品的境界與生活的真理之間的關係。她認為「人生的真理，必是爲了生活，而不是生活爲了真理。」鼓勵文學青年用筆去戰鬥，去揭露和改造社會與人生。

(四) 重申《文藝》意旨

1939年9月1日，楊剛正式接替蕭乾，擔任《大公報·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蕭乾任主編時，《文藝》保持著和《大公報》一致的步調，走不偏不倚的紳士路線，楊剛來後，決心把《文藝》由紳士改造成戰士，披上戰袍，環上甲冑，將《大公報·文藝》的戰鬥性再向前推進一步。

《中國新聞事業史》一書，在「香港、澳門和海外華僑的華文抗日報刊」一節，專門提到《大公報》港版，稱：「它的《文藝》副刊，在女作家楊剛的主編下，成爲鼓吹抗戰、團結、進步的號角。」¹

(1) 胡政之告誡「不許過激」

對於楊剛的到來，胡政之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大公報》添了能寫、能譯、能編的生力軍，擔心的是楊剛的共產黨員身份，會給報社惹麻煩。所以，

¹ 丁淦林編《中國新聞事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頁333。

楊剛抵港後，胡政之找她談話，向她講明《大公報》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和超然傳統，告誡她「不許過激」。

楊剛也開始研究《大公報》的整體辦報思想以及副刊的一貫特色，推敲蕭乾赴英之前留下的辭行文章《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楊剛認為《大公報》雖有親蔣(介石)抑共的傾向，但整體的辦報態度還是以鮮明的愛國主義和堅持抗戰為主。她既看到了《文藝》儘量不登雜文，不參加文藝界論爭的傳統，又注意到《文藝》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文藝》在香港恢復後積極宣傳抗戰的種種變化。

在楊剛眼中，《文藝》從七·七事變那天起，就披上戰袍，環上甲冑。在抗戰這面大纛之下，《文藝》站住了它兩年多以來的崗位。《文藝》副刊在香港《大公報》逐漸成為主要副刊，是一片不可多得的抗戰宣傳陣地。

(2) 帥字旗下的一個小兵

1939年9月4日，上任第四天，楊剛在《文藝》發表了自己的就職宣言：《重申〈文藝〉意旨》。楊剛首先肯定，《文藝》已經是一名抗日戰士。並說「對這風雷豹變的局勢所造成的國家需要只有紮著穩步子去替它尋求滿足，它永遠不會忘記它是民族生活的一個關節，帥字旗下的一個小兵(可不是熱血最少的)。它有許多兄弟們，它張開坦白的手心還要抓緊更多弟兄的熱手。」¹

然後，楊剛宣布今後的編輯方針：「一切有心滾進這個大時代的人，他既肯把耳鼓貼在底層上聽見戰馬的驟蹄，又聽見了大地的暗語，就讓他把這些語言有心的寫出來……總之，凡可稱為文章的東西，在《文藝》的哨位上應該是一

¹ 《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4日。

位擊不倒的勇士。他可以明攻，暗襲，奇劫，擊中要害。《文藝》在抗戰上沒有躲避宣傳，今天也無謂標榜。」¹

在這裡，楊剛肯定了蕭乾主持《大公報·文藝》的功績，又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辦刊主張。她希望自己編輯的《文藝》是以抗戰宣傳為宗旨，上面發表的一篇篇文章，應該是一顆顆擊中敵寇要害的子彈。這就清楚地表明，楊剛要進一步改變《文藝》的「紳士」形象，打擊敵人而不被敵人打倒，有如一位跨上戰馬的勇士，馳騁在抗戰宣傳的戰場上。

楊剛在《重申〈文藝〉意旨》中強調：「《文藝》篇幅小，野心卻有一個，它要放映這民族囹圄的一整個，從內心腠理到表皮。」²在當時的狀況下，作為一個全國大報新上任的副刊主編，敢於說出這樣的話，可見楊剛的勇氣。

六、《文藝》(港版) 跨上戰馬

《文藝》(港版)在楊剛接手後，一個顯著特色，是增加了來自敵後遊擊區作家的戰地生活報告。戰時郵遞線路時斷時通，難以保證，但楊剛和敵後戰地作家卻一直保持著緊密聯繫，為廣大讀者輸送大批新鮮、及時、真實的戰地作品。

(一) 展現延安風貌

1939年10月13日刊於《大公報·文藝》的《賀龍將軍》，是沙汀長篇報告文學中的一部分，這篇文章通過賀龍生活片斷的描述，表現了這位八路軍將領思想的深度、臨戰的鎮定、平易近人的作風。這是《文藝》(港版)上發表的直接描寫八路軍將領的重頭作品。

¹ 《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4日。

² 《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4日。

1940年2月起連載的《沁洲行》，是吳伯簫又一長篇散文，同之前刊登的《潞安風物》風格相似，作者通過沁洲之行所見所聞，夾敘夾議，歌頌根據地軍民的鬥爭精神和質樸美德。此外，描寫延安青年開荒勞動生活的《沖洗》，控訴日機空襲延安的詩作《我們播下了血的種籽》等一系列反映延安風情、讚頌革命戰士英勇事跡的作品，陸續登上《大公報·文藝》。

(二) 特約丁玲撰寫《我怎樣來陝北》

抗戰爆發後，許多熱血青年紛紛奔赴延安，欲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中去。國民黨聞訊非常害怕，且懷有嫉恨，就在各個通往延安的要道關口設置關卡，試圖阻撓，實行圍堵。甚至將投奔延安的青年加以逮捕，投入牢獄。

楊剛針對這一情況，特約已經到達延安的丁玲撰寫《我怎樣來陝北》這篇文章，丁玲敘述前往延安沿途的見聞和個人經歷，其中，介紹了如何巧妙地躲避國民黨盯梢的方法。這篇文章的發表，為即將奔赴國統區的青年，無疑提供了若干有益的經驗。

1940年7月13日開始在《文藝》發表的《夜歌》，11月23日的刊出的《我們的歷史奔跳著》、1941年5月5日發表的《叫喊》，均為何其芳抵達延安之後創作的詩歌。其中《夜歌》分四次連載，為《文藝》(港版)三年來發表的最長詩作。

相比以前在《文藝》(滬版)發表的詩歌，這一時期的何其芳新作，經受了延安烽火對身心的洗禮，從內容到形式都作出新嘗試，詩風開始蛻變。反映了一

個青年詩人在時代風雲召喚下，走出「小我」融進「大我」，貼近民眾、貼近生活的一種努力。雖然在藝術上顯得稚嫩，但何其芳用詩表達的情感卻是真誠的、健康的，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對國統區的青年，帶來積極影響。

(三) 揭露腐敗黑幕

除了正面宣傳黨的政策方針，歌頌敵後軍民的感人事跡，楊剛在主編《文藝》時，還大膽揭露國民黨當局黑暗統治和腐敗黑幕。

1939年11月1日，《文藝》刊出蘆焚的散文《風波》，揭露在民族危亡之時，「有人專門靠著散布謠言為生」的現象，揭露他們唯利是圖，棄國家命運、民族存亡於不顧的醜惡嘴臉。1940年1月17日刊出的艾蕪作品《難民哀話》，描述了擁擠在桂林這秀山麗水下窮苦難民的悲慘生活，暴露了號稱「模範省」的廣西，不為人知的陰暗一面。

1940年1月29日見報的《寄給》，將國統區警察殘暴無理、蠻橫對民的醜惡行徑全面曝光。1941年1月27日至2月7日，《文藝》還發表了《劉訥鷗之路》，是黃鋼寫的報告文學，文章敘述了劉訥鷗由追求享受到淪為漢奸，最後被人刺殺的整個過程，揭示漢奸之醜陋及其生命的危險。雖然作品中的人物不是以延安為背景的，然而卻是黃鋼到了延安之後，立足新的生活高度，重新審視過去發生的人與事而寫作的。

學者吳廷俊認為，「這樣的作品發表，其實已遠遠地超出了《文藝》的範圍。」

¹吳廷俊所指，主要是《劉訥鷗之路》發表的政治意義和現實的警示作用。

¹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頁351。

(四) 通訊——連線延安

1940年3月17日,《文藝》(港版)發表了《記延安文協代表大會》,是庄棟的一篇長篇通訊。文章分三大部分,其一,新年,新春、新文化;其二,嶄新的陝北文化陣營;其三,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而奮鬥。詳細地披露了延安文協代表大會的盛況。

1941年1月在《文藝》(港版)連載了《抗戰期中的「日後」文藝》,是沙汀寫的長篇通訊。該文對延安的文藝活動進行了系統總結,對「延安文協分會」、「魯迅文藝工作團」、「西北戰地服務團」等文藝團體及其主要成員,進行了詳細介紹。

在總結「文協分會」活動時,沙汀著重介紹了吳伯簫、何其芳、卞之琳、蕭三等在晉西北、冀中、晉東南各根據地的工作情況。談到「魯藝」工作團時,沙汀還重點介紹了幾個具有寫作能力的後起之秀,包括梅行、黃鋼、楊明、葛陵等,以及工作團的領導人——陳荒煤。此外,文中還介紹了丁玲、吳奚如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

沙汀《抗戰期中的「日後」文藝》的最後,寫道:「像上面舉出的幾位作家所走過的道路,因為工作是多方面的,方法也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夠,而且也不應該要求一切作家都像他們那樣,但在創作的意義上,我個人卻毫不遲疑地在他們身上多寄托以大的希望。」¹

¹ 沙汀《抗戰期中的「日後」文藝》,香港《大公報·文藝》,1941年1月。

(五) 副刊作品趨單一化

在《大公報·文藝》的園地裡，相比沈從文「莫輕視技巧」的「精耕細作」，相比蕭乾的「尋寶式」的「永不讓佳作漏在網外」，楊剛顯然更看重的是作品中洋溢的革命激情，作品的技巧反倒在其次。從她本人的作品來看，從她編輯的《文藝》(港版)來看，楊剛對技巧的輕視，都有跡可尋。

(1) 楊剛不重視技巧

楊剛雖然發表了不少文學作品，包括她的代表作、長詩《我站在地球中央》，發表在蕭乾主編的《文藝》(港版)，寫得激情澎湃，但作品的語言缺乏錘煉，結構方面也稍顯鬆散和粗糙，給人的印象不深。有評論認為楊剛「單一的革命激情，不能代替詩人豐富的感情。」¹

楊剛自己則辯稱：「我這人十分空想，也十分貼實，矛盾到極點；對於提煉兩個字，犯了習慣的不耐煩，因此素來避免保存詩思、寫詩這些字。」²

楊剛說的另一段話，說得更直接，「我要做的就是一隻號筒，一隻掛著紅綢子對著太陽高唱的號筒。我只望我能夠吹出宇宙的心音，我只望這號筒上發出來的粗號，能引得地心的精靈點首。別人以生命動作，原野村莊的演出鋪陳他們的錦艷，我則只要吹號，吹出生命遍在的秘密。」³

我們不僅從楊剛的作品，看到這隻「高唱的號筒」，她接手後的《文藝》(港版)，因偏重內容而輕技巧，也逐漸變成另一隻掛著紅綢子「高唱的號筒」。

¹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 69。

² 《楊剛文集》，人民出版社，頁 35。

³ 《楊剛文集》，人民出版社，頁 35。

(2) 共產黨的機關報？

楊剛接編後，《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版面，幾乎被延安的作家所『佔領』。¹前《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的兒子王芝琛，特意做了個試驗。他有一位朋友對《大公報》成見很深，聽說解放前的《大公報》對國民黨蔣介石「小罵大幫忙」，因此誤以為《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機關報。當王芝琛將一份份楊剛當初主編的《大公報·文藝》港版，拿到這位朋友面前時，他驚呼：「怎麼《大公報》又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²

為何同是刊登延安作品，楊剛編的《文藝》(港版)會予人共產黨的機關報的感覺，而蕭乾時期卻沒有予人這種印象呢？

一說指因為楊剛編《文藝》刊登延安作品多過蕭乾。從總量上看，《文藝》(港版)共刊出延安作品一百一十八篇，蕭乾時期，刊四十四篇，楊剛時期，刊七十四篇。考慮到蕭乾當年只在香港工作一年，從1938年8月—1939年8月，而楊剛在香港工作二年又九個月，1939年9月—1942年1月，楊剛經手刊登在《文藝》(港版)上的延安作品，按時間平均分配，刊登延安來稿的密度，楊剛主編時期其實未多於蕭乾主編時期。

這種誤解的產生，說明楊剛編《文藝》(港版)，內容相近，稿源單一，因而談起楊剛主編副刊發表什麼作品，人們印象最深，還是延安文藝。而講起蕭乾，除了延安作品，人們還會想起大後方的作家作品，會想起「清算日本」等一系列給人啓迪、鼓舞士氣的文章，會想起《文藝》(港版)的綜合版和國際化。

¹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70。

²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70。

(3) 長篇通訊顯沉悶

像楊剛在《文藝》(港版)強力推出莊棟的《記延安文協代表大會》和沙汀的《抗戰期中的「日後」文藝》，這些類似新聞報道的長篇通訊，純介紹性的文章，在以往蕭乾的《文藝》中較少刊用，也不大可能通篇連載。因為作品本身非文學作品，更像一種工作報告或工作總結。雖然是介紹延安的文藝活動，但畢竟平鋪直敘，藝術加工欠奉，對大多數讀者而言，略顯沉悶。

這種長篇大論，不大適合在篇幅有限的報紙文藝副刊刊登。作為編者的楊剛，顯然沒有像她的前任蕭乾一樣，肯花心思去體味報紙文藝副刊這種特殊載體的長處與短處。

七、兩次討論激起千層浪

1939年10月，《文藝》借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之際，在香港文藝界發起了關於「民族文藝」問題的討論，當時香港文化名人許地山、劉火子、黃文俞、郁風、劉思慕等十餘人參加了座談會，楊剛主持會議，她就「民族文藝」這一議題作了解釋。

(一)「民族文藝」成為香港文藝界中心議題

這場由楊剛發起的關於「民族文藝」的討論，對引導香港文藝向抗戰救亡的方向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在座談會上，與會者從不同角度闡釋對「民族文學」的看法，大家認為民族文學應是「抗戰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是「現階段和中國文藝的將來所必要的一條路」，應「利用各種舊形式和外來形式，創造

新的民族形式」。

不少發言者認為，對這類重大的而又極能引人興趣的問題，展開討論是必要的，並希望像《大公報》這樣有聲望的報紙副刊今後多召集一些這樣的研討會。

這次座談會的紀要，在《文藝》上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民族文藝」一度成為香港文藝界的中心議題。楊剛在此基礎上，又及時擬出兩個討論題目：「文藝之民族形式的創造問題」、「新文藝外來影響的估價和清算」，把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並使之具體化。《文藝》還特別拿出五個版次發表討論文章，黃文俞、杜埃、黃藥眠、袁水拍等人都有討論文章在《大公報·文藝》發表。

(二) 反對「新式風花雪月」

一年後，楊剛又發起「反對新式風花雪月」的討論，在香港文學界引起更為熱烈和廣泛的反響。1940年10月1日，楊剛在《文藝青年》第二期發表了《反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一文。

當時，內地抗戰硝煙四起，而香港流行著一種危險的論調，說香港是一個「世外桃源」。這不僅麻醉香港青年，也與全國抗戰大局很不協調。許多幼稚的文學青年受這種論調的影響，也出現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許多文章都是在「懷鄉病」下寫出來的。楊剛稱：「這些寫文章的人的情緒，大都在一個『我』寫的統率之下，發出種種的音調。多半的人是中了懷鄉病的，想著故鄉。」¹

¹ 《文藝青年》第2期，1940年10月1日。

這一場討論，打破了香港文壇相對平靜的局面，文章針對盛行於香港文壇的萎靡之風，指出「這類文章除了對祖國的呼喚在某方面能夠引起相當共鳴而比較有益以外，別的都可以風花雪月的自我娛樂概盡。風花雪月，憐我憐卿，正是這類文章的根底。不過改了新的樣子，故統名之曰『新風花雪月』」。

楊剛文章一經發表，香港文壇立刻作出強烈反應，十餘家報紙參與了討論，前後共發表了九十多篇文章。在討論最熱烈時，《大公報·文藝》自1940年11月13日起，用了一周時間，舉行關於「新式風花雪月」的討論筆會，邀請香港「文協」的許地山、喬木(喬冠華)、黃繩諸等名家執筆撰文，引導討論方向。

(三) 兩次「論爭」顯鋒芒

對於這兩次楊剛策劃的論爭，有多種評價，有的欣賞其敢於主動進攻的「騎士」作風，向一切「風花雪月」、「憐我憐卿」的萎靡之風開戰，也有的稱楊剛當年過激的言詞，傷害了一些香港青年的自尊。¹但不管怎樣說，拉近了《大公報·文藝》與香港作者和讀者的距離，擴大了在香港本地的影響力。

從一個編輯角度，能夠抓住時代的脈搏，適時提出文藝界同行和廣大讀者共同關心的問題，能夠挑起話題，引發媒體參與熱烈討論，同時主導輿論，使她所編的《大公報·文藝》備受各界矚目，在這一點上說，楊剛做到了蕭乾沒有做的事。

楊剛另一樣超越蕭乾之處，是這兩次論爭都是圍繞香港問題、邀請香港專家和香港媒體共同參與。各方反響激烈，一方面說明《大公報》這張外來的報紙開始在香港紮下根，有了「江湖地位」，一方面也說明楊剛推動《文藝》「本

¹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70。

土化」策略，初見成效。一張大報，既要有全國的影響，在它的出版所在地，也需要有聲音、有回響。

應該看到，通過這兩場由《文藝》(港版)主動發起的「民族文藝」和反對「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楊剛試圖改變蕭乾保持的不捲入文藝界內部論爭的傳統，楊剛所編的《文藝》，也開始擺脫以往的紳士風度，在時代的洪流中，日益顯示出鋒芒。

(四) 關注香港學生界

除了《文藝》副刊，楊剛在《大公報》還主編《學生界》副刊，這是一個專門面向青年讀者的刊物，發刊於1939年4月，之前由蕭乾主編。

楊剛接手後，《學生界》由原本「中級文藝」性刊物，轉變為記述和討論學生生活、學習問題的進步刊物，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歡迎。在接手《學生界》不久，楊剛就發表了重要啓示，為刊物重新定位：為了溝通全國學生界的思想、情緒、智識，報道他們的生活、組織與工作。

為了推行這一方針，楊剛特請教育界合作提供下列稿件：淪陷區學生生活報道，大後方和邊省學校狀況及學生組織訓練生活，游擊區的戰時教育狀況，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狀況與工作。

身在香港，楊剛特別關注香港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狀況。從抗戰教育到級會、導師制、考試以及學生生活等一系列大小問題，楊剛在《學生界》均有涉及，通過互動的方式將副刊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拉近再拉近。暑假將至，楊剛請名家為學生開列暑假讀書數目及提要，並發起「暑假生活報道」徵文活動，為了使

香港學生關注生活、熱愛生活，《學生界》特地發起「牆頭寫生競賽」，規定篇幅千字上下，內容以物以地以人為對象，聘請知名作家任評委，選出優秀作文予以獎勵。

1939 年底，楊剛還發起「新年徵文」活動，邀請讀者對《學生界》進行檢討，寫出他們「誠摯的批評和願望」。楊剛專門為學生闢《大家談》專欄，一般由學生提問，楊剛以編者身份作答，循循善誘，不板起面孔訓人，很快，這個專欄成為了文學青年的知心友。楊剛在香港《大公報》擔任副刊編輯的兩年零九個月裡，用她的智慧和熱情，盡量拉近報紙與讀者之間的距離，進而引導讀者的思想。

八、楊剛接手《文藝》(桂版、渝版)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突然發動突擊，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到一個月，九龍棄守，香港被日軍佔領。大街小巷遍佈特務密探，楊剛本人也被列入黑名單。

1941 年底《大公報》(港版)自動停刊。全體同人向讀者宣誓：在任何磨折威脅下，將決不屈服。1942 年 1 月 25 日，楊剛化裝混出香港，轉移到東江敵後根據地。三個月後，楊剛再次秘密轉移，經惠州、韶關到達桂林，輾轉來到桂林星子巖下的《大公報》桂林館，胡政之熱情地歡迎她，並請她主持《文藝》(桂版)副刊的工作。

以下是楊剛編《大公報·文藝》時間表：

時間	編輯版面
1939 年 9 月—1941 年 12 月	《大公報·文藝》(港版)
1942 年 6 月—1943 年 10 月	《大公報·文藝》(桂版)
1943 年 10 月—1944 年 3 月	《大公報·文藝》(渝、桂版)

如果說，楊剛接任《文藝》(港版)編輯，主要是得力於蕭乾的推薦，那麼，楊剛後來出任《大公報》桂版、渝版的文藝副刊，則更多的是她個人的努力成果。說明楊剛以自己的實際工作表現，打消了《大公報》高層的顧慮，特別是贏得胡政之的信任，獲得《文藝》作者和讀者的信任與支持。

(一)《歸來獻辭》重申方針

1942年6月1日，楊剛從張蓬舟手中接過《文藝》(桂版)，當日在《文藝》(桂版)發表《歸來獻辭》，重申編輯方針：「我們已經走過了一條道路，現在，這條道路依然是一切真實的寫作者，真實地生活在民族戰爭中的人們所共走的。我們沒有理由脫離它，也沒不能脫離。或者，近在國人的身邊，我們將有幸歌頌更多的壯烈和英勇，同時，也不能面對戰爭所帶來的種種災難和苦痛，閉上眼睛，裝著無情。」

楊剛稱：「我們依賴著師友和讀者，依賴著一切真實地生活著的人們更多的力量、精神和熱情。……一個嶄新的世界在戰爭外面閃著光芒，雨季快要停止了。走完這一段泥濘的道路的日子是不會太長了的。有誰能使陽光不鋪滿草地，誰能使江流不如海洋？」¹這篇文章堅定地宣告《文藝》(桂版)將一如既往地站在文化界的前沿，走香港時期開闢的道路，宣傳抗戰，教化民眾，揭露黑暗，歌頌光明。

楊剛和她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即便在日軍侵華最猖獗的時刻，仍保持樂觀精神和必勝信念，堅持用文字向讀者預示著勝利的曙光即將到來。

¹ 桂林《大公報·文藝》，1942年6月1日。

(二)《東南行》深入戰地

1942 年秋，一位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邀請楊剛，一同深入戰地調查採訪，於是楊剛提前編好足夠兩個月用的《文藝》(桂版)稿件，從 1942 年 7 月開始，兩人結伴前往東南戰地，行程遍及湘、贛、閩、粵四省，歷時兩個月，楊剛共發回十餘篇戰地通訊，在《大公報》桂版和渝版刊出，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楊剛這一批戰地通訊，後來收集在《東南行》的集子中。

(三)兼任《大公報》的外交記者

1943 年，楊剛奉命到達戰時陪都重慶，主編重慶、桂林兩地的《大公報·文藝》，並兼任《大公報》的外交記者。1943 年 10 月 31 日，《大公報》渝版刊登《啓事》：鑒於本報渝、桂兩版副刊統籌辦理，《戰線》即日停刊，並自 11 月 7 日起，每周改出《文藝》一次，渝桂兩版同時刊出，由楊剛女士主編。

楊剛精通英語，談吐不凡，在重慶外國記者圈很快打開局面，她的才幹也很快獲得各方的賞識。一方面，由於楊剛將自己主要精力，集中於做外交記者，一方面由於《文藝》改為周刊後，刊期長，篇幅小，再加上皖南事變後，重慶文藝界情況複雜，故這一時期《大公報·文藝》副刊，與香港時期相比，影響要小得多。

(四)《美國通信》風靡一時

在重慶工作一段時間，1944 年 3 月，楊剛接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並得了免費一年的優惠條件。楊剛也希望利用這次機會，實地考察研究美國社會。楊剛遂於 1944 年的夏天，隻身前往美國哈佛，她選修了小說、

文學批評。

1945年6月,《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參加完聯合國成立大會後,特意從舊金山來到紐約,正式委派楊剛為《大公報》駐美記者。接下來,楊剛便以《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身份,參加了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記者招待會,並被作為第一個參加此會的中國女記者介紹給杜魯門。

楊剛在美國將近四年,經常深入民間,切身感受,為《大公報》寫了四十多篇《美國通信》,有些還被分成上、中、下篇連載,成為傳誦一時的著名專欄,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和歷史地位。其中《蓓蒂》被認為是楊剛美國通信中的代表作,文章不僅成功塑造了一個典型美國青年女性的形象,而且反映了美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從精神到物質。

三十多年後,從大陸到台灣,成為台灣筆會中心主席的陳紀滢,仍對楊剛的《美國通信》稱讚有加。他說:「內容充實,分析深刻,文字也生動有力,足有一兩年之久,楊剛所寫《美國通信》為戰後《大公報》馳名的專欄,吸引了無數讀者,也增高了《大公報》不少聲譽」。¹

楊剛的所有《美國通信》與部分赴美期間通信,後來收集在《美國札記》一書。和蕭乾一樣,楊剛對《大公報》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副刊編輯,外交記者,駐美記者,楊剛樣樣幹得非常投入,表現出色。楊剛讓《大公報·文藝》(港版)成為抗日哨位上的勇士,她留下的戰地通訊《東南行》和發自美國的《美國札記》,風靡一時,為《大公報》贏得了榮譽。

¹ 陳紀滢《抗戰時期的〈大公報〉》,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270。

第七章

《大公报·文艺》走进历史

由沈從文主編《大公报·文艺副刊》，蕭乾、楊剛接力主編滬、港、桂等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到抗戰勝利後，已有多年的歷史，在文藝界影響深遠，擁有的讀者、作者眾多，成為《大公报》這張「名牌」報紙中的「名牌」。

《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成功，主要原因，是不黨不群、不偏不倚、專心辦報。在報紙政治化和商業化之間，走了一條注重文學作品的純文藝之路，在作家分成左翼和右翼兩大陣營之間，走了一條與政治保持距離的中間路線，為報紙文艺副刊闢一條新路徑。

《大公报》文艺副刊團結了廣泛而有影響的作家為刊物寫稿，嘔心瀝血為文壇「育苗」，致力培養年輕作者，使《大公报》文艺副刊始終保持了較高質量，編出了自己的特點和風格，在中國報紙副刊中脫穎而出。

另一重要原因，是《大公报》用人、培養人眼光獨到，唯才是用。首先邀請文壇名家沈從文主編《文艺副刊》，將《大公报》文艺副刊品牌在文藝圈打響，為繼任者建立一個高素質的作者網，為文艺副刊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後邀文壇新星蕭乾接力主編，為《文艺》注入時代氣息，步向年輕化，大張旗鼓地推廣書評，讓副刊站在推廣文化、普及知識的新高度。在抗戰的大旗下，《大公报》打破常規，任用有黨派背景的楊剛主編《文艺》(港版)，使《文艺》成為抗戰文艺作品的重要陣地，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

沈從文、蕭乾、楊剛的名望和才能，有助於《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報界崛起，躋身當時第一流的報紙文艺副刊。而《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工作平台及讀

者網絡，又反過來，提高了沈從文、蕭乾、楊剛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特別是蕭乾、楊剛，在新聞界、文藝界，從無名到有名，從小家到大家，《大公報》是一個重要的台階。

一、《文藝》見證傳媒生態變化

如果說，《大公報》百年榮辱毀譽，是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一個縮影，從一個側面見證了中華大地的百年風雲和滄桑巨變的話，作為《大公報》的一部分，《文藝》也見證了中國政治生態的變化，見證中國各地的新聞管制與變遷。

《文藝》是《大公報》一個跨越抗戰時期的文藝副刊，相比社論、新聞，副刊與政治的關係不算密切，但在《文藝》出版的歲月，無論是在天津、上海，還是在香港，也受到各種限制和制約，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蕭乾 1939 年離開香港赴英時，回首過去四年在《大公報》編副刊的經歷，他感慨：「這四年來，我目睹並親歷了大時代中一家報紙的掙扎。當日在華北當局委屈求全的局勢下，一個必須張嘴說『人話』、『正派話』的報紙，處境的困難是不下於目前上海(指當時淪陷區的上海孤島)同業的。一個炸彈放在門口了，四個炸彈裝在蒲包裡，一直送到編輯室裡來了。我看見社長和同事臉上的苦笑。炸彈從沒使這家報紙變色。《文藝》雖是一個無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到一份厄運。」¹

(一) 天津：法國巡捕問罪

蕭乾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間不算短，跨越了抗戰前夕、全面抗戰展開

¹ 香港《大公報》，1939 年 9 月 1 日。

後以及勝利初期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刊物都是在洋人鼻子底下編的：天津的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香港英國殖民統治。由於刊物登了不順他們眼的文章，天津法租界的黃毛巡捕曾到編輯部來興師問罪；在上海，曾受過工部局法院的傳訊；在香港，刊物多次開天窗。1946 年的上海沒有了工部局，可是仍然有「書報審查處」，動輒就挨黃牌警告。刊物不大，惹起亂子還不小。

蕭乾最初加入《大公報》做副刊編輯，當時《大公報》設在天津法租界牆子河附近。在天津法租界編《大公報》副刊，除了明文規定的「赤化」、「反日滿」的禁款外，還提不得法蘭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任何掛三色旗的地方。

1935 年秋的一天下午，一個唇上留著一小撮口髭的法國人闖進報館，帶著個可憐巴巴的翻譯。一進門就嚷：「你們頭兒出來」。幸虧《大公報》經理胡政之在辦公室，趕緊出來問明情況。原來是蕭乾在《文藝》上發了一篇描寫安南的文章，得罪了法國老爺。這個法國巡捕房的小官，把手中的警棍使勁地在桌上敲。巡捕走後，胡政之對蕭乾說「以後可得當心點」，沒有一句責備¹

（二）上海：工部局下傳票

後來到了上海《大公報》，蕭乾只編了一年多《文藝》——1936 年春至 1937 年「八·一三」。亂子可出了不少，首先是國民黨下的警告，前後下過三回，其中有一回令人啼笑皆非，起因是《文藝》出了「弱小民族文學」特輯，當時的「弱小民族」指的是今日東歐，中國那時本身就是個任人欺凌的「弱大民族」，同病相憐，編者不知何罪之有。

¹ 蕭乾《懷念胡霖先生》，《蕭乾文集》第 5 集，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31。

上海環境複雜，蕭乾編《文藝》，除了應付文壇上的四陣八營，種種人事微妙關係外，還要揣度檢察官的眼色。那時新聞送檢，副刊可免檢。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編者事後的責任。

蕭乾嘆息：「當一位故都的作家責《文藝》下了海時，上海一些朋友正指著我們爲『謫京派』，當進步批評界質備我們太保守消沉時，南京中央黨部的警告書也送到了。」

當年，上海《大公報》設在所謂「公共租界」，即英日美三國共管的地方。日本侵略中國，在當時是創作界最突出、最迫切的主題。刊物編者有個通用的辦法，就是文章照登，只把犯禁的字樣一律打「XX」，一方面讀者可以看懂，一方面報刊檢查官抓不到把柄。當時，一個編輯在看刊物大樣時，他首先要做的，不是發現與原稿的出入，而是充當自己的檢查官，看打「X」子打得到不到家。

但是有一回，蕭乾發覺這辦法不靈了。1936年8月16日，蕭乾在《文藝》的《戲劇特輯》上，刊登了陳白塵以抗日爲題材的獨幕劇《演不出的戲》，這是一齣戲中戲，總共五千字，寫得很有力量。控訴在不抵抗主義重壓下，連帶有抗日色彩的戲也不准上演的痛心事實。

劇中人悲憤地說，在北方(指華北偽政權)不許演抗日戲《沈陽之夜》，說「妨礙邦交」，可是到了南方(指蔣政權直接統治的地方)仍舊不許演，連「東北是中國的」這句無可厚非的台詞，居然也得刪掉，所以他們憤然說：「戲演不下去了！」巧妙借戲中人之口，直截了當地向南京政權提出抗議。¹

¹ 上海《大公報》，1936年8月16日。

蕭乾在發排這個劇本之時，照例把一切犯忌的字全都打上「XX」，例如文中「日本軍衣」就成了「XX 軍衣」，全文多次出現東洋人的字樣，「東」字一律打成了「X」，蕭乾滿以為沒事了。這一期的《文藝》出版不久，工部局就給《大公報》下了傳票，租界的日本當局提出起訴。先後傳訊過三次，都是報館主筆張季鸞出庭。張季鸞咬定一點：文中犯忌的地方全打了「X」，所以罪名不成立。

事後，張季鸞得意洋洋地敘述他在庭上慷慨的對答：「X 洋人」怎會是「東洋人」？它也可以是「西洋人」甚至「南洋人」。《大公報》此次官司沒敗，蕭乾深感並非自己打「X」打得到家，而是主筆的巧舌如簧。

（三）香港：刊物常開天窗

1938 年至 1939 年蕭乾在香港《大公報》編副刊，又嘗到了殖民地的滋味。這裡不但講抗日犯忌，對殖民地或殖民制度的任何揭露，也是不允許的。

當時，香港報紙各版的清樣，都必須送殖民官審查，他只要在任何一條新聞或文章上打個「禁登」的戳，或甚至隨使用紅鉛筆打個「X」，報館就得把它抽出來。

那時戴望舒在香港編《星島日報》的文藝副刊。蕭乾與戴望舒兩人相約：如遇文章禁登，就盡可能讓它空著，不補旁的文章，好讓讀者領教一下香港有多麼民主。刊物上的空白，當時的行話叫「開天窗」。如果翻翻那個時期的報紙，《大公報》與《星島日報》的文藝副刊，天窗的確開了不少。

有一天發完《文藝》的稿，蕭乾過海到九龍一家電影院去看一齣音樂電影。正看得出神時，忽然，蕭乾的胳膊猛地被人攔住了，硬把蕭乾從黑乎乎的影院拽出來。原來當日下午蕭乾所發的副刊稿子全部給扣了。編輯部拿不出東西來頂替，只好派出兩位小同事到處找人，要蕭乾趕快回去再補發一期副刊。

這種種的官方磨難，到了楊剛接編《文藝》(港版)時更加變本加厲，1939年9月，乘船赴英國的蕭乾，從蘇伊士寄給《文藝》一篇揭露西貢殖民者的報告《坐船犯罪記》，到了文章在副刊登出時，已被砍得面目全非。

(四) 魯迅逝世的短評風波

編副刊除了要應付來自官方的管制之外，還得受到報社內部各種因素的影響，副刊雖獨立一版，但它始終隨報紙一起發行，是報紙中的一張。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蕭乾正在上海編《大公報·文藝》，聽到噩耗後即趕往魯迅生前位於大陸新村的寓所，了解魯迅彌留及病逝的經過，以及治喪委員會的組成，並趕回去協助《大公報》要聞版編魯迅事略，一直忙到深夜。

第二天，10月20日，蕭乾打開報紙，從版面看，上海《大公報》對這一噩耗的報道似乎很重視，佔了要聞第四版的大半篇幅，用了多幅圖片，另配力群的木刻。

就在同一天，在《大公報》第四版下欄有篇短評，題為《悼魯迅先生》，文章首先稱文藝界巨子魯迅(周樹人)先生昨晨病故於上海，這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接著寫道：「他已是世界文壇上的有數人物，對於中國文藝界影

響尤大。自《吶喊》出版，他的作品風靡一時。他那不妥協的倔強性和那疾惡如仇的革命精神，確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風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劃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年不少不良影響。」

這篇《短評》刊出後，立刻在上海引起「軒然大波」，在報館內部也引發不少爭議，蕭乾甚至一度想辭職不幹了。

蕭乾回憶：「那天的《大公報》出版後，上海文藝界當然群情憤慨。我除了憤慨之外，還感到背後被人捅了一刀。放下報紙我就去找胡政之質問，並表示這個文藝版我編不下去了，老闆說他實在不知情，要我冷靜一下，容他去調查。當時巴金自然也十分氣憤，他給我以支持，說辭職不會叫你餓飯，可以給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屠格涅夫。下午，胡政之找我談話，他承認短評寫得不對，但不肯透露是誰執筆，只說短評是凌晨看大樣的人根據當日新聞臨時寫的，並不像社論那樣事先經過周密的討論研究，說追究既往於事無補，你辭職也不是辦法。事情既然不幸發生了，還是先考慮一個彌補的辦法。」¹

於是，蕭乾提出由報館在顯著位置刊登啓事道歉，胡政之表示很爲難，而且也不好措辭。最後，蕭乾又提出在《文藝》版上刊登啓事道歉，不署名的——即是也帶有社論性質——悼念文章。這個補救方法，胡政之同意了。

蕭乾就在1936年10月26日《大公報·文藝》版正中央闢個四欄高長方形的專欄，上頭是司徒喬畫的魯迅遺容，用大號楷體（專欄以外是新五號鉛字），登了一篇不署名的悼文。

悼文稱：「五十六年的苦鬥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黃土坯下，寧謐地安息了。」

¹ 《新文學史料》第2輯，頁133。

但我們堅信他仍以一種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態永恆地存在這個世界上。只要還有不甘心作奴隸的人，就會追隨他那堅實榜樣，為著貧弱的中華民族搏戰下去。」

1

事後，胡政之為了說服蕭乾打消辭意，又找蕭乾談了兩次話，其中一次，他談到自己辦報的奧秘，稱早年留學日本，辦《大公報》，心裡總拿《朝日新聞》作榜樣，得兼容並蓄。一家報紙心目中絕不可單純只有一種讀者，那樣銷路就不會大，影響也就有限了。現在這十四版報紙，各有各的讀者，這個《文藝》版是給青年讀者看的。這番話，蕭乾理解為副刊的政治取向可以與新聞版有所不同。

（五）《大公報》的副刊管理和用人哲學

從吳宓編《文學副刊》到沈從文編《文藝副刊》，副刊的編輯部都不在報館，編輯也不是報館中人，但《大公報》對這些館外人員高度信任，他們編的稿、畫的版樣，不需審稿和改動，就可以直接進入排版程序，原封不動地依樣刊出，顯示了《大公報》重人唯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理念。

（1）尊重編輯 業務放手

蕭乾在編《文藝》的過程中，雖然多次遭受來自租界、官方的審查和留難，但《大公報》高層從沒有因為這些副刊惹的「亂子」，而責怪編輯，顯示《大公報》對副刊的管理，比較寬鬆和放手，尊重編輯，維護編輯的權威。南京下警告，工部局來傳票，令《大公報》總經理張季鸞多次出庭，總經理胡政之都沒埋怨過編輯蕭乾半句。

¹ 《大公報》，1936年10月26日。

蕭乾在回憶錄裡，多次談到《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對自己工作的信任、支持和放手。無論是在天津大刀闊斧改造《小公園》，還是在上海、昆明、香港編《文藝》，都可以按自己的理想，設計副刊路向。尤其是 1938 年到香港編《文藝》，因為綜合版創版，為宣傳抗戰，打破了多年的純文藝框框，受到一些老作者、讀者的質疑，沒有胡政之的默許，蕭乾的改革舉措，不可能這麼順利。

（2）爲了人才拋開政見

對於與自己信仰不同、與報社立場不同的「赤色分子」楊剛來編《文藝》(港版)，胡政之儘管一開始不大願意，但既然接納了蕭乾推薦的人選，唯有全力支持。在日常工作中不僅沒有任何留難，反而後來再請她編《文藝》桂版和渝版文藝副刊，做到了只問人才，不問黨派。

1943 年胡政之訪英，到劍橋大學看望蕭乾，幾次稱贊楊剛「真是人才」。楊剛從編副刊開始，進而寫通訊和社評。蕭乾當時感嘆：「胡霖不是共產黨員，那時也並不靠攏共產黨。他是把『才』放在黨派之上。」¹

1944 年 3 月，楊剛接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並得到了一年免學費的優惠條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空前增加，國民黨當局擔心留美學生歸國後，向政府要民主，爭自由，規定凡申請赴美留學者都要進中央訓練團受訓。楊剛辦的是去哈佛大學留學的護照，也是需要受訓的。但楊剛覺得自己是共產黨員，憑甚麼要接受國民黨的訓，宣稱：「我不去美國了，因為我看不起國民黨，我不受他們的訓。」²

¹ 蕭乾《懷念胡霖先生》，《蕭乾文集》第 5 集，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32。

² 《〈大公報〉名記者叢書·楊剛卷》，《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頁 20。

胡政之聽說了楊剛出國受阻的原委後，主動向楊剛表示這事由他來辦。後來胡政之親自出面，弄到一張蔣介石的手諭，特准楊剛不用受訓。楊剛遂於 1944 年夏天，隻身前往美國，追求自己的理想。

（3）培養多面手

「倘若不是當時的香港《大公報》胡霖的堅持，1939 年我很可能就不去英國了。」¹事隔多年，提起英國之行，蕭乾對胡政之仍心存感激。

當時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聘請蕭乾的條件比較苛刻，年薪二百五十鎊，還要交稅，路費得自籌，合同只訂一年。即便蕭乾能借到這筆旅費，滿了一年合同若不獲續訂，蕭乾也得背上一筆不小的債務。當時，去過英國的朋友，都勸蕭乾去不得。

後來，胡政之聽說了這件事，把蕭乾叫到辦公室，滿口答應：旅費由報館先墊上，以後蕭乾用通訊稿來還。不巧的是，蕭乾剛從《大公報》領到的旅費，半夜又被賊給偷去了。蕭乾急得滿頭大汗，心想這下可去不成了。但胡政之卻神色泰然地說：「叫財務科再給你補上一份。」²

臨行，胡政之對蕭乾說，歐戰是打定了，報館要你去，就是在那里先放上顆棋子。被人當作棋子，當時蕭乾心裡有點不是滋味，日後蕭乾才認識到，搞事業就得像一名棋手那麼精明，要幹著今天，想著明天。

¹ 蕭乾《歐戰雜憶》，《蕭乾文集》第 4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400。

² 蕭乾《歐戰雜憶》，《蕭乾文集》第 4 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 400。

新記《大公報》在用人方面，今日看來仍是高明的棋手。蕭乾出任副刊編輯時期，《大公報》提供機會讓他出外採訪，嘗試寫旅行通訊，這才有了《魯西流民圖》、《滇緬路》等傳誦一時的特寫佳作。爲蕭乾在二戰時期，寫下膾炙人口的《紅色的七月》、《銀風箏下的倫敦》、《矛盾交響曲》等戰地通訊，打下堅實的基礎。1946年蕭乾回國後，《大公報》還讓蕭乾出任社評委員，發揮蕭乾研究國際問題的專長。今日，人們稱蕭乾是世界聞名的記者、卓有成就的作家、翻譯家、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大公報》的多方栽培，應記一功。

《大公報》不僅栽培蕭乾，對楊剛也是一視同仁。1942年楊剛在桂林《大公報》編《文藝》時，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找到楊剛，希望介紹一名翻譯陪同赴戰地採訪，楊剛本人也一直有去戰地採訪的想法，於是徵得《大公報》高層同意，奔赴戰地，發回《東南行》等十多篇通訊，在《大公報》桂版、渝版刊出，反響很大。1946年，胡政之赴美，又聘請正在美國留學的楊剛任《大公報》特派記者，撰寫美國通信，令《美國農民生活又一角》、《蓓蒂》等美國通信，成爲《大公報》名牌專欄，風靡一時。

胡政之曾經說過，「我不用已經成名的大文人，這種人要一陣便走了。」¹《大公報》挑選人選取那些可以栽培的青年人，用人精選，人數不多，基本上沒有聖(剩)人賢(閑)人，每個人都在實踐中鍛煉，培養成爲多面手。從蕭乾、楊剛的成功個案來看，《大公報》在副刊管理和人才培養上，有其獨到之處，有智慧，有胸襟，有眼光。

二、 抗戰勝利後的《大公報·文藝》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先後恢復上海版、香港版，在這兩個版上，首先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312。

恢復的就是《文藝》副刊，顯示《大公報》對《文藝》副刊的信心和厚望。爲此，胡政之還於1946年9月特別邀請沈從文，與楊振聲、馮至一起主持《大公報·星期文藝》。又於1946年夏，邀請蕭乾與劉北汜合編《大公報·文藝》(滬版)。以老帶新，目的就是希望《文藝》重現昔日輝煌，在新的歷史時期展現新姿。

(一)《大公報》史書忽略抗戰勝利後的《文藝》

由方漢奇等著的《〈大公報〉百年史》，寫新記《大公報》文藝副刊，至1943年10月，楊剛奉調重慶，主編《大公報》渝、桂兩地的《文藝》副刊，就結束了。稱「由於這一時期楊剛兼任外交記者，分身無術，加上皖南事變後，政治形勢日益複雜，故《文藝》副刊較之從前，規模有所縮小，影響有所下降。」¹

吳廷俊著《新記〈大公報〉史稿》一書，談《大公報·文藝》副刊，從1943年11月7日起，《大公報》每周改出《文藝》一次，渝桂兩版同時刊出，由楊剛主編，也結束了。「由於《文藝》改爲周刊後，刊期長，篇幅小，再加上皖南事件後，重慶文藝界情況複雜，楊剛自己處境困難，故這一時期，《大公報》的《文藝》副刊與香港時期比較起來，影響要小得多。」²

這兩本研究《大公報》歷史的權威書籍，談到《文藝》只講到楊剛爲止，給人的印象，似乎《大公報·文藝》這一知名副刊，到此終結。事實上，在抗戰勝利後，《文藝》仍在出版。

¹ 方漢奇等編《〈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256。

²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頁353。

（二）《大公報》（滬版）復刊

《大公報》滬版於 1945 年 11 月 1 日復刊，復刊號上發表了題為《重來上海》的長篇社評，文章首先說：「今天，我們重來上海，和苦別八年的讀者見面，不禁無限酸辛，湧上心頭」。¹

「我們是一張民間報，自十五年改組復刊後，承全國各界的愛護，得有今日。二十年來，飽經憂患，同人等不揣愚陋，始終固守『不私、不盲』的社訓，對建國大業，盡其平凡之努力。現在我們也隨著國家復員而復員，上海版今日首先復刊，我們今後一本過去不畏強權，不媚時尚的傳統，繼續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²

（1）重返上海聯繫新舊作家

在復刊的《大公報》（滬版）上，《文藝》每周出刊兩次，每次半版，新五號字，版面安排大方得體，字型在滬報中也是較美較新的。刊頭「文藝」繼續沿用早年沈從文主編該刊時題的字。劉北汜於 1946 年 9 月 1 日進入上海《大公報》，《文藝》（滬版）先是蕭乾主編，新人劉北汜協助。不久，這項工作就全部由劉北汜承擔下來。

劉北汜不僅得到蕭乾的「言傳身教」，1947 年 10 月，當時從昆明來到上海，住在蘇州的沈從文還專門來信，向劉北汜介紹了他過去編《文藝》的一些經驗及聯繫的作者。沈從文、蕭乾像過去培育青年作者一樣，培育《文藝》編輯的接班人。

¹上海《大公報》，1945 年 11 月 1 日。

²上海《大公報》，1945 年 11 月 1 日。

過去常為《文藝》撰稿的巴金、靳以、李健吾、王統照等，對剛剛復刊的滬版《文藝》，表現一如既往的支持。巴金在《文藝》上發表作品《月夜夢鬼哭》，通過一個「鬼魂」喊出了千百萬人的心聲：「你說爲了自由與生存，爲了幸福與獨立，可是我們只看見官僚發財，投機家得利，……壞人享樂，好人受苦，東西在倉庫裡腐爛，而多數人缺乏一切。勝利給我們親人帶來飢餓、痛苦與貧困，在另一些人中間卻充滿著荒淫與無恥。」¹此文發表後，引起許多讀者的共鳴。

劉北汜接編後，繼承和發揚了《文藝》的優良傳統，廣泛聯繫作家，除巴金、靳以外，還有胡風、荃麟、葛琴、臧克家、楊晦、以群、葛一虹、戈寶權、許杰、蔣天佐、魏金枝、陳白塵、王西彥、碧野、綠原、豐村等。當時在上海的知名作家，幾乎都為《文藝》寫過稿子。《文藝》副刊刊登的作品質量較高，產生了較大影響。

劉北汜也陸續發表文學新人的稿子，包括路翎、冀仿、賈植芳(楊力)、曾卓、耿庸、王戎、何公超、駱賓基、李白、郭風、羊羣、何飛、單復(蘿白骷)、水岸(耿林莽)等的稿件，關注文壇生力軍。

(2) 出特輯提高影響力

劉北汜學習蕭乾在副刊組織「特輯」的方法，集中同類稿件，提高《文藝》影響力。1946年10月，魯迅逝世十周年時，《文藝》以一個整版刊出紀念特輯。刊出了以群、王冶秋、許廣平、林辰、蔣天佐、歐陽凡海、程造之、韋蕪和林炎等撰寫的九篇紀念文章，以及新波、刃鋒的木刻作品。這個特刊，在當時上海各大報刊中，篇幅是最大的，質量也是較好的。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187。

上海的作家們不僅自己常給《文藝》寫稿，還不時轉來其他人寫的一些作品。在巴金、靳以的支持下，《文藝》在1946年11月出過兩期紀念陸蠡——一位死於日本侵略者之手的散文家特輯。以後還出過紀念普希金的特輯，甚至出過揭露舊中國監獄的《牢籠生活特輯》。

1947年初，《文藝》連發了「新年號」兩期，第一期，刊了荃麟、楊晦、袁水拍、葛琴、李健吾、范泉的文章。第二期，發了馮雪峰、靳以、豐村、程造之的來稿。范泉是當時《文藝春秋》月刊主編，袁水拍正為《新民晚報》編副刊《夜光杯》。小說家豐村，出版過長篇小說《大地的海》，在這期特刊之前，豐村和范泉的名字，經常出現在《文藝》上。

進入五月，劉北汜又在《文藝》上發表鄭振鐸、許杰、梅林及何家槐紀念「五一」文藝節的稿子。梅林當時是全國文協秘書，許杰在滬西一所大學教書，已經為《文藝》寫過一些評論稿，對《大公報》滬版《文藝》非常支持。

1947年6月19日，《文藝》組織了一次特刊，紀念高爾基逝世十一周年，刊發中國兩位蘇聯文學研究專家戈寶權和葛一虹的文章。戈寶權當時在時代出版社主編《蘇聯文學》，葛一虹則編輯出版了十六開本精裝《蘇聯木刻》，專心致志於蘇聯文學與戲劇的介紹。這兩篇介紹高爾基的文章，都是精心之作，受到讀者的重視。

（3）《文藝》繼續提倡書評

這時期的《文藝》，刊物內容仍然以發表小說、散文、詩為主，也闢了幾個專欄，《書刊簡評》、《文藝新聞》、《木刻新作》等，過去為《書刊簡評》經常寫稿的劉西渭(李健吾)，此時忙於和鄭振鐸一起籌辦《文藝復興》月刊，寫得少了一些，李影心、常風的稿子卻沒有斷過。他們先後介紹過《文藝時代》、《木刻藝術》、《中國作家》等幾種新出的刊物。

書評專欄介紹過不少文藝作品，如《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受苦人》等。錢鍾書也為這個專欄寫過文章。《文藝》上還注重發表一些文學評論，許杰和蔣天佐(史篤)之間，展開過關於寫作與批評問題的爭論，一時頗為文壇所注目。

到了1947年，抗戰勝利初期交通閉塞的情況有所改善，各種報刊陸續多了起來，在抗戰初期經常見諸《文藝》副刊的《文藝新聞》一欄，刊出的數量也隨之減少。

(4) 版面調整《文藝》停刊

1947年，《大公報》滬版版面調整，增加了幾個周刊，每期一版，有洪深主編的《戲劇與電影》周刊、靳以主編的《星期文藝》、戈紹龍主編的《醫藥與衛生》週刊，陳伯吹主編的《現代兒童》，榮孟源主編的《史學》周刊，由潘際垌發排。而報社內部編的幾個副刊、專頁，包括《文藝》副刊，篇幅都被縮小，隨著廣告的多少而或大或小。

1948年10月，《大公報》推出《大公園》綜合性副刊，篇幅半版，每周見報四、五版，《文藝》則在廣告多時，篇幅隨之縮小，版面無法再固定，見報次數也隨之減少，主要刊登散文和詩。

上海解放後，《大公報》(滬版)成立了副刊編輯室，《大公園》繼續出版，《文藝》停刊。原有幾個由《大公報》聘請專家兼編的周刊，也不再出版了，改為三個周刊：《文藝周刊》、《星期影劇》、《讀書與出版》，篇幅都是整版。

(三)《大公報》(港版)復刊

《大公報》香港版 1948 年 3 月 15 日正式復刊，復刊號上發表了胡政之撰寫的《〈大公報〉港版復刊詞》，稱：「我們在八年抗戰中，事業由黃河流域而到長江流域，由長江流域而到珠江流域，一切都是團體行動，不知經歷了多少艱難困苦……我們之所以能在如此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團結了同人，吸收了若干青年同事，就是我們不敢妄自菲薄，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恢復港版，想要利用經濟比較安定的環境，加強我們為國家民族服務。」

1

1946 年 10 月進入上海《大公報》的姜鍾德，曾協助劉北汜編《文藝》(滬版)。1948 年 4 月，姜鍾德被調至香港《大公報》，接編《文藝》副刊，前任編輯羅承勛被調去編《地方通信》版了。辦移交時，他告訴姜鍾德，由於《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當了國民黨的「國大代表」，香港《大公報》又是胡政之親手主辦的，導致香港的進步作家都不給《文藝》供稿，副刊稿源困難。為解決稿荒，姜鍾德需多管齊下想辦法。

¹ 香港《大公報》，1948 年 3 月 15 日。

姜德鍾特別感謝巴金，當時他已是譽滿中外的文學巨匠，為支持在港版復刊的《文藝》，不止一次地寄來他的譯作，唐弢也多次以「若思」的筆名，寫來散文，以示支持。黎烈文也自台灣寄來了自已翻譯的法國小說。

艾蕪、王西彥等名家，紛紛把最新作品給了港版《文藝》。單復、阿湛、郭風、逢人等，更是經常來稿，有力地保證了《文藝》副刊的按期出版。

當時，姜德鍾還委託前任編輯羅承勛，向他熟識的香港文化人組稿。正在香港編《野草》的秦似、秦牧，答應給《文藝》(港版)寫稿，為免麻煩，他們不敢用真名，僅以「王某」、「林某」化名來寫文章。當時在上海《大公報》工作的蕭乾、劉北汜，均給港版《文藝》寫過稿。

《文藝》(港版)，讀者來稿不少，有些質量還比較高。有一篇讀者來稿，是一首抨擊當時內地保甲長凶橫殘暴的詩，感情激昂，語言鏗鏘有力。詩歌末尾大呼：「反抗就是一條路」，感染力很強。姜德鍾將之刊出時，為免和香港新聞法的條文抵觸，原標題《反抗就是一條路》中的「反抗」二字被刪掉了。

姜德鍾採取以上措施後，《文藝》(港版)稿荒問題算是解決了。在魯迅逝世紀念日，《文藝》也曾出過特輯。此外，還發表過不少評論，推薦進步作品，如刊登過趙樹理的小說、曹禺的《艷陽天》、谷柳的《蝦球傳》等的評論文章。

《文藝》(港版)還陸續登過聶紺弩、端木蕻良，鄒荻帆、公劉等作家新作，採用過黃永玉、方成、荒煙、余麗亞等畫家的作品，其中，黃永玉畫的刊頭，構思奇特，畫面新穎，受到讀者喜愛。後來，《大公報》(港版)推出另一個綜合性文藝副刊《大公園》，取代了《文藝》的地位，《文藝》逐漸從香港《大公報》淡出。

（四）《文藝》淡出《大公報》

儘管《文藝》在《大公報》滬版、港版復刊後，也曾繼承和發揚《文藝》傳統，除了名家捧場，也有新人支持，也曾開展書評及刊出特輯，但影響力逐漸減弱，《文藝》這個有過多年輝煌歷史的文藝副刊，於 1949 年前後在《大公報》滬版、港版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

（1）人員流動 版面不固定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滬版、港版編《文藝》的編輯經常變動，版面也不固定，隨著廣告的多寡而或大或小。這種人員的流動性、版面的不確定性，對《文藝》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直接影響讀者的閱讀習慣。

抗戰勝利後，劉北汜、羅承勛、姜鍾德、潘際垌、袁水拍等，相繼主編《大公報》滬版、港版的《文藝》副刊，但無論是名望、才能、人脈及綜合素養，都不能與他們的前任沈從文、蕭乾和楊剛相提並論。在《文藝》的組稿和版面編輯中，號召力不足，缺乏創意和特色。

（2）蕭乾只是掛名編輯

1946 年剛從英國返國的蕭乾，繼續在《大公報》工作，兼任上海復旦大學英文系和新聞系教授。1948 年 10 月，蕭乾再赴香港，擔任社評委員，至 1949 年 8 月，同家人一起乘「華安輪」，離開香港，經過青島到達解放區。在上海和香港期間，蕭乾均獲邀編《大公報·文藝》，但僅是掛名而已。

1978年，蕭乾在《魚餌·論壇·陣地》一文憶述：「1946年夏返滬，我只是名義上兼管《文藝》，實際工作是劉北汜、潘際垌兩位做的。那時我的工作已轉到國際問題方面了。港版起義後，我才第一次參加整個報紙的工作，也是第一次才嚐到熬通宵、揉著眼睛看大樣的報人生活。這期間，我編過一個短時期《文藝》，後來由於無法兼顧，就交給了正翻譯新聞電報的袁水拍了。」¹

（3）綜合性副刊崛起

1939年蕭乾在《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謹向本刊作者和讀者辭行》一文中，曾反省《文藝》這種偏重文藝副刊的出路問題。蕭乾稱：「我時常懷疑，在文藝刊物多於任何期刊的中國，究竟報紙的副刊還應偏重著文藝嗎？一個專業雜誌自有其特定讀者。如果文藝也算是一項專業的話，它自有其特定的讀者。但一個報紙的讀者卻沒有那樣單純。他們需要的知識必須是多方面的，但使用的可得是比新聞輕鬆些的文筆。如果報紙也是社會教育工具之一，應不應該把副刊內容的範圍儘量擴大些呢？」²

蕭乾編《文藝》多年的思考，可以說是深思熟慮，看到純文藝的副刊發展遭遇到的瓶頸，預見綜合性的副刊再度時興。抗戰勝利後，各種報紙、刊物陸續恢復，競爭加劇，《文藝》在《大公報》(滬版)停刊，在《大公報·文藝》(港版)被綜合性副刊《大公園》取而代之，風行多年的《大公報》純文藝的副刊，如今道路越走越窄。

¹ 蕭乾《魚餌·論壇·陣地》，《蕭乾文集》第4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23。

² 香港《大公報》，1939年9月1日。

三、《大公報》與沈從文、蕭乾和楊剛的命運

1949 年後，留在內地的《大公報》人，大都歷經浩劫，際遇坎坷。其中，《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三位編輯：沈從文、蕭乾、楊剛，命運雖有不同，但或多或少與《大公報》的命運連在一起。

（一）《大公報》走到十字路口

在抗戰時期，蔣介石一向看重「不黨」的《大公報》，他不看《中央日報》，不看《新華日報》，但每日必讀《大公報》。在蔣介石的辦公室、公館、餐廳裡，各放一份《大公報》，以備隨時翻閱。1944 年夏天，蔣介石還專門請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到重慶北岸作了一次長談。¹

1944 年春，國民黨當局答應美國記者赴延安參觀訪問，也讓中國記者參加，這個「中外記者參觀團」，包括《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在內。1944 年 6 月 12 日，「中外記者參觀團」抵達延安，毛澤東當晚在大禮堂舉行宴會，招待全體團員。入座之前，毛澤東讓《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坐在首席，孔昭愷一再推辭，最後在毛澤東一再堅持下，孔昭愷很不安地坐下。席間，毛澤東對孔昭愷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²毛澤東指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下令全國各家報刊稱共產黨為「匪」，而《大公報》沒有照辦。「不黨」的《大公報》，曾獲毛澤東的高度肯定。

但是，從前受國共兩黨器重的《大公報》，到了抗戰勝利後，政治生態驟變，形勢出現逆轉，陷入左右為難的尷尬困境。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加速了腐

¹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中國文史出版社，頁 296。

²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 183。

敗墮落的進程，這使《大公報》痛心疾首，於是向國民黨發出警告：莫失盡人心！

1945年9月14日，《大公報》發表社評《收復失土不要失去人心》，9月27日，再發表社評《莫失盡人心！》對接收大員「大搶出手」、「五子登科」，人民遭受「勝利的災難」，發出嚴厲警告，但國民黨方面對此似乎無動於衷，所做所為繼續喪失人心。

《大公報》視共產黨為在野黨，希望共產黨交出軍隊、勿以兵爭，而應走上所謂堂堂政爭之路。1945年11月20日《大公報》刊出《質中共》社評，稱一個國家有兩個系統的軍隊爭降爭地，絕不應該。希望中共放下軍隊。次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題為《與〈大公報〉論國事》的社評，稱《大公報》社評作者是國民黨當局一位妙舌生花的「說客」，予以嚴厲批駁。

1946年4月16日《大公報》在滬版刊登《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感嘆國土既歸來，還流同胞血。次日，又在《大公報》渝版、津版都刊登這篇社評，此舉更加激怒中共。4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針鋒相對，發表了題為《可恥的〈大公報〉社評》，嚴厲反擊。

抗戰勝利之後，中國共產黨沒有，也決不會如《大公報》所希望的那樣，放下軍隊，走所謂「政爭之路」；中國國民黨沒有，也決不可能如《大公報》所希望的那樣，實行民主政治，讓共產黨與它進行所謂的「政爭」。

國共兩黨的戰爭不可避免，一觸即發，《大公報》主張和平息戰的「中道」宣告破產。《大公報》本身，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1946年5月29日的《大公報》社評，深感自己「實在落於一條極狹的夾縫當中」。

（二）《大公报》易幟

1948年11月10日，經過《大公报》內部中國共產黨員李純青、楊剛反覆做思想工作之後，《大公报》總編輯王芸生，在香港《大公报》發表了社評《和平無望》，抨擊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支持人民解放軍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爭取真實而持久的和平。標誌著《大公报》從此告別政治中立，轉為「擁共」立場。

1949年2月27日，王芸生與文化界的其他知名人士陳叔通、柳亞子、葉聖陶、鄭振鐸、馬寅初、曹禺等人，在共產黨組織的安排下，從香港登上「華中輪」，啟程北歸。

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又發表了王芸生寫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是具有政治與文化兩重機能的私營企業，它檢討過去，開拓未來，也正是揚棄舊污，開拓新生。……從今天開始，《大公报》從機構到版面，都經過重大改革，內容固然嶄然一新，機構上也已民主化。今後的《大公报》，從經濟觀點說，是私營企業，而在精神上，是屬於人民的。」

1

但是，《大公报》這個「私營機構」，在新的政治生態之下，不久就開始土崩瓦解了。除了香港《大公报》得以保全外，1949年2月27日，天津《大公报》改為《進步日報》出版。1952年8月4日，重慶《大公报》終刊，改造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

上海《大公报》自發表新生宣言後，既沒改名，也未停刊，繼續出版，但已呈江河日下之勢。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人們爭相閱讀黨報，迫切需要了解

¹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共產黨的政策方針，上海《大公報》這張民營的報紙，初現「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景況。1953年，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在天津出版《大公報》，1956年遷往北京新館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公報》被新帳老帳一起算，成為報界挨批遭鬥的「重災區」，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公報》被迫停刊。

從此，《大公報》在內地的上海、重慶、天津三館，在疾風驟雨中全部停刊，且「文革」後一直未獲批准復刊，只有香港尚餘一家《大公報》，作為愛國愛港的左派報紙，仍在出版。

（三）沈從文封筆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夏天，沈從文攜家眷自昆明經上海，在蘇州小住後回到北京，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不久他又受聘任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的主編，同時還參與了《大公報·星期文藝》、《經世報》和《平明日報》文學副刊的編輯工作。

沈從文怎麼也沒想到，事隔多年再重編《大公報·星期文藝》，重新為《大公報》撰稿，長期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沈從文，卻反被政治找上門來，一場災難悄悄降臨。

（1）厭惡政治指責內戰

1945年，沈從文回到闊別九年的北平，坐車通過天安門時他百感交激，抬頭是熟悉的城頭樓角和藍天白雲，但腳下卻是等待出發的坦克，用千萬生命的死亡與流離轉徙，萬千理想的摧毀，萬千財富的消失所換來的勝利，又將被另

一場戰爭替代。直指「現實中的北京城讓人」焦慮和失望。直指「現實中的北京城讓人」焦慮和失望。沈從文這篇《談苦悶——聶清遺文引言》原刊於1946年11月重慶《大公報》，「恐北方青年尚未普遍見到，特再刊出。」，並特別加上編者按¹。

當時，美國特使馬歇爾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國共之間「調處」失敗，內戰全面爆發。面對這一嚴酷的現實，沈從文痛苦萬分，一種強烈的反抗情緒瀰漫心頭，再加上他一貫的對「現代政治」的厭絕，禁不住對內戰發表了激烈的意見。

1946年8月4日，沈從文在《大公報》發表星期論文《憶北平》，代表了他作者對「五四」以來中國社會歷經戰亂、曲折發展的歷史獨特的思考和評說。他深切憂慮：「昆明已發生的不幸，覺得實在象徵著國家明日更大的不幸。」²沈從文又在復刊後的《文藝》和《星期文藝》上陸續發表《懷昆明》、《一個傳奇的本事》、《湘人對於新文學運動的貢獻》³

1946年11月3日和10日，沈從文在《大公報》上發表長文《從現實學習》，強調戰爭的殘酷性、破壞性的一面，對內戰的國共雙方進行了無區別的指責。這是沈從文重要的一篇自我剖析文章，有人稱之為「是一份沈從文從湘西進入都市二十餘年的自傳綱要。」⁴沈從文說：「國家即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偉大玩火家在玩火的情形，大燒小燒都在人意料中。歷史上玩火的結果，雖常常是燒死他人時同時焚毀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會那麼用古鑒今。可是燒到後來，很可能甚麼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但是到那時，年青一代，要生存，要發展，總會有一天覺得要另外尋出一條路來！這

¹ 沈從文《談苦悶——聶清遺文引言》，《大公報》，1947年2月2日。

² 沈從文《憶北平》，《大公報》，星期論文，1946年8月4日。

³ 沈從文《一個傳奇的本事》，《大公報》，星期文藝，1947年3月23日。

⁴ 沈從文《從現實學習》，《大公報》，1946年11月3日。

條路必然是『爭奪』以外接受一種教育，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¹

沈從文以悲憫的眼光，審視這一場戰爭，他希望人類最終能以「理性」戰勝「愚蠢」，使自身擺脫「自相殘殺」的戰爭陰影。²

（2）「中間路線」受到清算

1948 年初，一場文化領域不斷升級的批判風暴，無可避免地降臨到沈從文頭上。「左翼」文藝陣營對沈從文的「中間路線」和自由主義文藝觀進行了清算。沈從文遭到批判的文章有《從現實學習》、《一種新希望》、《文學周刊·編者言》，還有 1948 年 1 月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一篇回憶性文章《芷江縣的熊公館》。

1948 年 3 月，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裡，發表了馮乃超和郭沫若的文章。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指責作者沈從文津津樂道地主的剝削，歌頌老爺太太們的德行，是「典型的地主階級文藝」，給沈從文戴上了「地主階段的弄臣」和「清客文丐」的帽子。

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則全面否定了沈從文的文學創作活動，把他稱為「桃紅色作家」。批判文章指責沈從文「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

¹ 《大公報》，1946 年 11 月 3 日。

² 轉引自《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之子》，徐榮街著，中華書局，頁 96。

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謚之爲『民族自殺的悲劇』……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¹

郭沫若指責沈從文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這裡所說的「報紙副刊」，主要指的就是《大公報》文藝副刊。這一篇《斥反動文藝》的大字報，很快全文張貼在北京大學校園裡，教學樓上還掛出「打倒新月派、現代派、第三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矚目驚心。

（3）缺席新中國第一次文代會

沈從文無法接受這些批判，他痛苦、惶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迎來了北平和平解放和共產黨新政權的建立。這時，許多與沈從文有著相同思想傾向的人，都以民主人士身份參與了國家大事，沈從文在新社會卻首先遭遇孤獨和冷遇。

1949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藝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與會代表名單上沒有沈從文。巴金來北京開會，約了靳以、辛笛、李健吾、唐弢等人一起去沈從文家中看望，沈從文仍然微笑著與朋友們聊天。儘管被誤解與排斥的痛苦糾纏著，沈從文卻沒有在老朋友面前露出絲毫怨言。

沈從文超黨派的自由民主主義立場，使他很難適應急劇變化的新社會、新時代，因言論獲罪的他，清醒地感到必須忍痛割愛，決心放棄「傳統寫作方式」，中斷文學生涯，鑽進古代服飾研究的故布堆裡，把筆擱下。這一擱筆，沒想到就是半輩子。一個文人的後半生，就此與文學絕緣，與寂寞相伴。

¹ 轉引自凌宇《名家沈從文》，頁167。

（四）蕭乾被打成「右派」

作為一個在西方世界駐足七年(1939—1946 年)的新聞記者，蕭乾很自然地用西方世界作為參照系，比照祖國的未來。他盼望西式的「民主」、「法制」，能夠使中國走上和平建國之大道。

1946 年至 1948 年，作為《大公報》社評委員，蕭乾一共撰寫了近二百篇社評。當時，國共談判已經結束，中國正處在兩種勢力大決戰前夕，在異國他鄉生活多年的蕭乾，對國共雙方立場、國內政治形勢所知不多，他依然像個「不帶地圖的旅人」，橫衝直撞，對自己看不慣的一切評頭論足，大肆宣揚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

1947 年紀念「五四」文藝節，蕭乾寫了一篇社評，其中提到：「過去三十年，中國文壇可說是一連串的論戰：有的是派與派爭，如《語絲》與《現代》，有的是針對著問題，如『藝術為藝術』，還是『藝術為人生』。那些論戰看起來是浪費，然而卻一面代表著當時中國作家對事的不苟，一面同派別主張之不同，也可以表徵著中國文壇盛極一時的民主。近年有些批評家對於與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是就文論文來指摘作品缺點，而動輒以『富有毒素』、『反動落伍』的罪名來抨擊摧殘。我們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們對文壇也寄以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義儘管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許與自己意見或作風不同者的存在 ……」¹

文章刊出後，郭沫若在 1948 年 3 月 1 日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發表《斥反動文藝》，聲討了所謂的紅、黃、藍、白、黑五種反動文藝，而最後一種「黑」針對的就是蕭乾。

¹ 《大公報》，1947 年 5 月 5 日。

「甚麼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想到鴉片，而我所想舉以為代表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這是標準的買辦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貴族的芝蘭』，其實何嘗是芝蘭又何嘗是貴族！……這位貴族鑽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報》這個大反動堡壘裡儘量發散其幽縵、微妙的毒素，而與各色的御用文人如桃紅小生、藍色監察、黃幫弟兄、白麵嘍囉互通聲息，從槍眼中發出各色各樣的烏煙瘴氣。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著了。就和《大公報》一樣，《大公報》的蕭乾也起著這種麻醉讀者的作用，對於這種黑色反動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勛就是政學系的《大公報》！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¹

1957年內地號召大鳴大放，蕭乾又忍不住「老調重彈」，呼籲獨立思考、言論自由。蕭乾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沒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前，他們有一句非常豪邁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生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利。」²

蕭乾強調「從『共同綱領』到憲法，我們國家對於人民享有言論、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規定。而且，解放以來，每個中國人都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政府從來也沒下命令查禁過一本書。可惜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寫作的自由了。」³蕭乾這篇長達五千字的文章，大聲呼喚民主與自由，立即引來了暴風雨般的批判。連帶蕭乾之前在《大公報》所寫的多篇宣揚自由主義的社評，新帳加老帳，蕭乾被批判為一貫以「自由主義者」自居，在「第三條路線」的幌子下，「販運反蘇反共人民毒貨」的徹頭徹尾的「洋奴」和「政客」。蕭乾的人生就這樣被腰斬為兩段——1957年前至1977年

¹ 香港《大眾文藝叢刊》，1941年3月1日。

² 轉引自《〈大公報〉名記者叢書：蕭乾卷》，《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頁34。

³ 轉引自《〈大公報〉名記者叢書：蕭乾卷》，《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頁34。

近二十年，戴著右派的高帽，被迫參加勞動改造。直至 1979 年，全國作協才確認蕭乾 1957 年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實屬錯劃。

（五）楊剛自殺

1948 年 8 月，共產黨員楊剛離美歸國，回國後第一個重大任務就是推動《大公報》轉變立場。《大公報》當時在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四地設館出版，乃國統區權威的輿論機構。

楊剛 1948 年 10 月直赴上海《大公報》總管理處，經過楊剛幾天的開導，《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逐漸明白形勢，消除顧慮，決定將《大公報》轉向「擁共」。1948 年 11 月 10 日，王芸生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社評《和平無望》，同時公開採用新華社的稿件，告別中立的政治立場。

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楊剛參與了把天津《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的工作，並擔任該報的黨組書記、主編。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楊剛作為副總編輯，主持了上海《大公報》的新生，1949 年 6 月 17 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王芸生執筆的《大公報新生宣言》。

楊剛其後正式離開《大公報》，調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員會主任秘書，1950 年 10 月，轉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秘書。1955 年，楊剛出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1957 年，是一個不平常的年份，全國反右派鬥爭愈演愈烈，楊剛積極參加了「反右」鬥爭。1957 年 6 月 8 日，她在《人民日報》發表第一篇反右社論《這

是爲甚麼》。6月9日，楊剛又以「金銀花」的筆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詩作《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揮戈上陣。

可是，1957年10月7日，楊剛突然自殺身亡，告別人世，沒有留下遺言。就在楊剛自殺前一天，她還參加了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大會。1983年，鄧穎超在爲《楊剛文集》出版而作的題詞中，讚揚楊剛是「黨和人民忠誠的優秀女兒」。楊剛的自殺至今仍是一個謎，就像《大公報》最早投向共產黨陣營的名記者范長江、孟秋江一樣，在連場浩劫之中，也是突然告別了人世。

（六）眾星隕落

《大公報》前總編輯王芸生的兒子王芝琛，在他的《百年滄桑》一書中寫道，「將《大公報》記者群，劃左中右，原意當然是想『依靠左派、團結中間派、孤立打擊右派』。可是，這樣的幹部路線，再經過不斷地『清理階級隊伍』，最後的結局是：百花凋零、眾星隕落。如果用『全軍覆沒』概括也不算誇張。」

1

儘管最後放棄了「四不」主張，《大公報》在內地的報館仍難逃停刊命運，堅持「不打筆仗」的《文藝》副刊，最終亦在筆仗開始之前就消失無蹤。早年亦師亦友的沈從文和蕭乾，後來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而年輕時情同手足的蕭乾與楊剛，當蕭乾被劃爲右派時，楊剛也表現出一貫的「大公無私」。信奉自由主義的沈從文、蕭乾在1949年後命運不濟，可以理解，而作爲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迫使《大公報》轉變立場有功的楊剛，卻在反右鬥爭中自殺身亡，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¹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113。

《文藝》副刊三位優秀的主編：沈從文、蕭乾、楊剛，一生榮辱毀譽，大部分繫於《大公報》，他們參與創造了《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輝煌，也目睹了《大公報》在內地各館的衰落，他們帶著許多無法填補的個人遺憾，和文人論政的新記《大公報》及不問作家只問作品的《文藝》一起，走進歷史。

第八章 結論

《文藝副刊》和《文藝》的主要貢獻

自 1926 年 9 月 1 日，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合組新記公司，續刊《大公報》以來，以其獨特的辦報思想、專業水準和經營得力，不出兩年，就由天津一份地方報紙，躍居成為具全國影響的大報。進入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公報》的各項事業進入鼎盛時期，《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經沈從文、蕭乾和楊剛薪火相傳，與時俱進，迎來了《大公報》文藝副刊歷史上的黃金時期，晉身為當時中國報界最著名的文藝副刊之一，《大公報》也從天津走向全國，最後紮根香港。

《大公報》文藝副刊也成為沈從文、蕭乾、楊剛，三位現代文學史、新聞史上名家的人生交叉點，他們盡己所長，用心血澆灌，為《大公報》文藝副刊帶來了新氣象、新風格，《大公報》文藝副刊也令他們攀上人生、事業的一個高峰。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都是在書報出版所劃定的文化空間中生存和發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與之相比擬的新的文化空間了。」¹《大公報》文藝副刊所提供的新的文化空間，所倡導的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注重技巧的文藝氣息、「只認作品不認人」的平等機會，以及無門戶之見的包容襟懷，時至今日，仍受到新聞界、文學界的推崇。

以往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文學史，往往偏重強調中國現代文學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片面強調以左翼文學為主的革命文學的主體地位。事實上，文壇是多

¹ 楊揚《文學的年輪》，花山文藝出版社，頁 248。

元發展的，沒有「右翼」、「中間」，何來「左翼」？與左翼文學或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公報》文藝副刊所集中的京派作家群，二者在現代文學史上交相輝映。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的歷史地位和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催生「京派」文學流派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股「左翼」文學的熱潮席捲上海文壇，迅速蔓延全成為三十年代文學的主潮。「左翼」文學推崇文學的政治化，鼓勵作家們參加政治鬥爭和政治運動，強調文學的政治宣傳功能和階級鬥爭功能。最流行的創作題材，就是政治題材，描寫革命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題材。

1930年3月，五十多位作家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為首的有魯迅、夏衍、馮雪峰、茅盾，以及原來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創造社、太陽社的主要成員。紅色鼓動詩、報告文學、雜文成為上海文壇最熱門的作品形式。

獨立於這股左翼文學大潮之外，用自己的藝術觀和創作成果對「左翼」文學有所糾正的，是北平文壇。有別於上海文壇的政治化傾向和商業化潮流，北平文壇強調文學與政治鬥爭保持一定的距離，呼籲尊重文學藝術的獨立和自由，反對文學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也反對文學商業化。京派作家以其鮮明的文學立場、傑出的文學貢獻，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之一。《大公報》文藝副刊，就是京派作家一個重要的文學陣地。

《大公報·文藝副刊》組織起來的這群北京作家，包括沈從文、朱光潛、

廢名、蕭乾、李健吾、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蘆焚，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梁宗岱、凌叔華、林徽因、馮至、曹禺等，他們所展示的文學才華和藝術風采，形成當時風格獨特、富於藝術魅力的創作群體。

《沈從文與〈大公報〉》一書的作者杜素娟評價《大公報·文藝副刊》稱：「正是由於北京文壇的崛起，使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呈獻南北之勢，從而避免了『左翼』文學『一元化』傾向，豐富了三十年代中國文壇。它對藝術風格多樣化、對藝術獨立性的呼籲，都對三十年代文壇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北京文壇的崛起，和《文藝副刊》的組織作用有著直接的關係。」¹

沈從文不止一次地強調一個好的刊物就是一所好的學校，而林徽因說得更直截了當：「我們可否直爽的承認一桩事？創作的鼓動時常要靠著刊物把它的成績布散出去吹風，曬太陽，和時代把晤的。」²《大公報》文藝副刊不僅為京派作家提供了發展壯大的陣地與空間，而且全面展示了京派作家的文學思想、創作風貌的發展與變化。

（一）《文藝副刊》是「京派」紐帶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新文學大發展的繁榮時期，各種文學流派應運而生。文學流派的形成，主要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因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學理念走在一起。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共同成立一個組織、發表宣言，如「左聯」、「創造社」、「太陽社」等，他們不一定有固定的刊物，但有經常的活動，發生論爭時站在同一陣線。另一種因共同創辦的雜誌而走在一起。一群趣味相投的文人，在大家共同的園地一起耕耘，惺惺相惜。如《新月》雜誌之於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現代》雜誌之於戴望舒、施蛰存為代表的「現代派」

¹ 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 60。

² 林徽因《惟其是脆弱》，《大公報·文藝副刊》，1933 年 2 月 23 日。

等。

因《大公報》的《文藝副刊》而走在一起的京派作家，沒有共同的組織，也沒有任何宣言，沒有自發或刻意地形成一個固定組織，有的只是由沈從文組織的文學聚會和在《文藝副刊》發表作品。

甚至京派作家自己都不承認有京派的存在。被譽為京派文人的重要代表的沈從文，直至晚年仍對京派一說持否定態度。據《沈從文晚年口述》一書中，沈從文堅稱：「京派也沒有啊，海派也沒有，真正沒有，具體的沒有。」¹說明在沈從文的心中，自始至終無黨無派，也沒有組織文學流派的打算。

但從當時的作家、作品來看，又確實存在「京派」這一文學流派。與絕大多數緊密型的文學流派相比，京派是鬆散的，即便京派作家內部，政治主張和文學風格也未必相同，這從《文藝副刊》發表的作品百花齊放、品種多元可見一斑。與當時因文壇領袖、發起人聚集在一起的文學流派不同，京派是跨黨派、跨地域的，因《大公報》的文藝副刊而走在一起。

有學者評析：「團結在文藝副刊『文藝副刊』周圍的京派作家，都是現代知識者，秉承『五四』芳烈的自由主義的精神，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在文學陣地上應和《大公報》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他們用人性論對抗著階級論，用個性義對抗著集體主義，作為文學者，他們最終又用創作自由對抗著創作工具論。他們置身在象牙塔中，或有衝向十字街頭的興奮，有關懷國事民瘼的良知，卻到頭來還沒有能力從時代最迅猛的訊息中理解民眾的歷史主動性。……他們活動在『文藝副刊』上，給歷史奉獻的是一件件迥異於左派右派的作品。」²

¹ 《沈從文晚年口述》，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67。

² 江南《從「文學」到「文藝」》，《文匯讀書周報》，2002 年 4 月 12 日。

（二）立足北平面向全國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文學流派，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排他性」，對於非本派、非本門的作家、作品，大多採排斥態度，這也是當時文學論爭激烈、筆戰盛行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上海文壇，口號之爭、路線之爭，唇槍筆戰，愈演愈烈。

相比之下，京派文人和《大公報》的文藝副刊顯得沉穩得多，除了沈從文偶爾就文學問題發表一些對事不對人的意見、引發過數次論爭之外，《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基本上恪守「不登雜文」、「不打筆仗」的自律，一心辦刊，埋首創作，不湊熱鬧，不捲入當時文壇大大小小的論爭「漩渦」。表現在《文藝副刊》上，園地對外開放，不偏不倚，沒有門戶之見。

除了京派，《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並不排斥其他流派，《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不僅立足北平，把北平作家組織起來，辦成北京文壇的文學園地，而且面向全國，不論左右、不論新老、有名無名，只要是高質量的文學作品，一律可以刊發。這種海納百川的包容性、開放性，使《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享譽全國，在文壇迅速崛起。

沈從文接編《文藝副刊》就定下一個原則：文章的寫作態度要嚴肅，不管什麼派別和主義、不管北方還是南方，不管政治立場是左還是右，只要作品好就行。這條「只認作品不認人」用稿原則，重視作品、兼容並蓄的編輯立場，直至蕭乾接棒編《文藝》，仍堅守不渝。

副刊約稿一般比雜誌難，但《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一直很幸運，從沒鬧過

稿荒。特別是到了上海，編輯手邊總有一、二十萬字積稿。雖然抗戰時期《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編輯部曾輾轉數地，從天津、上海、昆明到香港，文藝副刊編輯也幾度易人，與《大公報》文藝副刊關係緊密的京派作家及其追隨者、《大公報》文藝副刊培養起來的青年作家，對《大公報》文藝副刊始終不離不棄，成為《大公報》文藝副刊最穩定的作者群，任抗戰八年漫天的戰火也不能阻隔刊物與長期作者這種相互的依存、信任和扶持。

如果說，《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托起」了京派作家，那麼，京派作家及其追隨者，也托起了《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令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藝副刊》、《文藝》星光熠熠，佳作紛呈。

（三）擁全國最廣泛的作者群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文藝派別、文藝論爭最激烈的年代，不少大報，特別是上海的報紙，都捲入這些黨派之爭、口號之爭。如《申報》的《自由談》，大量刊登魯迅一人的作品，成為魯迅雜文的專欄。而《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以發掘文壇新人和刊登優秀作品為己任，因而贏得了大多數作家的支持。

經常為《大公報》文藝副刊供稿的作者之中，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及和他風格趣味相近的廢名、俞平伯等；有二十年來活躍於北京文壇的鄉土派作家蹇先艾、魯彥、許欽文等；有新月派及同它密切有關的葉公超、余上沅、饒孟侃、林徽因、凌叔華、孫大雨等；有文學研究會的冰心、鄭振鐸、朱自清等；有「左翼」作家張天翼、沙汀、艾蕪、歐陽山等；有東北作家蕭軍、蕭紅以及李輝英等；有民族主義文學家傅彥長；有崇尚國家主義的陳詮；有已經成名的茅盾；也有當時尚未成名但 1949 年後卻為中國文壇重鎮的

劉白羽、陳荒煤、嚴文井、吳伯簫等；有在創作或理論界獨樹一幟的老舍、巴金、朱光潛、李健吾等；也有包括蕭乾在內嶄露頭角的文藝新進，曹禺、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蘆焚(師陀)等；更多的，是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作者。

陳白塵的獨幕劇《演不出的戲》、巴金的《「愛情三部曲」作者自白》、胡繩的《上海通俗化問題之討論》和《偶然論在上海》等曾經轟動一時的作品和文章，都是在《大公報》副刊上發表的。

如此眾多作家作品，當然各有各的思想傾向、藝術風格和審美情趣，它們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爭奇鬥妍，把文藝副刊妝點得生動活潑，豐富多彩，《大公報》文藝副刊亦因此贏得「北方文壇重鎮」美譽。

二、爲報紙文藝副刊樹立核心價值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擁有眾多的報紙文藝副刊，消閒性副刊與文藝性副刊爭奇鬥艷，各有各的讀者群。但論對文學青年的培養、對新人新作的重視，《大公報》文藝副刊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其他報紙難以比擬的。

中國的報紙文藝副刊，從一開始就起著文藝搖籃的作用，這是文藝副刊的寶貴傳統。多少後來成爲大作家的，都是先經過向報紙副刊投稿起步，接著在雜誌上出現，最後，由出版社出書。這種「三級跳」的過程，許多人都經歷過，其中最具關鍵性的是副刊。

《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者沈從文、蕭乾、楊剛都經歷過成爲作家的這種「三級跳」，他們深深地體會到文藝副刊的核心價值所在：無論多大多有名的作家，開頭總都是無名的，從無名到有名，這是每個作家的成長過程。報紙文藝副刊，

正是這一過程的起點。

（一）副刊編輯定位——文學保姆

《大公報》的編輯沈從文、蕭乾、楊剛，都是從報紙的文藝副刊走上文學之路，《大公報·文藝副刊》更是蕭乾的文學搖籃。他們三人深深地體會到文藝副刊為文學「育苗」的重要性，深深體會到一個文藝副刊編輯作為「文學保姆」的重要性。所以，在眾多的報紙文藝副刊之中，《大公報》文藝副刊對新人新作的重視程度、培養力度、評價高度，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當時，一些大報的文藝副刊盲目地追逐名人效應，專登名家之作，像徐志摩主編之前的《晨報副鐫》，投寄來的新人新作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大公報》文藝副刊卻將育新人、登新作提昇為副刊的核心價值，堅信副刊如不以登新人作品為主，它就失卻存在的意義。這為中國報紙副刊的發展，帶來一股清流，樹立一面旗幟。

《大公報》文藝副刊重視對青年作者的培養，這種良好的傳統，始自沈從文編《文藝副刊》。當時大部分新進作家的初期之作，相當一部分是在《文藝副刊》上率先發表。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成為中國文學運動的中堅。

朱光潛評說：「在當時孳孳不輟地培育青年作家的老一代作家之中，從文是很突出的一位。他日日夜夜地替青年作家改稿子，家里經常聚集著遠近來訪的青年，座談學習和創作問題。不管他有多忙，他總是有求必應，循循善誘。」¹

雖然蕭乾編《大公報·文藝》期間，曾得到多位文藝界先輩的大力支持，

¹ 轉引自《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秀士》，頁 255。

然而一接手這刊物，蕭乾的思想很明確：自己的主要職責是為新人新作提供園地。「我認為品評一個文學刊物的成就，主要不是看它發表過多少資深作家的文章，而是看它登過多少無名的。」¹

（二）樂於發表作家處女作

當時，許多報紙副刊的編者習慣於見了無名作者的來稿就馬上丟入紙簍，沈從文、蕭乾早年投稿都曾遭此厄運。因此，當沈從文、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他們首先向投稿者保證：有稿必看，永不讓佳作漏到網外。

翻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就會發現巴金的文章在刊物上不總是首篇。近萬言的《寶馬》長詩寫得好，一登就是一整版——作者孫毓棠當時在詩壇上還是一位新丁。1979年，蕭乾曾經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生講課，談到了自己的文學上第一步：「1933年，當我有幾篇小說被《大公報·文藝副刊》採用後，我的信心加強了，才慢慢往雜誌上投，後來出版社要我把小說編成集子出書。文藝副刊是文藝青年的一個園地。」²

很多文學青年像蕭乾一樣，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處女作。劉祖春的第一篇小說《葦煙劃子》，發表於《文藝副刊》上。王西彥當年還是一個沒有名氣的青年，他第一個集子《夜宿集》中的作品，先經沈從文編輯在文藝副刊發表。楊絳的第一篇小說《璐璐你不要哭》，也是發表於《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嚴文井也是由《文藝》起步走上文壇的。

當年北京大學的「漢園三傑」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都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常客，何其芳在《文藝副刊》上經常發表詩歌，卞之琳1930年開始

¹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頁228。

² 蕭乾《我愛新聞工作》，《蕭乾全集》第4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163。

寫詩，他的作品主要發表在《文藝副刊》和《文藝》上，沈從文爲此專門寫了兩首小詩《何其芳雕像》、《卞之琳雕像》，刊登在《文藝副刊》上。李廣田描寫鄉間見聞和感受的散文，也受到同是「鄉下人」沈從文的欣賞。

而在蕭乾接編之後，《文藝》又推出一批青年作者，如沙汀、吳伯蕭、劉白羽、李輝英等，這些作者，後來都成爲名作家，他們早年的作品爲人們所廣泛認識，跟編輯蕭乾的慧眼分不開。

當時，很多報紙文藝副刊編者樂於登名人作品，常常拒絕新人的作品，原因可能是複雜的，但大多不離「避難取易」四字。中國報紙的文藝副刊，喜歡用名人作品招徠，以求借助「名人效應」，增高副刊「身價」，以吸引更多的讀者。

1995年8月，蕭乾在《今晚報》發表了一篇《龕裡龕外》的文章，對這種把「名人」供奉在佛龕的做法頗有微詞。每逢接到約稿信，要求爲刊物的什麼「名人專欄」或甚至「外地名人專頁」寫稿，蕭乾就困惑不解。他質疑碩士博士屬明確級別，可這「名人」又是怎樣一種規格呢？蕭乾稱：「三、四十年代我先後編過七年文藝副刊，魯迅、茅盾的稿子我登過，巴金、靳以更是我的常客。然而，我從沒把文藝界老一輩放在佛龕裡供奉，而且他們也絕不樂於那樣。」¹

新人初次提筆，陌生生地，新作必然要帶點粗糙。但大多數編者，卻不肯費功夫去刪改新人的作品，甚至干脆不用新人新作。可是，在許多時候，在硬粗粗的貨色下面，正潛蓄著無限的珍寶。這時，若有一位諳練的編者稍稍費點力氣，編者因此做了兩件功德——他不但把一篇味道新鮮的東西介紹給了讀者，更啓示給了那陌生的作者，給他信心、爲他指明了寫作的方向。

¹ 《今晚報》，1995年8月9日。

蕭乾始終堅持：「每個編者在工作上最值得驕傲的應當是這種介紹。一切新人也多半是在這種情形下鼓勵起、扶持起的。但這種編者是不多見的，這種外形少粗而貨色結實的新作就尤其稀少。」《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者，沈從文、蕭乾、楊剛，在充當新人新作的介紹人這一點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他們都為此不惜付出比別的編者更多的努力和心血。

（三）稿費劃一

《大公報》文藝副刊不僅在作品處理上不存歧視，副刊的稿費也有一個傳統原則：它必須一律。這在當時充斥「稿費黑幕」的文壇，顯得難能可貴。

報紙文藝副刊稿費劃一的好處有三：第一，勢利的編者再不能借著剝削新人來侍奉文壇元老。第二，文章至少像一般勞力一樣，可以光榮而公允得到它低微但是平等的報償。第三，更重要的，在精神上，給開始寫作的人不少自信力。通常，一個較小的數目後面，往往隱著的是一隻白眼，一種不應持有的藐視。

蕭乾本人就是靠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文藝作品，獲得稿費，完成了最後兩年的大學教育。蕭乾的第一篇小說《蠶》，1935年發表於沈從文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第一次收到稿費，蕭乾認為數目太大了，準備把它退回去。蕭乾曾詢問編輯沈從文：是不是為了鼓勵一個新人，編者個人要掏腰包補貼呢？沈從文告訴蕭乾，他給的不多也不少，和別的人一樣。由此，蕭乾不但獲得穩定的學費來源，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一點自信心，那才是生命裡最寶貴的動力。」¹

¹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44。

《大公報》文藝副刊採稿費劃一，從制度上，保證了新人新作與名家作品，處於同等待遇，享受同等待遇，鼓勵更多的文學青年，投入文學創作的行列。

三、引發全國性四次文藝論爭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曾發起、參與四次文藝論爭，四次都與沈從文有關。由於論爭引起魯迅、茅盾等作家的參與，令這四次文藝論爭的影響超越了問題本身。雖然《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傳統是不登雜文，不打筆仗，但這四次論爭演變的結果，讓《大公報》文藝副刊在新聞界、文學界，首次掌握了「話語權」。

自 1933 年接手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沈從文有了自己掌管的陣地，一向關心文壇的沈從文，希望將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同作者、讀者交流。這是四次論爭的出發點，結果演變為文藝論爭，違背了沈從文的初衷。

（一）京派與海派

1933 年 10 月，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一文，指陳文壇上的不良風氣：一些從事文學者以「玩票」、「白相」的態度從事創作，指出現代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實佔作家中的最多數。其意不在文學，一方面他們對寫作缺少嚴肅認真態度，一方面，對自己的作品又自吹或相互捧場，力圖出名、登龍有術。真正有志於文學事業的年輕人，應從這種態度中擺脫出來，在「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帶點兒呆氣的性格上，做出紀念碑似的驚人成績。」¹

¹ 《大公報·文藝副刊》，1933 年 10 月 18 日。

此文發表後，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作家杜衡的不滿，並在《現代》上發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認為北方作家「不問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這名詞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筆抹殺」，有失公道。¹

針對杜衡的指責，沈從文於 1934 年 1 月寫了一篇《論「海派」》一文回應，將「海派」一詞作了更明確具體的詮釋，如「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並引申為「投機取巧」、「看風使舵」等。為防別人誤解，沈從文特意強調兩點：一是與上述海派惡劣品質相反的茅盾、葉紹鈞、魯迅及大多數作家編輯不會成為海派，一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風氣，並不獨存在於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經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養這種「人才」與「風氣」。²

1934 年 2 月 3 日，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以栳廷石為名，發表題為《「京派」與「海派」》的文章，稱：「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將原先的爭論加以引申。³徐懋庸、曹聚仁等也在《申報·自由談》撰文，展開激烈討論。

1934 年 2 月 17 日，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關於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棄這種論爭。晚年沈從文回首這一次論爭，曾經說過：「魯迅罵的其實也是我罵的，他罵的就合理，我罵的就不合理，因為我罵的就得罪了他的關係。」⁴沈從文此言所指，是魯迅在雜文《文人無文》、《上海文藝之一瞥》中對上海文壇商業化和投機現象的批評，與沈從文當年的文章觀點相近，但文章際遇、論者際遇卻不同。

¹ 凌宇編《名家沈從文》，頁 128。

² 《大公報·文藝副刊》，1934 年 1 月 10 日。

³ 《魯迅全集》第 5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⁴ 《沈從文晚年口述》，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67。

（二）「禁書問題」

1934 年，國民黨正加緊對「左翼」文學運動的「文化圍剿」，2 月 19 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奉中央黨部之令，查禁了一百四十九種書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譯。

1934 年 2 月 28 日，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寫了《禁書問題》，對國民黨當局對於作家的迫害及文學書籍「檢查與禁止」行為提出批評，將之與古代的「焚書坑儒」相提並論。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國民黨控制的刊物、上海《社會新聞》的猛烈攻擊。

為此，施蛰存在《文藝風景》創刊號上著文，為沈從文辯護，指沈的原意不過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實為鑒，出之審慎而已。

施蛰存此舉卻招來魯迅的批評。7 月 5 日，上海《新語林》半月刊發表了魯迅署名杜得機的文章《隔膜》，點明文章的現實針對性：「施蛰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上，很為『忠而獲咎』者鳴不平，就因為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¹

（三）小品文問題

一年後，1935 年 8 月，沈從文發表《談談上海的刊物》，對上海出版的各種刊物進行了綜合評述，對幽默小品盛行提出較多的批評，甚至不承認小品文是真正的文學。他指出《論語》給讀者以幽默，作者隨事打趣，相去一間就是「惡趣」，《人世間》要人迷信「性靈」，尊重「袁中郎」，宣傳小品「比任何東西還

¹ 《魯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重要」，文章便慢慢轉入「遊戲」。¹該文貫穿沈從文兩個一貫主張。其一，作家應有嚴肅創作態度。其二，作家應注重文學作品本身的創作。

當時，上海文壇正出現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學與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圍繞小品文之間的論爭。當沈從文看法公諸於眾，首先招致上海「左翼」作家的紛紛指責。

9月12日，魯迅寫了《七論「文人相輕」——兩傷》，對沈從文的文章提出批評。「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竟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²

（四）差不多運動

1936年10月，沈從文發表了《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指陳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差不多」的現象及其產生原因。根據他這幾年編副刊的經驗，「覺得大多數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內容差不多，所表現的觀念也差不多。」失去作者個性的作品，變成了創作模式，招致讀者的反感。

文章指出，「凡事都缺少系統的中國，到這個非有獨創性不能存在的文學作品上，恰恰見出一個一元現象，實在不可理解。這個現象說得蘊藉一點，是作者們都太關心『時代』，已走上了一條共通必由的大道，說得誠實一點，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長進，因為缺少獨立識見，只知追求時髦，結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沈從文將「差不多」現象的根源最後仍歸結為文學與政治的結合。文章

¹ 《大公報·小公園》，1935年8月31日。

²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最後號召作家「來一個『反差不多運動』。」¹

刊發該文的《文藝》編輯蕭乾加了編者按，稱「這是對中國新文藝前途發了愁的人的一個呼籲。它代表一片焦灼，一股悲哀，一個模糊而真誠的建議。我們期待著他掀起的反應。」²

很快，《書人月刊》轉載了沈從文的文章，《文藝》也於2月21日組織了「反差不多運動」專刊，沈從文在上面發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觀點，闡述自己所持的文藝自由主義立場。

1937年春夏，「差不多」問題的討論在北方達到高潮，參加討論的作家幾乎普遍承認文學創作中「差不多」現象的存在，認為沈從文說的是「老實話」，切中當前文學創作不能深入的時弊。而在南方，卻引起不盡相同的反響。沈從文「反差不多」的矛頭針對文學與政治的結合，令一向主張二者緊密結合的「左翼」作家，對此十分敏感。

1937年7月，茅盾連續發表《新文學前途有危機麼？》、《關於「差不多」》，對沈從文的觀點提出批評。文章認為從新文學二十年發展歷史的全體而觀，矛盾中有發展，而沈從文單就現有的作品發議論，是把範圍縮小了。雖然所謂的「差不多」，未嘗不是文壇現象之一，但沈從文「無視了『視野擴大』這一進步重點而只抓住了『差不多』來做敵意的挑戰」。³將沈從文的評論，定性為「敵意」。

為了進一步澄清在文學與思想、與時代關係問題上產生的誤解，1937年8

¹ 《大公報·文藝》，1936年10月25日。

² 《大公報·文藝》，1936年10月25日。

³ 《中流》第2卷第8期，1937年7月5日。

月，沈從文又發表《再談差不多》一文。顯然，沈從文並非反對文學表現「思想」、「時代」，而是要求作家有真思想，對人生有深入獨到的認識和體驗，而不是滿足於從某種觀念出發進行創作，否則，就難免公式化傾向的出現。

這次討論前後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差不多」三個字成為文藝界流行的名詞。到了 1938 年，餘波猶存。其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全面展開，「差不多」問題的討論漸被新的文學形勢下出現的新的問題所代替。

以上四次文藝論爭，放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主義之爭、口號之爭、門派之爭此起彼伏的中國文壇和報業，不過是文人間因意見不同，引發的相爭或相譏而已，較少人身攻擊和挑釁的意味，火藥味也不濃。但沈從文與以魯迅、茅盾為代表的「左翼」作家之間的政見分歧、個人矛盾，卻因此而擴大，雙方的隔閡也有增加。

從客觀效果來說，這四次由《大公報》引發的文藝論爭，提升了《大公報》在文藝副刊在全國的知名度、受關注度，也凸顯沈從文的世界觀、文學觀，以及他在文壇引人注目的地位。

四、中國第一個文藝獎金——《大公報》文藝獎金

每逢提起《大公報·文藝》，人們往往就會想起 1936 年 9 月的「文藝獎金」。迄今為止，這是《大公報·文藝》唯一的一次，也是中國報業、文壇的一項創舉。當時，上海《申報》、《新聞報》和《大公報》三家競爭十分尖銳。到上海開業剛一年的《大公報》想盡辦法「闖牌子」。《大公報》文藝獎金的設立，一下子讓報紙的名字響徹黃浦灘。

爲慶祝新記《大公報》十周年，《大公報》擬搞一個全國徵文作爲紀念，蕭乾認爲搞徵文確實困難，首先是來稿量很大，看不過來，徵文裁判者總得請知名的作家，大家都忙，不可能逐篇去看，意見更難協調統一。倒不如仿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年一度的普立茲獎金，辦法是獎給已有定評的作品，這樣比較容易掌握。

蕭乾的建議獲得報社同意，《大公報》決定以後每年評選一次，由報館每年拿出三千元來，以一千元充文藝獎金(獎給一至三人)，以二千元充科學獎金，獎給一至四人。

「文藝獎金」邀請的裁判委員是北平、上海兩地與《大公報·文藝》關係較密切的幾位先輩作家：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聖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和凌叔華。由於成員分散，這個裁判委員會並沒開會，意見由蕭乾負責溝通和協調。經過反覆醞釀協商，投票推薦，到1937年5月公布出的結果是：小說《谷》(作者蘆焚)、戲劇《日出》(作者曹禺)、散文《畫夢錄》(作者何其芳)分別獲得《大公報》「文藝獎金」。

值得注意的是，得獎者蘆焚、曹禺、何其芳，都是在三十年代才踏入文壇的新人，何其芳的處女作發表於1929年，曹禺的處女作發表於1933年，《谷》是蘆焚第一本集子，1936年問世。

這次評獎轟動一時，具有多項指標性的意義。首先這是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次有了鼓勵作家創作的「文藝獎金」，開新文學史先例，對於鼓勵新文學創作，繁榮文學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次，這是中國報紙文藝副刊有史以來，第一次爲作家、作品評定「文藝獎金」，顯示新聞界對文學的高度關注。最重要的是這次評獎所帶出的重視質量、獎掖新人的信息，令廣大文學青年獲得鼓舞，

刺激了年青人進行文學創作的積極性。

五、林徽因編《文藝叢刊：小說選》

新記《大公報》借創刊十周年紀念的機會，除了舉辦「文藝獎金，還計劃從《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已刊出的作品中，編一本《大公報》的小說選，由誰來編？蕭乾認為只有林徽因最適當。因為自《大公報》文藝副刊創辦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認真仔細。

《文藝叢刊：小說選》的出版，在中國新聞史上開風氣之先，有別於一般的小說選集，它是文學與新聞聯姻的產物，代表了《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文學水平。

（一） 林徽因選了三十篇作品

蕭乾寫信邀請林徽因編小說選，她馬上答應了，並且很快就把選目寄到了上海。她一共選了三十篇作品。作者之中，有的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張天翼、凌叔華，有的如宋翰遲、楊寶、程萬孚、雋聞、威深等，當時「小荷才露尖尖角」，還不大為人所知。

入選作品，有蹇先艾《美麗的夢》、蕭乾《蠶》、宋翰遲《一點回憶》、祖文《避難》、李同愈《報復》、沈從文《箱子巖——湘行散記之一》、振聲《報復》、蘆焚《陰影》、叔文《小遲的悲哀》、楊寶琴《瘋子》、沙汀《鄉約》、前羽《享福》、徐轉蓬《失業》、沈從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湘行散記之一》、老舍《聽來的故事》、林徽因《模影零篇》、李健吾《書呆子》、季康《路路》、沈從文《一個戴水獺皮子的朋友——湘行散記之一》、雋聞《這年頭》、李輝英《驛

路上》、程萬孚《求恕》、凌叔華《無聊》、沈從文《過嶺者》、張天翼《善舉》、蕭乾《小蔣》、威深《黎明》、劉祖春《葦煙劃子》、蕭乾《道榜》。作品排序參照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文藝》上發表的時間先後。

（2）林徽因作《序》點評《大公報》文藝副刊

林徽因還為這本《文藝叢刊：小說選》寫了一篇《序》，稱「《大公報》文藝副刊出了一年多，現在要將這第一年中屬於創造的短篇小說提出來，選出若干篇，印成單行本供給讀者更方便的閱覽。這個工作的確使認真的作者和讀者兩方面全都高興。這裡篇數不多，但是聚在一個小小的選集裡也還結實飽滿，拿到手裡可以使人充滿喜悅和希望。」

林徽因還就這三十篇作品，作了評點和總結，從中也可看作是對《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評價，因為這些作品是《大公報》文藝副刊一年多來的代表作。

其一，在題材的選擇上，偏向農村、少受教育分子、勞力者的生活描寫。

在林徽因看來，文學作品題材的「偏」，說好一點，是這個時代對於他們——農人與勞力者有濃重的同情和關心，說壞一點，是一種盲從趨時的現象。事實上，這種題材上的「偏」，非《大公報》文藝副刊獨有。描寫勞工社會，鄉村色彩，是當時文壇的風氣，一些年輕作家，或個性不強的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容易因襲這種已有眉目的格調下筆。

其二，創作態度認真，但創造力量不足。

林徽因肯定入選作家們創造文藝的認真是毫無疑問的。拿單篇來講，許多

都寫得好，還有些特別寫得精彩的。但她認為，以創造界全盤試驗來看，還是顯得貧弱，缺乏創造力量。

其三，短篇小說為主，結構上顯得單調。

受篇幅所限，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刊載的，以短篇小說為主。在描寫上，大多數作品所取的方式都是寫一段故事，或以一、兩人物為中心，或以某一地方一樁事發生的始末為主幹，單純地發展與結束。

林徽因認為這是比較薄弱的手法。她質疑或是許多作者誤會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過窄的緣故。剖示生活大膽的斷面、貼近生活的矛盾，則少有作者嘗試，在林徽因看來是一種遺憾。

其四，短篇技巧成熟自然。

林徽因稱：「無疑的，在結構上，在描寫上，在敘事與對話的分配上，多數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的運用。」以往常見於新文藝早期，生澀幼稚和冗長散漫的作品，現在已完全斂跡。顯示《大公報》文藝副刊對技巧的提倡和「申冤」，開始見到了成果。這也說明此一時期作家對白話文的應用、對小說技巧的掌握，趨向成熟。在入選的作品之中，通篇的連貫，文字的經濟，著重點的安排，顏色圖畫的鮮明，已成為尋常的標準了。

六、提倡獨立書評開風氣之先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除了商業性的書商廣告，真正的書評尚未流行，甚至是文化界的一個有待填補的空白。《大公報》大張旗鼓地推動書評，甘

當書籍與讀者之間的橋樑，踏踏實實地推廣文化、引導青年，承擔了一個報紙文藝副刊的社會責任，也推動了書評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若論當時提倡書評口號最響、刊登書評數量最多、組織書評座談會陣容最大，非《大公報》文藝副刊莫屬。

《文藝副刊》和《文藝》所發表的書評，都是從文學本體出發的藝術批評，是從文學的內在結構、人物塑造、文學語言、文體探索等多方面入手，追求自由獨立的文學精神，這樣的「獨立」書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評論家的視野，但也因此形成了《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書評特色。總括而言，就是以純藝術批評的手法評論純文學作品，遠離政治與商業，不阿諛作者，不苛刻作品，不以個人愛憎為作品估價。

《大公報》文藝副刊所組建的書評隊伍、所發表的評論文章，都代表了當時文壇的最高水平。李健吾和常風，是《文藝副刊》和《文藝》兩位最活躍的書評家，他們獨特的批評觀念和文章風格，被評為「專業批評家」的代表人物。吳小如為《李健吾批評文集》一書寫序時稱：「從三十到四十年代，文藝批評領域中只有劉西渭和常風兩位帶有專業批評家性質，彼時寫這類文章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¹

（一）沈從文栽培書評家

早在吳宓為《大公報》編《文學副刊》時，就經常刊登書評，內容上以外國書的介紹為多，但國內的文學作品也偶有涉及。

沈從文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後，覺得經常刊登書評是一個好經驗，

¹ 郭宏安編《李健吾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頁3。

可以把文學界的新作品及時介紹給讀者，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新書動向，推動文化的傳播。沈從文推動書評，首先從書評人才培養做起，劉西渭、常風、李長之等加入書評隊伍，都是沈從文重點培養的結果。

1933年，李健吾由法國留學回到北平，適逢《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從此，成為這個副刊的主要撰稿人，第一篇書評，就是有關福拜樓（Gustave Flaubert）小說的評論¹，他在巴黎大學留學時曾專門從事福樓拜研究。李健吾在《文藝副刊》發表了很多書評，觀點獨到，文筆生動。他早年的文學評論集《咀華集》、《咀華二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以筆名劉西渭在《文藝副刊》和《文藝》上發表的。他始終認為：「一篇很有份量的評論，他是帶著滿腔的熱忱，更帶著一個評論家的客觀態度來進行評論的。」²

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常風，也是沈從文親自培養的年輕書評家，常風看過老舍的《離婚》，頗有感受，寫成《評老舍的〈離婚〉》一文，寄給老師葉公超，葉公超又推薦給沈從文。沈從文很喜歡作者不俗的觀點和文字，將該文刊登在《文藝副刊》上，並在文章後面登了鼓勵的附記。不久，沈從文還親自寫信給常風，稱《文藝副刊》很需要這樣的評論文章，希望常風以後常寫。

（二）蕭乾推動立體書評

蕭乾接手《大公報·文藝》後，從理論到實踐推動書評。除了書評作者的隊伍不斷壯大，書評欄目定期推出之外。為避免由一位書評家對作品「一錘定音」，蕭乾嘗試在書評中，引入「集體討論」，即邀請多位評者來談一部作品。集體討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談，有時還會反映評者的某些生活體會。為此，蕭乾當時用了三個整版來做試驗，希望用這種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場，超攻訐，

¹ 李健吾《福樓拜評傳序》，《大公報·文藝副刊》，1935年1月6日

² 田本相《曹禺傳》，十月文藝出版社，頁166-167。

不阿諛，不中傷，心平氣和，與人爲善的批評。

1937年元旦前後，曹禺《日出》劇本剛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藝》率先展開介紹和評論，蕭乾想通過它把評論搞得「立體化」一些。「集體評論」分兩次進行，佔據了《文藝》兩個整版，第一次參加評論的有謝迪克、李廣田、楊剛、陳籃、李影心、王朔、茅盾、葉聖陶、沈從文、巴金、靳以、黎烈文、陳荒煤、李蕤。¹這次集體評論之後，《文藝》又發表了曹禺的自述《我如何寫〈日出〉》，作爲對這次集體評論的一次答辯，文中對謝迪克、李蕤、陳荒煤等人的意見逐一作了回答。

曹禺對《文藝》組織的集體評論深表感激，他說：「我想坦白說幾句話。一個作者自然喜歡別人稱贊他的文章，可是他也並不一定就害怕人家責難他的作品。事實上最使一個作者（尤其是一個年輕的作者）痛心的還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裡，任它浮遊四海，沒有人來理睬。這事實最傷一個作者的自尊心。僥幸遇到一位好心的編輯，怕冷淡一位年輕作者的熱情，請許許多多前輩出來說話，讓《日出》也佔一點陽光。

讀了這些批評文章，使我驚異而感佩的，是每篇文章的公允與誠摯。」²把書評家和作家自述一起推出，這在當時報紙副刊中開創先河，不單是對曹禺一位作家，也不單是形式上的創新，它爲讀者認識作品、引起共鳴提供了多個角度、多條捷徑：既有評論家解讀，也有作者自述，還有讀者自己的評判和領悟。這種做法成爲《文藝》書評的一大特色，

¹ 《大公報·文藝》，1936年12月27日。

² 曹禺《我如何寫〈日出〉》，《大公報·文藝》，1937年2月28日。

（三）沈從文、蕭乾、楊剛都是書評能手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大力提倡書評，相比其他報紙副刊，有著獨特的人力資源。

沈從文的書評，在當時曾傳誦一時，他以周圍的作家同行們為對象，寫了不少評論文章，推介他們的作品，如《論周作人》、《論廢名》、《論郭沫若》、《論魯迅》等，膾炙人口，後來結集出版，題為《沫沫集》。沈從文在評論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時，認為魯迅看人生是「隔」的，不透，作品風格鬱悶阻澀；周作人看人生是「不隔」的，所以作品會如秋水一般清澈透明。沈從文並將這種精神境界稱為「格」。¹ 早年，沈從文還為很多青年作者寫了數目可觀的序，這些都是很好的書評文章。蕭乾的第一本小說集《籬下集》，就是沈從文寫的序言。

蕭乾是新聞系科班出身，他的大學畢業論文選了個介乎新聞與文學之間的題目《書評研究》，他認為中國應當大力提倡書評，因為它是推廣和提高文化的必要手段。這些宣揚書評的文章，陸續刊於《大公報·文藝副刊》和《國聞周報》上，後來結集出版，成為蕭乾的第一本書。在編《大公報·文藝》的七年中，蕭乾從理論到實踐，力推書評。

楊剛最早在《大公報·文藝》露面，是書評家的身份，是蕭乾組織的書評隊伍重要一員，由於楊剛畢業於燕京大學，主修英國文學，蕭乾分工讓她主要負責評論歐美的文學作品，斯諾（Edgar Snow）《活的中國》一書出版，楊剛很快就寫了書評。

《〈大公報〉一百年副刊文粹》收錄了一篇楊剛寫的書評《亨利巴比塞》，

¹ 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頁84。

原載於1935年9月23日的《大公報·文藝》，全面評價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y Barbusse)的創作特色，全文約四千字，寫得熱情洋溢，一氣呵成。在《大公報·文藝》組織的多次有關作品的討論中，楊剛都積極參加，踴躍投稿。楊剛往往在評論作品時聯繫到一些理論問題來展開，較一般的書評視野更為廣闊。

由於沈從文、蕭乾、楊剛三位編輯都重視書評、寫作書評、致力推廣書評，令《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組織了當時文壇陣容最強的書評隊伍，最早加盟的有李健吾、李長之、常風、李影心、楊剛等，其後再加入的有陳荒煤、李宸冬、黃照、陳籃（張秀亞）、張庚、劉榮恩、宗瑋等。《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者與書評作者一道努力，使書評真正成為作家與讀者之間的「用同情和公正搭成的橋樑」。¹

七、《文藝副刊》和《文藝》與時俱進

報紙文藝副刊的風格形成，有著濃厚的個人色彩，與文藝副刊編輯本人本身的文學素養、編輯方針、朋友圈子，息息相關。因而，同一報紙文藝副刊，在不同編輯的手上，或多或少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同是副刊編輯，沈從文與蕭乾都致力挖掘文學新人，讓文藝副刊成為千千萬萬文學青年發表作品的重要園地。但沈從文花很大的精力去改稿，關於沈從文的改稿，蕭乾在《認真：一個妥實的出路》有過生動的描述。「天還黑著的時候他就起來，為了一篇短文，他不憚抄改四五次，每次他都發見文章還可以改得更好些。像一位朝奉稱銀兩似地，他把每個字重新掂一掂，在分量上他一點也不肯馬虎。」

¹ 曹禺《我如何寫〈日出〉》，《大公報·文藝》，1937年2月28日。

而蕭乾做了多年的《大公報·文藝》編輯，對於副刊的其他作品，蕭乾輕易不去刪改。只有在書評這一欄，遇到文字過於尖刻或跡近挖苦時，蕭乾總在保持評者的觀點及評價的前提下，盡量把帶刺的字眼刪去。

又如，同編《文藝》（港版），同時致力發表抗戰文學，蕭乾更注重作品的文藝性，楊剛更注重作品的戰鬥性。《文藝》（港版）在楊剛接手後，一個顯著特色，是增加了來自敵後遊擊區作家的戰地生活報告。「雖然楊剛接編前，文藝副刊曾發表過不少來自延安的作品，而自楊剛接編後，文藝副刊的版面，幾乎被延安的作家所『佔領』。」¹

報紙文藝副刊的風格，也與時代發展密不可分，時代不同，讀者的要求、口味也隨之改變，作為大眾傳媒的一部分，必須時刻考慮「受眾」需求，即便是同一副刊編輯，文藝副刊面貌也必須與時俱進，否則便被時代淘汰。沈從文、蕭乾、楊剛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因為編者不同，時代背景不同，又有了不同的風貌。

蕭乾說：「自從我接手編《文藝》以來，它經歷了一番巨變。原先它穿的彷彿是士大夫的長袍馬褂，聯繫較多的是『五四』早期的作家，我經營後，新一代作家群成為中堅力量，可以說是穿的是學生服。在香港復刊後不久，學生服也穿不住了。隨著大時代形勢演變，刊物換上戎裝。」²蕭乾這一番話，形象地展現了《文藝副刊》和《文藝》，由天津、上海，到武漢、香港刊出的種種變化，這種變化折射出社會的風雲變幻和《大公報》的歷史變遷。

除了作品內容發生變化，反映戰爭、揭露日本、描寫延安的作品在《文藝》

¹ 王芝琛《百年滄桑》，中國工人出版社，頁70。

²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姆》，《蕭乾文集》第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頁240。

港版增多，《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形式也發生變化。1935 年，蕭乾初進《大公報》，花大力氣將介紹戲曲、掌故的《小公園》，改造為純文學刊物，棄綜合性，突出文藝性。到了國難深重的 1939，同樣是蕭乾，深感非常時期的文藝副刊，承擔更多文化傳遞的使命。他編《大公報》的《文藝》（港版），開始打破純文學的框框，周六、周日推出的綜合版，從文化角度來揭示日本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更能體現報紙時效性，加強新聞性、知識性，擴大了文藝副刊的傳播功能和對社會的直接影響。

《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由沈從文、蕭乾、楊剛所開創、引領的文藝副刊風氣之先，所堅守的獨立精神、包容開放、與時俱進的專業操守，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新聞史上，獨樹一幟。沈從文、蕭乾、楊剛個人，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共同之處，是與《大公報》維繫了長久的關係，是與《大公報》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作為《大公報》人，他們參與和見證了中國新聞史上「文人辦報」的歷史，參與和創造了新記《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輝煌，他們的名字與《大公報》交相輝映、閃爍天際。

附錄一：

A Study of Takungpao's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the 1930s and 40s

'Ta Kung Pao', the oldest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in China, which was founded on 17 June 1902 and approached its 106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is the medium that recorde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 Its Hong Kong edition, issued on 13 August 1938 and re-issued on 15 March 1948, has witnessed the highly volatil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50 years. This thesis focuses mainly on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of Ta Kung Pao in the 1930s and 40s, edited by famous writers from Shen Chongwen (September 1933-April 1936), Xiao Qian (April 1936-August 1939) to Yang Gang (September 1939- December 1941).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not only printed the works of the most established writers in China, they were also the "Literature Cradles"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writers who later raised to greater fame. Most young writers made their debut on the pages of these two literary supplements.

附錄二：

《文藝叢刊：小說選》序

林徽因

大公報文藝副刊出了一年多，現在要將這第一年中屬於創造的短篇小說提出來，選出若干篇，印成單行本供給讀者更方便的閱覽。這個工作的確該使認真的作者和讀者兩方面全都高興。

這裡篇數不多，但是聚在一個小小的選集裡也還結實飽滿，拿到手裡可以使人充滿喜悅和希望。

如果我們取鳥瞰的形勢來觀察這個小小的局面，至少明一個最顯著的現象展在我們眼下。在這些作品中，在題材的選擇上似乎有個很偏的傾向：那就是趨向農村或少受教育份子或勞力者的生活描寫。這傾向並不偶然，說好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於他們——農人與勞力者——有濃重的同情和關心，說壞一點，是一種盲從趨時的現象。但最公平的說，還是上面的兩個原因都有一點關係。描寫勞工社會，鄉村色彩已成一種風氣，且在文藝界也有一點成績。初起的作家，或個性不強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覺的，因襲這種已有眉目的格調下筆。尤其是在我們這時代，青年作家都很難過自己在物質下享用，優越於一般少受教育的民眾，便很自然的要認識鄉村的窮苦，對偏僻的內地發生興趣，反倒撇開自己熟識的生活不寫。

拿單篇來講，許多都寫得好，還有些特別寫得精彩的。但以創造界全盤試驗來看，這種偏向表示貧弱，缺乏創造力量。並且為良心的動機而寫作，那作品的藝術成分便會發生疑問。我們希望選集在這一點上可以顯露出這種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刺激作家們自己更有個性，更熱誠的來刻畫這多面綜錯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

除卻上面對題材的偏向以外，創造文藝的認真卻是毫無疑問的。前一時代在流暢文字的煙幕下，刻薄的以諷刺個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說，現已無形的擯出努力創造者的門外，衰滅下去幾至絕跡。這個情形實在也值得我們作者和讀者額手相慶的好現象。

在描寫上，我們感到大多數所取的方式是寫一段故事，或以一兩人物為中心，或以某一地方一樁事發生的始末為主幹，單純的發展與結束。這也是比較薄弱的手法。這個我們疑惑或是許多作者誤會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過窄的緣故。生活大膽的斷面，這裡少有人嘗試，剖示貼己生活的矛盾也無多少人認真的來做。這也是我們中間一種遺憾。

至於關於這裡短篇技巧的水準，平均的程度，編選人卻要不避嫌疑地提出請讀者注意。無疑的，在結構上，在描寫上，在敘事與對話的分配上，多數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的運用。生澀幼稚和冗長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藝早期中毫無愧色的散見於各種印刷物中，現在已完全斂跡。通篇的連貫，文字的經濟，著重

點的安排，顏色圖畫的鮮明，已成為極尋常的標準。在各篇中我們相信讀者一定還不會不覺察到那些好處的，為著那些地方就給了編選人以不少愉快和希望。

最後如果不算離題太遠，我們還要具體的講一點我們對於作者與作品的見解。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誠實的重要還在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麗之上。即是作品需誠實於作者客觀所明瞭，主觀所體驗的生活。小說的情景即使整個是虛構的，內容的情感卻全得藉力於迫真的，體驗過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虛假來支持著傷感的「情節」！所謂誠實並不是作者必需實際的經過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確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極明瞭，在感情上極能體驗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許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鮮，而故意的選擇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並不熟識的生活來做題材，然後敲詐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鋪張出自己所沒有的情感，來騙取讀者的同情。這種創造既浪費文字來誇張虛偽的情景和傷感，那些認真的讀者，要從文藝裡充實生活認識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煩和失望的。

生活的豐富不在生存方式的種類多與少，如做過學徒，又拉過洋車，去過甘肅又走過雲南，卻在客觀的觀察力與主觀的感覺力同時的銳利敏捷，能多面的明瞭及嘗味所見，所聽，所遇，種種不同的情景，還得理會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關係與牽連，固定的與偶然的中間所起戲劇式的變化，最後更得有自己的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學。

一個生活豐富者不在客觀的見過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觀的能激發很複雜，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夠同情於人性的許多方面的人。

所以一個作者，在運用文字的技術學問外，必需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觀與客觀之間，感覺和了解之間，理智上進退有餘，情感上橫溢奔放，記憶與幻想交錯相輔，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筆下才現著活力真誠。他的作品才會充實偉大，不受題材或文字的影響，而能持久普遍的動人。

這些道理讀者比作者當然還要明白點，所以作品的估價永遠操在認真的讀者手裡，這也是這個選集不得不印書，獻與它的公正的評判者的一個原因。

附錄三：

論文參考書目、資料

有關大公報（總論）

- 陳紀滢：《胡政之與大公報》，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
- 陳紀滢：《抗戰時期的大公報》，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 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 丁淦林：《中國新聞事業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方漢奇（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 方蒙（編）：《〈大公報〉與現代中國》，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 馮並：《中國文藝副刊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 郭汾陽、丁東：《報館舊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 高恆文：《〈大公報·文藝副刊〉在「京派」發展史上的意義》《文藝理論研究》，1998，2期。
- 郭志剛、孫中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黃世坦編：《回憶吳宓先生》，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
- 李白堅：《中國新聞文學史》，上海：上海文學出版社，2004。
- 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孔範令（編）：《二十世紀文學史》，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 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錢剛：《舊聞記者》，中華書局，2006。
- 孫昌熙、張華（編）：《楊振聲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 沈衛威《〈大公報·文藝副刊〉與新文學姻緣》，《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期。
- 王謹、胡玫（編）：《胡政之先生紀念文集》，四川，2002。
- 王芝琛：《百年滄桑》，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 王芝琛、劉自立（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 徐鑄成：《報海舊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 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湖北：武漢出版社，2002。
- 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 周雨：《大公報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 朱傳譽編：《張季鸞傳記資料》（一、二），台灣：天一出版社，1979。

鄭師渠：《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我與〈大公報〉》，香港：大公報出版社，2002。

《〈大公報〉一百年》（上、中、下），香港：大公報出版社，2002。

《〈大公報〉一百年社評選》（上、下），香港：大公報出版社，2002。

《〈大公報〉一百年歷史人物》，香港：大公報出版社，2002。

《〈大公報〉一百年副刊文粹》（上、下），香港：大公報出版社，2002。

沈從文

杜素娟：《沈從文與〈大公報〉》，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

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對作為文學家的沈從文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凌宇：《沈從文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巴金、黃永玉等：《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沈從文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第1卷至第12卷。

金介甫(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傳》，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吳立昌：《「人性的治療者」——沈從文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王保生：《沈從文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

劉淑玲：《沈從文的文學觀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定位》，河南社會科學，2004，12卷3期。

徐榮街：《名人眼中的沈從文——湘西之子》，中華書局。

《沈從文晚年口述》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凌宇(編)：《名家沈從文》。

蕭乾

鮑霽編：《蕭乾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丁亞平：《別離在新世紀之門——蕭乾傳》，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傅光明(編)：《蕭乾文集》，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第1卷至第10卷。

傅光明：《人生採訪者蕭乾》，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

傅光明、孫偉華：《蕭乾研究專集》，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

傅光明：《解讀蕭乾》，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

智效民：《蕭乾與楊剛》，香港：香港書屋，1998，4期。

也斯：〈寫小說的蕭乾與寫報導的蕭乾〉《街巷人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大公報〉名記者叢書·蕭乾卷》，香港：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07。

楊剛

《楊剛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大公報〉名記者叢書·楊剛卷》，香港：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07。